

# 刘少奇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六九

下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刘少奇



## 后 记

《刘少奇年谱》于一九九 年写出初稿。经反复讨论、修改，一九九三年底完成送审稿。在送有关领导审核，并征求专家意见后，又对全书补充了大量材料和作了进一步加工，一九九五年定稿付排。

本书在李琦指导下编写，他审阅了部分书稿。

编写组成员：

主 编 刘崇文陈绍畴

副主编 马济彬黄峥

分段编写人：

1898 年至 1928 年——马济彬、周志兴、吴美华

1929 年至 1935 年——马济彬、陈君聪

1936 年至 1939 年、1941 年——陈绍畴

1940 年、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陈绍畴、姚勇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9 月——朱元石、张飞虹

1949 年 10 月至 1953 年——黄峥

1954 年至 1958 年——周以漠、张文和

1959 年至 1961 年——马云飞、吕小蓊

1962 年至 1966 年 4 月——马云飞

1966 年 5 月至 1969 年——黄峥

全书由刘崇文、陈绍畴负责修改、定稿。

参加本书审读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秀鑫、陈文斌；军事科学院毕建忠；中共中央党校陈雪薇、范守信、金春明、盖军；中央档案馆齐得平、曹雁行。还有本室力平和毛泽东研究组、周恩来研究组、朱德研究组、邓小平研究组、综合研究组、注释组、科研局、档案处的有关同志。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本书的编写十分关心，并审读了书稿。

中央档案馆提供本书使用的档案资料。本室档案处、图书资料室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少奇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

## 1946年四十八岁

1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一）杜聿明[1]部第一步进攻阜新，第二步将向热河进攻。傅作义一部已向张家口地区旗下营攻击了一下。阎锡山一部由大同向东出扰。（二）李先念部已到大悟山，王树声、戴季英部到息县、经扶、光山境，他们将继续向东转移，决心与新四军军部靠拢。（三）据陈毅来电，他们在鲁南方面的作战很有把握。（四）依目前形势看，内战一时还停止不了，我们只有决心战下去。但应更有力地宣传停止内战，阐明内战责任在彼。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五师主力已决心向东转移，你们须作有力之接引与配合，望令淮南军区全力注意此事，迅速加以部署，增强路西兵力，并令接引部队与五师直接通报，”“徐州战役已达紧张阶段，华中主力及粟裕、张爱萍应集中徐州附近，参加这一战役。”

出席中共中央机关元旦团拜晚会并讲话。

1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肖克、罗瑞卿并告各中央局、李运昌电：“据息，苏军早请国民党军队到沈阳、长春，但国民党借口无冬服，故意迟延前去，而集中兵力进攻热河，顽军[1]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目的确在赤峰、承德，企图占领此二点，隔断我华北与东北联系，然后和我谈判停战。现热河情况已十分紧急，望速部署打击进攻之顽敌，并速组织赤峰、承德一带之物资向安全之乡村撤退，万不可大意。我在锦州、朝阳、阜新抛弃大批物资教训必须记取。不论顽敌已否侵占承德、赤峰，我均须坚持热河阵地，打击顽军，直至顽军退出热河为止。现我在重庆已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望你们在军事上消灭敌人一二个师，阻止敌人进攻，以配合重庆的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肖克、罗瑞卿、林彪、李富春电：“关于立即停战事，有可能在近日实现。国民党企图在停战前占领热河，因此热河的命运可能在近日决定。如我能给顽军以打击，迟滞顽军前进，保卫承德及其他要点在我手中，则我在热河仍可占有优势地位，如我不能保卫承德，在今后数星期内失去承德，则我在热河至多只能占有乡村。因此，最近数星期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而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冀东及杨、苏[1]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顽军，保卫承德。”

1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肖克、罗瑞卿并林彪、黄克诚、李运昌等电：“国民党、马歇尔已同意立即停战，双方停战命令可能于十数日内下达。望你们即令前方部队死守平泉、凌源、承德，不得退让，同时迅速集中兵力打击进攻之顽军。林、[1]杨，指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苏，指苏振华，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黄[1]应不惜重大牺牲，打击阜新至义州之敌，截断铁路，牵制顽军西进。李运昌、黄永胜部应以一切努力阻敌前进，截断顽敌之后方铁路交通。这一切作战之目的是为保持热河这一战略要地于我手中。最近一二星期的战斗带着决定的意义，各部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分局并华东局电：“现在国共谈判，因有美国

参加，很可能于最近停战。在停战后将继续讨论我之驻兵、恢复交通及参加政府等问题。如我在江南仍有游击队活动，我仍可争取在江南的某种合法地位，如驻兵若干及参加若干县政府等，这对我在江南今后的工作关系很大。望你们设法坚持并相机发展江南的游击战争。浙南、闽东游击更须坚持并发展之。”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并告陈毅电：“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的同意并报告军委。”

1月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同时，周恩来和张群草拟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其中规定：“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国共谈判由于马歇尔的参加，双方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军事冲突并双方恢复交 [1]林、黄，指林彪、黄克诚。通，可能于最近成立协议，停战命令可能于最近十天内下达（但有可能再拖延若干时日）。但国民党在停战前可能向我作突然之袭击，如在热河，国民党军即正进行积极的进攻，企图在停战前控制更多的要点，造成对彼有利之形势，然后实行停战。望各地提高警惕，坚守阵地，勿作轻易之退却；对于来攻之敌，仍须坚决彻底消灭之。在最近十数日内，我军对于深入我区之据点，如能拔除者，应迅速拔除；对于某些交通线能控制者，应迅速控制。一切行动须有在十天后再作一结束之准备，但不应该对国民党发动战略性之进攻战役。在国共停战谈判中，我方声明对未解除武装之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除外；满洲问题亦除外。”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故意不加重重视，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它限制政协的职权及政协开会时间。而我们必须坚持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如果政协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肖克、罗瑞卿电：“请令黄永胜所率之四个团在朝阳以东坚守数日，务必不惜牺牲，保卫朝阳，以利我之停战谈判。从我向国民党抗议其进攻热河后，各方影响很大，即美国合众通讯社亦谴责国民党，外面形势对我很有利。”

1月7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扫清津浦路西之伪顽问题致刘伯承、邓小平并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电：“冀鲁豫部队进攻济宁、聊城、博平，扫清津浦路西之伪顽，甚为必要。山东方面应即密切配合，并须迅速动作。”“以后刘、邓与陈、张、饶、黎应直接规定配合，不必经过延安。”

周恩来与张群、马歇尔会谈，讨论《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内容。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以政府要从苏联手手中接收主权为名，提出东北和华北的赤峰、多伦例外。

1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关于停战、运兵，就我们方面来说，东北一起解决，不除外为好。否则，国民党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东北停战与运兵问题，如此则东北问题可能久延不决，对我不利。关

于赤峰、多伦问题，可向马歇尔、张治中声明，如国民党军队进入赤峰、多伦而不退出，停战即不可能，我并将在其他方面采取攻势。

1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对热河之进攻，估计数日内蒋军可能到赤峰，届时我将给各地指示予以报复。如国民党坚持到赤峰、多伦的要求，你可延缓下达停战命令，不必着急，以便在各地痛打国顽一下，然后下令停战。如此形势，你们可在政治协商会议报告谈判经过，痛骂国民党迟延并无诚意停战，同时确实要求马歇尔在停战未确实实现以前停止运送国民党一切军队到华北和满洲。”同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反对国民党政府从中共手中“接收”赤峰、多伦的要求。经马歇尔找蒋介石谈，国民党方面撤回这一要求。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东北局电：“国共停战谈判，原则已议妥，但停战命令因国方要求进兵赤峰、多伦除外而未通过，如国方此点让步，日内即可下达。”“你们打击阜新、大虎山、沟帮子之顽军，应从速动作，一方面可牵制向赤峰、承德前进之顽，另方面恐在停战令下后不好再打。”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停战谈判已有结果，命令可能在日内下达，如果不发生中途大的变化，和平新阶段可能即从此开始。但你们仍须准备国民党中途变卦，继续战争。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华东局、华中分局电：“据郑、李[1]电告，他们因为国共谈判将快实现，已不作东进或北上打算，决心留原地坚持，你们准备接引五师的计划，望即停止执行。”

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定》和《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并发布于一月十三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要求双方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保持双方在一月十三日午夜以前的军事位置。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中央社广播文字如有出入以后更正）。但蒋介石在今日又秘密命令各军尽快尽量秘密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共军利用之。为此，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如彼来进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报告延[1]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

安。”

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

1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停战与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在发言时指出，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前要完成停战，先城市后乡村。但现在和平还不巩固，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平，这就需要发展民主，争取民主改革，民主愈

发展，和平愈巩固。斗争的总路线仍然是需要有团结有斗争，放手发动群众，有理有利有节。要注意和平之下的危险性，第一是美国插进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才不致束缚自己手脚，损失人民利益；第二可能对蒋介石等发生幻想，右倾情绪、贪污腐化倾向会发展。会议通过重庆谈判协定，周恩来参加军事三人小组，叶剑英[1]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电：“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但我们同意国军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并在谈判记录上取得默契四点，即在满洲不得驻兵过多；经过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只能开入满洲；如派遣国军经过华北我区其他路线而入满洲，须事先经过协商；进入满洲各地的国军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执行总部。”“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分散，控制广大地区。一切尚无国民党正式委任名义和关系的土匪，你们均可迅速剿除；但对于正式国军及已被国党正式委任之部队应避免冲突，不给国党以进攻我之任何借口。各地武装应以人民自卫武装名义出现；但凡在未驻红军之 [1]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地方，尤其西满，是否可以八路军名义出现，请与辰兄[1]商量决定。凡是红军驻扎之地方，均将交国党接收，因此你们应力求红军缩小驻防地区，使红军从一些次要地区撤退交我接收，不要弄得因红军关系而不得不让出许多地方，在靠近苏、蒙地区一切要点你们必须控制，不要弄得被国民党控制隔断我与苏、蒙联系。”“全国和平后，满洲对国民党亦应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设法与国党建立外交关系。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要求民主改革。”

乙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肖克、罗瑞卿并林彪、黄克诚电：“一月十三日叶剑英飞北平后，即将由执行部派国、共、美三人组到热河执行停战。”“望速接收赤峰、多伦，并调集兵力控制顽军未控制的一切地区，特别是朝阳、叶柏寿以北地区，应布置更多的部队/1月1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电：“（一）停战命令已下，全国各地统限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过此时限的一切进攻行动，均属非法。此次停战有美国代表参加及到各地监督，我各地部队必须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攻击的行动，特别是攻城的行动，不给对方以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二）停战包括对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在内。对日军、伪军亦必须依时停止攻击。但仍可对敌伪包围，以便交涉争取受降。（三）我依时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但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四）从子真 n）特别是从子元 u）二十四时以后，所有对方向我任何地方、[1]辰兄，是当时进入我国东北地区对日本作战的苏联红军的代称。

（2）子真，即一月十一日。

[3]于元，即一月十三日。任何部队、政府的进攻，特别是对城市的进攻，应将其进攻的时间、地点、番号、经过、死伤等完全准确的迅速报告延安及北平，以便抗议揭露。各地电台须与北平叶剑英建立联系。”

1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肖克、罗瑞卿、聂荣臻、林彪、李运昌、东北局电：“顽军正向赤峰、承德、古北口攻击。如不给进攻之顽以痛击并消灭其大部，在热河东北之顽是不会依令停止进攻的。为在热河以至在东北真能实现停战，决心由程、肖、罗及聂坚决消灭向承德、古北口进攻之顽军，恢复凌源、叶柏寿、朝阳、赤峰等地。林彪及程世才部坚决消灭阜新、新立屯、大虎山、沟帮子之顽军，并相机占领义县，打通与热河之联系。”“战役计划从本日起实施，在一星期内完成，至二十日止。如对方停止进攻，

即实行停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杜聿明决于寒删[1]进占赤峰。李宗仁[2]亦有在停战令发生时效前进占承德之命。”“为了真能停止该方面的战斗，我已给热河及古北口方面指示，如在元亥[3]以后顽军仍来进攻，即不顾一切牺牲，予以坚决之打击，并相机收复某些要点。顽军如在十四日仍攻赤峰、承德，林彪在十五日亦将给予当面之顽以打击。”

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4]、美国代表罗伯逊[5]到达北平。十四日，军调部在北平正式成立。

[1]寒删，即十四日、十五日。

[2]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3]元亥，即十三日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

[4]郑介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

[5]罗伯逊，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

1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肖克、李运昌电：“恩来电，国党保证不占赤峰，马歇尔即调查顽军在热河攻我行动。中央元未[1]电暂停执行。但如顽军来攻，你们仍须坚决抵抗，确保平泉、承德。”同日，刘少奇分别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聂荣臻电，要求暂停执行中央十三日电令。

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寒[2]整日古北口方面顽仍猛攻，丰镇、集宁、凉城方面亦在进攻，望紧急处理。”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电：“国民党在各方面已遵令停战，十五日只有个别地方有战斗，你们现在决不要攻击，部队在现地停止待命。但对方来攻时，则应坚决消灭之。在东北将来还可能要发生战斗，应迅速准备一切。”

1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区的通知：“中央社二十一日广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号命令[3]，其内容是不公道的，对我不利的。中央已电平设法挽救。各地接到这一命令应依照各地情况灵活执行。”“同时我各地驻军应派代表设法主持与当地顽军接洽，成立当地和平协定，相约互不侵犯，划定彼[1]元未，即十三日十三时至十五时。

[2]寒，即十四日。

[3]第二号命令第一条规定：“实施停战原则：甲、所有冲突的双方部队，接到本执行部的停战指示以后，必须立即停火，并施行双方部队的隔离，以保证冲突不再发生。乙、双方部队冲突隔离应依第二条规定办法，按当时当地的情况，由本部适当处理。”第二条规定：“实施停战的办法：甲、城市——如一方占领，另一方之部队撤至距离城一日之路程。乙、城市——如双方部队都在城内，双方均撤至离城一日之路程。丙、野战双方部队撤离冲突地点一日之路程。”还规定“一日之路程至少为六十华里”。此同意之界限，各守原防；但不要因此麻痹自己人民，松懈警惕，必须了解我们的对手是不守信义的。其次在军事上，除对方来攻，我应坚决守备阵地加以抵抗外，不得向对方作任何攻击，即使顽军进驻我之地区，也不要反攻。而加以和平交涉使彼速退。”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原则同意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的方案，但必须提出几点增加、修改及声明：“双方布雷区由双方拆除，封锁线及碉堡必须全部拆除；一切存在之铁轨、枕木，凡可交出者，均交出；国民政府现尚未实行改组，所有华北、华中各铁路管理局，须有我方人员参加为正副局长及正副站长等；如果组织运输司令部时，亦须

有我方代表为司令及其他工作人员；路警由双方人员组成，正副路警局长、段长等，各须有一人为我方人员，赞成路警完全中立，受执行部监督；不能无代价动员解放区人民修路，修路工人一律给予工资；其他邮电交通自由亦请提出，由解放区寄出之邮件、书报等不得扣留，对陕北之封锁线亦须拆除。以上各项望据理力争，尽可能争取实现，以打破国民党对交通的一党包办。”

1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彭真电：“国民党现尚未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北平执行部亦不会派人到东北，故你们不应退出营口，以逼国民党和我谈判东北问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电：“苏联已通知国民党，红军即离赤峰，现我即已接收赤峰，如国民党来攻，必须坚守。”

1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北平执行部已下今国共双方军队须退至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位置。凡顽军在十三日以后所占我之地区，望向执行组提出，严格命令顽军退出，不要让步。”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们对东北问题应力求迅速和平解决，在国民党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条件下力求与国民党合作。”但“国民党在东北还未放弃武力解决方针，在此苏军开始撤退，国方（由苏军引导）正在接收各市县政权，到处与我们发生磨擦冲突之时，我们意见此时应即向国方及全国人民提出解决东北问题，以表示我们对东北问题确是愿意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避免在东北进行内战的诚意。莫氏[1]在政协准备提出解决方案，组织由国共及各党派无党派参加之东北军政调处委员会，要求释放张学良等，我们要积极支持（至于有组织之部队撤至何处当可另议），赞成由政协也派考察团去东北考察实情。”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电：“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的并不是蒋的阴谋），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但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的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行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 [1]莫氏，即莫德惠，当时以无党派社会贤达身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针，还有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作到以下几点：（甲）必须采取一个完全坚定公开明白的和平合作方针，动员全党全军及东北人民为东北的和平民主而斗争，并使自己的行动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内，不给对方以破坏和平的任何借口，不给对方以难受的刺激，并采取一切办法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诚意与他们合作。（乙）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丙）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为了实行上述方针，望你们立即实行下列各项：“（甲）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1]、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

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让步。但必须巩固的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切实准备在蒋军向我进攻时给以歼灭的打击。在军事上我应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不应有任何进攻挑衅的行动，在完全防御的有理的条件下来击败蒋军的进攻。不在大城及铁路干线附近决战，在军事上想亦是有利的。（乙）切实加强内地农村工作，发动群众，准备在决战不利时能长期坚持，而不陷于溃败。（丙）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加以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丁）对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官吏进行和平攻势，并设法公开某些负责人（如李兆麟<sup>[2]</sup>等），设法我国党谈判。组织地方绅士去与国<sup>[1]</sup>龙江，即齐齐哈尔。

<sup>[2]</sup>李兆麟，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中共松江地委负责人。方接洽。（戊）将我们和平合作方针向辰兄切实说明，要求他们给以协助配合。”

1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林彪、黄克诚电：“（一）彭<sup>[1]</sup>二十六日十八时电悉。同意彭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的有理条件下（在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为此必须激励士气，细心准备，不要多战，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望彻底向干部说清，不惜以重大牺牲求得这一战役之完全胜利，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为此，林彪应设法在主战方面去指挥，（二）政治协商会议、改组政府、国民大会等问题，已经妥协成功，我党与人民获得很大胜利，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马歇尔、周恩来、张群不久将到东北并找你们见面，那时东北和平局面可能打开。望你们即根据中央前日指示，宣传和平合作方针，在党内和人民中预作准备。”

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等。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停战、政协等问题谈判情况的汇报。会议研究了新四军第五师撤到华北、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在行政院力争取得三分之一名额、东北问题等具体事宜。

1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关于无条件停战、政协会议、东北问题等谈判情况。会议同意中共<sup>[1]</sup>彭，指彭真。代表团在重庆商定的政协会议的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正式签字。刘少奇在发言中肯定了代表团所取得的成绩。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名单为：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范铭枢、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你们决定会北满的部队，望令其星夜前进赶到目的地，否则满洲和平实现后，我军即可能冻结不能调动。”

1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苏军同意我军驻本溪、鞍山、辽阳，但须撤离抚顺。彭真等已到抚顺，东北局拟公开，以便接洽谈判。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

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同时指出：“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并且英美大资产阶级与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阴谋企图将中国变成反苏基地，我党与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是很大。但是这一切困难是能够逐步克服与必须逐步克服。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同时要在六个月至十个月内放手发动群众（目前主要危险是许多干部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动员），完成新旧解放区的减租，以巩固我党在解放区的群众基础，更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的时局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了重大的成果。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基本上是好的。这些决议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成立以及它的实行，就会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使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开始破坏，全国民主化开始实现，使我们中国变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进一步巩固国内和平，并且使我们的党及我们党所建立的军队及解放区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就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报告认为，这些决议的实行，还只是全国民主化的开始。国民党的独裁也还只是开始破坏。要达到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彻底破坏和全国彻底民主化，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经过许多奋斗，克服许多困难。要全国彻底民主化，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使中国工业化。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个方向、这个趋势是确定了的，不可抵御的。反民主势力是可以克服的。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月2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饶漱石[1]关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问题的几点请示。发言指出，工作方针问题，应与执行部的上级军事三人小组建立直接联系，在全国要与国民党的主体合作，表现我们力求解决问题的诚意。对一月十四日以后被占区一定要收复，但基本上应以政治方式解决，只在彼方坚决不肯讲理时，间或慎重地以军事解决。交通问题（包括邮政）坚持双方恢复，撤销障碍物，东北问题，争取与国民党谈判，如国民党退出热河，则在东北可让一点，否则不作让步。另外应帮助开展北平市地方工作、群众工作，使平津地方工作取得合法地位。执行部内，由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2]等不超过七人组成一小委员会，以饶为书记，对外用顾问名义，叶对外负责。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电：“请你考虑是否可从陇海路及山东抽调若干部队到华中南线六合、扬州、泰州、如皋一线，警戒顽军向我进攻及骚扰。”

2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许世友、林浩、袁仲贤[3]电：“关于美军

总部派人到烟台，企图借通商贸易名义，在烟设立军事机关，应加警惕。你们交涉方针应为欢迎美国商业机关来烟，但应拒绝在烟设立任何美国军事机关。”“望设法迅速恢复对美贸易，以帮助解放区经济。在中国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前，对美商业可由你们谈判协议一种临时办法，照我区法律经商。”

[1]饶漱石，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沈阳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

[2]罗瑞卿，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

[3]袁仲贤，当时任山东军区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黄克诚电：“马歇尔提议派一执行小组到营口执行停战令，我们久已同意，但国民党至今未同意，故尚未派出。由此可见国民党尚要在满洲打我们。因为我在停战谈判中允许国民党军队调入满州接收主权（但未允许其入热河），已却除美国疑虑我要独霸满洲，各方舆论已转向对我有利。国民党在打了热河后，如再在满洲向我进攻，我给以坚决之回击消灭其大部或一部，并控制北宁路一段，在政治上及国际、国内舆论上均不会有恶劣影响。”“如果国民党向你们进攻，马歇尔将会立即要求双方停战，我们也只能立即答应停战，国民党亦不能不答应停战，停战执行人将立即到达东北召集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因此东北很可能再打一下，但绝不会久打，能打十天到半个月就必然被强迫停战。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的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你们绝不要再丧失。你们如不能在东北打一个好胜仗，以后你们在东北的政治地位就要低得多。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好一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的胜利。因为以后可能再无作战机会，所谓以多胜少的原则，也不要机械执行。能完全消灭敌人更好，应努力争取，但能打个平，给敌人以数千人之杀伤，以表示我军之顽强勇敢，使敌人不敢放胆在东北横行，也是好的，也算完成战略任务。如必须有把握消灭敌人才行，只有十天半月时间，可能又丧失最后一次作战机会，这在战略上是极不利的。”

2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关于国府委员及宪章审议委员人选的请示电。会议一致通过后，中共中央即复电中共谈判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的我方人选；国府委员我方人选仍照周恩来在延安所提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八人，如范明枢不能去则提彭真；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部长及不管部长。

2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军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为取得经验并看清美国的意图及当前形势来决定对军队的政策”。提出“现在只决定第一期整编计划，第二期的整编计划待第一期整编完毕时，再行决定。国共军队互相插入合编，其目的是企图消灭或控制中共军队，故绝不能答应”。“我们军队主要应驻在华北，一相当部分驻东北、苏北、皖北。”“第一步整编至少坚持二十个师，但应编七个军方好配备干部，望设法争取为东北的部队增编三四个师。”要注意地方部队，因地方部队尚能保持某种独立性，我之武装将大部分保持在其中。“美蒋的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此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并周恩来电：延安已发表

中共在东北有三十万部队，其中十万正规军，整编时可争取东北在二十个师之外多编二三个师。

2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关于交通管理问题，如能与解散敌伪、改组政府等问题同时讨论，作有利之解决，甚好。我应力争在华北、华中及东北交通命脉中能深插一脚。但北平执行部在铁路管理问题上久争不决，我们为表示诚意迅速恢复交通起见，似在管理问题上须有适当的暂时的让步，以便迅速获得协议。我们可以同意罗伯逊的书面提议：由执行部监督修复铁路及通车，成立铁道管理组及八个三人小组，铁路守卫和保护各自负责。”“此外，恢复与开放交通应坚持同时并行，一切封锁线碉堡必须拆除，并以后不得建立。”

2月10日董必武、王若飞由重庆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有关政治协商会议情况。

2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王若飞举行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了军队国家化和新四军第五师主力撤离等问题。刘少奇指出，在第五师问题的交涉中态度要强硬一些，董必武可在湖北任中共省委书记，公开党的机关，亲自主持第五师的调动。并指出，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性，国民党是不会使它的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化的，在这一点上不可有幻想。对于东北问题，力求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合作。在重庆准备作原则谈判，具体谈判在东北进行，也不性急于解决问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熊式辉在北平拒绝与叶剑英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仍坚持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已极为明显，一切决定于打败蒋介石在东北的进攻，实行聚歼。

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肖克电：“顽军在东北正向我进攻，已占盘山、台安、辽中三县。在彰武以北顽军向我进攻之部队已被消灭五个营，东北大规模战斗，即将展开。热河我军有牵制热河境内顽军不使其东调以配合东北作战之任务。为此，我热河部队应坚决消灭由平泉、凌源向南北我区进攻之顽军，并向平泉、凌源、叶柏寿、朝阳的铁路线威胁，相机破坏一段铁路。”“顽军在东北大规模战斗发生后，仍有可能在热河向我采取攻势，抢占赤峰、承德，我热河部队应严加警惕，妥为部署，以便在顽军采取攻势时，给顽军以歼灭之打击，但我军决不要主动的去进攻平泉、凌源等城市。又顽军第五师违令从冀东调至平泉，在交涉时可提出质问。”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东北国民党军队已向我进攻，占我三县城。请周考虑是否即向马歇尔、张治中[1]正式要求在东北停战，并派停战组到东北去。估计国民党不会答应停战，或采取拖延政策，那时我实行主动打击，消灭其部队，国民党将无话可说。

2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估计国方如不遭受更大打击是不会答应停战，会采取拖延政策的。如此，你们消灭更多敌人，国方当无话可说。你们一面努力争取和平，但另一方面仍须准备长期战争。蒋[2]在这次失败之后，可能仍不放弃武力解决方针，再向你们组织更大的进攻。你们在打了这一仗后，还可能再打一仗，望加注意。如美蒋立即答应停战，你们亦还可再打一星期到十天，在士气甚旺时停下来是有利的。”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分局电：“在目前，你们应以练兵、准备整编、减租、生产为中心工作。对国民党可能的袭击，你们仍须严加警戒，绝不可大意。和平民主的总趋势虽已确定，但严重的波折还会有许多，还不能使你

们完全安心进行和平建设工作。”

2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关于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不可贸然行动。恩来不久可到武汉，届时当可决定是否能合法北调，你们现在仍未脱离危险的环境，国民党仍企图消灭你们，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必死之心，来求取生路。”

[1]张治中，当时为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

[2]蒋，指蒋介石。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马歇尔到东北时，首先看其态度是否公正，你们当要求国共两军首先无条件停战，和杜聿明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并实行两军隔离，然后谈判国民党进驻东北其他城市和铁路问题以及我军防区问题。照中央所申明四条[1]谈判，在谈判中，我方须有让步，但国民党须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可试图以我在东北的让步交换国民党军队从热河撤退。”

2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电：“（一）广东国军于九号至十四号以猛攻侵我大鹏半岛，我主力突围，损失很重，在顽军占领半岛后，方令执行组前去，以证明广东无我军。此事望加以揭破，并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对突围之部队停止进攻，及其他善后办法。关于广东事件，你们是否可提议由执行部发表公报。（二）国方在东北进攻，对我在东北停战提议不答复，国方仍有在热河再向我进攻之可能，望在事前加以准备，设法制止其进攻。（三）现在国民党部队及伪军在各边缘地区有不断骚扰蚕食，执行组多设在国方地区，有些并不许我设电台自由通报，我代表行动受限制，我方问题多不能在执行组提出作公正之解决，此种情况，望研究改善之办法。（四）在派出恢复交通的执行组时，请力争派一个组到西安，拆除对陕甘边区之封锁线。”

2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如在三人会要求停战及停止运兵无效，请周考虑，是否可向张、马[2]声明我亦将向东北增兵，以逼其停战。”

[1]中共四项主张是：一、从东北行营到各省政府应吸收东北民主人士参加；二、承认东北抗日民主部队；三、承认东北各县民主政府；四、国民党政府开入东北的军队应有限制，并禁止利用伪军接收东北。

[2]张、马，指张治中、马歇尔。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电：由于东北内战又起，顽军可能在关内向我作较大规模之袭击，提请军事调处执行部对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及新四军第五师地区的移动及进攻准备予以注意，并要求武汉小组驻信阳监视。新派一组到苏中兴化，停止沿江一带的冲突。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并华中分局电：“沿江顽军完全可能向我区作较大之袭击，华中分局必须严重警戒并作适当之部署。”二十二日，陈毅电告中共中央：“我已令华中分局即调王必成纵队，南调苏中保卫沿区解放区。”

2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军事三人小组关于整编全国军队的计划已决定。“为了准备将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对我举行突然袭击时，我仍能有效的组织自卫斗争起见，中央决定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去请求国民党加委。”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电：郑介民要求释放在东北俘虏的彼方军官，因双方死伤、俘虏较多，可提议立即派遣执行组到东北冲突地带执行停战并在当地交换双方俘虏，在执行部会议上正式提出，列入记录，并发表公报。

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即到各地巡视，应准备答复他们所提各种问题，并提出需要其解决的各种问题。但不要组织群众的请愿和游行。

军事三人小组签定《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到一九四六年底全国陆军整编为一百零八十个师，其中中共部队十八个师，分驻华北、华中、东北等地。

2月26日军事三人小组商定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赴华北、华中各地视察停战与恢复交通及整军工作情况，军事调处执行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三委员将随行。

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滕代远电：“已电林平[1]、曾生[2]冒险到广州会马、周、张[3]等。望注意设法找到林、曾，即可对国民党在广东的违约进攻举行公开控诉”。“以后在交涉中，经常可以广东事件为借口，拒绝国民党的各种要求。”

3月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等一行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次日，军事三人小组一行飞汉口，然后返回重庆。

3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东北问题“目前似还未至解决时机。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的经济合作，美蒋尚不答应此种合作，并在全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亦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但在本年五月间第三次外长会议中有讨论并解决此问题之可能，在此以前，美蒋和苏联还将继续进行斗争。因此，东北的内政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在东北的妥协，暂时亦将不能解决。只有在东北外交问题解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妥协才会有可能。”“在东北外交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蒋介石将利用他已进入东北的军队向我军进攻，企图击溃我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想在外交上利用苏联将东北更多城市移交给蒋接收，以便将来在国共谈判中有更多的法律依据来压迫我方让步。因此，蒋 [1]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东江纵队政治委员。

[2]曾生，当时任东江纵队司令员。

[3]马、周、张，指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与我方在东北的军事对抗和冲突，还将继续一个时期。蒋军可能在最近进攻西满及南满，通辽、洮南及辽阳、鞍山、营口、海城、本溪、抚顺等地，有被蒋军占领可能。但蒋军预定进入东北者只有五个军（约十五万人），在此数外再多调兵到东北，即将牵动国内整个大局，今天还未见蒋方有此种计划。故蒋军在占领上述各地以后，即很难再举行更深入的进攻，又在长春路上作战，并有可能引起苏军某种形式的干涉。因此，如我能很好组织反对蒋军进攻的战斗，击溃与停止其进攻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必须迅速准备严重的粉碎蒋军进攻的战斗，并须准备在上述地区被蒋军占领后，你们仍能继续斗争。”

3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苏军即从抚顺、吉林撤退，一周内亦将从沈阳撤退，长春以北是否撤退不明。由于苏联撤兵造成的东北新情况，望予以注意，是否可因此再提东北停战。

3月11日军事三人小组对扩大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权限及东北问题获得

原则协议，并决定由执行部派出执行小组前往东北，同日，马歇尔离华返美述职。在其离华期间，暂有吉伦中将代理。四月十八日，马歇尔返回重庆。

3月1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吕正操、李富春电：蒋介石在马歇尔几次要求下，虽同意派执行小组到东北停战，但附带了许多苛刻条件（如中共军不能阻拦政府军接收东北主权，并须撤退；政府军有权进驻矿区；中共军撤离长春路三十公里以外；小组只能随政府军行动，并不得干涉东北政治等）。我当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停战，因此在苏军撤退后，东北的军事情况即将紧张起来。必须你们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之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目前你们应即准备粉碎蒋军的进攻。估计蒋军在东北作战将完全依靠北宁路的运输，如北宁路不能畅通，蒋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即不能作战。望你们即布置对北宁路作有效之破袭，以便争取粉碎蒋军进攻的胜利。

苏联红军撤离沈阳。十三日，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3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在谈判中，你们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至于政府军以后再要进驻哪些地区和我军须从哪些地区撤退，须待政治问题解决及我军驻防地区确定，并须到东北与我军负责人员商讨后，才能具体解决。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商讨一点须十分重视。但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你们暂时不要答应国方并且也未征求东北局同意。现在你们切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全部接收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你们在此问题的交涉中，须通盘计划，步步设防，并与中央与东北密切联络，以期做到算无遗策。”希望周恩来回延安一次，住四五天然后返渝。由于苏军突然撤兵，蒋介石急欲解决东北问题，我倒可不急，迟几天无不利之处。

3月1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指示说，“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正在积极进行反苏反共阴谋，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为此，“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苏军不告诉我们国民党是否全撤，如全撤国民党接不赢，所以急于要谈判。并强调说，在东北问题上一定要加强同国民党的斗争。国民党提出，苏军撤退区中共不能占，苏军撤退区的含义模糊，差不多会包括苏军到达的一切区域，这就无法承认。为了这一问题，要周恩来回来一次，详细谈谈。根据过去的谈判经验，决定比较大的问题不要急，反复磋商一下好。

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与宪章审议会协商小组举行联席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与会。会议在宪章修改原则上商得三点协议：（一）将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二）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第六项第二条取消（这一条文是“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三）“省得制订省宪”改为“省得制订省自治法”。

3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想采用迂回办法

首先推翻宪草原则，成立独裁政府，则国大改组、政府纲领、整军等决议势必成为具文，对此必须十分警惕。应即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必须实现，对修改宪草原则及其他决议的任何主张，均必须予以痛驳，并要他们遵守信义。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反对修改宪草原则的斗争中，不要害怕破裂。

“在东北问题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求东北停战，并用协商办法来解决国共两军驻地及其他一切问题，如国方不愿停战，并利用东北问题来发动全国内战，我亦不应惧怕”。“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停战协定应无条件适用于东北，不能再附加条件。”“政府军有权接收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但决不能承认长春路全部及苏军每一撤退区，都只能由政府军接收，停战协定无此规定。如此，彼方可指任何一苏军到过的地方都是撤退区，都要进驻，毫无限制，将使我陷于彻底被动。彼方即不承认我军驻地，甚至连维持现状的话都不愿规定，我方当然不能承认彼方此种无限制的要求。为了妥协，我方现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而政府军则要承认实行停战，并保证讨论东北政治问题。以后政府军与中共军的驻地再详细规定”。“如彼方必须规定政府军进驻地区，则必须同时规定我军驻扎地区。”“如彼方不愿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

3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电：“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但在进驻时及进驻后，不得伤害国民党之接收人员。”“全满各地均须注意，除罪大汉奸外，不杀一人，以收人心而利谈判。”[1]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东北局电：“关于南满工业区，不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国、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的影响。”

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强调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的主要条件，全国军队统属于国家，军令与政令的统一。会议通过了主张由国民党制定宪法，行政院向总统个人负责，不制定省宪等几项决议。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和 [1] 这后一句话和前面“时间愈快愈好”几个字，是毛泽东在审阅电报稿时加的。重庆《新华日报》都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结果是通过了准备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决议的决议”，“从根本上从实质上从基本精神上完全动摇了政协的五项决议”。

3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据新华社报道之十五日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三点，我们仍深感不妥，因为这动摇了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必给国民党保持独裁以极大便利，国家民主化就没有可能。因此必须迅速加以挽救，或者由代表团撤回对十五日决定所给予的同意，或者要求召开政协全体会议否决十五日的决定，或用其他办法来挽救。“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所有解放区各工矿主人，只要他们未曾投敌者，不进行反共活动，均可回到解放区接收并经营他们合法的产业。权益我均予以保护和便利。至于抗战期间，敌人所参加之资本，则将作为地方公产。汉奸资本亦将没收。”

3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同意你们意见，我党参政员不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其理由是因为这次参政会的召集完全没有必要，事前也未同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协商。而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却企图利用这次参政会来实现其二中全会所决定的反动方针，并否认政治协商会议和推翻政协决议，其目的是企图破坏国际和平与国内团结。中共为了反对这种企图，并保护政协一切决议使其不遭受任何破坏与污损起见，决定不派人出席这次参政会。这一态度请你们与民主同盟人士商量，请他们最好能和我们一致行动。但他们如有人决心要去出席，亦不要相强。”

3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只好暂时让其僵一时期。在此时期中，除开在东北准备军事斗争外，在延安与重庆应即准备宣传斗争。为此你们应在群众中预作准备。首先向民盟人士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说明白，在国民党发动宣传攻势时即给予有力回击。口号还是要求停战协定无条件适用东北及全中国，反对东北除外，用协商方法解决东北问题，反对武力解决。谈判经过及双方提案，准备在适当时期公布。为了宣传，同时也是为了协助东北的军事斗争，请你即向美方提出，在东北未实行停战以前停止运兵到东北。”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如苏军谅解，即可进占长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肖克、程子华电：“重庆关于东北停战的谈判已陷入僵局，东北战局仍将继续扩大。为了配合东北作战，望你们即派两个得力的旅进至山海关以东地区，准备破坏山海关至锦州之北宁铁路，以阻止顽军运输。”

3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恩来同志昨日回延，马歇尔今日即从华盛顿来电，催恩来回重庆解决东北问题，以便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之停战小组能够立即派至东北。美国现急欲解决东北国共冲突，以便借此能插足东北。在前数日之谈判中，我们已答应让出沈阳至长春之铁路线及其两侧各三十华里给国民党驻兵（山海关至沈阳铁路线亦由国民党驻兵），其他地方暂时不让。如果国民党及美国答应在这种条件下和我停战，我即不能不和国、美成立协议，让停战小组进入东北。”

3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李富春、黄克诚、程子华、肖克电：恩来今日已到重庆，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但执行小组到东北并召集双方代表协议实际停战，还须若干时日。因此，你们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关于东北停战及以后东北工作意见，由饶漱石转达，饶现在延安。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莫致彭真电：东北执行小组可能于数日内抵沈阳，我方小组代表为饶漱石。你处到沈阳代表建议由林枫[1]或伍修权[2]充任。除沈阳执行小组外，可能还须派出若干执行分组到抚顺、营口、彰武、四平街及其他苏军已经撤退而战争尚未完全停止之地方调处停战，请通知各战略单位

派遣一二个了解该区全面情况的军政干部，到沈阳参加工作和充任执行分组代表。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中原局电：“周、饶[3]来延，已商定利用美方与国方急欲解决东北问题，要求五师问题、广东问题与东北问题同时解决。争取中原主力全部转移，在转移前给我足够粮食与款项接济，估计可能取得国美两方同意。”同时，应“加紧整训部队，经常作战斗准备，提高警惕，以防顽军之突然袭击。并准备于顽军突然袭击时，或者顽方断绝你们粮款无法生存时，能够无遗恨的应付一切，并在不得已时实行 [1]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兼东满分局书记。

[2]伍修权，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3]周、饶，指周恩来、饶漱石。非法转移”。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据悉，国民党驻龙州之第九十二军第一二九师，寅马[1]调九龙（可能转东北），驻海防之第二军，驻云南之第五军，驻贵州之工兵十二团，于寅马调东北。请向国美双方提出抗议，要国方停止调兵，要美方停止运兵，否则我方亦将向东北增兵。

复电李富春：毛泽东身体已复原，已部分开始工作。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应宣布四平为八路军、新四军或民主联军所占领，我东北三省政府应正式执行职务。“在两方尚未停战前应如此处理，才能打击顽方的威风，提高我方的声势。也只有如此处理，才能逼使国民党不得和我们和平合作。如不敢承认我军占领四平，则表示我军软弱，对和平不会有利益。现应用一切努力保障四平在我手。”

3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并告周恩来电：“三人会议三方声明政府军进入东北者不得超过五个军，现政府军已有十三军、五十二军、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及九十四军第五师，新二十七军（姜鹏飞）进入东北，超过六个军。因此请你们向执行部要求明令禁止政府军九十三军、第二军、第五军进入东北，并要求超过五个军之法定额数的部队立即退出东北。否则我军亦不得不增兵东北。”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为了应付东北目前紧张的局面，高岗、立三同志[2]暂时不必回延，留在东北工作，高岗 [1]寅马，即三月二十一日。

[2]立三，即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部长兼城市工作部部长。最好留东北局帮助彭真工作，立三工作由东北局决定电告。”“为了进行今后在东北有重大关系的外交斗争，东北局应选派头等有经验的干部参加各停战小组的工作。立三能否参加停战组的工作，辅助饶漱石，请你们考虑决定。”

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决定立即组成执行小组派往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三天后，国民党军队破坏东北停战协议，分四路进犯营口、海城、鞍山、本溪、四平等地。

3月2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国民党“尚有第六十军正运入东北。关于政府军进入东北的数量，对我关系极端重大，决定国我两方今后在东北的力量对比和地位，决不能马虎，让五个军以外的任何部队进入满洲，此五个军按编制只能有十五万人，不能超过人数。此事必须立即在三人会议及执行部明确决定，以免运入东北后难于挽救。”

3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电：“去东北小组以快去为好。请饶及其他干部即去沈执行南满停战。争取在四平、本溪、海

城或鞍山设小组。”

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请你到少奇同志处拿了看一看。请你清出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加以审查，看其中是否有现时已不适用之处，列举告我为盼！”

4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在宪草与国大等问题没有解决及中央没有最后通知以前，拟提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参加政府的名单不要提出。

4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部队首长电：三月三十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出的和字第六号命令[1]，“系使双方确定与恢复子元[2]二十四时前之合法位置，打破和字第二号命令由我方后退六十里之规定。望各区即利用和字第六号命令进行坚决反对顽方蚕食及恢复子元位置的外交的与军事的斗争”。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3]等由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

4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同意周明日飞平转沈。在谈判中，我应坚持如不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则一切无从谈起。我决不在武力进攻下答应国方任何要求。”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吉伦（代表马歇尔）、秦德纯[4]（代表陈诚[5]）、罗瑞卿（代表周恩来）、陈士榘[6]（代表叶剑英）赴东北视察。四位代表于十二日由北平飞沈阳，在东北作了三日视察。

4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电：“国共双方既未承认停战，前线冲突激烈，而且规模甚大，战线不固定，双方的纵深后方亦有战斗，小组既不执行停战而到前线活动，安全殊无保 [1]和字第六号命令规定：“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各指挥官应严格执行此项命令。”

[2]子元，即一月十三日。

[3]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世界工联候补委员兼理事。

[4]秦德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次长。

[5]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四月，接替张治中为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

[6]陈士榘，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整军处长。障，请将此种情势通知国美两方，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将小组撤回。”“我方为切实保护小组安全，请林彪、彭真经饶漱石通知小组安全驻地，并将小组标帜通知前线官兵。”

4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并周恩来及各中央局电：执行和字第六号命令在全局上来说，对我是有利的，而在有些地方我将吃亏而有利于国民党。为严防国民党方面只在对其有利的地区执行，应在全国范围内有统一的布置。中央意见，各区可进行初步商讨，划定双方所同意的界限。然后由各区派代表到北平执行部，由执行部签字，统一命令双方军队退到所划定的界线以内。

4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电：我军在本溪、四平已获大胜，顽军三个半师已失去战斗力，山海关铁路又遭我破坏，顽方

兵力不够，困难增加，决无力在最近打到长、哈[1]。马歇尔在十六、十七日可能到华，如美国不助蒋介石在东北大打，蒋的态度可能软下来。望你们在谈判中坚持无条件停战及停止运兵，并不要急于向美蒋求妥协。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向即将来华的马歇尔表示中共再不能让步的立场，对东北问题应“强调停战、停运，承认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及地方民选政府，并改组中央接收机构，由各党派参加”。关于宪法问题，“中共坚持政协关于修改宪草原则五项决议，反对修改，即坚持不要有形的国民大会，立法院与监察院成为国会的上下两院，对行政院有完全的不信任权及同意权，省县地方自治，及人民权利之不受法律所限制等项。如国民党坚持不同意这些原则，中共将不能参加政府及国大”。

[1]长、哈，即长春、哈尔滨。

4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决定罗迈[1]到重庆参加宪草委员会及代表团”。根据这一决定，李维汉等于十九日从延安飞重庆，接替王若飞等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追悼“四·八”烈士大会，在讲话中号召，要把悲痛变成行动和力量，继续加强团结，努力工作，完成遇难同志未竟事业。十九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举行隆重公葬，同朱德一起主祭。二十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文《痛悼我们伟大的死者》和题词：“把给予我们伟大死者的悲痛，变为积极的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

4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请特别注意对顽军进行政治的和平攻势，以削弱顽军士气，来配合我之军事斗争。望在详细调查顽军各部队官兵之政治情绪及其长官之欺骗宣传教育后，写出简明有煽动性的传单、标语，在前线广为散发、张贴、书写及进行喊话等。对于俘虏过来之顽军官兵，须进行很好的教育并加以优待，选择其中不顽固的一部分放回各部队去；对于受伤的顽军官兵，应医治及宣传后放回；死者在可能时亦可令百姓抬回，以示我军渴望和平，对顽军官兵无敌意。这一工作望令前线各级司令部、政治部及地方党政动员群众广泛进行，以便在其军队中打破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并宣传我之政策。”

4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肖克、程子华电：东北大战正激烈进行中，我军在本溪、四平已获大胜，国民党兵力不够，正由华南运兵北上，从秦皇岛登陆入满，并有调北平李文[2]集团及热河一九五师入满讯。在此情况下，冀热辽军区的任务，第一 [1]罗迈，即李维汉。

[2]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截断山海关以东之北宁路，以阻止国民党之军运。第二为钳制在热河之国民党军队，使其不得东调。关于一九五师东调事，昨已电北平叶、罗[1]，要其提出抗议，并要求下令禁止。望肖、程亦立即向承德小组提出，下令禁止。已调动者，立即返回原地。

4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军十七日晨已占长春。哈尔滨苏军于二十四日才能撤退完毕，我军可于其撤退当日或次日进占。昂昂溪也已由我军占领，并正向齐齐哈尔逼近。“马歇尔来后东北可能迅速停战，望推迟时间至少到二十五日以后签字停战，才于我有利。又东北停战必须要求国美两方同时停止运兵，并须派小组监督停运。因为继续运兵即表示在东北继续内战。”

4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黄克诚并彭真、林彪电：“（一）

为了保卫长、哈[2]，巩固北满的占领，必须迅速加强哈尔滨、四平以西，洮南以东广大地区的工作，多派干部发动与组织群众。（二）保卫长、哈巩固对北满的占领，还是可能的，应用一切力量不惜重大牺牲来争取。国美虽仍在增兵，但运输很慢很困难，不得不逐渐增兵。只要我能在长春以南再打一二个大胜仗，并迅速发动与组织哈、长、四[3]两侧一二百里以内的群众，并彻底破坏沈、长[4]间铁路，这一全国最大的北满战略根据地之建立就能实现，望注意争取这一前途。”

4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关于宪[1]叶、罗，指叶剑英、罗瑞卿。

[2]长、哈，指长春、哈尔滨。

[3]哈、长、四，指哈尔滨、长春、四平。

[4]沈、长，指沈阳、长春。法问题，除有些意见已由罗迈[1]转告外，现正准备一个五五宪草修正案，不日即可陆续电告。关于你们在一切宪草会议中的态度、最基本的原则立场，就是对于任何便利反动派独裁、反对人民的条文和制度，一律不能表示同意和赞成，而对于任何便利人民反对反动派统治的条文和制度，都应该表示拥护并须尽一切可能求得通过。”“只有坚持这种立场，共产党才能教育群众，并在长期斗争中树立起自己的政治威信。”

4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马歇尔的东北问题方案进行修改给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运往东北之军队以五个军为限，超过此数之军队，应立即运回，现正起运之六十军及九十三军立即停运。双方军队在东北境内的必要调动，由三人会议来规定。

4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程子华电：“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请你们即日派赵振声[2]来延安参加会议，以便将中央意见带回你区，指导群众土地斗争。”

4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就马歇尔所提东北停战问题，提出了中央的五点意见：“（一）原则上赞成隔离，但如何隔离，各退若干里，可由执行组到各地召集双方议定之。”“（二）同意双方停止调动，但九十三军开入，只有在其他一切问题解决后，我方才能松口允许。”“（三）铁路中立，双[1]罗迈，即李维汉。

[2]赵振声，即李葆华。方不驻兵，关系重大，我太吃亏。因实际大部铁路为我控制，我应争取管理。如中立，则至少将和他人共管。而国方所占之铁路，我事实上不能插足，故我反对。但我赞成恢复交通。”“（四）组织东北行政委员会、实行三三制及莫德惠任主任，我们赞成。但行委须独立工作，不受东北行营干涉。东北人士的三名委员须由民盟或现在东北之人士提出或选举，不能由国方指派。”“（五）由行委选人接收长春路，因现无接收问题，故不谈，尤其不能作为停战条件。事实上，长春路大部分已为我接收。”

4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国方即有对我五师六万余人之部队及工作人员加以围歼之部署，现已步步逼近，情况危急。请即向国方提出抗议，并向马歇尔提出要求，为了保持国内和平局面，不致引起全国性内战，请马歇尔设法保障五师之安全及给养之接济。并须向国美正式

提出警告，同时在报纸上警告全国人民，如我五师六万余人受到围攻，我不能不认为全国性的内战再次由国民党方面重新发动。其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当由国民党负其全责”。五月一日，周恩来就此事往晤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徐是于四月二十四日接替陈诚的），同时致电马歇尔，指出此系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的阴谋，企图突然发动全国性内战。要求立即采取有效办法制止对停战协定的任意破坏，表示愿与徐永昌及美方代表同往第五师地区监督停战。

4月2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就民盟及马歇尔提出的三人调查委员会办法指出：“没有停止运兵条文，停战条文亦不确定，似有经三人调查后提出建议再停战之意。国、马可能以此法求得暂时停战，运集大兵及军火之后，再行大打。望你与民盟警惕此种可能阴谋。”因此“必须在前面加一条，确定永久停战，并规定停战协定签字二十四小时后停止一切冲突，再加上停止运兵及运军火之条文。委员会建议书必须经三人一致协议，协定中不得有接收主权、按照整军方案及其他任何不利于我之文句。如能这样，可以签字同意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办法，否则不能签字”。

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民盟于二十九日晚又提一调解方案，即先停战、停运，但说明在停战后即改组政委、经委，与行营分开，成立三三制联合的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驻长春，行使东北政权，到时长春不驻兵。马歇尔表示不能接受。于是民盟在渝之努力乃告最后失败。

4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民盟方案被蒋[1]拒绝，蒋坚持内战面貌更加暴露。我在宣传上应根据最近事实尽量揭露之。蒋决心延长与扩大东北内战，并违约从华中、华北、华南不断抽兵到东北。而美海空军帮助国民党的军事运输，则为蒋决心延长内战的决定条件。请你向马歇尔正式提出要求，为了停止东北内战，并使东北内战不致牵动全国内战的重新爆发，我们根据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所说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不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并根据三国会议停止中国内战的决定，要求美国海军及空军立即停止帮助国民党运兵及运军火到东北。”

5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顽军有在五月五日至九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向东或向北行动均很困难，顽方已有周密准备，似应以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分散坚持游击，主力向西到鄂西、陕南、豫西地区为适宜。详细意见另告，望速准备。”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鼎丞、粟[1]蒋，指蒋介石。裕、谭震林电：“据确息，白崇禧[1]到徐州、开封，系布置围歼我五师，并同时向你们进攻，决定在五月五日至九日行动，望你们速作准备，严加戒备。”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顽方有在五月五日至九日围歼你们计划，情况危急，你们应在五月五日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行动方向另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并周恩来电：“蒋[2]亲到武汉、西安，布置围歼五师。白崇禧到徐州、开封布置。”“除令五师速作转移准备外，望立即向国、美两方提出严重警告，停止这一阴谋行动的实现，否则我方即不能不认为全国内战又由国方面重新发动。关于五师伤病员，请叶即交涉由执行组迅速接收运华北，并保障其安全。并要求立即令执行组赴前线监视顽军行动，以制止这阴谋。”

5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五师决定在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待交涉、制止无效及在原地无法坚持时再突围，以免中顽挑拨之计”。

5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解放区外交方针问题给华东局、华中分局、晋察冀局、晋冀鲁豫局的指示，指出：“关于外交方针，我应积极争取在对我有利的条件下，直接与美、英、法各国解决一些地方问题。”“我们应采取和美国以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但须拒绝美国经我们的手在山东建立任何军事据点。”“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1]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经靖区政务委员会副主任。[2]蒋，指蒋介石。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至于外国在我区进行传教及文化活动，只要遵守政府法令，当许其自由进行，各国财产亦应发还。”

致信朱德：“关于土地问题指示，请即看，并准备意见，在五月四日下午四时，到枣园开会讨论。”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对内改称中共南京中央局）。

5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在发言中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仍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要说服群众，使他们了解只有遵守各项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除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过分侵犯，一切必须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到，以便运动得以正确的进行。土地问题的方针，今天就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文字还可以修改。会议原则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

5月5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此件（指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略有增减，请酌。请给薄（一波）、邓（子恢）、黎（玉）三人看一下。可用中等密码拍发。”“关于宣传事项（不要谈土地革命等）请草一简电。”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全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提出正确指导这一群运动的十八条原则，主要是：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真正同情或满意；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对待中小地主和大地主、豪绅、恶霸要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同样地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要有原则区别；要给汉奸、豪绅、恶霸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这个指

示编入《刘少奇选集》。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

5月6日就张闻天建议成立东北联合政府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可以考虑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为东北临时政权机关并作公开号召。将来在东北停战后，与国方和平谈判成功，可改组临委。恩来同志亦有此提议。”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电：“如果国方进攻五师，全国内战再爆发，你们先下手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必须得到中央命令之后才能行动。现恩来、吉伦，徐永昌已到武汉及去五师制止国方阴谋，大内战不一定爆发，你们应准备一切，着重练兵，待命行动。其他精兵简政及发动群众工作等仍照常进行。”5月8日就宪法修改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延安宪草委员会认为，在宪法上规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一章，划定某些事项归中央立法与执行，某些事项归地方立法与执行，是对国民党有利，而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主张从宪法上去掉这一章，只在立法院职权及省、县制度两章内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作大体规定，比较有利。此种意见甚堪重视，望予注意”。“延安宪草初稿已脱稿，不久可送你们作参考。”

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发出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问题发言要点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已开始电发各地。在讨论和通过这一指示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发言中有最重要的几点，值得全党同志注意，兹摘要通知如下：（一）五四指示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群众所创造、为中央所批准的解决土地问题的适当方法；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二）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使全党干部认识其重要性。（四）由于广大群众的行动推平了土地（即平均分配）的地方，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但无休止的推平，不联合中农的推平，不照顾应当照顾的各色人等的推平，就要不得。（五）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暂时的动摇，应向他们解释，减租与“耕者有其田”都是实行政协决议。（六）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必须与土地政策、农民运动有原则区别，切忌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定得太高，应该是劳资合作，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劳资两利。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转周恩来电：“国方之内战阴谋中心，似在陇海路沿线，而不在武汉。蒋在西安对将校班训话：共党问题必须用武力解决，不要幻想和平解决，要即刻准备好。”

5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中央‘五四’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将要更加促进各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实现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极大地巩固解放区，极大地增加我们反对国民党政治进攻与军事进攻的力量。农民的土地要求与土地改革的行动是完全正当与正义的，并且符合于孙中山的主张及政协决议，对于中国政治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完全必要。但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报纸除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为了拥护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各地报纸应多找类如《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中央五四土地指示，各地应即当作党内文件印发给进行群众工

作的干部及其他广大干部阅读，使大家明白党的政策，迅速实现土地改革。”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电：“现国民党正在东北大打，不肯停战，内战未停止前根本谈不到整军。你们拖延不参加整军会议是对的，你们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

5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西安特务捣毁《秦风工商联合报》，使其停刊，杀死王任[1]律师，又暗[1]王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西安的和平民主运动，捣毁西安进步报纸《秦风工商联合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王任挺身而出，自愿担任该报法律顾问，向法庭提出起诉，控告反动派摧残舆论、镇压民主、侵犯人权的罪行。国民党于四月查抄了他的律师事务所，逮捕并杀害了他，制造了一起血案。杀《民众导报》总编辑李敷仁[1]，在西安已引起严重恐慌，使进步分子人人自危。”如不压下反动派嚣张之气，西安民主运动将有一时期走向消沉。“望即与民盟商量由民盟出面，在外交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我们加以赞助，并在宣传上发动全国的抗议运动。要求律师公会即派调查团到西安调查惨案真相，课国民党以严重之法律上的责任。”

5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桂军第七军正向淮南津浦路西的定远、藕塘等地进攻，已占老人仓一线，战斗激烈。又国军已占肖县、夏邑二城，但国方反空叫南通方面有战斗，想为声东击西之计。你去淮阴、南通时，最好能去蚌埠一次，以制止顽军进攻。”

5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并周恩来、叶剑英电：“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加以制止，如不能制止，亦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对于顽军在各处的进攻和蚕食，我应在当地积极予以打击。如果这种打击还不能停止顽军进攻，不能使顽军退出侵占我之地区，我在其他适当地区采取某些报复行动是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报复，顽军的部分进攻和蚕食必然更加猖獗，对我不利。但这种报复行动目前必须注意不要使之成为顽军发动全国内战的借口，必[1]李敷仁，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之一、西安民盟青年部部长、中共秘密党员、西安《民众导报》主编。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在陕西咸阳被国民党特务枪击受伤后。被送到延安医愈。须是有理有利有节，必须在外交上预先有充分准备。”

5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全党的指示电：“全国性的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各地应根据中央过去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以便能配合军事上的自卫斗争，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

5月23日致电叶剑英转薄一波：“你从延安带去的笔记本，有许多秘密记录，望即销毁，其他秘密文件，如土地指示、宪法说明等，亦望销毁，以免遗失，造成损害。”

5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电：“在东北尚未实行停战及重大问题尚未解决以前，关于国共两军合作遣送东北日俘而发布和字第八号命令，显然为时过早，望勿签署该命令。”

5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立即发起要求美国执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的运动。“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些援助，中国反动派不理睬三国决定和政协决议，继续进行与扩大内战和实行反动黑

暗统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求美国履行三国决定，立即停止并收回其对于中国反动派的上述一切援助，立即从中国撤退美国一切海陆空军，以便中国人民迅速实现和平、民主与统一。”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并陈毅等电：“顽军清剿淮南路西地区，执行部不派小组调处，如不给以有力报复，即不能停止顽军进攻。你们必须立即准备破坏津浦路或准备打下六合、沱河或其他地点，最好能控制津浦路一二车站，以逼执行部立即派小组来调处，并停止对于定远地区进攻并退出侵占区。”请用张、粟司令名义向北平执行部三委员及淮阴或涂州小组发出照会。“以后顽军进攻，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均可采用这种报复行动。山东对枣庄伪军亦可用陈名义向徐州小组及执行部发出照会，要求解散该伪，否则我将打击之。如限期到，执行小组无办法，即攻下枣庄。”

5月2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周恩来、叶剑英电：“冀察战区孙连仲部以李文为指挥，攻占安次地区后又进攻胜芳，有飞机战车参战。据确息并有于最近进攻香河、宝坻、芦台地区之企图及侵平津保三角地区之企图。请聂即以军区司令名义向北平执行部及张家口小组致送正式照会，说明上述顽方进攻情形（时间、兵力、番号、侵占地区，我方死伤人数，及人民被杀、物资被劫等情），要求执行部命令顽方立即退出侵占区，并阻止对于香河、宝坻地区及平津保三角地区之进攻，并申明如顽方不退出安次等侵占区及进攻宝坻等地区，我将被逼采取某种报复行动，其责任由顽方全部担负。在发出上项照会同时，你们应迅速准备报复的军事行动，如袭占及破坏平古路或破坏北宁路、平汉路或袭占其他顽占地区，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在经过警告之后的适当时机，采取这种报复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可逼执行部派小组去调处安次、胜芳冲突。但必须先送照会，先有警告，才能表示我之有理。在报复之后，我不应拒绝小组调查，应让其调查，申明我系报复，在调解时则将我占地区与顽方侵占区作为交换条件，彼停我亦停，彼退我亦退。否则不停不退。”

就国民党军进攻水东区，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请刘即以军区司令名义向北平执行部及新乡小组发出照会，说明顽攻水东情形（时间、地点、兵力、番号、死伤及人民被杀物资被掠等情形），要求执行部命令顽方立即停止进攻，并退出侵占区。”“同时，须在军事上立即准备攻取顽军某些地点，例如攻占长垣、考城、永年及袭击破坏陇海路等。”对阎锡山的蚕食，亦可用此办法对付。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我军占领鞍山消灭一八四师一团以后，该师长即率全师反正，我军已占领海城、大石桥及营口等地，现该师已开进我区。”

6月6日国民党与中共谈判代表团达成协议，从六月七的正午起东北停战十五天。实际停战延续了四个月。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并高岗、陈云电：“国军已到哈[1]市近郊，望坚守哈市。如敌已进入市区，应力求驱逐，因在南京已获协议，从七日的正午起停战十五天谈判。”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分局电：“目前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除练兵、生产及群众工作三项中心外，据张云逸说，你们应立即生产大量水雷及地雷，准备大量黄色炸药（山东应送一部

炸药给华中，并派人去华中训练），物资及粮食应预为准备及收藏。”

6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并告饶漱石电：“同意周[2]提议以饶漱石为执行部第二委员，到长春执行部分部人员即以饶及沈阳小组人员为基础，再加东北派出若干人员组织之。”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电：“山东我军对于张店、周村、德州、泰安、大汶口等地伪军之作战，乃因国民党迟不解散伪军并利用伪军不断向我进攻，故我不得不进行此次作战。”“执行部对于最近山东战事之调处，应以首先调处永定河水东区及淮南区之战事为交换条件。并以到山东临沂进行谈判为[1]哈，指哈尔滨。

[2]周，指周恩来。宜”。

6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电：“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面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同时必须立即准备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我们应即准备好一切，在全国大打时能够发动广大群众，坚持鄂豫川陕以至江南广大地区的斗争。根据以往经验，在内战中如果不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是很难胜利与坚持的。现中央已指示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切实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将来大内战如果爆发，你们亦须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但现在尚不要发动）才能坚持敌后斗争并建立根据地。”

6月1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电：如国美两方要求派小组到哈尔滨、本溪、大石桥及吉林等地实行停战，应接受，按三月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定》办。

6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电：时局紧张，全国内战很有可能在最近爆发，请你们考虑是否可把张垣、宣化和承德的兵工机器及对经济关系重大的机器迁移至内地分散生产。

6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经毛泽东修改）致东北局电：“目前在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局长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

6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为了在民盟朋友面前证明我们的诚意，同意你的建议[1]，承认美方人员在小组中关于调查的决定权。”

6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叶剑英、罗瑞卿电：同意派执行小组去青岛。国民党第五十四军确系由美军总部负责以美军船只从九龙运青岛，故确为美军直接破坏停战命令。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肖华并陈毅、舒同[2]、林浩、许世友电：“据息国民党海军在烟台、威海卫一带海面巡逻，已捕获我方若干船只及民船。长山岛有被侵占可能，辽东运山东物资之船只及干部来往，望注意此种情况，以免损失。”

6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蒋介石的整军方案我不接受，我需提出一与之针锋相对的具体对案。如蒋要求在东北、华北增加驻军，我则要求减少东北、华北政府驻军比例与我相等；蒋要求我退出哈尔滨、牡丹江、安东（今丹东）、白城，我则要求长春双方不驻兵，政府军退出平泉、朝阳、北票、阜新；蒋要求我退出华北各城市及铁路线，我则要求政府军退出大同、石家庄、新乡、济南等。此外，我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增编五个

师，政府亦减低东北驻军至五个师，共驻十个师，已足够维持东北秩序。华北政府军和我军各驻七个师亦完全够。其他东北 [1]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中共谈判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称，民盟有希望中共能让步到在军事三人小组中美方有调查决定权（即双方有争议时，美方组长可决定何处、何时及如何调查）的建议，以区别马歇尔、蒋介石，使马歇尔勿消极，而继续谈判，延长休战或完成停战。代表团拟同意，以此争取马歇尔求得交通、停战两协议先行签订，使整军方案延长讨论。而蒋介石会连此也不同意，必欲三个协定同时解决。这就大有利于动员和宣传。

[2] 舒同，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与全国政治问题、停战问题及最后决定权[1]问题的对案亦请提出，以便暴露蒋介石、马歇尔提案之无理，并提高群众情绪，吸引群众到我们方面来。

致电陈毅：“此次一纵攻泰安亡伤甚大，而山东部队则善于攻坚，大概是由于山东部队善于使用黄色炸药，平时即有此种训练望令华中新四军部队迅速训练，使用黄色炸药攻坚，其效果甚大而伤亡则甚少。黄色炸药对愈坚硬的石头洋灰工事则效果愈大，而对于黄土工事效果反小。”

6月26日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大举围攻在鄂东、豫南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从七月到九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向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国规模内战爆发。

6月底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三十万人的包围进攻下，开始主动地作战略转移，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7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并刘伯承、邓小平电：“国民党是会利用黄河的水向我们斗争的，在这一问题上我应提高警惕。现请你们立即在三人会及执行部提议，为了保证使黄河改归故道不致引起水患起见，立即派一小组去监督黄河改归故道的一切工程之进行，并只有在小组的命令之下，才能准许堵口放水。”

7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第一二 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在延安逝世。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组成毛泽东、朱德、刘 [1]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周恩来与徐永昌、马歇尔会谈后，徐永昌提出，承认在国共谈判中马歇尔有最后决定权。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十一人的治丧委员会。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刘少奇、任弼时、罗瑞卿、杨尚昆等参加关向应遗体的入殓仪式。

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10月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1]。这个指示详细地总结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三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指出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克服一个时期的困难以后必然能够取得胜利。对于支持和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所需要解决的解放区内部的土地改革问题，发展解放区的生产问题，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斗争的领导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这个文件也作了原则的说明。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下令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置政协决议于不顾。这个大会于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召开。它遭到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应该是各党派参加的民主的团结的大会，必须在政协各项协议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的领导之下才能召开。

10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二十九日请示电的方针，不以国大名单交换停战。当时国民党通过第三方面向中共代表提出，中共必须交出参加国大代表名单方可停战。

11月2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国共谈判的[1]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三个月总结》。情况汇报，并决定马明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王维舟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傅钟为总政治部副主任，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廖承志主管新华社、解放社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原局转移到延安，仍由原中原局负责同志负责，王维舟参加中原局兼管四川武装工作。

11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保卫延安命令，十一月上旬，蒋介石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西渡黄河入陕西，准备会同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突袭延安。

11月9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时局声明；决定保卫延安由彭德怀负责与西北局联络，立即在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器材一两周内疏散完毕；中央直属纵队，由杨尚昆[1]、邓洁[2]任正副司令，李涛[3]任参谋长。

11月11日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保卫陕甘宁边区与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在讲话中提出，必须按战争的需要改变全党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严格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坚持艰苦奋斗。并指出蒋介石的攻势仅仅四个月已显出趋于衰竭的征象，再存两个月到四个月就一定可以被打退。

11月中旬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问题。在讲话中指出，国统区的城市工作要继续贯彻隐蔽精干、教育群众的方针。城市的共产党组织要帮助乡村。现在城市的形势还是高涨的，尚未压下去，故不以退却为方针，而[1]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2]邓洁，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3]李涛，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参谋部副部长。应以防御为方针。动员一些人到乡村去，以准备乡村的进攻。乡村仍是主要舞台，成熟的即发动游击战争，未成熟的加紧准备。并强调说，根据经验，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很难搞，也很难立足，但不要小看数十数百人的民变形式，它相当于解放区一个旅、一个纵队的作用，战略意义很大。要看得起白区工作，看得起这种干部，在党内予以鼓励。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财政会议情况的报告及对各地财政工作的指示致各中央局、区党委电：“在空前大规模长期激烈的内战中，各解放区的财政与经济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各解放区领导机关，对此必须严重注意，精密计算，给以正确领导，并动员全党全军及全体人员克服各种困难，以供应战争的浩大消耗，同时又保持人民的生活水准，才能争取战争的胜利。否则，由于财政经济的困难和混乱，可以直接妨碍与瓦解我们的战争机构，尤其要破裂我们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而使战争归于失败。”现将晋冀鲁豫中央局九月财政会议的报告转发各地，望切实研究参考，并将各自整理财政经济的经验电告。

1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退却逃跑、坚持敌占区游击战争的指示。强调“必须切实注意在已被敌占及有可能被敌占地区的各级干部和各种组织中，进行坚持游击战争的思想动员与组织准备，提倡英勇奋斗、艰苦工作的牺牲精神，反对退却逃跑、畏难怕死的卑怯心理，提高组织纪律与行

动纪律，命令那些具有决心和适宜的干部和部队留在敌后或回到敌后去，进行游击战争”。对于不适宜于游击战争的人员和组织的撤退，“必须是有计划和有命令的，必须是便利而不是妨害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的”。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谈判代表团飞返延安。董必武留南京主持工作。

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并就对国共谈判的估价、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的方针等问题交换意见。刘少奇最后说：代表团的工作就是揭露。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国际上也是糊涂了一下，但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了。和虽不可能，谈是必需的，为了教育人民。谈判中间不管有些什么个别问题，整个是很成功的，成绩就是证明妥协的不可能。几个问题可以确定：打的方针是定了，但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口号是保持一月十三日停战位置与政协决议从国际国内分析，胜利是可能的，但要经过较长的困难时期，要提倡克服困难。另外，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发展国民党区的游击战争，也都做而不讲。

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和形势问题的报告，并确定打倒蒋介石的方针，但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但不宣传；发展国民党区的游击战争，做而不讲。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冯白驹[1]、黄康[2]、李振亚[3]电在全国内战条件下，蒋介石很难调兵到琼崖，应利用此种条件采取积极行动，学会打大仗，消灭反动武装，扩大武装部队，为占领整个琼崖并向南路发展而斗争。

11月30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朱德六十寿辰晚会上致词，赞[1]冯白驹，当时任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黄康，当时任琼崖纵队副政治委员。

[3]李振亚，当时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扬朱德“为中国人民所作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结晶，给予党和人民极大的光荣”，号召各解放区以粉碎蒋军进攻作为寿礼。

12月1日致信康生：[1]，“边区土地文件看过。同意。在实行中还可发生各种问题，应随时准备再发布补充办法。特别是关于土地分配办法应切实注意。”“禁止干部多得土地及机关占有土地，现在即应提出，并在执行中切实注意，以免在事情发生后难于纠正。以上几点，望与西北局商酌。”

12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确定在伪国大闭幕后发表声明；对马歇尔复电，表示只要解散非法国大，撤退侵犯军队，则仍可继续谈判。周恩来在会上汇报了蒋管区中共组织的情况和群众斗争、统战工作等情况，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刘少奇认为，国民党区一方面一切反常混乱，另一方面群众还没有打倒国民党的决心，中国的主要斗争还是国共军事斗争。

12月4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发言中指出：半年到一年要有大革命，要准备在半年到一年内作出成绩来。确定大革命前夜的形势很重要，有预见才能有领导。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尽管有局部的防御和隐蔽。要有适应进攻的工作布置，口号仍是防御的形势。宣传要耐心地解释革命的必要，组织工作上要大胆使用各种干部。党内目前的主要倾向仍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

12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冀东区委并告各中央局、分[1]康生，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驻延安，同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先后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局电：应在实行土地

改革区域“进行过细检查，以便发现尚未改革、或改革不深入的村庄，加以改革与深入。对于中农利益被侵犯者务必迅速补救；以稳定全部中农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受打击的地主、富农应采取适当拉的政策，以缓和他们的反对。对于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应帮助其进行生产。此外，在边沿村庄你们亦可根据情况试行土地改革，以便发动边沿群众，坚持斗争。”

12月16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华南蒋管区工作。刘少奇提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香港可设香港分局，调刘长胜任书记。

12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破坏蒋军后方军事设施的指示。要求各地对“蒋军的仓库、军械、弹药、被服、军粮、汽油及其他一切军用器材，和供军事运输的一切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飞机、汽车、电讯等，应用各种方法给以焚毁和破坏。”指出，“这种工作如能有效进行，将在军事上给解放区以极大的直接帮助。”

12月19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关于党章报告可以公开出售的指示：“七大通过之党章及刘少奇关于党章的报告，各地可以公开印刷和出售。”

12月21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吕梁地区工作。会议决定陈赓纵队的领导关系，仍归太行建制，由中央军委指挥。

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并华中分局电：“同意华中分局与华东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华野[1]与山野[2]的[1]华野，指华中野战军。

[2]山野，指山东野战军。机关合并，使华中与山东完全统一领导与统一收支，以击破蒋军进攻，收复失地。”“但华中游击战争必须使其有力的坚持，必须留置必要的部队，华中分局委员必须有一二个负责人留在华中。”因此华中分局亦不必宣布立即取消。同时指出：“敌愈向北攻，敌后必愈空虚，愈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派部队派干部恢复淮南、淮北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12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鄂豫陕区委和鄂西区委电：坚持与发展两区的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对于目前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中国和平民主与独立的整个战局，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中央正准备从陕甘宁边区及五师来延安的干部中再抽调一批干部到鄂豫陕工作，以加强蒋军后方的斗争，配合解放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原在两区的干部必须继续坚持工作，不得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

12月28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南与鄂西北的工作问题。会议强调坚持斗争以渡过目前困难时期，要发展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两面武装，决定中原局派一人到陕南去。

12月29日就土地分配问题复信林伯渠，指出：“清算得来之土地如已经分配，可以和这次征购之土地一起统一均分。”“土地分配一次很难分妥，不要怕在明年春耕以前把土地多分几次。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是贫农的要求，是彻底革命的，我们必须拥护并实行这种平均主义，才能彻底改革土地。否则一切土地改革都不会彻底，并或多或少要成为富农路线的改革。我们应站在这种平均主义的要求上，在不侵害中农利益范围内，在明年春耕以前，来平分土地，并不怕多分几次，到大家特别是贫农、雇农认为分得满意与公平时，然后把土地固定起来，再不重分，方为有利。”

12月31日为中共中央和中原局起草复鄂西北区委电：为了在严重的情

况中“坚持斗争、保存力量、以待时机，请你们考虑是否可分一部分队伍和干部，分散的、秘密的渡过襄河以东，回到鄂中及豫南地区行动，留一部在鄂西北分散坚持。你们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必须避免铺张、暴露及正规根据地的一套，而采取精干隐蔽，以适应严重的游击战争。”

## 1947年四十九岁

1月1日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关于坚持鄂豫陕游击战争致鄂豫陕区委并告鄂西北区委电：“由于你们现在所处地位对于全国战略形势十分重要，中央与中原局认为；你们全体必须在鄂豫陕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不作别的打算。望你们动员全党全军坚决为这一光荣任务而斗争。”“为了在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必须克服内部一切动摇情绪。应开展斗争，反对退却逃跑，反对动摇不坚定及消极怠工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对于动摇不坚定没有信心坚持的各级领导者，必须撤职处分以至开除党籍，另提拔积极有信心有能力的干部来充当领导者。”“为了在严重情况下坚持斗争，你们必须改变现在一切铺张、不隐蔽、搭架子及建立正规根据地的作法，而转变到一切适合于严重游击战争的形式，并密切结合于群众斗争。部队必须力求精干，而不要只求数量的扩大。因为财粮困难，及需要缩小目标，应适当缩小合并及编并一些游击队，减少数量，提高质量。部队的行动应力求隐蔽，并须大部穿便衣，不要穿军衣。除在有保障地区建立我之公开的一面政权外，应大大建立两面政权，应十分注意在游击区、边沿区及国民党地区进行合法工作、秘密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以便应付敌人，隐蔽自己。”“现在全国的斗争形势对我们甚为有利，蒋介石困难甚多，全国各解放区都在直接间接配合你们，望你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取得其他解放区直接有力的援助，那时你们将发生伟大的作用。”

1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致各解放区的指示电：“冀察晋中央局提议召集华北财经会议电转告各区。此提议甚好，召集这种会议甚为必要。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中央认为应立即召集此项会议，但地点应在邯郸，并由邯郸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以邯郸中央局为中心在会议中组织主席团统一领导会议。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

1月10日就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征询意见致电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黎玉、刘澜涛、黄敬、李井泉、张稼夫、高岗、彭真、李富春、陈云：“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例如：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原佃户和大佃户分占了更多土地，军队、政府及其他机关团体，占有许多土地及公田（除自己开荒者外原则上这些土地和公田应一律让农民分配），而许多赤贫及雇农则没有分到或很少分到土地。为了在这些地区继续深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请你们考虑并搜集意见后，答复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颁布土地公债法令之时期，是否已到？是否要影响那些土地改革尚未深入的地区及将来新发展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还是要用反奸清算等方式来使地主拿出土地。（二）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党内和党外都有一部分人企图窃取土地改革的果实，分占更多的土地，这就是一种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而与贫农平均分配原则相对抗。在这些分配不公，引起农民不

满的地区，是否应提出重新分配的口号，或只实行个别填平补齐即够？又重新分配办法以在何时何地提出为妥？根据内战时期经验，土地常须重新分配二三次，才能最后分妥。因在最初分配时，总是急促的，难于调查周到确实，且有一些贫农雇农不积极要求分得土地，乃便于一部分人多分。但到后来势必重新分配，且一次比一次分得更公平合理，最后才把所有权固定起来。这是贫农雇农的要求，并使他们得利最大，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重新分配。（三）解决土地后转入生产，有何困难及如何解决此项困难？是否如有些人所说第一年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关于这个问题亦请你们表示意见。（四）上述三个问题以外你们见到的其他问题，请将意见一并电告。”[1]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中央决定，在今年五月四日召集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每一区党委及中央局、分局须各派代表一人，于五月四日以前赶到延安。会期大概二十天到一个月。到会代表不必是负责同志，但须熟习当地土地改革情况并准备材料和意见，最好能亲自到下层考察一个月后即动身来延。”

就军政委员会是否取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程子华、李运昌、陈奇涵[2]、黄火青[3]并告聂荣臻、刘澜涛、肖 [1] 三、四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加写的。

[2]陈奇涵，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3]黄火青，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副政治委员。克、罗瑞卿电：“在分局、区党委及地委已实现一元化领导地区，即应取消，如尚未实现党委一元化领导，可暂时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在军队中，如依七大时新党章讨论中所提出者，组织了军队党的各级代表会及团党委、旅党委等，则军政委员会即应取消，如尚未组织者则应保留。”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关于土地问题，你们须十分注意分配问题。在分配不公，群众不满的地区，可以重新分配。关于工业建设，须特别注意在山地及其他比较有安全保障地区，建立各种小规模工厂并提倡手工业。”

为徐特立[1]七十寿辰题词：“中国共产党的光荣”。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通告，宣布结束与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联系。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中央决定撤回执行部人员。

2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说：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现蒋介石在鲁南与我决战，如在鲁南再歼蒋军两三个师八九个旅，则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伪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未达到目的，美国陆战队要撤，片面放手援蒋亦困难，蒋区群众运动 [1]徐特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我们要研究这个形势，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

2月2日对保卫延安的部队讲话，指出：蒋介石的正规军有二百四十六

个旅，投入二百一十八个用于进攻我解放区。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五十七个旅，再打一年半，蒋介石就会倒，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在二三年内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是有可能的。你们的任务是，打垮胡宗南的军队，配合全国性的革命高潮。

2月4日作形势报告，强调全党都要出去工作，把过去保存的力量统统拿出去，打倒蒋介石，迎接全国革命的高潮。在谈到陕南、鄂西北困难地区怎样坚持时，阐述了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说共产党不怕什么，不怕马歇尔、蒋介石、地主，只怕脱离群众。“少拿多给，替群众想办法谋利”，如有这些观点，共产党只剩一个人还是不可战胜，一个人很快变为几十个。不要怕老百姓得了便宜，不然不能叫革命，不能叫布尔什维克。给群众好处，才有政治资本。群众观点一动摇，一切成问题。

2月6日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赴陕甘宁边区各地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员讲话，指出：解决土地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需要，实际做的就是打倒蒋介石的工作。我们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投身到这一广大的群众运动中去，执行中央的决定，迅速、放手解决边区土地问题。在给地主生活出路、不损害中农利益、不过火打击富农、满足雇农、佃农、贫农的要求等基本原则下，越彻底越好。

2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指出：“最近在陕甘宁边区试办土地公债结果，证明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初步的经验如下：（一）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的办法，如与群众的诉苦清算运动相结合，决不会减弱群众运动，相反，大大加强群众运动，使群众的清算更加站在合法地位，使群众感觉有政府法令的保证而更敢于斗争，使地主感觉更非拿出全部余额土地不可。”“（二）公债征购可以使地主把余额土地完全拿出，交给农民。”“（三）有些抗日地主、开明士绅的土地不便清算者，可以公债征购。对于外国教堂、外国侨民的土地，及其他某些公地如用公债合法征购比用清算办法更可避免一些外交纠纷。”“（四）在必须取得某些个别富农的土地以分配给农民时，用公债购买的办法比用清算的办法使富农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五）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能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六）公债对于地主的生活亦有若干帮助，地主希望以公债缴纳逐年的公粮。”“（七）边区公债条例传到北平时，很得中外记者赞许，认为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有所变更，故土地公债的办法可使我们的土地改革增加一般的合法地位，减少中间派资产阶级的反对。”“根据以上各项，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因为不是以公债征购的办法去代替清算，献地等办法，而是在采用清算、献地等办法之外，再增加一个征购的办法，多一个办法总比少一个办法要好。在陕甘宁边区也和各解放区一样，发动群众清算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办法（这是由下而上的），但如果再加一个由上而下的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来配合，就更能发动群众，更能使土地问题迅速彻底而完全的解决。”

2月9日关于东北土改问题致信毛泽东：“在东北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已发生打击面宽，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生产的不良结果，这在

东北有大量城市人口需要粮食供给及大量粮食出口的情形下，而完全不保留或在土改后不重新发展大农业经济，恐是不好的。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东北立即实行大体的土地国有制，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再由各地政府无代价分配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耕种，而耕种的农民只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土地税。自耕小农的土地（即中农、贫农土地）及富农家庭依照当地土地分配方法所应留下的土地，则不没收。如此，富农经济似可保留一部分，在将来亦更好发展新富农经济。四五十口人的大家庭亦可不分家，在可能条件下，即有土地多余条件下，愿意扩大生产的人，可以无代价向国家领到土地耕种。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以至私人资本家，亦可领取土地耕种或开荒耕种，并可建立少数国家农场，则可使农业经济不完全分散。在这种政策下，向富农征收多余牲畜、农具时，应以富农在土地分配后能耕种所分得的土地为限度。而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亦不按人口绝对平均分配，主要地应按各家庭的劳动力来平均分配，按人口平均则成为次要分配标准。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永远使用权。如此，对于富农、对于生产、对于东北深耕大农业经济，似比较有利。”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收集发动妇女经验的指示：“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中，务望在领导上主动及时地加强发动妇女参加，发动得愈多愈普遍愈好。要在农民大翻身的运动中，同时也使受压迫的妇女大翻身，打破数千年来在观念上及社会制度和习惯上的封建束缚。并望搜集发动妇女的经验与参加斗争的各种情况材料加以整理，于土地会议时带来，如有典型材料可先交新华社报道。”

2月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你们应派负责人带大批干部分往胶东、渤海两区，加强这两区工作，主要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组织生产运动及扩兵工作，因为你帆在今后长时期内将主要依靠胶东、渤海两区人力物力的供给来战胜蒋介石，故必须将你们的工作重心转到这两区去。”

2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晋冀鲁豫中央局电：“华北财经会议，对于克服困难，支援战争，非常重要，务须使其有成就，各项问题务须获得解决。”“望即催促各地代表携带材料，准备意见，迅速起身前往邯郸使会议能如期召开。会议进行情况望薄一波负责择要电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请派彭真率东北代表回延出席五四土地会议，最迟须于三月中旬起身。”

2月27日就军队中组织党委会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根据晋冀鲁豫实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这个电报经毛泽东阅改后转发各中央局、分局。

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办事处，限于三月五日前撤退全体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3月2日致电吕振羽[1]，指出：“目前在蒋管区组织人民斗争、开辟第二条战线，已十分重要。现在蒋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已调来进攻解放区，大后方十分空虚，蒋政府征兵、征粮及经济破产已使人民不能生活，组织蒋管区人民广泛斗争的前提条件，已很成熟。故你此去，甚有必要。但仍望你善自珍重，一切谨慎将事，切忌急于求功，一切依靠革命的群众，则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进入陇东庆阳地区，企图吸引中共军队西调，然后集中全力袭取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问题。

3月5日复信胡乔木[2]：“敌人进攻陇东，自须动员群众应付战争和敌人，但土地改革工作决不要宣布停止，并须尽力利用战争间隙，继续进行土地工作，使土地工作与应付敌人及战争联系起来，应依靠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的群众来应付战争，如转移与埋藏物资，组织民兵，掩护群众避难及为战争服务等”。土地改革“工作团人员，应在战争与复杂情况中表示自己的坚定、沉着与清醒。一切张惶失措及畏缩的情绪，应该克服。工作团现仍留陇东工作，以便受到锻炼。”

同朱德宴请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回到延安的工作人员。在讲话时说：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在复杂的斗争中，你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宴会。

3月7日同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董必武率中共在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回到延安。

[1] 吕振羽，历史学家。一九四七年，中共派他去湖南蒋管区工作，因病及交通梗阻未成行，停在东北。

[2]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秘书。3月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中央决定黄敬为晋察冀中央局第三副书记兼军区第四副政委，以便他能协同刘澜涛主持后方各方面的工作。”

国民党军飞机开始轰炸延安。

3月12日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带领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3月16日同朱德、任弼时致电贺龙[1]、李井泉、周士第[2]：我们及中央机关已由延安撤至瓦窑堡至清涧一线，原在这一带的中央机关已陆续向晋西北转移。毛泽东、周恩来暂留延安，南线总归彭德怀指挥。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3]指挥。

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十九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

3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冀察晋待命。”

3月20日同朱德、任弼时致电贺龙、李井泉：“（一）中央 [1] 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2] 周士第，当时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3]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决定全部先后转移晋绥。（二）贺炳炎[1]旅暂向离石、柳林线开进为宜，因克虎寨位置太偏北。贺旅电台即与我们电台联络，将来西渡后归我们指挥。（三）请在辛关渡设置少数船只，以便紧急时渡河之用。”

同朱德、任弼时在子长县王家坪与周恩来等会合。

3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子长县王家坪与毛泽东会合。

3月29日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县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

3月29日晚——30日出席在枣林子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电贺龙即转周恩来：“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2]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从中央工委指示。”“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3月31日晚，同朱德等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临县。

4月2日晨，到达晋西临县三交镇，与周恩来、贺龙、董必武[1]贺炳炎，当时任晋绥军区独立第五旅旅长。

[2] 董、叶，指董必武、叶剑英。武等会晤。

4月4日同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的中直、军直五千五百人，留河西七百人，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约一千人，决定去太行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其余陆续走。路线经五台前进，四月十二日可开始出发。我军已在大同及忻县方面有布置，可以保证过路。董必武、叶剑英在前带电台先行，以便与各地保持联络。杨尚昆留三交处理后行人员，邓洁留守三交到最后。但邓洁尚未到三交，请令他速来。

4月5日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档案资料转移情况：“（一）曾三[1]所管之文件，除带来六箱外，其余均存在陕甘宁边区，由西北局曹力如[2]保存，在安条岭者十五箱（为《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交清涧县委书记保存，在清涧以东四十里之某地二十箱（《向导》、《新青年》、《红旗》及抗战初期各地报告等），已告曾三派人将清涧文件中一切带秘密性者取出外，望中央直接负责告西北局保管与处理该两批文件。（二）现存河东文件，除曾三者外，有机要处二十箱（历年各报等），中组部二十箱（干部结论及表格），一局八箱（历年军事文件），尚有二局、中社部、城工部各有数箱。现决定除各机关本身少数文件自己负责带走不得遗失外，所有曾三、机要处、中组部、一局文件，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贺龙同志负责一切安全保障之责，暂时保存在贺龙同志处，以后听中央命令转移，并已令曾三将所有文件分为三类：甲、重要而不秘密者（如《向导》、《红旗》及已印刷之各种决定）；乙、秘密而不十分重要者（如某些电报及西北局[1]曾

三，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2] 曹力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财政计划等)；丙、又重要又秘密者。上述分类，以便在必要时或埋藏或销毁，或务必带走，无论如何不得遗失。关于上述决定，中央有何指示，望告。”

4月8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了全国和晋绥解放区的形势，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指出：晋绥边区的具体任务在于坚持长期斗争，尽可能消灭阎锡山和傅作义的有主力量，增加其困难，以便将来消灭他们。报告强调，首先要使人民的穷苦状态有所改变，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才能增加物力、人力，提高群众情绪，支持长期战争取得胜利。同时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真正得到土地，然后帮助其生产，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不起来，任何英雄好汉都是解决不了的。

4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4月11日接中共中央电：“根据目前战争形势与上月中央仍留陕北另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之决定，为求中央领导及工作进行之便利起见，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至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朱、董[1]三同志为常委，刘为书记。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来康生、彭真参加上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在中央工委下，中组部、中宣部、解放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徐特立文教[1]刘、朱、董，指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工作团、三局一部、中央机要处一部、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一部，均由安子文[1]率领去太行，受中央工委领导。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罗迈[2]、邓颖超参加为委员。

4月22日致信贺龙、李井泉、张稼夫[3]等。指出：“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工作进行，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能彻底的。”“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在个别的村子的典型运动开始后，周围村子的群众就自动照样开始，使运动成为潮流，成为风暴，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自发运动；应加以鼓励促成，并尽可能给以组织性和纪律性。只要有真正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少数二流子及干部），只要这种运动的领导不是操在坏人手里，只要我们在这种运动起来之后，不是置之不管，而是及时派一些忠实而有能力的干部去掌握其领导，并从群众中培养教育成批的领导分子，这种运动是不会有危险的。”还指出：“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批评与撤换我们任何干部，在各种会议上令他们报告工作及答复群众所提出的质问，指出他们的缺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罗迈，即李维汉。

[3] 张稼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部长。点，揭发他们的错误，选举或不选举他们到领导机关。群众的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使其不受侵犯。任何党政军机关，对于侵犯群众这些民主权利的任何行为，对于受到群众批评和反对的干部向群众施行任何报复的行为，应该认为是严重的犯罪，必须给以惩处。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毫不动摇的切实实行。”“如果群众没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勇气，群众就不能压服地主阶级。群众如果还怕我们的干部，害怕我们的干部不正义的报复行为，那群众将更怕地主和恶霸。也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才能肃清社会上数千年来的封建残余。”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把这封信批转各地，指出：“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4月23日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六地委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强调晋绥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一是对付阎锡山，斗垮敌人；二是把地方搞好，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吃饭问题，中心任务是土地改革、生产、同冀晋发展通商。把这三件事做好，老百姓生活就会好，群众就会团结在我党周围。在谈到解决土地问题时，要求分区党政军及县委选择一批干部，组织工作团，在今春到明春把五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完。工作中基本的是群众路线问题，先经贫农，再经农会。我们提出意见，让群众去讨论，大家动手做。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真心赞成，遵守了这一条，就不会犯冒险主义。要用一切方法培养群众的自信心、自信力，一切功劳是群众的。党政军及社会上的一切肮脏东西，要依靠充分的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才能洗干净。在政策上要坚持四个原则，即：彻底取消封建地主的土地关系；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能彻底消灭富农经济；按已有土地平均分配。但政策不要阻碍发扬群众民主。群众要违反这四个原则，我们不赞成；群众还要办，还不赞成；群众一定要办，就让办，让群众犯个错误，有了教训，会改正，以后会相信我们。

4月24日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汇报途经晋绥地区兴县、静乐、宁武、崞县（今原平）等地所了解的情况。指出，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农民生活很穷困，生产降低及破产现象，到处可见。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电报提出，准备由晋绥分局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对晋绥地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并从党政军民各机构中抽调最可靠的干部组织工作团，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建立贫农小组，建立村、区、县及边区的农会组织系统，依靠农会组织和工作团去彻底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

4月26日到达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城南庄。

4月27日28日同朱德听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汇报工作。

4月30日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干部欢迎会上讲话。指出，蒋介石进攻延安，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因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实际在政治上没有好处，军事上又犯了大忌，使胡宗南陷在陕北，粮食困难，交通断绝。蒋介石

石这样干，正表示其危机严重。再有一年半年，全国也可能变成山西形势，蒋介石变成阎锡山。那时美国开一百万兵来也不管用。晋察冀解放区在一切为着前方军事胜利的方针下，后方要用一切力量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以此为中心，结合各种工作把它搞好，使党更巩固，根据地更巩固。一定要切实节省人力物力的消耗，减轻负担，爱惜民力，保护民力，单纯的财政观点，没有群众观点是错误的。

5月1日对薄一波二月十八日所送的晋冀鲁豫区土改情况报告作批示：“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惧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常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常常落后于群众甚至阻碍群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对于这个报告应注意下列几点：（一）对于地主，必须根据全体农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意见来处理，对于中、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干部家属地主的照顾，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愿”。“（二）对于富农的土地及其牲畜、工具等，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是不能不动的，但必须取得中农的赞成，向中农作详细解释，而且必须保存一部分富农经济（即在事实上允许农民发财），不要完全消灭富农经济，以免引起中农的恐惧和动摇，因此，打乱平分及中间不动两头打乱平分的办法各地必须慎重采取。（三）在各地所表现的‘左’的错误，在于没有切实注意建立与经常保持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统一战线，在于对中农采取不谨慎不细心的态度，因而常常引起中农的恐慌动摇，或侵害中农利益，各地必须密切注意中农态度的任何波动，对中农采取密切联合政策，只要全部中农能和贫农一致，就不会有过左的冒险主义，而如果引起中农与贫农分裂就要成严重的冒险思想。（四）我们各乡干部如有多占群众斗争果实及其他为群众所反对的行为，应充分发扬群众民主，让群众批评揭发及撤换其现任职务，不要阻碍群众，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群众相信自己作主人。为了使群众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应组织经常的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县区农民代表大会等，让农民选举，农民代表会暂时统治一切，并经过他们来改造政府和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被群众批评和撤职的干部，应采取争取教育的方针，调他们学习后改派工作，并在群众中对他们的错误负责。”

5月3日同朱德到达河北平山封城村，与聂荣臻、刘澜涛、肖克、罗瑞卿见面。随后中共中央工委机关设在平山西柏坡村。

5月6日就彻底完成冀东土改问题，同朱德致电中共冀东区委：“冀东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获得伟大成绩，但还未彻底，地主还保留了过多的土地财产，富农土地一般未动，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仍未满足。因此，农民继续要求获得土地。共产党对于农民群众的这种要求及其过去一切反对地主、富农的行动，必须拥护，不能反对。”“为了尽可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第一、你们应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可从地主方面继续取得一部分土地财产填补给农民。以前主张留给地主多于中农一倍、两倍土地的意见，是不妥当的，中央前曾要你们对地主采取拉的政策亦是过早的。但在彻底清算地主的土地财产时，仍应集中火力斗争汉奸、豪绅、恶霸，对中小地主、抗日地主仍应有出于群众自愿的照顾和区别。第二、在复查地主割封建尾巴的运动中，可

以而且应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满足农民要求，但应避免发动专门反对富农的运动，除对汉奸、恶霸、富农为群众所痛恨者应该清算斗争外，对一般富农可用协商、调解、征购等办法使其拿出一部分土地牲畜。对于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应以不动为原则。就是说不要完全消灭富农经济，在每一乡、每一区应该保存几家富农不动，中农才不恐慌。第三、必须坚决联合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但最近由地主、富农下降的中农可以除外），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使中农在复查中得到利益，密切注意中农情绪和态度的波动。凡是引起中农恐慌和反对的事，应劝告贫农停止进行。凡是中农同意和赞成的事，应大胆放手进行。”

5月24日致电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望注意研究几个问题：“（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右倾错误与‘左’倾错误。（四）在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封建统一战线的经验如何。（五）在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建立乡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区县边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系统来进行改革是否更便于运动的开展及群众的学习。（六）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的分配原则应如何规定。（七）在改革完成后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八）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即需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

5月31日同朱德致电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七月七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

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我们提议以杨得志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以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以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负责全权指挥晋察冀野战军，上述提议经我们与聂、肖、罗[1]分别谈话，在数日考虑之后，又经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一致赞成和同意。”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6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晋察冀野战军工作状况：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还带着联合作战的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现正着手改变这种情况。为此建议在青沧战役[2]后允许野战军休整一个月，责成杨得志及罗瑞卿在朱德、聂荣臻的帮助下完成一切必要的改组。朱德现已随聂荣臻去冀中，刘少奇因身体不好未去，拟回阜平休养一时期。

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信中通报了各战场情况，说“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6月16日同朱德复电华东局，同意雷经天任华东军区两广纵队[3]政治委员。

6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并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青沧战役胜利完成甚慰”。“下一步行动，似以全力（主力三个纵队不要分散，再加地方部队）向平津段出[1]聂、肖、罗，指聂荣臻、肖克、罗瑞卿。

[2]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津浦线北段，天

津以南地区发起青（县）沧（县）战役，解放了青县、沧县，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这一战役使冀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3]两广纵队由东江纵队改称，曾生任司令员。击，截断杨村、黄村段，争取在大清河北歼灭援敌为有利；如援敌不好打时，则转向平保段出击。如此，可在平津、平保两线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

6月22日任弼时、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在平津附近可设电台，所需报务员，请就近解决。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十二万余人，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一百五十公里地段上，一举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7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即转杨得志、罗瑞卿并告林彪、罗荣桓：“现在距雨季尚有一个月，主力应即照杨、罗电移至高阳、雄县以东，休息若干天，争取在午号[1]或午有[2]以前，在永定河以北（平津间）进行一个战役。此役完成后即回至石门[3]以东，休整一个月（八月），然后进行石门战役（九月）。打石门以后休整一时期，即应移至平绥、平汉两路之间，对该两路之敌作战，计时约在十月半以后，准备以三四个月时间将该两路之敌充分削弱，然后与我东北部队配合夺取平绥路。”杨、罗于四日又提议提早开始石门战役。六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7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就晋察冀再组三个地方纵队问题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肖克、刘澜涛、黄敬：“此次刘邓[4][1]午号，即七月二十日。[2]午有，即七月二十五日。

[3]石门，即石家庄。

[4]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南下前，晋冀鲁豫已从四个军区组成四个地方纵队，担任起解放区周围的野战任务。除王新亭[1]纵队已在晋南吕梁建立战功外，现冀鲁豫七纵队已重新解放河南浚、滑[2]、封丘、延津四县，秦基伟纵队[3]正在道清西段行动，已占博爱、沁阳。”“本此经验，晋察冀可否亦于最近从四个军区组成三个地方纵队，以便配合杨、罗野战军或独自在本区对敌作战。”

7月10日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会议准备情况：“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全国土地会议，只待晋绥及陕甘宁代表到达，即可开始。估计到齐可有一百多人。“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会议即在工委领导下并组织主席团进行。对于会议，我们只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若干文件作为参考外，无其他准备，亦未准备报告，拟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会议问题将牵涉很广，我们将尽可能解决一切业已成熟的问题，其他未成熟的若干问题，亦拟进行一些讨论，作些思想准备，但不作决定。会议将延长到一个月以上，工委将集中全力来进行这个会议。”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土地会议进行的方法，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

7月11日朱德致电毛泽东，报告晋察冀军区军工生产、人员补充等问题。其中说，此间军事工作，经刘少奇的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督促进行尚非易事。财政经济及土地改革更是困难[1]王新亭，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浚、滑，即浚县、滑县。

[3]指以秦基伟为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解决的事，但是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军事进行仍是会遇到许多阻碍的。

7月12日电告各中央局、分局：“现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陈伯达[1]均已到达平山工委所在地，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各处情况及报告望即送工委。”

7月14日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飏[2]并告聂荣臻、黄敬并报中共中央：“顷接耿七月十二日电，悉敌七师之二十、二十一两团侵占正定。如我乘敌未稳和滹河水涨，敌援不易，我军将其歼灭正是好机会。这对于军委指示逐渐削弱冀敌，及下一战役之执行，均有好处。请杨、罗、杨考虑，目前部队情况，是否能马上行动，决定，电告聂。”

7月15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他们所制定的关于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文件。指出：对过去的成绩不要作过高估计，要亲自或派可靠而有能力的干部去那些认为业已解决土地问题的乡村多加考察。挖掘大地主、汉奸、恶霸的窖藏，以彻底消灭地主的经济基础，并解决农民牲畜、资本、耕具的困难，是很必要的，但应注意不要把大家的全部或主要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方面，而放松农民对土地问题的基本要求的解决。在指示文件中应提出，在乡村中建立贫雇农小组，并以贫雇农小组为核心团结全体中农建立农会，建立区、县、省的农民代表会，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去解决各种问题，实现农民代表会的最高权力。为此应严格告诫土改工作团，在工作中要彻底走群众路线，反对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对新解放区及恢复区的工作，亦 [1]陈伯达，当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2]耿飏，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应在指示中提出。

在全国土地会议预备会上讲话：全国土地会议原拟五月在延安召开，由于战争关系没有开成，中共中央就委托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将来的文件和决定还要经过中央批准。会议定于十七日开幕，会期大概三四十天。会议开法，先由各地作报告，然后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会议的领导机构是主席团，由中央工委委员及各代表团负责人组成。工作机构是秘书处，下设文件编辑委员会。主席团由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二十二人组成；常委为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康生、彭真。秘书长为安子文。编辑委员会由陈伯达、廖鲁言[1]负责。

7月17日主持全国土地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一百一十余人。刘少奇在开幕会上讲话，指出：“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左”了一切就“左”，右了一切就右，会影响各种问题，今后如何有意识地使其它工作有计划地推进，应从解决土地问题开始。大家反映情况、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好就好，坏就坏，开个老实会。如果根据假报告做决议，就会害死人。

7月20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与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土地改革以后，仍有富农经济，只有最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 [1]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

究室秘书长。消灭富农，消灭穷困，要把这个真理告诉农民。只要不侵犯中农利益，就不会犯冒险错误。强调不改变干部的不民主、命令主义的作风，不先搞党的问题，就不能搞好土地改革。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长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致电薄一波：“土地会议须八月底才能结束，望你即来参加，带财经材料来。”

7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康生[1]，通报近期工作和战争情况：（一）“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2]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又决定精简人员，规定新的生活标准，以利持久；又决定向脱离群众的干部作斗争，展开土地改革。”（二）“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赓[3]纵队行动；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三）“刘、邓歼敌八个半旅，山东歼敌一个半旅，邱清泉[4]、吴绍周[5]等十个旅从鲁中被迫调至兖州，山东局面稍见松动。”

7月30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与晋察冀代表团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晋察冀在土地改革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1]康生这时在河北平山参加全国土地会议。

[2]彭、贺、习、马、贾，指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贾拓夫当时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3]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陈谢兵团司令员兼第四纵队司令员。

[4]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师长。

[5]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同时强调这些问题的性质还是党内问题，要当作党内问题来解决，不要打人。一打就秩序混乱，就没有民主了，要订出纪律。

8月2日致电饶漱石、邓子恢并报中共中央：在党内严重不纯的情况下，如不预先加以适当改变，即去进行激烈的土改，必致引起事变。在冀晋区亦有类似的情形，冒然进行彻底土改即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干部强迫群众开会、打人、杀人。“你们去改造渤海党组织时，必须十分警惕慎重。目前山东军事十分紧张，进行这种党外党内的激烈斗争，更须充分警惕，否则类似内战时富田事变及大杀AB团改组派的错误是可能重复的”。可先调开若干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负责干部，然后动员全党去发动贫农联合中农进行土改，并在土改中逐渐改造干部，根本改变渤海现在情况。

8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反映土地会议上各地所汇报的情况，并对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转变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建议，请示中央：“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

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与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冀察晋及其他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在冀察晋（晋绥亦大体相同）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分，其中地主、富农成分直接间接占统治地位者不少。”同时“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两月来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上述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但这个方法，又是如此激烈的一个斗争过程，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然而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必须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为此建议：全党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暂时代替各级业已死亡的参议会，作为各级权力机关，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规定每年旧历正月初一（或其他日期）一切村干部解除职务，由农民大会或代表会检讨其工作，并进行改选，然后召开区、县代表会，改选区、县干部；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除特许者外，在土改期间回避在本县、本区工作；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加调查审讯，以保障干部及少数人不受群众中某些过分行动的侵犯，并对其犯罪行为得以揭露、证明和处分；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犯罪干部及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十三日，中共、中央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8月8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谈上改工作的领导问题。指出，领导的基本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及其不断反复。走群众路线不是不要领导，恰恰是要好好领导。只要群众自己干，这是自发论。我们要的是既不包办、又不尾巴主义的列宁式的领导。不是共产党领导，就是地主、富农和中农的领导；不领导，就是放弃领导，这是危险的。领导群众，不能脱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能没有意见和主张。要用一切办法争取领导权。在谈到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偏向时说，偏向要纠，但应研究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间纠。强迫纠即是泼冷水。纠偏，要依靠说服，依靠群众的自觉，注意在纠偏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鼓励他们的热情。领导要有预见，要能预防偏向的发生，要善于拔掉萌芽。8月9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讲话，着重阐述群众路线问题。强调要树立相信群众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要恩赐包办。一切伟大的人民事业，都是人民自己搞的。第一有功劳的就是人民。指出将群众路线与领导相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把群众要求与政策相对立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政策要根据群众的斗争和要求而制订，也要根据群众的斗争和要求来修改。同朱德、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

“据杨、罗、杨[1]电：敌主力退大清河以北扫荡，我以军区部队配合民兵对付之，野战[1]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军急须整顿到八月二十五日。我们商量的意见，趁此时机，应准其充分休整，因野战军初组成，干部调动多，交代就职均不熟习，连队补充了新兵，亦应争取训练短时期，如准备充分再配合东北作战或独立作战，均须准备连续作两个战役为宜。因此我们提议中央准许他们整训到八月二十五日为好。”

8月10日致电黄敬：“关于战争形势估计，以更谨慎一些为好，否则可能引起某种乐观情绪及对困难估计不足等心理。你们可将新华社总社来电转发各地及有关机关，作为你们以前估计的某些修正。因为仅系一种估计，就很难完全符合客观的发展，如有新的情况发生或发现以前没有估计到的某些情况，应随时修正自己的估计。这应成为工作习惯，不要以为自己讲过的东西就不好修正。”

8月13日同朱德致电聂荣臻、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据东北林彪、罗荣桓电，东北主力将于九月尾开始行动，要求冀热辽部队于九月八日前后，先在北宁路山（海关）、锦（州）段进行彻底破坏，以便尔后配合作战。

8月16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讲话。讲了“五四指示”形成的历史背景，强调以后党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首先要在党内的思想上和组织上采取一些办法，经过整理、整顿，加强纪律，在思想上和组织系统上取得一致，再去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团只是暂时地特殊采用，地方党经过工作整顿后，工作团就可以撤回。在土地改革和整顿党的问题上，一定要在思想上明确一致，组织上有界限，办法上要妥当，步骤上不要错乱，不要犯急性病，但必须有决心，不要等待。

同朱德、聂荣臻致电晋察冀野战军：石门既不好作战，请提出新的战役意见，以便我们商讨后呈军委决定。如暂时各方均不好打，可多整训十天至十五天，将部队补充完整，好好训练，待秋高时再大举进攻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平汉、津浦、北宁三条铁路线，或再攻石门。现正定有保安队二千余人，在此休整中亦可派一部分兵力解决之。

8月20日——21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土地会议的中心是要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没有很好发动、组织和团结起来。妨碍充分发动农民的原因大致是三方面：地主、富农阶级的阻碍和破坏；领导上的动摇和官僚主义；党内的不纯洁。报告认为抗战期间发展党员没有强调成分，没有强调阶级教育，而且是大量的发展，很多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吸收了很多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相反，对吸收贫农入党，有些地方根本不注意；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领导机关中、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机关中占了优势，并在党内形成熟视无睹的状态。所以，必须对地主、富农站在党内反对土地改革的情况引起严重注意。要整编队伍，首先从党内整起，提高党的纯洁性。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实行回避在本地工作的原则。其次，整编群众队伍，以贫农为中心，团结全体中农以及其他反封建分子，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团结群众的队伍。第三，要建立人民法庭，对于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判调查，执行诉讼。建立起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

8月23日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杨、罗、杨[1]十九日十时之第二方案行动（三纵去西面涑水一带行动）可否，请军委批示。”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一个纵队攻涑水一带、主力至大清河以北机动之

方案。

[1]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

8月30日同朱德复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你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敌地堡坚固，应研究对策，筹备技术与材料后，再设法攻破。”“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习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

9月1日在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城市工作问题很重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因为进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1]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贪污腐化。如果我们领导上不注意抵抗这个势力，自己也动摇，也搞贪污腐化，那就保管垮台。进城之前要有准备，进城之后要有纪律，要委派负责人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关，要给进城工作的人员讲清楚，一定要守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9月4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认为平分土地的办法是消灭封建最彻底的办法，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毛病最少、好处最大，简单明了，贫农容易掌握，是个大解放。这是最公平的办法，党内问题也好解决了。

9月5日就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等问题向中共中央请示：“土地会议已经进入结束阶段，四、五天内即可闭幕。讨论原集中在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因新华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1]李自成，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而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及整党、组织农民与进行农村民主运动及生产运动的方法等”。六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央工委：“九月五日报告悉。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

9月11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来实行彻底平分土地，而不采取打乱平分的办法。从理论上讲更进步的办法是打乱平分，封建关系可以通通搞掉，就连农民的土地旧有关系也搞掉了，但这个办法比较激烈，恐怕农民受不了，可能说服农民更困难些。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乡

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刘少奇作会议结论时，指出：全国土地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土地会议有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阶段，一些观点、论点、看法和政策有缺点，甚至有错误，后来修改了。可见大会是实事求是的，也看到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是会有错误的。开始有错误，后来改了，这就对了。”“大会开得好，错误发现了，修正了，真理也发现了。我们准备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是毛主席的口号。今后要继续去发现我们的错误。《土地法大纲》等文件还可能有错误，要准备去发现，准备由历史来证明、来作结论。”结论对土地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会议上通过的《土地法大纲》，代表着今天土地政策的基本和主要部分。《土地法大纲》还要经中央修改、批准后再发给你们，可先根据此草案去准备。从草案来看，政策已彻底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一部分中农虽然抽出土地，但大部分中农得到土地。就是对抽出土地的富裕中农也要设法团结他们，必要时可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比如在政治待遇方面或分些别的东西给他们。”“《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但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如对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等，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区别一下好。对大地主、恶霸可斗得凶一些，对于那些愿意投降的中、小地主就轻一些。不过，要在基本上不牺牲群众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之下，在执行平 93 分土地政策之下来区别，不能因为区别和照顾而牺牲群众基本利益或不实行平分。区别，基本上是根据群众意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在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方针下，分化敌人营垒。应该有此斗争策略。”“《土地法大纲》经中央批准后，要与群众直接见面。各地订的细则如有与《土地法大纲》抵触的，以《土地法大纲》为依据，平分土地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自己去搞。最可怕的是群众还没有发动，还没有与地土撕破脸，仅仅由几个干部包办。苏维埃时期的经验，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组织队伍，发动贫农、雇农组织农会，群众觉悟了才行。不去组织队伍，不提高群众觉悟，是不能分好的，就是分了也不巩固。”“政策上有个问题要提一下，就是工商业问题。工商业肯定要保护。有的工商业者有土地可以分，其他不动；有些地主有工商业，工商业部分不动；有的地主把东西转移到铺子里，可以命令退出，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结论认为，“今天，政策不彻底这一条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党搞好了，其次是群众队伍，群众队伍的整编决定于发动群众。整编队伍的方法，上次报告中已详细讲了，还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进行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结论强调，“实行这样的彻底平

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象个共产党的样子。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我们有信心能做好。”这个结论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

9月14日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晋冀鲁豫代表团谈话，指出党内斗争是为了搞好党，而不是弄垮党，提意见要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一切无原则的斗争都不准。在土改中，对“反革命案”更要慎重。

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晋察冀代表团谈话，指出要坚决地结束那些无原则的争论，回去只解决一个问题，平分土地和为解决土地问题的需要而整党。全党要努力为消除军队与地方的隔阂、增进军队与地方的团结而斗争，消灭山头，消灭界限。

9月15日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晋绥代表团谈话，指出从分局到支部的党员，凡障碍土改者一律必须以组织手段扫清。历史检讨与土改、整党直接有关者仍可以而且应该检讨。怕丢地位、丢面子等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保守性，都要妨碍革命性。把面子、架子打掉才能一身轻，从头做起。自己不去保护面子的人都有面子，极力保护自己面子者就无面子，这是党内的规律。凡属真理是磨不掉的，磨掉了就不是真理，这就没有什么可惜。领导人应该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人民的一个工具，要有这种认识，面子问题就解决了。

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东北代表团谈话，指出在党内要及时制止争论不休的、不考虑后果的、不负责任的无原则斗争。整党与整干部要自上而下，从中央局起，然后以省为单位、以省委为中心来整，有些实际是在党内闹事的老资格要整。要为东北人民树立一个好作风，建立一套工作的纪律，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搞好与群众的见面礼。这才有政治资本，局面就打得开。搞群众运动，除了农民就是工人，绝不能忽视城市的工人工作。

9月16日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山东代表团谈话，指出要派负责干部深入下去搞土改，必须在生活上、作风上给当地以面貌一新之感，有为人民当长工、当儿子的决心，特别对穷小子要更亲热。要先抓紧渤海区。在游击区可搞土改，只有搞土改才能坚持。在游击区搞土改、整党、民主运动，都须看形势、想办法。检讨历史问题不妨晚一点，现在没有时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土地会议“决定两大问题，即通过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及普遍整党”。关于整党，“决定各区首先由上而下进行，召集各级干部大会，查阶级、查思想，宣布平分土地政策，总结过去土改经验，进行打通思想、调换干部，整理组织及规定纪律诸项工作，以便在党内去掉平分土地障碍”。“然后进入农村，整编农民群众队伍，建立贫农委员会，联合中农，建立农会，即齐始平分土地和地主富农财产。

在平分土地之后，再实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整党整政，召集村农民大会及区、县、省、边区各级农民代表会，由群众审查并改选各级干部，公开党员及党的支部，建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建立各种经常的民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预计在明年春耕以前，完成由上而下整党及平分土地，以后再进行由下而上的整党整政。约三四个月亦可完成。我们想在明年五六月间召集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不再开土地会议），成立全国农民总会，并同时召开青年、妇女的全国会议，成立青年团及妇联会，总结平分土地经验，讨论建立各种民主制度，并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中央政府的成立”。

9月17日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冀热辽代表团谈话，指出进行党内斗争，应采取最负责的态度，目的必须是有利于工作，对党对人民有好处。遵义会议时，只说军事战略错误，不说路线错误，毛泽东明知路线是错的，但在决议上却写着是对的，这不是隐蔽真理。当时如提路线错误，则不能团结，会在长征中途搞垮的，这是最大利益，小道理应服从大道理。又指出，上面这些话是对上级而言，绝不能用来对下级，把它用做自己实行家长制的根据。

9月18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晋察冀需要加强领导，提议彭真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到晋察冀帮助与指导工作。十九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同朱德分别致电续范亭治丧委员会和续范亭夫人。给续范亭夫人的唁电写道：“范亭先生逝世，是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闻之不胜哀悼，尚望阖府善自节哀，继承先生遗志，灭蒋救国，以慰英灵。”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在山西临县病逝。

9月19日在中央青年工作会议上讲话：要踏踏实实准备一年，再开党内青年工作会议或青年团代表大会。青年团首先要求质量，要有一个好的纲领，一个好的作风。今年和明年，青年干部要先参加土改，在土改中组织青年，总结经验。还指出，青年团在大革命前搞得很好，大革命后犯了先锋主义错误，抗战时取消了，现在正是重新建立的好时机。

9月20日在中央妇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解放区的妇女是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力量，解放妇女是各级妇委会的重要工作。解放区的广大妇女是农民家庭妇女，这是妇女工作的对象、主人，要了解她们的痛苦、要求、脾气。要深入下去接近她们，搜集材料，积累经验，搞一个纲领。有了纲领，目标明确，各地工作就不会盲目，就会统一。

9月22日同朱德、冯文彬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青年工作会议情况，建议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提出建团工作计划。十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9月23日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晋察冀野战军在大清河战役[1]中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未获大胜；但此次士气极旺，干部之具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朱德拟去野战军再整理一时期，随同杨得志、杨成武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树立起来。刘少奇因要整理土地会议文件，不能去。

9月28日致信彭真：“你们在大会可传达土地会议的精神与几个要点与原则的规定，不要照样传达”。“由你们根据情况发挥与择要解释，这样传达与讨论最为适宜有效，可免教条主义的危险。”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热河分局电：“现将中央对土地会 [1]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晋察冀野战军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整训，向大清河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歼灭国民党军五千余人，至九月十二日，撤出战斗，

返回大清河南岸。议平分土地的指示转你们。同时土地会议又决定全国各解放区普遍整党，以便先肃清党政军民各机关阻碍平分土地的障碍物。”整党“首先由上而下整，召开各级干部会，打通思想，整顿组织，查阶级、查思想，调换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及妨害土改的干部，并定出严格的纪律以便制裁一切反对与阻碍土改的分子，只有如此，取得全党思想上组织上的一致，才能集中全力去团结与发动农民，以贫农雇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实现平分土地。在平分土地后，再进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来改造与整顿党政，建立各种经常的民主制度。”

9月30日同朱德致电徐向前[1]、滕代远[2]、薄一波[3]并报中共中央：叶飞[4]、陶勇[5]两纵队是陈毅[6]、粟裕[7]兵团的主力，他们的削弱，对大局是不利的。你们可否在尽快的时间内给该两纵补充兵员。望转告陈毅、粟裕，令他们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十月四日，徐、滕、薄复电，说拟于今冬扩大十万新兵，当给叶飞、陶勇两纵以补充，唯新兵须经短期训练，估计明年一月始能拨兵。

10月5日同朱德复电杨得志、杨成武：同意晋察冀野战军出击保定以北地区，并仍采用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10月7日在中共中央工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

[1]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滕代远，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3]薄一波，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4]叶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陶勇，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6]陈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7]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主要讲了查阶级、查思想的道理。

10月9日同朱德致电杨得志、杨成武、耿飏、聂荣臻、肖克、赵尔陆[1]：在破坏铁道时，应注意桥梁、水塔及其它我们将来不能或难于修复者均不要破坏；但铁轨应搬走，枕木应烧毁，路基应彻底平毁，以及其它我们将来易于修复者应尽量彻底破坏，以达到战术要求为止。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土地法大纲业已修改完毕，决于明（十）日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政策。

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致信彭真，对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扩大会议及土地会议的经过情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表示赞成。认为晋察冀中央局“对于过去的总结及对今后工作所决定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并将成为晋察冀工作转变的开始”。

10月11日晋察冀野战军在保定西南清风店地区发起清风[1]赵尔陆，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店战役，至二十二日，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第七师和第十六军一个团。

10月17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电：“在目前土地改革期间，应由无地、少地农民组成贫农团，再由贫农团大会选举贫农委员会（可不叫贫农小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应改为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乡村农民大会及农民代表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应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由各级代表会委任各级政府委员会。而各级农会委员会即等于各级代表会的常驻机关，与以前参议会的常驻委员会差不多。它与各级政府委员会同时存在，并经常监督政府工作，且由它按时召集代表会审查并决定政府工作。上述形式是否妥当，望你们提交会议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考察，进行创造，以便在将来能正式规定一种制度。”

10月18日致信彭真，指出：“整党的具体目标，也是为了使党能正确地领导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平分土地，暂时以不旁及其他为好。因为在平分土地中，问题还是很多的，不要疏忽。另外，在平分土地后，是还要来一次整党的，故党内许多问题还可到那时去解决，也以到那时去解决为适宜。现在只以除去平分土地中的党内障碍及破坏因素为目标。”还指出：“一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只要与原来的阶级断绝联系，诚心接受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教育，改造自己，就都有光明的前途。”同样，也应该告诉一切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也受过旧社会地主富农许多错误观点的影响，因此也必须在党与劳动人民的教育下改正与肃清这些影响，然后他们才能成为人民的代表，人民的领袖。”信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群众，并不是唯成分论者。我们现在有完全的必要强调社会阶级成分，因为现在党员的社会成分正影响我们政策的执行及党的进步。但我们必须防止不正确的唯成分论的产生。

10月22日晋察冀野战军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乘清风店战役胜利之机夺取石家庄的建议。

10月23日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兵只有三个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官被俘[1]，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2]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你们意见如何？望复。”并告，朱德拟即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

致电彭真、聂荣臻、康生、刘澜涛并告薄一波：“晋绥报告他们由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了一个告农民书，作用很大，农民根据此书自动起来扣押地主并请派人去分田。你们除公布土地法外，是否也发一个告农民书，望考虑决定。最近你们在会议上印发的文件似乎太多，可能会失去中心。”

10月26日复电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完全同意你们对于土地工作的计划。领导骨干依靠县、区、村农民代表会去进行一切工作的形式很好，望普遍运用与发挥代表会的作用，并多开代表会去解决各种问题。这种代表会议将来可能成为解放区民主政权的经常制度，将一切权力集中到代表会。”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舒同电：“同意[1]指在清风店战役中，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被俘。

[2]平、保，指北平、保定。你们意见，在整理党的组织中，对于立场不

坚定、脱离群众、不能完成土改任务的干部，应无所顾忌的加以调动；并同意调换区党委书记景晓村，以张晔为书记。”

10月30日电告中共中央：朱德已到杨得志、杨成武、耿飏处，康生已于二十九日晚从阜平起身去渤海张鼎丞、邓子恢处，彭真到阜平晋察冀中央局，董必武、刘少奇、陈伯达留中央工委。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总到杨、杨[1]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11月3日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转朱德并聂荣臻、肖克：“请准备于冬春之间开始与东北我军作较密切之配合作战”。“请计划在石门战后之兵员及弹药等补充，以便在这次战役后休息一时期，即进行平津路或平绥路之配合作战。为此目的，请令杨、罗、杨电台即与林彪电台直接联络，并要聂、肖令地方部队亦按时休整补充，准备配合作战。”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一）同意合并察哈尔及冀晋两区党委为北岳区党委，并成立北岳纵队。以赵振声[2]为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军区纵队政委，唐延杰任军区纵队司令员，王平任第二政委，张苏任行署主任，刘杰、杨耕田均任区党委副书记。（二）同意调吴德到冀热辽工作，以杨献珍为中央局秘书长。”

11月4日同朱德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我们电台已与你们电台经常联络，你们情况及地方工作情况，请直接发给我台。”

[1]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

[2]赵振声，即李葆华。

11月5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建议同意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凡野战军、地方军及地方干部因作战阵亡或在对敌斗争中牺牲，其家庭贫苦者，烈士本人仍算人口，分得一份土地”的提议。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抗日和此次爱国战争中所牺牲的一切烈士均应算作人口分得土地的指示。

11月7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彭真、聂荣臻电：从晋察冀抽调十个台的报务、机务和十个所的医务、行政干部给刘伯承、邓小平。

11月12日杨得志、杨成武、耿飏向中共中央工委报告石家庄战役于本日胜利结束，全歼守敌两万余人。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一般以称人民代表会议为妥。中央注）。但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新式富农应除外。中央注）。望在土地改革中，应将解放区政权，改组为人民代表会政权。”“各级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会，而不应集中于委员会，或群众大会。”“各级代表会代表，县以下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亦可说由人民直接委派），县以上由区、县代表会间接选举。”“各级政府机关，应向代表会报告自己的一切工作，并请求审查和批准。代表会对于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武装等一切事项，均有权决议或否决之，各政府机关须完全遵守并执行代表会决议。”“代表会代表不称职者，得随时由选民撤回另派。各级政府委员会不称职者，得由代表会全部或个别撤换、审核。”

11月14日为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论查田运动》一书撰写前言：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苏区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著作。虽然当时江西苏区的情况与今天解放区的情况并不相同，党的政策和口号也与今天并不一样，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也并不能在今天各解放区都能适用，但毛主席在当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及其所指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是相同的和适用的。故特加以翻印，发给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级干部阅读，作为借镜。”十二月八日，刘少奇把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11月15日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一）东北我军主力之一部在一星期内外即将在锦州附近作战，以后再进入冀东及平绥线作战。你们应作密切之配合。（二）你们在恢复石庄秩序后，即将石庄善后一切任务交黄敬诸同志负责，并配属必要部队给黄敬，你们部队应争取时间迅速进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下一更为巨大的战役。”

11月16日同董必武致电康生<sup>[1]</sup>并张鼎丞、邓子恢：“现在山东土改应大量用有经验的外地干部去作领导，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及官僚蜕化分子应调离本地。以后再不要在干部中提华中、山东干部的界线，一切能很好领导群众进行工作的干部即应提拔，一切不能很好领导群众进行工作的干部均应撤换，不管是华中来的或原在山东工作的。”

11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对于明年全国各解军<sup>[2]</sup>的财政供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能不即时通盘计算，提出统<sup>[1]</sup>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

<sup>[2]</sup>解军，指解放区和军区。一的目标和计划，以便号召各解放区和各军一致努力奋斗，实行一切必要的调剂，来加以解决。因此我拟在最近集中注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注意各地土地改革及整党，使其不出大的乱子。兵工生产及交通运输会议亦拟参加一下。在解决这个问题后，或可到杨、杨<sup>[1]</sup>部队中去参加与帮助他们一些工作。”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东北局电：“最近接到一些小孩子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他们都在中学快毕业或已入大学与专门学校或在大学快毕业。请你们代表中央对他们的学习加以可能的指导，要他们学习工业、农业、采矿、医生等各种技术，同时尽可能参加青年团、职工会及其他组织的活动。并请你们把《东北日报》及其他报纸书籍分别各学校按期寄给他们，使他们多知道一些祖国的情形。”

11月中旬对石家庄工作作指示：石家庄是华北各解放区联结的中心，其重要性关系人民生活，关系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对石家庄要采取建设的政策和长期建设的方针，不允许任何破坏，要严明入城纪律，用一切力量保护城市设施，维持城市秩序。

11月28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东北局电：“关于土地法大纲的补充，还须在平分过程中不断由各省加以修正和补充，不要规定过多的统一办法。”

“关于东北的政权制度，请你们研究工委申宥<sup>[2]</sup>给冀东电（中央戌文<sup>[3]</sup>转各局），在一切群众业已充分发动的乡村和城市，由下而上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并使之成为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城市工作中望加强工会工作及<sup>[1]</sup>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

<sup>[2]</sup>申宥，即九月二十六日。

<sup>[3]</sup>戌文，即十一月十二日。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东北局及各地负责人应经常到工厂中及工人大会、工人代表会去作报告和讲演，使我们各种政策和工作能首先取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和帮助。”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和华东局等：陈（毅）、粟（裕）区域人口二千余万，党政民工作的领导亟须加强，请考虑让邓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去陈、粟处，以加强陈、粟区域及苏中、苏北的领导，明年秋冬或后年春夏，陈、粟主力出江南时该机构则随军南进。目前渤海区土改及后勤工作的领导由康生暂代邓子恢，待华东局派人接替渤海工作时康生可去山东帮助土改。三十日，刘少奇和董必武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

12月4日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四分区干部会上讲话，指出蒋介石败局已定，一年后人民解放军将有大队发展到江南，现需将北方工作赶快做好，以备届时能抽调大批干部到华中、华南。强调土地改革必须搞好，否则即使打倒了蒋介石，革命也不算胜利。如不搞土地改革，共产党的干部也可以变成地主和变成北洋军阀。

12月6日电告中共中央：朱德、陈毅已到中央工委，彭真、聂荣臻两日内亦可由石家庄来工委。

12月8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华东地区工作情况。在发言中指出，豫皖苏地区拟成立分局，邓子恢到后，此局归晋冀鲁豫中央局，不归华东。华东野战军主力，准备于明秋南渡，所以在这一年应准备在走后仍留有完全的一套，工作不受影响。一定要抓紧搞好土地改革，要在这一年中完成土改，消灭地主阶级、消灭蒋军。把根据地搞好，培养一些强有力的干部，把几个县真正搞好。部队实行军事掩护土地改革，打击土顽。12月10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彭真、聂荣臻、赵振声汇报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即四分区干部会）、土地会议、政工会议（实际是部队的整党会议）的情况。在发言中指出：晋察冀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城乡的联合问题，对石家庄及其附近的乡应即开始宣传联合思想。

12月13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刘仁<sup>[1]</sup>等汇报北平的中共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情况及今后工作。在发言中指出：对党员要进行“打倒蒋介石”的教育，要使党员确认蒋介石必须打倒，而且下决心自己去打。现在的情况是，一般党员有决心打，但拿不出办法，至于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认识就很不一致了。只有解决了要不要打倒、打不打得倒、有否决心去打、为什么下决心去打，那才是党员。要用这四个标准去审查党员，以使党精干。还指出：在北平，在打倒蒋介石这个问题上，工人所起的作用不如学生。自然，学生与工人比是有些便利条件的，他们的自由多一点，与上层社会的联系也多一点。但是也说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作得不够。要动员群众在这一大革命中积极行动起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只有群众的大多数决心为打倒蒋介石而牺牲奋斗，那么大革命的高潮就确实到来了。蒋管区城市的每一个群众运动，哪怕是单纯的生活要求，都对解放军有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作用，都有打倒蒋介石的意义。这一工作做好，就能有厂大群众的配合攻城、里应外合，并配合管理城市。当前的实际任务就是组织日常斗争，积蓄力量，避免蒋介石国民党破坏我在城市中的组织，以便到时里应外合。还要注意争取老一代的技术高、有地位、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老工人，来解放区参观，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力量，了解我们的政策。他们回去后，就会积极起来行动。

[1]刘仁，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

12月14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据彭真汇报晋察冀的工作情况，晋察冀“中央局威信大增，一切无原则纠纷，突然停止，党内空前团结，干部信心大大提高，群众已开始活跃。只要以后不发生错误，彻底完

成土地改革，这里的工作是可以走上正轨并加以巩固的。”“野战军的作风也改变，军队整党已开始，已不怕大的伤亡，并能够攻坚。”“财政赤字已不很多，已不靠发行度日，物价亦趋稳定或下跌。如在土改中不出大乱子，可保障此区在今后能比过去更有力量地进行作战。”

在听取黄敬[1]汇报石家庄情况时讲话，指出：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存和发展工商业，保存和发展经济，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城市的工人运动、贫农运动，都要从城市的整个经济政策出发，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准。不仅公营企业要发展，私人工商业也需要发展。不能把在乡村中的清算斗争运用到城市工作中来。在乡村，清算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消灭封建，清算的结果把最黑暗的封建势力搞垮，农民解放，社会生产得到大发展。但在城市如对厂主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都搞垮，是会把城市毁灭掉的。

12月18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绥分局并报中央、抄送西北局电：  
“（一）关于树立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问题，可在法律上规定许多办法去保障。例如：解散旧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旧组织，收回其图章，再由贫农团负责筹备新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组织。旧干部的审查、撤换与处分及新干部的提拔，以及定成分，各种组织会员的介绍，地主、富农土地财产的没收和这些土地财产的分配等，均须先经贫农团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农民大会讨论[1]黄敬，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政治委员。通过。如此，贫农团即使人数不占大多数，也自然成为领导核心。乡村中一切工作，特别关于土地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必须先经贫农团的发起和赞成，否则，就不能办。这些都可成为法律，党与政府可训令一切党委、工作团及党员和干部遵守这些规定去进行工作，凡有不遵守这个方针和这些规定的党委干部和党员，可给以处分、撤职、调离本地和开除党籍。如此，可从领导方面去切实扶助贫农团的领导。但仅仅这些法律规定，还不能树立与保障贫农团在乡村中的领导，还必须依靠贫雇农的积极性、贫农团组织的纯洁性，而不致被坏干部及流氓分子所篡夺；同时，贫农团办事必须公道，必须注意去保护中农利益，而不要侵犯中农利益，并且事事与中农商量，在贫农团自己讨论好了之后，都提交农民大会或代表会去与中农讨论，取得中农同意后，再来办理，而不要由贫农团独断独行。”“（二）工委给冀东关于代表会议制度电，是指解放区经常的政权制度，这是要在群众业已充分发动或土地改革业已完成的地区，才能建立这种代表会系统，而且必须在目前反对地主、没收分配土地财产、改造旧干部等斗争中，建立了党与贫农团正确的领导，才能使这种代表会真正形成，而决不是可以和平建立的。因此，你们应立即召集县以下各级临时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去解决土改中各种问题。”“（三）你们《土改通讯》第二号关于后木栏干村成分问题的意见，是不妥的，偏于过左的。确定某人成分，应以当地建立新政权前若干年及抗战后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来决定，而不要联系到很远的历史，更不要以今天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的好坏为标准来提高或降低各人的成分。”“（四）关于自发运动与普遍运动不应当作口号去叫喊，也不要成为固定名词写成什么‘自运’或‘普运’。虽然我们不要惧怕群众的自发运动，但我们不只是群众自发运动的追随者，而必须努力去领导自发运动，使自发运动尽可能更多地变成自觉运动——有系统、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的运动。现在你们那里不是缺少群众自发运动，群众已自动扣押了数万地主，因此，你们再不要去鼓

吹与煽动自发运动。你们那里所缺少的是党对于这种自发运动正确而有能力的领导，因此，运动就常被流氓、坏干部、富农甚至地主所领导。因此，你们必须加强正确的领导，加强运动的计划性与系统性。为加强领导，现在经常召集县区代表会，依靠代表会这个形式是很必要的。”

12月19日致电康生：“阜平及其他若干地方吸收正派非党员贫雇农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干部会议及支部大会进行整党与讨论土改，曾获得很好效果，希望你们斟酌采用。”

12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华中分局副书记曾山汇报华东工作。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东北局电：你们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很好，已转发各地。在群众运动中，应特别注意考察若干特别好的领导干部，使他们的领导作风能够普遍扩展，由领导一个县到领导两个或三个县，并从工作好的县中抽出下层干部去帮助邻近落后县的工作，这对今后长期工作十分重要。望你们根据东北的情况和经验拟定一个劳动法，在工人与工厂合作共同发展经济的方针下，保护工人的生活。

12月21日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交通会议[1]开幕典礼上 [1]中共中央工委召开的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开始，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闭幕。出席会议的有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解放区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代表四十多人。会议主要讨论军工生产建设方针、工厂管理、组织领导等问题。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召开座谈会。二十一日，军工会议和交通会议举行开幕典礼。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央领导的，目的为解决统一领导、调剂、节约、技术、管理等问题，提高军工生产。现在全党整党，军工生产也要整顿，兵工厂中也要进行三查，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要研究和建立比较合理的工资制度等。还说，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优势，年来已发挥净尽，美蒋已均无信心，已在作退路的打算，第一步退两厂，第二步到台湾，再不行只好当流亡政府。我们这个会议就是要整理兵工交通方面的问题，克服各个环节上的工作中阻碍我们与人民结合的缺点，从而充分发挥党和军队与人民结合的力量，达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12月25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就华东局要求调一批有土改经验的干部去山东一事指出，干部问题应采取自己解决的办法。渤海区可抽三五个中心县搞土改，以后再推广土改，干部即从这几个县里出。还可设党校、办训练班、开会来训练干部。干部一定要从群众中产生，作风才会好。还提出，张鼎丞在鲁南、曾山在胶东各搞一个县，康生在渤海搞一至三个县，只留饶漱石一人在华东局管打仗、财经，掩护土改。

中共中央工委致电中央军委参谋部，报告军工会议情况：会议已进行五天，根据刘少奇、朱德的报告讨论了军工的建设方针。工厂以分散在山地为原则，不搞工业中心。产品集中解决弹药和炸药，除生产一些有效用的各种迫击炮外，武器主要靠缴获。对石门、井陘、阳泉的工业，采取恢复方针。对工厂管理，采取经济核算的企业化制度。工资原则不能过高。对生产规格，大致做到某些必须统一及可能统一的统一起来。

12月26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绥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并报中央电：“现华中局面开展，急需大批干部南下工作，决定从晋察冀抽调二千人，从晋绥抽调八百人南下，区党委、地委、县委、分区委及优秀乡级干部，党政

军民财经干部均要。”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杨尚昆、李克农[1]并报中央电：“望从后委各机关尽可能抽一批干部到豫西及豫皖苏地区工作。能抽多少，何时可抽出集中出发，望即告。”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康生、张鼎丞、邓子恢并报中央电：“派干部到豫皖苏事，因晋绥、晋察冀两区大批干部已进入村庄进行土改，暂时无法大批抽调，若干撤职干部，如不经过一时期训练，派去华中，亦将有害无补，故暂时无法大批派出。但中工委已决定开办党校，并要各区亦办党校，对所有受处分干部，只要他服从党，不拒绝工作，一律送党校训练，在党校审查后，陆续分批派到华中，其他比较负责干部，亦须待二、三月才好抽调，你们在大连的干部应设法调回。”

12月29日听取军工会议关于军工厂的领导问题、职工问题、党政工作问题、干部问题、工资问题、工厂管理等情况的汇报。

12月30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转廖承志[2]并报中央电：“总社广播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及怎样分析阶级两文件，据说每日播送很少，至今未播完，望饬令即速播送完毕，并多播一、二次。因各地在没收地主、富农行动中，已因错误地分析阶级而发生过左行为，损害中农利益，急需此两项文件也。”

12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委与军工会议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生产不仅是军工厂的第一任务，而且是唯一任务。生产 [1]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

[2]廖承志，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任务包括质量好、数量多、成本低，党、政、工会都要合作一致把生产搞好。并说，革命很快就可以胜利。革命胜利有三大功臣，前方军队，党的领导，后方工作。军工生产就是后方工作，在中国革命中间有很大功劳。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党委立即检查本地土改工作，如已发生在划分阶级方面的“左”倾错误，应立即纠正、补救，如尚未发生应早加防止，不要使这种错误发展。指示指出：“划分阶级应只有一个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如再提出其他标准都是错误的。追历史只能追到当地新政权建立以前三年、五年，而不要追到太远或追几代。例如。在当地新政权建立前三年中是地主，即订地主成分，是农民，即订农民成分。望根据新华总社广播的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及《怎样分析阶级》两文件去办理，并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印发给一切土改工作干部详加讨论，并根据中央指示立即提出修改及补充这两个文件的意见速告中央，以便中央能迅速规定分析阶级的统一标准和办法。”指示还指出：“确定谁是地主、富农，必须首先在贫农委员会及贫农团大会讨论通过，经工作团或上级审查同意，再由本村农民大会讨论通过，方可确定。而决不应由少数人决定或有任何强迫包办。”

## 1948年五十岁

1月1日在干部团拜会上讲话，指出去年已打掉蒋区优势，现解放区力量已超过它，这是带决定性的形势变更。今年再取得第二个决定性胜利，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可能倒台。

1月5日就遣散石家庄敌伪公务人员问题，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在登记国民党员及清理罪犯完毕后，除我们必须留用者及犯有严重罪行须交人民处理者外，应加教育后，迅速向天津、北平释放，一方面可以节省，另一方面可到平、津传布我方影响，对将来攻打城市会有好处。”

同朱德、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三交机关[1]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作较长期打算，请即示复，以便作各种准备。”

1月7日传达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刘少奇在传达中强调要揭破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一定要把战争进行[1]三交机关，即中共中央后委机关。到底。

1月9日致信康生：老解放区的土改“是不能性急的，性急的结果不是形式主义，就要出乱子。渤海的情况不会比这里[1]更好，因此更不能性急。你们在土地会议以后，似以不普遍发动，而以集中力量发动数县（但至少须有一县或数县）为宜。因为如此才能训练干部形成新作风，取得经验并不被坏分子所利用。如若普遍发动，则仍不免出乱子，或是形式主义的假分田”。“如果你认为应该这样做，那在其他不进行土改各县，就应以其他工作及整党为中心工作，先由上而下系统地考查训练与调整干部及党的组织，就替以后进行土改准备了前提。待党的组织调整后，中心县土改又取得经验，再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似比较地对人民有利。”

1月10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为准备局面开展之干部，拟开办党校，招收县团以上干部五百至一千五百人，训练半年派出工作。是否可行，请示。”

1月11日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石家庄是华北最大的特务据点之一，现正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肃清特务，唯审讯人员缺乏，致工作进行迟缓，李克农是否可再派若干干部前去帮助工作。

1月13日在晋察冀四地委土改汇报会议上谈老区土改方针问题。指出全国土地会议没有区分新老解放区的不同办法是个不足。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不同，方针、政策与工作方式都应有区别。老区消灭封建已经搞过好几次，油水已不多，硬造高潮就会出乱子，老区的错误就在于主观上硬要制造斗争，动富裕中农，动工商业。今天老区挤封建主要是整党，整党内的地主，就是搞掉[1]这里，指晋察冀。党内的封建，把整党与挤封建、“搬石头”[1]、斗地主结合起来就会有高潮，要在群众参加的公开的支部整党会议上查阶级、查思想、查行为。整党与土地改革要结合进行，不能机械分开。

1月14日嘱杨立三[2]转告薄一波：“毁家纾难”的口号不大好，不要提，因战争是长期的，山东提出这个口号曾吃过亏。想要人家的东西，就提高人家的阶级成分的情况要注意。组织贫农团不能有关门主义，一切无地少

地的农民都应加入。不要干部当家，把干部当家与群众当家分开来是错误的，干部当家只是不要包办代替，而要代表群众说话、当家，严重的尾巴主义和强迫命令都是机会主义，都违背群众路线。共产党员件件事要有主意，要提出办法，要带头干，对别人的错误意见要进行批评，这是领导的责任。群众不赞成的，就应做耐心说服工作，同时考虑自己的意见是否错了，既向群众学习，又向上级请示。

毛泽东关于不发《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3]问题致电刘少奇。电报说：“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这是因为土地会议及写指示草案的时期着重点没有也不应当放在这方面。”此外，“指示的内容，土地会议中你都向代表们说了，他们都回去照做，不发这个 [1] “搬石头”是形象比喻撤掉那些阻碍土地改革深入进行的党内干部的职务的意思。

[2]杨立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

[3]《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是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电请中央审核可否发出。

该指示草案的精神主要是反对土改运动中的右的倾向。

书面指示并不要紧。指示中许多内容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写文章发表，文章可以写几篇（写一篇长文不如写几篇短文），可以针对目前运动中发生的新鲜问题。指示草案中有些个别问题例如青年团、新区工作等，则可由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同时又写文章，不知你的意见如何。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这些材料正由弼时及乔木整理，其中一件是怎样分析阶级及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不日可完成，月底可公开发表，其余几点拟以电报通知各地，并写几篇社论。”

1月15日致电张鼎丞、邓子恢、康生并告华东局、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冀察晋土改普遍发动后，发生问题很多，并提出老解放区的很多新问题，阜平中央局正在汇报，我亦找附近四县同志在汇报，详情不日电告，望你们在渤海暂时不要普遍发动，首先集中力量发动二三个县，取得经验后再普遍发动，因春耕已近，如发动后在春耕前不把土地大体分好，即将妨害春耕。”1月18日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发我在土地会议后起草的那个指示[1]。因为现在运动已向前发展，如发那个指示，不独无益，而且有害。现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倾，向地主富农妥协，而是‘左’倾，过分与没有必要没有分别地打击和大批逮捕地主富农，在底财问题上逼死地主富农，准备只分给地主富农坏地或少分地，留给地主富农财粮过少，马上就不能生活而要饭，对富农与地主、对新旧富农及对勤劳起家与贪污剥削起家的新富农没有或甚少区别，在定成分中侵犯相当 [1]指《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数量的中农利益，贫农团与新农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对旧党员旧干部采取一律不信任与排斥态度等。而领导方式上的偏向，强迫命令虽仍存在，但主要也已不是强迫命令，而是尾巴主义，放弃领导，工作团下去对运动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不提意见，不提办法，特别不耐心揣摩群众真正的心理和坚持说服群众，不直接指导群众行动，只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上述各种‘左’倾错误，不加反对与纠正，反而

跟在后面跑，加以赞助和鼓励，而美其名曰：这是群众路线。其结果，就是把运动的领导权送给野心分子、流氓分子及地主富农分子。因此，我们现在应在承认土地会议着重批评右倾与强迫命令的正确性（这是很必要的，否则将立即回到以前的右倾和强迫命令）的前提下，着重批评‘左’倾与尾巴主义。”信中还推荐了晋察冀平山县把土改与整党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二月七日，毛泽东批示：“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在这个电报里所提出的意见。”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决定草案（即“中央一月决定”），决定提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指出：“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士绅，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决定还对政权、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此文件明日开始用电报发你处，收到后，请你及中工委各同志提出意见，希望能在本月内得到复电”。

1月22日致电毛泽东：“此问虽已到处发生‘左’的错误，但因有前次‘左’的经验，及领导上早有精神准备，故在发生后，便立即停止，尚未发生大的恶果，此外，还有很多地区尚未开始发动向地主的斗争。现在提出‘左’的偏向及尾巴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故中央新决定发来，亦不致突然转变为右倾。此外，邯郸会议完毕不久，尚无反映，故亦不会有大发动，渤海山东则尚未开始。故在土地会议后‘左’的错误以晋绥较严重，其他地区还不严重。但在土地会议前，则有若干地区犯过严重乱打乱杀错误，但早已停止。”

电告毛泽东，已派人到两个县的基层去搜集对“中央一月决定”草案的意见，三四天后可将意见电告中央。

1月23日致电薄一波、并致康生、饶漱石、热河分局，询问干部下乡后发动群众的情况。指出：“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这种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以便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又老解放区因为封建残余已不多（地主、富农的财产及贫雇农都不多），故仅在土地问题上常不能组织广大群众队伍及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而必须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乡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才能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运动。在平山因吸收两倍、三倍、四倍的非党贫农及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党的大会与群众大会结合为一，借以公开党的支部，及整党、查阶级、查思想作风与行为，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获得极好结果。望你们亦试行这个办法。”“又华北有许多地方无乡一级组织，因此一个区领导四、五十个或六、七十个村，小区亦领导二、三十个村，如此断然无法领导。故必须建

立乡一级组织，一区成立七、八个或上十个乡，一乡管理五、六个或七、八个村，成立乡代表大会及乡农会与乡政府和支部等，以乡为基层组织，工作重点放在乡，如此即可大大免去村中复杂的组织形式，减少村干部、村财政，而工作效能会加强。在山地即以现在的行政村为乡。这个办法，在平山试行，毫无困难，益处甚多，望酌量采用。”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粟裕电：“我们调集了一百多个干部，一个月后即起身到你处，晋察冀决定抽调二千人到黄河以南工作，分四个月调齐，每期五百人，除一部到陈、谢[1]处外，大部到你处并大别山。”

1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讨论“中央一月决定”草案。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子养[2]电悉。（一）为了详尽考虑一月决定，你可召集阜平中央局诸人和中工委一道开几天会，缓几天复电不要紧。（二）尚有几项拟加入此决定：（甲）为了稳定 [1]陈，指陈赓；谢，指谢富治，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陈谢兵团政治委员兼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2]子养，即一月二十二日。

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乙）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丙）保护和通商传教的外国人；（丁）货债及农民内部债务之处理；（戊）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第一阶段只组织农会，第二阶段再组织贫农团。以上各点，请一并考虑”。二十六日，刘少奇复电毛泽东，“即告阜平彭、聂、黄[1]拟于二三日内来工委商讨你所提出之各项问题。你给粟裕电[2]完全同意。新区土改应集中干部，由最有能力的人领导，在一个或几个县发动，作出模范，然后依据其对四周的影响逐步推广，而不要分散干部普遍动手，结果无法领导，毛病百出。”

1月25日致电毛泽东，汇报对“中央一月决定”的修改意见。建议在反对党内“左”右倾向中加上这样的语句：“在全国土地会议决议尚未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加以贯彻的地区，必须继续切实贯彻。在这些决议业已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贯彻，和群众业已发动的地区，必须根据群众中所发生的新的问题与新的偏向，迅速及时地加以解决和纠正，而不要让其继续发展，拖延甚久，损害群众利益。”“当着干部中强迫命令的作风严重存在，必须反对强迫命令，当着强迫命令已大体停止，尾巴主义的作风已经产生，必须反对尾巴主义，反对不在群众中去集中意见、提出办法并耐心教育说眼群众，放弃领导的倾向。”建议把“富裕中农及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改为“富裕中农及中农的土地，如 [1]彭、聂、黄，指彭真、聂荣臻，黄敬。

[2]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粟裕电。该电指出：新区“土改工作不能性急”，分配土地应分阶段完成。本人坚持不同意，即应对他们让步，不予平分”。还提出：把地主“化形”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转化以工商业收入为全部或一部生活资料者，这应鼓励与保护，在保存地主工商业条件下可以少分或不分地。另一类是伪装穷人、小贩或商人，以隐蔽目标，保护其封建财产，而实际并不经营工商业，对于这类化形则必须加以反对与没收”。“必须将新富农与旧富农加以区别。在新富农中还须区别由劳动及善于经营致富的新富农与由贪污霸占、侵吞果实、逃避勤务等方法致富的新富农”。建议在“国营企业中行政方面与工会方面组织联合的管理委员会”中加上“在厂长负责制下”和“厂长在委员会中有最后决定权”。二十六日，

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认为这些意见“甚好”。

乙就对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邓子恢电：“（一）保护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二）过去鼓励地主富农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是正确的，今后仍应鼓励。（三）地主富农工商业一般应予保护，而不应一般没收。只应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但没收者亦不应分散或停闭。（四）华中一般清算没收地主富农工商业的政策是错误的。（五）在保存地主富农工商业条件下可酌量不分或少分地给他/ = 月 26 日在中共中央工委召开的敌军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指出，由于打胜仗的结果，俘虏了国民党军队一百多万，其中有几万军官，对这些人怎样处理才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要把它与战胜蒋介石，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总任务统一起来。一切有助于打倒蒋介石的力量都要利用，可以争取他们中立、同情与赞助我们，个别的还可以争取教育成为共产主义者。所以对他们要采取教育和分散释放的政策。释放不能过早或过迟，过早不成熟，过迟“一斗米养恩人，一担米养仇人”。俘虏工作的基本精神就是贯彻宽大政策，达到争取的目的。“国军”工作以后一律改称“敌军”工作。敌军工作的目的，就是瓦解敌人，有三种办法：第一是放俘虏；第二是打入敌人内部，或去谈判争取；第三是开展政治攻势。

1 月 31 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彭真汇报晋察冀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城市工作和财政、扩兵工作等情况。刘少奇在谈到怎样对待中农的问题时指出，在土改运动中不先让中农吓一跳，就造成不了平分土地的舆论。他们因吓一跳，由恐慌而积极，这种积极一般是可靠的，有了这种积极再拉一把，就能很好团结。否则贫雇农的骨干将形不成，不把中农压在被领导的地位，则贫雇农领导是不巩固的，因为中农在经济上、人口上（老解放区）、文化上都占优势。要中农积极，但只能是在被领导地位上的积极，不是同贫雇农争领导的积极。贫雇农领导的形成，不仅是对地主、富农而且是对中农的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

2 月 3 日致电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工委在听取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土改报告后，再次汇报对“中央一月决定”草案的意见。认为“草案”的写法“必须严格注意到不要因为反‘左’，又使各种右倾观点得到复活机会，特别在党内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尚企图反攻，而贫雇农领导骨干尚未真正形成的地区，尤须注意，不要使土地会议以来在各地进行整党与消灭封建的那股劲又松懈下来，而应该督促各地继续贯彻土地会议决议，进行整党与消灭封建，克服各种右倾观点。同时，在各种‘左’倾错误业已发生地区必须迅速纠正‘左’，在‘左’倾错误尚未发生地区，亦必须切实防止‘左’。因现在发生严重‘左’倾错误地区，只晋

绥、陕北较严重”。所以“只从正面提出若干规定严格防止。左，倾即够，而不宜大喊反‘左’”。“决定在写到某些具体问题时，还要适当强调批评一下某些右倾观点，然后再着重批评‘左，倾’”。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提出“关于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种地区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二）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

区。这种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为半老区。在这种地区，经过两年清算斗争，经过执行‘五四指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相当提高，土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尚不是很高，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必须组织贫农团，确定贫农团在农会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三）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

2月5日就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问题复电毛泽东：“似应规定在半老区中土地已大体平分的地区，亦不应再平分，只须实行个别的或部分的调整。而在上改不彻底的半老区，则完全适用土地法”。“老区平分空气甚高，这一方面使中农有些恐慌，但另一方面又使土地之抽补调整及退出贪污果实等容易进行，故我意在这种地区亦不必宣布（在已复查地区应宣布）取消平分，只说土地早已大体平分，现在只实行部分多少与好坏地之抽补调整”。“照平山经验，如没有这样的贫农团，则整党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在乡村中即农会），就要发生困难，抽补土地及其他工作，亦将有困难。因我们在乡村中失去党支部这一个依靠支柱后，如不找到另一个依靠的支柱，我们就很难有所作为。”“在人民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业已巩固。党支部业已整理好，贫农团无疑是可以取消的”，其他均赞成。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你对我给粟裕子养[1]电先加审查提出意见，以便丑灰[2]左右能将此电发给他们”。

2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东北土地改革中打击面太宽的问题，指出：“东北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这种人一方面受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别人，其中有一部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所余不多，应定为中农；另一部分，则有相当大的资本，剥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剥削基本上应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及富农的恶霸与非恶霸外，在东北是否应将富农的圈子划小一点，并将[1]子养，即一月二十二日。富农亦分为大、中、小分别对待。即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剥削部分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者划为中农，除平分土地外，这种中农的财产不动，对这以上的中、小富农在征收其牲畜、农具、房屋时，给一部分代价（价款由地主封建财产中支出，或由政府发一次公债），其粮食及其他财产不动”。中共中央于九日将此电批转东北局，指出：“东北上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

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究竟应当缩小到何种程度及采取何种步骤解决此项问题，使土改走入正轨，既不对土改高潮泼冷水，又不使运动跑出正当的范围，请你们拟具办法电告”。东北局于十一日复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和中央的指示，将“以各种方法缩小打击面及分化打击面”。

致电中共中央，就东北局请示发表其整党问题通知，提出供中共中央考虑并答复东北局的几点建议：可同意东北局发这个通知，因“现在整党中到处都多少发生一些‘左’的唯成分论，即认为凡是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不好的，而加以批评打击与斗争。认为凡是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好的，而加以奖励与提拔，而不根据各人的具体工作及思想与作风的好坏，来加以批评和处理。甚至将农村中组织贫农团斗争地主的一套搬到机关、学校来实行，这种错误，决不可让其发展”。“在整党中提出贫雇农路线一词，是很不妥当的。应一般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路线，即在土地改革亦应提出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的路线”。中共中央于十一日对党内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吸收了这些意见。

2月9日致电毛泽东，认为在“东北有大量城市人口，需要粮食供给及大量粮食出口的情形下，而完全不保留、或在土改后不重新发展大农业经济，恐是不好的。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东北立即实行大体上的土地国有制，即没收地主土地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再由各地政府无代价地分配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耕种，而耕种的农民，只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土地税。自耕小农的土地（即中农、贫农的土地），及富农家庭，依照当地土地分配方法，所应留下的土地，则不没收。如此，富农经济可保留一部分，在将来，亦更好发展新富农经济。四五十口人的大家庭，亦可不分家。因在可能条件下，即有土地多余的情况下，愿意扩大生产的人，可以无代价向国家领到土地耕种”。“在这种政策下，向富农征收多余牲畜、农具时，应以富农在土地分配后，能耕种所得土地为限制，不应过分征收。而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亦不按人口绝对平均分配，主要的应按各家庭的劳动力来平均分配。按人口平均，则成为次要标准，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永远使用权。如此，对于富农，对于生产，对于东北佃耕的大农业经济，似比较有利”。“现在就在东北实行这个政策，似不过早，不致犯冒险主义。因中国是一个这样不平衡发展的国家，任何一个法令，要在全国一切地方都贯彻，是困难的。在全国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或还可在热河的某些地区及其他地区，例如蒙古地区，则大体上实行土地国有制，似无大妨碍”。十九日，毛泽东将此电批转东北局加以研究提意见。

2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委财政经济座谈会上提出，为有利于统一财政、货币等经济工作，有利于大批干部南调，有利于太原作战，可考虑先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起，先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和西北，而后再及其他。认为这两个区的分割，在过去是被迫的、合理的，现在这两个地区已打通，且敌人已不再能分割太行与五台，在今天完全是我们自己人为的，极不合理，故必须解决，要向中央及两个中央局作建议。

2月14日致电薄一波：“你处有无乡一级组织，如无，应为人民团结及领导的方便，立即成立乡的组织。否则一区领导五、六十个村，决不能把工作做好。划乡时，如不涉及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财产问题，人民即完全

赞成，毫无困难，如涉及此问题，即争论不清，故以不涉及此问题，土地、财产仍依群众意见以村为单位分配为好。又在乡成立后，乡应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只在必要与可能时才开全乡人民大会，村则只成立人民大会，而不要人民代表大会。并须使村的组织，大大简化起来，以乡为基层组织重点，各种问题的决定权都归乡，使必要的村干部（村干部可一律称为乡干部）只成为执行乡决定和指示的人员。如此，似更能使我们掌握对乡村的领导。”

同朱德致电晋察冀野战军：“你们仍应照预定计划，按军委前次电示向平绥冀东方向行动。”“向新的方向行动，可能遇到比以前更多的困难，你们全军上下，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及组织准备，并在每一次具体战斗与具体行动中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而决不要轻视敌人，轻视这些困难，否则，你们就有可能遇到一些意外的挫折。”“你们在战略上应该是大胆地无所畏惧地进行机动。”“克服各种不愿长途行军，不愿急行军，不愿爬山，不愿吃苦等思想，并须改变某些不适宜于大踏步进退的组织形式和习惯。”如此你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月16日致电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的分界线，原系被敌人封锁分割，故我们亦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来划分我们的行政与工作区域，这是正确的。但自正大、德石两路及石家庄、元氏之敌完全消灭以后，两区分界线的客观原因与必要，即已全不存在，因此，这条分界线的继续维持，即显出其违反地理历史诸条件，严重妨害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完全人为的障碍。”“因此，这种界线，只要敌人的封锁一撤除，即应尽速废除，完全无继续维持之必要。为此，我想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校、大学、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野战军仍分南北两个兵团，但指挥与建制统一，若干军分区亦实行合并统一。”“如此，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极大利益。从此也就可以抽出大批高级与中级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了。这两大解放区完全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是不可限量的，因而也就可以逐渐和缓与减弱对这些区域交界线上的对抗，三月间要召开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乃可获得重要结果。”

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董必武，就处理蒋方释俘问题提议即由中央规定几项办法：“所有由敌方释回我方之俘虏，在各地地方者，统一由各中央局或最高地方党委及其社会部处理。在前方者，则统一由各野战军前委及政治部处理。前方能送后方处理者，均送后方处理。其他各地方及军队党委均不得擅自处理。已处理者一律无效。”“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该项归俘时，须事先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后，然后实行。”“所有各地归俘，均须集中审查教育一时期，弄清在敌方的一切情形后，才能处理。”“中央指定社会部为归俘处理机关，而社会部又须与组织部密切联系。”刘少奇的这些意见被酌收当日《中央军委关于归俘人员处理办法的指示》中。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你及各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

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加以精细的审查，将修改意见电告，我们认为这个文件甚为重要，单有土地法大纲而无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很难避免犯错误及走弯路。”

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通知：本日起经新华社电台拍发这个规定草案给你们。你们收到后召集会议加以讨论，提出内容及文字的修改意见，在三月十六日以前电告中央。“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

2月18日致电毛泽东：二月十六日指示悉。“你前给粟裕论新区土改电及‘中央一月决定’，亦望能迅速发出，与划阶级文件同样，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文件，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地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之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最近我调查了老区几个村的确实材料，证明你的提议完全正确，即在老区土地早已基本平分而不要再来一次平分，也不要人为地去组织领导一切的贫农团，只要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实行土地调整，即可完全解决土地问题，而集中注意去整党与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地区贫农团已组织者，亦暂时不必宣布取消，而只在新农会委员代表中增加中农成分，贫农团作用不大。不好者，即归新农会领导，其作用很大很好者，即吸收新中农（即过去老贫农）加入贫农团，使其尽一时期的责任。土地调剂，则尽先抽出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贪污侵占的土地，过去分配不公的土地及公地黑地等，去补助缺地的贫农。如已足够，即不动中农土地，如不足则在得到中农同意后再调剂一部土地。补地亦尽缺地较多的正式贫雇农先补，有多时，再实行一人家庭分二人土地等办法，且只有一人的青壮年男子才可分二人土地，其他孤老寡妇可不多分，土地不足时，一人青壮男子家庭亦可不多分。二流子及有二流子习气劳动不好好吃懒做而土地不足者可后补少补。”“我前电说土地多出或少于平均数十分之一不抽不补的规定是不好的，望不要采用这个规定。因此在平分土地中要反对我们干部及农民中一种机械的绝对的平均主义，反对为平分而平分，而不是为了消灭封建与发展生产而平分。这种形式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正直农民认为是不公平的。以上意见，是否正确，望加指示。”

2月19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通报。通报指出，东北及其他解放区，均可能在最近收复一些中等的和大的城市，而这些城市收复后又可能长期归人民所有。我们工作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要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不准自由抓取物资。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要求全党注意和讨论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指出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应即以中央工委总结的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和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和方法。

2月20日毛泽东就刘少奇十六日关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建

议，复电刘少奇：“提议中工委于寅[1]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2]、邓子恢[3]、康生、饶漱石[4]到中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你两区合并的提议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交换对于《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意见（这个文件，实际上带有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工委即于二十一日发出会议通知。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粟裕：“粟部三个纵队决调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然后出动。你们正好召集陈、饶、康、邓、薄等寅[5]初至中工委开会十天，然后到粟部开团长[1][5]寅，即三月。

[2]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4]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以上高级干部大会。此种干部大会应于寅灰[1]开始、卯东[2]以前开毕，卯东至卯删[3]开各旅团连长、政指以上干部大会。两种干部大会均应集中讨论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政策性问题：将政策彻底弄清楚，一切准备工作应于卯底完毕，请与陈毅妥商。”

3月2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

3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是敌人分割我们，现在敌人已经消灭，界线完全成人为了的，以致发生许多纠纷。两局合并，两政府现名义不变而合并办公，两军区合并，野战军仍为两个，南北兵团，其余是大军校、大党校、大报纸、大银行，这样尽可能不发生“巴尔干现象”。当然，我们不是巴尔干，而是一个民族，在一个党的领导之下。合并起来以后，在生产方面还可以从经济的自然发展上求得分工合作。成立华北局不是临时的，而是一直达至，全国胜利。中央要吸收这种太平区域的管理国家的经验，以便将来管理全国。两区合并后必须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为将来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

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中央工委会议情况，说昨日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今日讨论了两区合并问题，明日起讨论划分阶级的文件，约十天左右可结束。并对两区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提出请示。

[1]寅灰，即三月十日。

[2]卯东，即四月一日。

[3]卯删，即四月十五日。

3月5日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要求军委将绥远地区划归他们机动范围，“拟在适当时机，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向大同、丰镇、集宁及归绥方向行动，打击傅匪后方，破坏平绥路西段，调动分散敌人，以便求得战机歼灭敌人。他们这一要求，我们已同意，惟须请军委批准并通知晋绥”。

中共中央工委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各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大会将在哈尔滨举行，准备成立解放区统一的工会联合会，并选派参加世界工会

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将来解放区工联将进一步团结蒋管区进步工会代表，走向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而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工会运动。

3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丑巧[1]电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1]丑巧，即二月十八日。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即未敢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定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央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合并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

3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华北局的报纸，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范长江[1]、廖承志两部分）、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充分条件办一

个较好的报纸，其名称似宜恢复解放日报。大党校、大军校亦是同时担负为华北、又为全国训练干部的责任，但中央现在尚无充分把握担负供给经费和管理事务的能力，似由中央会同华北局规定方针及计划交华北局办理为适宜。以上意见请交会议讨论。”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关于农民团体的名称，我觉得贫农团一律改称贫农会，农会一律改称农民协会为适宜。请向你们的会议征求意见。此外，请叫冯文彬[2]或他人召集几位有经验的同志起草一个贫农会与农民协会的简明的章程，规定这些农民团体的组织和任务。起草后经你们及阜平局修改，报告中央，修改公布。”

3月9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汇报和请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的合并问题及华北金融贸易问题。电报说：和各同志商量的结果，认为合并党务财经机构，而不合并军政两项机构，势不可能，因主要机构均需迁至石家庄附近，才便利工作，如不合并，工作人员不灰心，我们意见，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亦一道合并，暂由朱德主持。两区政府亦合并办公，[1]范长江，当时任新华社总编辑。

[2]冯文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但仍各保持独立领导，指定党团负责人，由董必武主持。关于华北金融贸易问题，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并拟在第二步即以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货币，再下一步即以华北银行统一渤海与山东的货币。如此才能使天津和胶东、渤海等海口与华北、西北内地联系，才能统一组织对外贸易，使货畅其流，否则无法与国民党作经济斗争，而内部的经济斗争则无穷尽。中共中央于十日复电同意中央工委所述党、政、军、财一律统一的方针。

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华北，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寅号[1]动身东移，约于卯删[2]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3]。”

3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毛泽东为发表《山西崞县[4]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通讯加写按语，指出：“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淳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 [1]寅号，即三月二十日。

[2]卯删，即四月十五日。

[3]指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计划。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3月14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饶漱石汇报华东局工作。

3月15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热河分局电：“经验证明：不论土改与整党，都是十分精细的工作，决不能性急，性急了，一定出毛病。所以最近中央规定以三年时间完成华北、华中、东北的土改及整党。故你们完全不应

性急。经验又证明：在党员干部及群众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采取普遍发动上改与整党运动，而不选择重点突破、逐步推广的方式，也一定出毛病，不能把土改与整党搞好。冀察晋普遍发动的结果，毛病亦多，幸而随时纠正，未让这些毛病继续发展，故损失还不大。然而结果不能说是很好的。经验又证明，在土地会议后批评与纠正了各种右倾观点后，在实际工作中又发生了许多‘左’倾观点及各种‘左’倾现象，例如普遍地提高成分，侵犯中农，贫农团的孤立主义与唯成分论及乱打、乱杀。乱捕、乱封门及土地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等，到处发生。在批评与纠正领导方式上的命令主义之后，到处又发生了尾巴主义。如来电所说热河、冀东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左’倾错误，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望坚决迅速随时予以纠正，而不要让其继续发展，使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中央最近所发出的各种指示，则是纠正各种‘左’倾错误的根据。为了纠正错误，避免损失，对于某些地方的运动，应坚决停上。剥削收入不超过总收入四分之一者，一律不得定为富农，而应定为中农，在民主政府成立后，地主参加主要劳动满五年，富农改变生活满三年者，应改变成分不得再认为地主或富农。订错的成分，应坚决改正，财产有损失者应退还或抵偿。在冀东老区与半老区土地业已基本平分的地方，应实行土地调整，而不要再来一次平分，不要走到绝对平均主义，亦不要组织领导一切的贫农团，只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在边沿区应实行新区土改工作要点，只打大地主，不打富农，不要立即平分土地，以免被敌人利用。但在老区半老区及热河地区实行平分土地时，完全不动中农土地，也是作不到的。在取得中农真正同意之后，从一部分中农手里抽出一部土地调剂给贫农也是可以的，但不要抽动过多中农的土地。此外实行移民移村及贫区与富区调剂时必须十分慎重，不要随意实行，因这种事很难办，群众常常是反对的。只有在有大块荒地能安插移民并在政府有很好准备的条件下，才可动员移民，又在纠正各种‘左’倾时望采取适当方式，严格防止右倾观点再次复活，并注意群众与干部的情绪。”

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粥时同志一篇讲演[1]，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粥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3月19日致电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工委会议情况：

“（一）工委会议，关于各阶级划分及其待遇一书，已逐条讨论完毕，有一些意见另告，现正根据你三月六日所提各点，由三个中央局[2]负责同志检讨自日本投降以来的政策问题，着重点是放[1]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阐述了土地改革中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禁止乱打入杀人问题等。这个讲话，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在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三个中央局，指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在纠正。左，倾的偏向上，详情另告。会议大约在二十五日可结束。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又有中央许多文件发表，今后运动可能纳入正轨，各中央局的领导方式亦可能改善，（二）各地所发生‘左’的错误，正如来电所说，确是华北、华东较晋绥、陕北更为严重，太行共杀人××多，山东在去年七月到九月亦杀了××多人，华中在政策上特别在工商业政策上，亦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政策执行的时间虽不久，但损失很大。这主要是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前及会议时所犯的。在

土地会议后，则以晋绥错误似较严重（其详细情形我们还不知道），晋察冀次之。从最近热河来电看，热河、冀东也有不少错误。这些都正在会议检讨中”。并告，由于三交机关已有部分到达，又两个中央局合并，有不少事务要处理，刘少奇与朱德拟留中央工委，不去阳谷，而由陈毅、饶漱石、康生前去开会。二十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备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并告，“我们明日动身东移，由此到兴县走路及谈话十天，坐车去代县五天，走路到你处十天，约卯删[1]可到你处。”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宣传问题给中央工委转东北局、刘宁一[2]的指示电：国际宣传确甚重要，各国人民、各兄弟党进步分子。乃至反动政府日益重视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急需要成熟的精制品供给国外。去年周恩来、陆定一[3]曾向东北局建议以俄。日文翻译毛泽东、刘少奇著作，迄今未得复。东北局对 [1]卯删，即四月十五日。

[2]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3]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翻译毛、刘著作、党的文件及编译国际宣传材料，究已与可能做些什么，组织与干部又如何，望写一专电报告中央。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

3月25日——26日在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上作关于形势诸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应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强调华北两区合并后的方针是建设，即是党的、政府的、军队的、人民团体的建设，是为着支援战争、争取全国胜利的战争时期的建设。战争、生产、土改、整党、建政、统一全中国管理全中国、供给全党干部，要靠华北；整党、土改、建政，人民法庭、人民代表会等等一套办法和经验，也要靠华北。报告还对土地改革、工商业政策、整党、建政。领导等方面的经验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阐述。并指出这一时期“左”的错误的产生，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主要是领导上缺乏对政策的正面规定和系统说明。现在有了规定，各地回去要系统说明，应着重宣传中央最近的指示文件，如阶级分析决定，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关于新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等。

3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讨论如何支援南下、调配各地干部、拨补和整编各地部队、管理后方，以及各地的整党、土改等工作。

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刘少奇去年春季对晋绥干部的当面指示和晋绥分局去年六月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作了肯定。指出：“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讲话也指出了这个会议的一些“左”的缺点。

4月12日同朱德致电徐向前、薄一波：“建议攻临汾采用攻石家庄的经验，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必须充分准备炸药五万到十万斤，炮弹须

有五万到十万发，请薄、滕[1]令兵工厂加工赶制以达攻占临汾任务”。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庄。

4月16日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晋冀鲁豫中央局电：“管理大城市最大的困难，是煤粮两项供给，现洛阳铁路已断，粮食已发生大困难，柴煤的供给不知怎样”。“你们应依靠自己，依靠群众，积极想办法来解决这种困难，不能只是希望和等待别人来救济”。“同时，请邯郸局就洛阳附近拨出一部分煤粮，贷给洛阳市政府及商人，并在可能范围内帮助运输，协助洛阳军民解决困难”。

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4月23日同朱德、董必武等热烈欢迎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西柏坡。

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1]薄、滕，指薄一波、滕代远。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1]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以上各问题请他们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刘少奇接电后，提议会议议题中列入华北、山东和华北财办的组织问题。

4月28日（或29日）在赴哈尔滨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职工代表各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讲话，指出这次大会的性质是全国代表大会，可用劳动大会名义，虽不科学，但历史上有意义，备大城市老工人都知道，可以多选一些委员，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址设在哈尔滨，等打开北平后再搬到北平。关于职工运动的方针，不能把产业工人运动的方针，用在手工业工人运动中去。亦不能把对蒋管区工运的方针用在解放区，应分别订出不同的方针。在解放区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只顾工人不顾资本家，或只顾资本家不顾工人；只顾公家不顾私人，或只顾私人不顾公家，都是不行的。过去的偏向就发生在这里。现在主要的危险是工商业办不起来。我们要管理在大城市中的历史悠久的大机器工厂，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资产阶级管理这些工厂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只有好好向资产阶级有经验的人学习，才能避免盲目性。我们的工业干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少，一个是低。要管理大城市。大机器工业是很困难的。要大量任用国民党的老的工厂干部，可以任用他们做厂长，争取改造他们为人民服务。关于工会、上厂、党的组织三者的关系问题。工人运[1]陈、粟，指陈毅、粟裕。动与生产运动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工会是代表工人的，厂长是代表政府的，都是要把生产搞好。厂长虽然是上级派的，但上级也是人民（包括工人）派的。不能认为厂长才是替国家做事，工人不是替国家做事。工人进行生产，厂长管理生产工作，都是替国家做事。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工厂。工厂可召开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会，向厂长提意见，过一定的民主生活，但工厂还是厂长制。厂长应参加职工运动，执行工会与支部的决定。在厂长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厂长有最后决定权。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厂长保证生产发展，不是干涉厂长。支部对厂长有监督权批评权，但没

有撤职权。厂长要做工人运动的工作，大的工厂，我主张有工人代表会，工人代表会的决议，厂长要执行。

4月30日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到达城南庄。

4月30日——5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讨论了(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问题。会议还对华东野战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以及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先后返回西柏坡。

5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同意凯丰[1]参加东北局为委员，张闻天[2]参加东北局为常委。

[1]凯丰，即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

[2]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

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三)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肖克为第三副司令员。”“(四)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林[1]为副主席。”“(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六)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七)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八)中央已与中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5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你们四月三十日给子华[2]的指示，纠正冀东及热河复查与平分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而迅速地纠正这类错误，才能保障土改与整党在中央政策下正确而健全的进行，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1]杨秀林，即杨秀峰。

[2]子华，即程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人民去战胜蒋介石；但你们在指示中说‘尚未挖出的底产，保证决不再分’。又说‘冀东基本区目前应停止一切土改斗争’。如此，似乎说得太死。在土改中过分着重挖底产以及采用肉刑急促地去挖底产，因而逼死很多人命，确实是错误的，应当禁止的，但农民如采用缓慢办法，调查谈判并挖出地主底产，亦不可禁止农民分配。又在目前集中注意去组织生产，也是对的，但在生产中仍有许多应当而且可能解决的土改斗争中的问题，并还有许多问题必须迅速解决才能安定农民情绪有利于生产，如已分好地的地区，可发给土地所有证，借以安定农民生产情绪，又如弄错成分因而扫地出门了的农民应加处理，弄错成分的下帽子等，这些工作不应一概停止。以上两点，

望加考虑后转告热河及冀东。”

5月15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大量筹集银洋的指示：“中央和军委认为在我军进入蒋区最初时期内，在财粮工作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尽可能发给在蒋区作战的正规部队一部分银洋，以减少困难，腾出时间来建立新区财粮工作，是很有必要和好处的”。为了筹集银洋，中央及军委特作下列决定：“由各地政府、军区及野战军规定价格及详细办法，收集银洋及白银。”“禁止银洋白银出口，及在解放区内部市场通用，并设法进口一部。”“各地积存收集与铸造之银洋，统归中央军委支配。”

5月19日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一起，约贾拓夫、杨立三、薛暮桥[1]等开会，商议解决西北财经困难及军委后勤等问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徐向前电：临汾战役[2]后，要特别[1]薛暮桥，当时任华北各解放区财经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

[2]临汾战役，自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开始，至五月十六日胜利结束。

至此，晋南完全解放；注意保护缴获的火车、汽车、汽油等和铁路上的一切建筑和器材，不准破坏、拆毁及收买。

5月20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阐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合并的理由，指出：以前因为日本人封割，所以成立两个战略单位进行斗争。今天没有封割了，故无任何理由再分成两个战略单位进行斗争，要合并起来，统一进行斗争。合并了，有利无害，这是人民的要求，还可以节省干部。在谈到华北局的工作任务时指出：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去，以保护我解放区。华北的方针是建设的方针，进行土改，发展生产，训练干部，支援前线，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建设的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中央工作主要是华北局工作，华北工作带全国性意义。我们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又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我们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无政府状态。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对派去河南、湖北、陕西一带工作的干部讲话，指出那里是新发展地区，是去年七月后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大军南渡黄河，展开战略进攻后，才创立的根据地，困难比这里要多些，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发展中的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

5月25日与谢觉哉[1]、陈瑾昆[2]谈话时说，华北大部分地区已没有敌人，可以着手建立正规法治。华北联合政府快要成立，要陈当法院院长，谢当司法部长。刑法和民法先就旧的改一下施行，边做边改，有总比无好。现急需稳定秩序，财产有保障，使人民乐[1]谢觉哉，当时为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负责人。

[2]陈瑾昆，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于建设。干部靠训练班，调些人训练几个月回去工作。

5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人权、地权、财权保障条例及号召地主回家布告均悉。你们为什么要发布这些文件，目的何在？你处情况如何，是否仍有普遍随意捕人、杀人及使用肉刑等事？又逃亡地主究有多少，逃往何处，他们不回家，是否严重妨害生产和秩序？又发出这些文件是否有伤群众情绪，相对助长反动分子气焰？是否可不一般地提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及保障人权、地权、财权，号召地主回家等口号，而只禁止随便捕人、随便处罚，规定捕人及审判的手续，保障一切人民（包括地主、富农

在内)在土地改革中所分得的土地、财产及以后劳动经营所得的财产不受侵犯,并保障官僚资本以外的工商业及外侨的合法营业传教自由。除犯有严重罪行及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外,保障一切逃亡地主回家后不加追究,并分配其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房屋、工具等,即可安定秩序、人心,使其从事生产。”

5月27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5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学习列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通知:“中央宣传部日内将经新华社广播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及重印该章前记一文,各局、各前委收到后,应即在公开党报党刊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分发给一切干部阅读,并组织讨论为要”。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指出:“毛主席最近指示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他说:‘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存在于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5月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训练班是培养保卫工作与情报工作的干部的。我们不仅要在军事、政治、思想理论斗争上胜过敌人,而且要在特务斗争上也要胜过敌人,革命才能胜利。胜利后很重要的是要建立维持治安和镇压反革命的机构。如果没有完备的保证人民安全的机构,国家的安全即不能维持下去。做这个工作是光荣的,要最可靠、最忠实于人民的好党员来担任。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要想出风头。要有两方面的修养,既需要能钻进污浊的环境里,又要能“出污泥而不染”,在艰苦环境里能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在顺利的环境下不贪污腐化,经得起考验。

6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华北局具体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党工作指示的计划”的通报:华北局准备公开发表决定,宣布华北土改业已完成的大部地区结束土改,发给土地证(有个别土地不足或过多而必须调整者,在发土地证时加以调整),而以全力进入生产。在土地尚须加以抽补调剂的地区,则宣布在土地实行必要的调剂后,发给土地证,进入生产。在一切基本地区,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订经常的相当固定的土地税则,稳定发展生产所必须的各种秩序。在接敌区及游击区,因大部均系以前的解放区,并实行过土改,只宣布以军事斗争为主要任务,不进行土改。要求除中原地区大部为新区应当在基本上执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外,其他各解放区的许多地区亦有与华北相同的情形,应参照华北办法,根据各区情况,决定各区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计划,并公开宣布以安定人心。

6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同意华东局发出《对新收复区处理地权及其农产物所有权的暂行办法草案》及《关于执行该办法的指示》。要求以后将执行结果和经验报告中央。并告,这两个文件已转华北、东北、热河、西北、晋绥各局参考。

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六周年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共产党为中坚来发展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与后退,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与后退。中国共产党前进了,那么中国也就前进,中国历史也就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后退了,大概中国是不会好的,也是要后退的。”讲话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的历史前进。

这件事情虽然经过许多曲折，但我们正在取得胜利。”指出：“我们党生长在列宁时代，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在列宁主义坚固的理论基础上，今天还在毛泽东思想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建设起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军事上、政治上，在群众中间是巩固的。以后只要争取我们不犯大的错误，干下去，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是无疑的。可以这样讲，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7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分局、张稼夫[1]并告徐向前[2]、周士第[3]、西北局电：“临汾地区当前第一步的中心工作，应该是安定社会秩序，收缴特务土匪武装，确实解散国民党、同[1]张稼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晋南工委书记兼临汾县委书记。

[2]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周士第，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志会等一切反动组织，并完成夏征。目前发动群众，亦应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来提出口号，并进行宣传鼓动。至于系统的社会改革，则须在这第一步工作完成以后，才好进行。”“对蒋党、阎党特务活动，应有警惕，应有对策，并须有计划地系统地向他们采取进攻的步骤，以至彻底打垮他们，但不要惊惶失措，操切从事”。“对学生、教员、知识分子，除号召其中蒋党、阎党特务人员但白登记，禁止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与阴谋破坏，禁止教授‘党义，之类的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以外，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则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适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要认识他们有些是为环境所迫而失足的，或是被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教育所欺骗蒙蔽的，对我们则完全不了解。对于这些，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人，我们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城市市区与乡村的政策和作法应严格分并。城市政策不能行之于乡村，乡村的一套亦不能搬用于城市。来电所提‘以贫雇农为骨干，建立我们的组织，过于笼统，行之于乡村也不完全，也不能防止你们所批评的片面强调深入贫雇工作的错误；行之于城市则是完全错误的。城市与乡村应严格分清界限，在你们今后的指示和工作中，必须切实注意。”

7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招收、训练当地知识分子解决干部不足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关于中原干部问题，我们估计从邓子恢带去大批干部及刘杰率领一千二百干部南下后，大体上已够分配，除你们所要的财经及卫生干部，准备从华北再抽一部南下外，无须在目前再大批抽干部南下。如你们再要，前华北抽出者尚有六百人在党校学习，亦可派给你们”。“中原有大批知识分子，望你们尽量招收，加以短期训练后即可分配适当工作。他们是本地人，只要他们愿意参加革命并经过短期训练，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比外来干部会有很多方便之处。这应该是你们当前干部的广大来源，你们必须十分注意争取、收集和教育他们，否则，你们的下层工作干部将很难解决”。

7月1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区委员会联合作出《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确定华北临时人民代

表大会的任务是，制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织法，并选举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决定华北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

7月中旬与董必武晤谈时说：“乡县政权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及危害解放区治罪条例三草案都很好。希望赶快把民、刑两法草拟出来备用。”谢觉哉主持起草的《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及《危害解放区治罪条例》等三个文件，于七月十五日报送中共中央。刘少奇审阅修改了这些文件。十七日，董必武致信谢觉哉，转达了刘少奇的意见。

7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同意华东局关于接收济南的准备工作报告。指出在训练中应注意防空及在飞机轰炸下如何维持秩序、保存物资的办法。对于所有进城人员及机关、部队，必须订出纪律，保持廉洁，不许抓取任何东西，生活标准不能定得太高。

7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告西北局电：华北政府新设公营企业部、工商部、农业部、交通部、财政部及银行，以上各部由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如此，对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有很多好处。山东省和西北政府，亦以依照上述分工设部为好。

7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许世友[1]、谭震林[2]并告华东局电：“经华东局修改的我军进入济南的七章约法，甚好。可以采用。你们七月十六日电所提出的政策，例如公开宣布除王耀武[3]、省党部书记长及几个主要首犯外，一律宽大，及警察乡镇保甲仍任原职等，均不妥。你们不要这样宣布。如这样宣布，就要限制自己手脚。因为有些破坏分子及少数罪大恶极的特务、国民党人员及少数警察乡镇保甲人员等是不能不逮捕惩办的，更有一些是不能任用的，还有一些虽可任用，但必须调动，而不能令其任原职的。这些事，虽在攻城过程中及占领后秩序尚未恢复时，不必忙于处理，但在通常秩序恢复后，是必须处理的”。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的通知，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任院长。

7月26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4]。发言说：我们的工作总而言之是“收”。“发”、“来”、“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地来的电报、文件、报纸，杂志都要有人看，看了之后摘录出来交中央同志着。书记处要分一下工，总要有一人看到一种。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中国的、外国的情况都要有反映，但要简化。合理、不漏。“发”的方法，电台是主要的。电台译电人员要提高技术和文化水平，各部委要注意“发”的批准问题，秘密电报、政策指示由秘书长批发；拨炸弹由参谋长批发；政策性的文件由书记处批发，要分工负责。我们的[1]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

[2]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

[3]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

[4]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是中央各部门集体办公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协调各部门的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工作方式要由游击到正规，由手工到工业，由乡村到城市，作长期打算。

7月27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今后称蒋介石集团为“国民党反动派”，并积极筹备召开除反动分子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致信谢觉哉：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整理的《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

条例》及选举条例“亦经书记处批准，请即当作草案付印。其中居民比例，到底用‘比例’或‘比率’为好，请你斟酌决定之，以便改成一律。又为何无市选举委员会？又根据本条例具体划分选举区及具体决定居民选举代表名额之比例，似亦须加上。以上各点请修改后付印”。三十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条例，交华北局讨论，再交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原则通过，交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作最后斟酌，然后发表。中央可在常务委员会讨论一次收集全部意见之后，作最后修改，交常务委员会通过，似较适宜。”八月七日至十九日召开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上述条例。

7月28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购买外国书报和收集资料（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党内的、党外的、蒋管区的、解放区的）问题。

7月29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研究揭露美蒋假和平阴谋问题，提出“解散国民党反动军队，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和“惩办战犯”两个基本口号。刘少奇发言说，对于反动派的和平口号，我们不简单拒绝，可以利用。在解放区着重揭露其挽救反动统治和增加群众幻想的动机，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利用”加“揭露”，提出“解散国民党反动军队，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和“惩办战犯”两个基本口号，使反动派为难。关于宣传工作，指出办好新华社作用很大，报纸是党联系群众的主要方法之一，全党都要建立这个观点。但是仅靠新华社二百多人办好宣传，还是有困难的，要靠大家来办。新华社与各部委是互相帮助的关系，报纸的编辑人员大多数没有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工作，新华社与各部委的业务工作联系应有所分工，各部委要将收集到的各种材料研究整理后交新华社。

7月30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刘少奇在发言时说，应该选送一些华侨到马列学院和北平大学，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训练学习。

8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鉴于华北两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会议研究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管理机构问题。刘少奇在发言时提出，把几个中共中央局统一起来，搞一个财政部，一个大华北政府。办法是“通通拿来然后再拿点出去”。货币统一问题推迟一下，以便各方面多考虑。成立农业部、工商业部。由上而下地建立合作社，固定办下去，干部经过训练再调下去。华北局首先成立华北合作总社。

8月3日致信薄一波，“送来华北政府组织大纲及土地农业税暂行税则和你的讲演稿[1]，均收到。中央同志对于这些文件的意见，已批在上面，请你们斟酌这些意见修改后，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在发表前请先送中央审查批准，然后再交主席团或常委或政府通过发表。谢老[2]起草的几个文件，亦照上述办法处理。

[1]薄一波的讲演稿，即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建议稿。主席团为了认真地讨论这些文件，可在代表大会组织几个委员会，以便在大会后和他们讨论几天，吸收他们意见，作为主席团下决心修改的一部分根据”。

同毛泽东等会见聂荣臻、杨成武。毛泽东向他们交代华北野战军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

8月4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新闻工作，刘少奇发言说，新华社的工作标准应该是全面、真实、及时地反映历史（各种斗争），

并且能够推动斗争、指导斗争，有所拥护，有所批评。以此衡量，我们的报纸作风是经验主义的党八股，一条一条孤立的新闻，有头无尾，看不出宣传目的，没有反映全面动态。比如，有反映前线战斗的消息，没有反映三查三整的材料；有各地平民办合作社的消息，没有办合作社得失利害的报导。过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现在是实话连篇言无长物”。下一步要训练记者，一个成熟的记者带若干个初学的。规定记者的权利义务，发扬记者个性。记者有报导权，但要遵守纪律，负责任。

8月5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钱俊瑞[1]关于华北大学的情况汇报，并讨论该校的教学问题。刘少奇发言时说，学校要把学生当作共产党的后备军进行教育，要很恳切地把党的政策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讲给他们听，使他们了解党和党的政策，了解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步骤。在组织管理上，要公开党员，有些党的会议要吸收群众参加，受群众监督，要吸取我们乡村中有些党支部因为不公开而变成恶霸的教训。

致信谢觉哉：“《惩治反革命暂行条例》草案奉还，请照[1]钱俊瑞，当时任华北大学教务长。毛主席批示办理。由你及其他原起草同志根据书记处各同志意见，加以斟酌和修改后，提出一个草案，交华北局及华北政府。”

8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安子文关于党组织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发言说，各地党委由于忙于军事、政治和财经工作而放松了建党工作。今后从中央起，要加强组织部的工作，组织部要设组织处、干部处，编教材，订制度，明确支部干什么。苏联现在正在整党，请陆定一同志把有关的十几篇文章编成小册子，请陈伯达同志把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大论战的材料编成丛书，另外，把党建论文集也重新选编一下。要选择一批作风正派的干部送到华北局党校加以训练，毕业后作党务工作。要设立监察委员会，机关干部开会，应该请非党员参加。我们的党员既要善于与非党员合作，又要与非党员有所区别。

8月7日—19日华北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二十六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九月二十日，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当选为副主席。九月二十六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8月13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筹备建立青年团问题。

8月17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李维汉关于石家庄城市管理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商业的发展方向是国营资本、合作资本。现在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们要用国家商业资本、合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私人商业要在我们的控制下营业。

8月21日在西柏坡与王光美结婚。

8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情况和邓颖超[1]关于妇女代表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在发言时说，现在是军事时期，军事第一。将来战争结束了，缺乏妇女干部和妇女没地位的情况会改变。今后，妇女都要专一门，要有妇女工作职业干部和妇女运动职业家。

8月24日向毛泽东报告：“在中央汇报时大家意见将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以便能管政协、海外及国区工作，而将解放区城市政策及工人运动归彭真及

政策研究室管。此点你的意见如何？请决定！”毛泽东批示：“同意这种改变。”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工部改名为统战部及该部工作任务等问题的指示》：“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原城工部所管解放区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划归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研究解放区城市与农村各项政策，新区工作及不属于其他各部，委、校的各项政策。”

8月28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施政方针的建议上写批语：“印发各同志，望各同志提出意见，并在会议讨论后，然后决定是否发表及如何修改。”

9月1日就《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请示毛泽东：“此件已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了一些修改，请审阅。”

[1]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9月初撰写《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文章指出，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今天的解放区及将来的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文章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占有相当比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在以后还要发展，而且这种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也还是必要的，有益的，不是可怕的。至于广大的小生产，则更加需要发展，但在这小生产中，是不断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成分。”“这些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也必然要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发生竞争。这种竞争，愈到后来就愈加激烈，并将继续很长的时期。这就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虽然它在旧社会中早就存在。这就是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上所发生的竞争，首先就在经济上表现出来。那末，这种竞争，首先是和平的经济竞争，到底谁胜谁负呢？这是要看将来的发展情况才能决定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要取得这种胜利，就必须继续巩固与加强自己对于国家的领导权，就必须迅速学会管理经济的一切知识，就必须吸引农民及其他一切小生产者站在自己方面，并用一切方法去帮助、教育与组织他们，就必须尽量争取国外的援助。”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有决定性又最难实现的要求，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如何去帮助、教育与组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使他们紧紧地跟随自己前进。合作社则是实现这一困难任务的最重要的办法。”文章指出，合作社可分为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两大类。“由于中国工业的落后，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文章根据解放区目前的情况，阐述了组织和办好消费合作社的各项办法。

9月8日—1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三日，在会上发言。在谈到对战争前途的估计时指出，这两三年内，可能有对国民党蒋介石不利的突然事变。要估计到这种最好的可能。我们的计划不摆在这上面，但可以力争，争取缩短痛苦，早日胜利。自然，还有些困难，要重视这些困难，防止骄傲。我们在战争中，还有带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这两个关没有过。过了这两关，问题就解决了。在谈到全国土地会议时指出：全国土地会议结

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和平幻想、右倾错误、地主富农思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八七会议。土地会议确定两条：平分土地和整党，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有重大缺点。这里的经验是要注意干部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这一方面，要切实注意防止那一方面，两面都要分析。土地会议的缺点和错误，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发言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七十万人，发动了辽沈战役。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十一月九日，东北全境解放。

9月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1]谈话：“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2]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 [1]一九四八年八月，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组成华北记者团，到西柏坡新华社总社学习。

[2]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地神之子。他在同对手搏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被对手举在空中扼死。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各种桥梁和群众联系，要依靠各种机构来领导人民，更多更频繁的是依靠报社和通讯社。“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新闻工作者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艰苦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

做。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这个谈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10月5日在妇女工作会议上讲话：妇女工作会议开了很久，党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的情形要发表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的文件如婚姻法等，以便在全国范围里统一妇女运动的方针与政策。现在重新把妇女工作提出来，提到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阶段，更广大的范围里，原因就是革命形势发展，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如果不动员和组织起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来参加斗争，就不能成功。妇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在全中国快要胜利、统一，党提出反对无政府主义、无纪律状态，强调统一的时候，妇女工作也要强调统一和加强纪律。现在解放区妇女工作的具体方针是生产，要以生产为中心发动妇女、团结妇女、教育妇女。

10月6日为统一华北。华东、西北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中共中央作出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决定，任命董必武为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黄敬为副上任。

10月10日彭真在中原局九月二十九日关于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上写道：“知识分子问题，现在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否需要将此件节略、稍加修改转发各地？”刘少奇阅后批道：“同意。并要各地根据本地情况，用一切方法吸收一切老区及新区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分派工作。”

10月修改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是由张闻天起草，经东北局通过后，于九月三十日报中共中央的。刘少奇对这个文件进行了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内容。其中对国营经济一节的修改指出：“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要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对合作社经济一节的修改指出：“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然后，刘少奇将这个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认为文件“修改得很好。”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致信有关同志：中央准备把《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发给全国各地，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但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故一律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此件还须征求东北局意见后才能向全国发出，特印发各同志，请各同志提出意见，以便再加修改。”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你们发来《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很好，我们已加以初步的修改，我们在征求华北局同

志的意见及你们的意见后，再作若干修改。现特将修改后的全文发给你们，望你们即加研究，并将你们的意见从速再次电告。”十一月二十五日，东北局复电同意中央修改稿。

11月1日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在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观，世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现况，目前世界的两大阵营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等问题。一九四九年六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

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淮海战役，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在新收复的大城市中进行军事管制，时间不能太短。在军事管制期间，应达到以下目的：“（一）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二）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三）恢复并维持经常的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物品。（五）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六）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七）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及生产的管制机关与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八）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九）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11月19日致信冀中新华书店的编辑同志，“很感谢你们再版《论党》一书。但此书是在我离开华中以后，同志们选辑了我一些稿子出版的，并未经我同意，其中有些稿子我至今未看过。”“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停止再版此书，将原本寄给我，由我校阅一次，抽出若干篇，加进若干篇，其他的文章我亦可在再版时，加以修改，并作一篇序，然后送给你们付印。”

11月24日五十寿辰。朱德赋诗祝贺：“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

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动平津战役，至十二月二十日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联名致信徐向前

前[1]：“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待痊愈后再上前线。总之，治疗和休养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办。”

11、12月间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作进一步修改。其中在论述合作社经济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合作社应该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易于接受和了解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一种普遍的

社会制度。在目前，应以极大的努力，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很有步骤地、很有条理地、很周密地、在自愿的条件下，将广大的消费者与小生产者组织到各种合作社中去。”合作社主要应该分为三类：第一，是消费合作社。

其任务是供给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使社员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第二，是农民、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及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供销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任务，就是供给社员（农民、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劳动者）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工具、种籽、肥料、原料等）和销售社员所生产的商品。第三，是农业或工业的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劳动互助社，这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个人私有，只实行集体劳动或变工互助，这是一种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二是集体农场。三是农业公社。这后两种则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级组织形式，在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前一种是现时就能普遍实行的。除此之外，还可组织其他的合作社，例如信用、医药、房屋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如果办理得法，能够保护社员利益，免受商人剥削，并可提高生产力，节省劳动力，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因为合作社把人民组织起来，就使国家对于社会生产与分配的统计和监督，变得容易，并能养成人民的集体 [1]徐向前于十一月中旬在指挥太原战役中患肋膜炎，去后方休养。观念，训练小生产者集体劳动的习惯，为将来组织集体农场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准备有利的条件。”在对结论部分的修改中指出：“在我们批判与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时，又必须坚决地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左’的偏向，我们必须严格地加以防止。”修改后的提纲草案经毛泽东审阅过，但未形成正式文件。

12月1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原局电，同意立即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

12月14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1]学员讲话。指出：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就整个党来说，我们是不是个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呢？是的，是有理论的，而且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党。党中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马列学院办起来，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中国党有三百多万党员，面临的情况复杂，再加上解放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情况更复杂，没有高深理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现在中央提出一个任务，要提高党的 [1]马列学院第一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在河北平山李家沟口开学。干部的理论水平，不久即将发出指示。开办马列学院也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将来还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依靠马列学院去使全党理论水平有所提高。”讲话强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

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1]曾与魏徵[2]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如在党内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的，要是人们不犯主观主义，就没有唯心论了。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主观主义。我们自觉地警戒，就能够少犯或不犯。但是，如果怕犯教条主义，就不学习 [1]唐太宗，即李世民，唐代皇帝。

[2]魏徵，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任谏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了，不进马列学院了，这也有危险性，这叫做经验主义。现在党内思想上主要的偏向、危险性到底偏在哪一方面呢？偏在经验主义方面的多，经验主义是主要偏向、主要危险。”“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规定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各级干部的配备基数。

12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合肥、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归华北接收问题致华东局电：请华东局即令华中工委准备接收人员与机构，如人员缺少，可放手从济南、潍县及徐州职员工人中抽调大批比较进步的人员进行短期政治训练，准备将来接收合肥、淮南铁路及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通、芜湖、无锡、宁波、绍兴等地，解决这一严重任务。

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李卓然[1]：“某刊[2]所载我论态度一文，我并未看过，我不知有此文，望切勿转载或印刷。”

12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 [1]李卓然，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

[2]某刊，指《晋绥日报》。

决定》。决定作出切实防止对公共房产的占领、争夺和任意毁坏等现象的十条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城市中成立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与分配该城市中的一切公共房屋。一切公共房产，一律由其接收、登记造册和保管；一切在巩固城市中办公的机关都要实行集中办公制度，不经当地最高机关批准，不准任何人在家中办公；所有党、政、军、民各系统的工作人员除其家庭原在本城市并有充足理由经本机关负责首长批准者外，都集中住

寄宿舍；任何负责的党员不得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私人公馆；所有公共机关和个人被允许居住公共房屋及以公共房屋办公者，均须付必要的房租；严格禁止一切霸占、争夺、移走、拆毁公共房产、家具、设备的行为等。此外，为了免除城市工作人员各种散漫的现象，及不适合城市工作的各种生活方式，应适当改变原来在乡村工作中的若干待遇，如：取消私人马匹、马夫、私人勤务员及现行警卫员制度（部队除外）。不容许城市中的工作人员有不守纪律和贪污腐化现象。

12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迅速胜利地发展，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和银行、对外贸易等，均已或将要归人民政府所掌握，我党必须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否则，决不能应付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据沈阳、郑州及其他城市工作的经验，新提拔的产业工人和平员干部，懂得工商业技术的干部，对于接管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是很能干和很积极热情的，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而农村工作干部及缺少工商业知识的干部，则对于接管大城市和大的工商业，就有很多困难。为此，我党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大批的培养、训练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目前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

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总支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支部工作的报告。指出机关支部工作应该做的不是一般的行政工作，而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把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混淆起来，结果就陷入事务工作，忘掉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在任务上混淆不清，支部任务不明确，组织方式不适宜，这就是支部工作做不好的原因。支部工作没有别的，就是要使大家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增强，文化程度、理论水平提高，更团结，工作做得更好，把错误搞掉。这些做好了，支部工作也就是做好了。机关党的支部工作任务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为提高工作效率而奋斗。

12月24日在全国军工会[1]上讲话。指出兵工同志对人民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武器弹药的生产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央估计一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垮国民党。将来我们还得建设国防工业，要有国防军，武器还要造，要正规搞。将来全国大工业到手，仗打完了，要建设新的工业。在接收城市、工厂时我们要注意学习，不能摆老资格。我们的老资格是山沟的老资格，搞工厂、银行、邮局还不是老资格。管理大工厂、大企业等，人家是老资格，我们要做学生，要学习。程度低没有关系，只怕自己不承认低，自己用心学习进步就快，危险的是不承认低、骄傲、不愿意向别人学习。

[1]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军工会，从十二月十二日开始，至二十五日闭幕。12月25日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作关于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主要讲四个问题：一、问题的提出是否过早？二、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三、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四、合作社问题。报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阶段中，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渐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

界社会主义的包围，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可能的。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但过早地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要犯“左”倾错误。应允许资产阶级在一定限度内赚一些钱，这就是无产阶级拿出一部分胜利品来赎买资产阶级。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制度。商业上也可考虑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外国人在中国的矿山、工厂也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通过颁布法律使之接受监督。报告阐述了合作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以及在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指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问题。”“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国家经济而没有合作社，国家经济就无所作为；只有合作社而没有国家经济，合作社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有了政权，有了大工业，还要有合作社，才有社会主义前途。”

## 1949年五十一岁

1月3日为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邠县地区在征粮、配合剿匪、肃特、反霸斗争中有扩大打击、乱斗、乱打人现象的通报起草批语，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委严格注意防止或纠正这类错误。

1月5日致信高岗：“你寄来苏联同志起草的农村合作社标准（标准二字较模范二字为好）章程及东北合作总社章程我大体看了一下。章程草稿是完备的，但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加以增减和改造，又有许多名同亦须斟酌改变，你们如能加以研究并改造，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文件。又东北如有苏联合作专家，最好能请他们首先帮助我们办好一个城市合作社、一个县的合作社和一个乡的合作社，如此创造经验并带领训练干部，即可逐步办好所有的合作社。”

1月6日—8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八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提出要学会管理城市。他说：现在许多地方搞得不好，应当训练大批工人运动的干部，甚至举办像抗大那样的学校，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各项政策的教授。各城市快要到我们手了，如何管理、领导？各中央局的同志要亲自动手，培养训练干部。在乡村靠贫雇农，在城市靠工人，要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居民。关于生产和经营的统一管理问题，由于中国太大，中央只能着重于统一计划，统一领导，要由地方来管理和经营；有些可能统一经营的，管理也要由地方去做。因此，在政府部门应有各项工作的计划和有管理经营的机构，还说：商业很重要，它刺激生产，也可打击生产，我们不让私商操纵国民经济，那我们就要操纵起来才行，特别是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要搞好。此外还谈了区、街政府等城市工作问题，强调不要把农村的工作方法搬到城市里来。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致天津市委并告北平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一）天津解放后，你们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对于接收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政、电报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没有逃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应令其担负原来的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工作，而不应派人去代替他们当厂长、局长、监工等。如果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即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除非是无法提拔或我们派去的人完全是该企业的内行，能够无困难地管理该企业时，才任命他们直接负责该企业的管理。对于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绝不是草率拟定办

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上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于被动。（二）我们派到各企业中的军事代表（即接收人员），对于大企业除派一个负责的总代表外，并可在各工作部门（十分必要时可在各车间）、各站、各段派遣代表，受总代表的指挥，并可设立监督部或政治部。”“（三）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经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

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

1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彭德怀向第一野战军中共代表会议的报告的批复意见：“对时局问题请以新华社元旦献辞、一月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为基础加以解释。”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北局电：华北局扩大会议，中央不准备派人参加，中央一月会议的决议即由薄一波传达，并望根据中央决议讨论与布置华北一九四九年工作。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资问题复北平市委电：“关于工资问题，同意你们与各企业职工共同商讨决定的各项标准，迅速发给，以保障工人生活，安定工人情绪。”“关于铁路工人与一部分矿工的年终双薪及铁路工人冬季一吨煤的煤票，亦必须按旧规完全承认，不应有任何动摇，并须尽可能发给。”“如果你们照旧规发给年终双薪及煤票确有困难不能全部或一部欠发时，则须向职工普遍地进行解释，说明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目前的困难，请求工人谅解，允许我们欠发一部或全部。欠发的时间亦须说明，即答应在平津战役结束秩序恢复后即补发，或在政府困难减少有办法时即补发，或在战争大体结束时再补发，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但在说明时，必须承认工人这些特殊待遇是应该照发的，而不要使工人感觉人民政府有取消这些待遇的意图，以致引起工人的不安。”

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蒋介石在浙江奉化故里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指挥部队。

1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军区宣传部电：“部队南进所应发表之一般的政治文告及标语口号，届时当由中央发出，现在尚不能拟定。解放军南进对城市及乡村人民的约法，请华野[1]前委根据江南情形拟定，报告中央批准。你们对江南的宣传品均须经华东局及总前委审查后，才准印刷，不得乱印。”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原局电：同意召集中原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中原总工会。

1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天津市税收及房租等问题 [1]华野，指华东野战军。致天津市委电：天津市旧有各种税收，原则上应一律暂时照旧征收，以便使市政府能有自己的经费，这对人心的安定，秩序的恢复亦有帮助。

各种税收及税率、税则的改革，除少数苛捐杂税急需停止或改革者外，一般可待二三个月调查研究清楚后再来实行改革不迟。不要提出或暗示分配房屋或减低房租的口号，相反表示房客应该照旧交纳房租，为了救济失业工人及贫民，可经过商会或在某种税收内附加若干，征收一二次救济捐。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1]委托飞抵石家庄，随即转乘汽车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同他会见。此后，他们同米高扬进行了多次会谈，二月七日，米高扬离西柏坡回国。

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商银行在中国经营的处理问题复天津市委电：“可以接见外商银行代表，并可通知他们：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并未通知外商银行停业。他们在人民政府法律范围内，可以继续营业。并令他们向政府报告他们的资产及其所经营的业务和帐目与国籍等，以凭核办。并可派人到各银行去检查他们的帐目、库存及资产等情况，待情况清楚后，再作决定处理，目前不要向他们表示任何不成熟的意见。”

2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照原计划召开中原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中原人民政府，将来长江流域解放后再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那时可将中原人民政府改为河南省政府。豫北部分，暂时亦仍归华北，不要划归河南。华中局的组成及成分，待七届二中全会时确定。

[1]斯大林，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聂荣臻[1]、薄一波[2]并华北局电：“同意华北局机构从现在起即有秩序地迁到北平办公。”

2月9日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解放妇女，发扬妇女的积极性，是建设新中国的必要条件。”

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改革学校教育问题复天津市委电：“（一）平津的学校教育是需要加以改革的。你们所提改革天津国立学校的计划，大体上也是好的。但我们怀疑立即进行这种改革的群众基础，即是否绝大多数的学生和教职员都拥护这种合并和改革，而不会引起某种反抗或误会或不谅解，以致给予特务分子以鼓动群众的机会，妨害事业的进行。我们认为你们在群众中的准备工作是不够的，目前你们应积极在学生及教职员群众中进行这种改革的准备工作，并将准备的情况和程度报告中央，以便中央有根据来下决心进行这种改革和合并。如果这种准备不够，缺乏改革的充分的群众基础，则宁愿将改革与合并的时间推迟，以便你们进行准备”。“（二）所有各大学中学的校长和教职员，均须从平津各学校原有人员中选择调整，由适当机关加以任命，无法由外面派人去接办。在原有人员中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者及坚决的反动分子，必须撤换，新任命的负责人员亦必须是忠实愿意执行我们的教育方针，并为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所赞成者。”“（三）你们所提限制私立中学的学费及由政府接办私立学校的意见是错误的，不可采用。对私立中学，你们可只要求他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取消一些应该取消的课程而外，不 [1]聂荣臻，当时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2]薄一波，当时兼任平津卫戍区政治委员。要去加以干涉，应让他们继续办下去。”“（四）关于学生公费制，同意你们所提意见，经过群众讨论，组织评议委员会具体审查决定，通过群众大多数的赞成后，加以改革。”

2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天津及其他重要海口的解放，许多外国的商业机关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业机关都要

求和我们进行贸易，而我们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亦需要进行这种贸易。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央特作如下各项决定：（一）向华北人民政府提议：立即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事宜。（二）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目前国家尚不能经营的某些贸易，以及由私人经营无害或患处不大的某些贸易，应该在国家管制之下允许私人经营。（三）应该允许那些愿意和新中国进行贸易并愿意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外国的商业机关派遣代表或指定其代理人来和我方接洽，并允许这些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设立办事处。（四）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局得向外国派遣商务代表并在外国设立商务机关。（五）对外贸易局在了解对外贸易有关的各方面的情况以后，须制定适当的对外贸易的政策和计划，送交中央审查批准。（六）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必须宣布中外船只进口、沿海沿江中外船只停泊及其卸货装货的办法，码头租借使用的办法，海关报关纳税及检查的办法，管理外汇及结汇的办法，以及违反这些办法和走私漏税的处罚力、法等。（七）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应和某些通商的外国口岸，建立邮电关系。（八）为了进行对外贸易所需之外汇，规定汇率及进行结汇、押汇和买卖外汇等业务，应由国家银行经理，其他银行不得经营外汇及买卖外汇。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北局、彭真[1]、叶剑英[2]、黄克诚[3]、黄敬[4]并林彪、罗荣桓并告东北局电：“丑铎[5]中央对外贸易指示即发给你们。在这个一般指示之下，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根据这个方针，望华北局及彭、叶、黄、黄立即派可靠人员向苏联商业机关接洽，和他们讨论我们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有关各项问题，并将我们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告知他们，以便首先了解我们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我们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试谈。”

2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滦煤矿管理问题致华北局并天津市委及滕代远[6]电：“开滦这样大的带垄断性的煤炭生产和经营，政府必须在可能条件下设法加以管制。”“在目前对矿局所提三项办法，首先应设法增加车辆运煤，以争取出口，此事望与铁道部方面商量解决。在将来运输上如有办法，政府即应把煤的出口和买卖，设法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控制到自己手中来，以 [1]彭真，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2]叶剑英，当时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

[3]黄克诚，当时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4]黄敬，当时任天津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5]丑铎，即二月十六日。

[6]滕代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便增加政府经济斗争的武器。那时政府即可从矿局购煤出口及分售给各工厂。在目前，政府应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一批煤炭，一方面既可掌握铁路工厂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可使煤矿生产不致停滞。至于暂减产量的办法，则应力求避免，因为这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失业，并将使工人内部分裂。如我们批准减产，工人即将反对我们，

矿局在此是有一些阴谋的，望你们注意。如存煤实在销不出去，车辆增加又实无办法，矿局维持又实在困难时，我们即应和工人职员（可组织开滦煤矿职工代表会）切实商量，要工人职员提出办法维持。那时工人会宁愿暂时欠发一部分工资，而不愿减产的。工人并可能提出其他可实行的办法（如发煤代替工资）来维持。”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华北局、总前委、北平市委电：“关于对外贸易问题，中央丑铣[1]电已有原则指示，望你们即加以系统研究，并找以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详细询问，以便了解情况，提出办法，去进行以后的对外贸易。”“关于银钱业工会，你们应即进行组织，成立津市银钱业职工会。”“并在此职工会中，进行适当的改善生活的工作，和进行普遍的政治教育，争取银钱业职工靠拢我们，即可完全了解情况，协助政府监督银钱业的营业。”“关于外汇问题，目前即由人民银行经理，确有困难。在国家银行没有办法经营外汇以前，可以指定一家或几家私人银行在国家监督之下代为经营。望你们立即进行调查并与若干银行试行谈判，将结果电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同意你们发行生产建设有奖公债一万亿。但其目的应真正地以之投资生产，不应以之弥补 [1]丑铣，即二月十六日。财政赤字。又分三年偿还，似乎期限亦过短，是否可稍延长偿还之期，使其对于事业真有所帮助。又东北城市中尚有不少富人及房租地皮等收入相当大的人，这种公债亦可作为吸收他们财富的方法之一。”

就催促迅速处理英轮“湖南”号到塘沽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电：应允许该轮立即卸货装货出口。“因现在英国商人、美国商人及上海商人和轮船业（可能还有日本商人来）正互相竞争与我进行贸易，这种情况对我有利，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不要给英国轮船（第一艘到津者）以不必要的过多留难。”

2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等电：同意你们在军管会下组织电影审查委员会，并以沙可夫为主任及以下委员共九人组成之。电影界民主人士应尽量吸收其参加。“但在目前，我们自己电影甚少，故审查禁放标准，必须从宽，不要把有点小毛病或无大害处的影片禁止，第一步只把明显反动的，即反人民民主事业的一部分影片禁止就行了。其余只是在思想上落后的影片，可待将来影片出产较多，能代替它们时再会禁止。”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你们对伪满大汉奸王荆山之处理意见。将王逮捕法办，其本人财产全部没收。但我们估计在东北如王荆山这类需要没收财产并加速捕法办的汉奸及官僚资本家，一定还有一些。望你们令各地秘密调查，搜集确实证据和罪状，将名单报告中央批准后，宣布同时没收或加速捕，而不要无准备无计划地一个一个地去逮捕没收，以免混乱及打草惊蛇。”

2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改革旧税制复北平市委电：“同意你们即按伪政府时代之税目税率暂行开征各税，对伪金元券与人民券折合办法亦同意。但伪政府之税目税率必须改革，收税办法及收税人员和收税机关的组织，亦必须改革，不改革，而长期因袭下去，则是错误的。但这种改革必须是有准备地、逐步地进行。因此，你们一面照旧收税，同时必须努力研究和准备旧税制的改革，而不可忽视这种改革。”

2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赵振声[1]并华北局电：同

意北平征税“由原征收机关进行，征税时必须由军管会派充分军事代表监督征收。市政府财政局并须尽快建立自己的征收机关，以便将原来征收机关加以改组”。

就中小学的收费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并华北局、天津市委电：同意“北平市公立与私立的中学和小学，仍应大体照过去一样收费。私立学校收费重者亦不要去限制。但公立学校对于贫苦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出不起学费者可以免费”。“应普遍向教职员及学生说明目前军事时期政府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情形，及军队与政府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的情形，号召他们为政府节省经费，市政府教育局应特别注意在工人区域办理中小学校，以便普遍教育工人子弟。”

3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北局电：“华北大学寅[2]初毕业的一千三百多学员，不应该分配他们到各区党委及石、保、张[3]诸城市的实际工作中去，而主要地应分配他们到各种学校及训练班中去，担负教育参加我们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及旧职员与工人的工作，和随军南下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组织华大式的学校，招收南方大批学生及旧职员，照华大一样加以训[1]赵振声，即李藻华，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

[2]寅，即3月。

[3]石、保、张，即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练。就是说，凡适宜充当教员及班长队长与支部等工作，一律派遣他们去作教育工作，而不适宜作这些工作者，或个别作其他工作有特殊作用者，方可派他们作其他工作。因为目前大革命高潮，参加我党我军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及旧职员，将有数万至数十万人，而对他们必须给以如华北大学那样的初步的政治教育，因此必须准备进行这种教育工作的干部，华大毕业学生即大部可作为这种干部。”

3月5日——13日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十二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指出：“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并围绕城市工作讲了几个问题：“（一）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二）城市的接管问题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另一个是企业接收后迅速安排，交给适当机关去经营，以便进行正常的生产。“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把城市建设起来，生产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接近起来了。”“（三）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在管理城市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毛主席的答复是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他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

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总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们的腰。于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3月8日根据东北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的建议，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约见东北航空学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

3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尽量收录知识青年入我所办学校致华北局并北平、天津市委电：你们应即令华北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军大对于来投考的学生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录，不得拒绝，并且有多少人即收多少人。借口没有房子及经费而大批拒绝收录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并应令财政部发给上述各大学充足的经费，不得吝啬。房屋问题由各大学自己到乡村及各县去设立分校，即可解决，不要一律挤在北平。你们并应分送一批（数千人）学生给陕北、晋绥，这些学生即由陕北、晋绥派来之招生人员带回去训练。你们并可分送每个区党委学生数百人”。

就海关进出口税则问题复华北局并薄一波电：“同意根据一九三四年税则加以修改后实行”。“但甲项免税进口之工业原料、机器材料、日用必需品等，凡我区不能自制者除特殊必须的若干货物外，亦应征税进口，因这对于国营企业并无妨碍，而于私人企业，则有某种限制作用。又统销货物，亦应征税，但可用计帐办法”。“彭、叶、赵[1]提议北平酒的专制，我们认为必要的，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大城市亦应照样实行。”

就处理接收企业物资问题复华北局电：“同意你们将平津并加张、唐[2]等城市所接收之企业物资迅速地适当地分配给各适当机关接管经营。并同意以杨秀峰、戎子和、宋乃德、宋劭文、张友渔、胡景云、徐冰等七人组织一个委员会，以杨秀峰为主任来处理。”

3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旧职员的处理原则复北平市委并华北局、天津市委电：“你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必须首先区别国民党的企业机关与政治机关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办法。（一）对于企业机关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地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的改革就是要设法清除那些坚决的反动分子，劣迹昭著为大[1]彭、叶、赵，指彭真、叶剑英、赵振声。

[2]张、唐，指张家口、唐山。多数群众所反对的分子及没有能力、倚仗亲朋势力在企业中领取干薪的分子。另有一些人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国民党负责人而占驻高级位置，领取高薪，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再有一些人技术较高，能力较好，但因与国民党负责人不合而位置和薪水显明地降低，则应适当地提高其位置和薪水。又，这种情形在工人中亦有不少存在，亦应如此处理。只有如此处理后，才能使企业内部安定团结，进行生产。因此，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

成熟，就必须进行这种改革。”“（二）对于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则须要采取另外的改造办法，也可以采取更急进的办法。因为除掉少数市政上公用机关、卫生机关等等外，我们一般地不依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依靠他们原来的机构，而要加以打乱，不打乱是错误的。因此，你们对于这些旧职员除少数必须留用者外，原则上应一般地集中训练，有些年老或资格太高，不能进普通训练班者，则组织特别训练班。一部分可送人民革命大学或华大、军大，但对于这些人的训练班须由华北政府或市政府特别创办，不宜进华大、军大或人民大学。训练后除必要者可回本机关工作外，一般可用人员亦不应回到原来机关工作，而应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分派其他机关或其他地方工作，或平。津。唐。张[1]几个城市对调任用，或派到江南去，或派到各县去工作，以便分散他们。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令他们候差，等候任用，在候差期间发给必须的生活费。对反动分子，劣迹昭著者及其他无能的不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

3月23日上午，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1]平、津、唐、张，即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共中央机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今北京）。当晚，住河北唐县淑闫村。

3月24日中午，到达中共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在省委机关午餐后，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听取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下午，到达涿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军部驻地。当晚，接见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滕代远等，并商议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行动安排。

3月25日晨，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上午，在颐和园休息。下午，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多人见面，并参加阅兵仪式。当晚，住进香山来青轩。

3月28日起听取中共北平市委召集的文化接管委员会、物资接管委员会、各区委书记及工会干部的工作汇报。

3月29日在中共北平市委召开的物资接管汇报会上讲话。在谈到工业品贵的问题时说，工业品贵并不奇怪，贵了我们可以做买卖，正合乎发展工业的方针，问题是不要过剩。工商局要进行工商业登记，调查有多少生产单位，各有多少产量，弄个清楚，是否会生产过剩。在谈到发展合作社和有计划进行机关生产等问题时指出，可以搞货栈作为城乡联系、工业农业交流的落脚点，房子不够，由公家拨给。把各省的会馆改为农民招待所，招待入城农民。机关要分地种菜、喂猪、开粉条豆腐作坊，其次要搞手工业生产，先搞机关消费的，由市政府工商局计划一下，把生产工具与生产对象适当配备，开一个会议用自报公议办法商讨进行。

3月31日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1日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组成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和平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于四月十五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四月二十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

对中共北平市委作工作指示。指出：北平接管阶段的工作已经过去，秩序大体安定下来。目前的任务，必须继续肃清封建残余，建立新民主主义

的北平，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只要生产有了进步，各方面就都会有进步。北平的文化建设事业也应该有发展生产的观点，要能够在五年十年之后为提高生产而服务。为了生产，就要组织工人、农民，必须把大部力量放在组织工会、组织农民的工作上，这就是全体人员的中心工作。机关生产也应该立即进行。

4月3日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北平解放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接收工作大体上已经结束。北平的秩序大体已经恢复，应进行的一些工作，已经可以开始进行。目前有以下几件事情需要迅速解决：（一）学校问题。公立学校：原有的尽可能办下去，不能办的就合并，能办与不能办决定于有无经费。私立学校：凡私人能出钱办学校者，只要不违反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一概欢迎。有的学校，政府少贴一部分也可以；还有的学校，学费很高，但学生愿意出，我们也不反对，这样使大家都有书读，有学校住，问题就少一些。至于学制问题、课程问题，目前完全实行改革不可能，大体上可照过去办法办。（二）对资本家的问题。有些资本家不安心，应想法使之安心生产。我们可以宣布既定方针，保障资本家的合法利润，禁止非法盈利。我们还应考虑哪些生产不妥当，要加以节制；哪些生产需要发展，加以帮助。在劳资问题上，应向资本家和工人宣布，在可能范围内适当改善工人待遇，但我们要反对过高的要求，反对把工厂分散，我们可说服资本家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三）房子问题。私人房屋，我们明确宣布除官僚的房产外，私人的不加没收，不准侵犯，私人房权政府保障。至于房租是否要减，我想我们也可宣布，不开展减房租运动。采取房主与房客自由商议的办法解决。如果遇有争执，可请政府调解。保障私人房产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如果不这样办，会使人们不出租房子，不修建房子，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四）金融物价问题，目前物价还有小小波动，应告诉人民这种波动是很难免的，待一时期会进一步平稳。物价问题关系一切工作，我们要很好去做。我们应该恢复进出口贸易，规定一些出口人口的办法，安定人心。我们还要把城乡关系搞好，使城乡货物交流，力求畅通。我们可以动员区、村干部搜集出口的东西，城市过多的东西可流向农村去，使物资迅速地周转起来。讲话还指出：北平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必须抓住中心工作。二中全会指出，城市工作必须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北平要执行这一路线，把城市管理好。今天我们主要的斗争对象还不是一般的资本家，而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许多地方把劳资关系搞得很紧张，这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发展生产，是北平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同时，没有北平千万的工人和群众与我们团结一致，则北平工作不易办好。目前北平的群众工作，首先应是工人工作，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大体可分为三项：一是要适当地解决工人的要求，凡是工人所提出的正当的、可能解决的、当前的切身要求，工会应该负责地和工厂商量加以解决。二是工会的组织工作。三是工人的教育工作。只有把上述三项工作办好，工会才有可能有效地动员工人，组织劳动竞赛，提高劳动效率，减少成本，才能使工人对工厂真正负起责任，才会积极

起来参加工厂管理，才会感到自己是主人，否则的话就不好办事。

4月4日与毛泽东、朱德等接见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的代表，并就城市工作中妇女工作怎样做的问题讲了话。指出：城市工作就是把城市群众组织起来，教育好并且保护他们的利益。这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党的机关、人民政府、青年团体、妇女团体，都要一起把工作做好，并且要以工会工作为中心。工会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也就可做好了。工会工作搞好了，女工工作和工人家属工作也就搞好了。女工工作要放在工会里做，在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妇女有很多特殊困难，应多办些托儿所和儿童保育事业，使更多的妇女能到社会上来工作。还应大批训练助产人员，做到使每个村都有一个助产人员，一个具有一个医院，遇到难产就好解决。

4月10日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天津视察和指导工作。并拟订了《天津工作问题》的调查提纲。4月11日上午，视察国营天津棉纺织一厂、天津自行车厂。下午，听取黄克诚、黄敬等的工作汇报，当汇报到不少来自农村[1]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三日在北平举行。的干部不能适应城市工作时，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误事了，当谈到天津接收工作时，说：我们接收城市只是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谈到城乡贸易关系时，说：我们对城乡关系不要单纯恢复旧的，而要有所改进。并建议多想办法打通渠道。当谈到私营工厂劳资关系紧张时，说：根据今天中国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争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今天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我们要抓紧纠正。

4月12日上午，视察天津造纸总厂。下午，听取天津市工商局、粮食局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在讲话中指出：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工商局机构。它的任务是登记、统计及对商标和市场进行行政管理。对私营大企业不必派员监督驻厂，不应过多干涉，如有捣乱，将来有劳动局来管。对私人小工厂的工资，也不要替人家定，由劳资双方各定一个标准，然后听取双方意见来批准。原料、粮食和供应用煤都应该按照“有饭大家吃”的原则来分配，视工业性质来定供应等级，而不是以“公”和“私”为标准来分供应等级，要公私兼顾。对税收政策要研究，出现把字号改合作社、大商店改小买卖等情况，大多是因为税收有问题，批发商不能一律不准。搞营业登记的目的是主要应是为了统计、调查研究、产生政策，限制投机只是目的之一。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交易所，并建立交易所系统，由国家办，代替过去的牙行[1]。天津市 [1]牙行，中国旧时城乡市场中的中间商行，其业务主要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从中抽收佣金。通过交易所加强纱布管理、平抑物价、反对投机，是个好经验。4月13日上午，视察中央电工器材厂。下午听取有关市场、粮食管理、金融等方面的工作汇报。

4月14日上午，视察天津汽车制配厂。

4月15日听取天津市对外贸易、海关和银行工作的汇报。4月16日听取天津市工业处的工作，汇报并讲话，指出：工厂经营问题，还是应利用贸易公司，由生产部门的公司来管。任何一个新东西还未建立起来以前，原有的不能停止。购买与收购大批货物须先与贸易公司商量。成品先通知一个什么机关，由该机关通知各公营企业尽先购买，余者再到市场上出售。 听取天

津市公用局的工作汇报并讲话，指出：应取消法商电力公司电价高于东北电力公司百分之二十的特权。汽油应由国家专买。国家应在码头办运输公司，取消工头的压迫和剥削，国家办运输公司可以与工会合办，运费可降低，公司抽钱可买汽车、办福利事业等，另一部分归国家。要组织运输工人工会或苦力工人工会，包括三轮车夫、粪夫、雇农等，以码头工人核心。将来组织码头工人学校，训练大批干部，可到上海、汉口去工作。4月17日听取天津市工会工作的汇报。

4月18日出席中共天津市委委员会会议并讲话，指出：天津是完整的接收了，很有成绩。现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管理、改造是为了发展。因此，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总的路线，二中全会决议已经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就是城市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这里讲的有群众，有队伍，有斗争对象，是很完整的一个路线。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的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在团结，如果把它当作斗争对象，那就犯路线的错误，天津干部在思想上还不清楚这一点。对自由资产阶级如果只有团结没有斗争，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团结，这是“左”倾机会主义，但今天重点是团结。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重点还不会变。因此，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必须确切执行，这是我们的战略任务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我们一定要熟悉资本家，不熟悉不行。我们党员不熟悉资本家，怎能代表无产阶级？还指出，天津工作须重新安排，主要应该是工会工作与经济工作，但首先要搞好工会工作。过去市委不直接解决问题，一切通过区委去解决，那是农村工作方式，城市工作复杂，要明确分工。因此，组织要调整，干部要重新配备，领导方法要重新考虑。

4月19日邀请天津市工商业家开座谈会，参加的有李烛尘、周叔弢、宋棐卿、朱继胜、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等。刘少奇在发言时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指出：你们可以和贸易公司合作，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私营也只有和国营合作才行。谈到劳资关系时说：你们可以定厂规，经政府批准，就可以执行了。至于临时工，有些可变长工，有困难的就不变。

4月20日在天津市对内对外贸易负责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对内对外贸易对于国计民生影响很大，甚至会起决定影响。它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周转经济”。搞不好就会不利于生产，经济也不得周转。税收问题也是这样。贸易应当服从生产，不是生产服从贸易；税收也要服从生产，不是生产服从税收。如果不服从生产而单纯追求利润或收入，就是单纯财政观点，这是我们以前批评过的。贸易、税收扶助生产发展是大事，相对来说赚多赚少是小事，这就是小道理应当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当服从大原则，生产有公营有

私营，现在公私营是共同发展的。周转经济的贸易，国营和私营是平行的，不是冲突的。这里有一个“公私兼顾”的问题。贸易服从生产，包括服从私营生产，如我们在贸易上把私营工厂搞垮，这就是错误。记住“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两句话，要贯彻到底，不要违背，生产中有原料、制造和推销三个环节。国营贸易公司加强起来，如果不顾私营，私营就难以收买原料，所以国营贸易应当和私营的共同分配原料和市场。我们需要和他们结合，同时我们还要主动地避免和他们冲突，要和他们搞经济联盟，和他们全面合作。具体办法就是和他们划分原料和市场。但是他们也有可能故意和我们竞争，果然如此，我们应当先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如真要竞争，他们吃亏了就不要怪我们。关于猪鬃统销，资本家们认为太早了些。过早了，私人到乡村采购的积极性就不高。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让他们去做，你们贸易方面，以后一定要把公私兼顾的原则贯彻到各方面去。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从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参观天津市私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中共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

4月22日听取天津市军管会接管部摩托接管处、电讯接管处及冀北电力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等部门的工作汇报。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

视察仁立毛呢厂。

4月24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今后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天津。所谓管好，就是要把天津可能与必须改造的加以改造，并加以发展。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为了今后把天津管好，把关系搞好，使生产得到发展，我们要进行以下工作：（一）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需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凡不必需的东西，尽量不进口。（二）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物资周转宜灵活，过去是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在这方面又要与资本家商人合作。还应组织交易市场，组织农民物资交易所。这样就活跃起来了，从而刺激了生产，东西也多起来了。（三）必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四）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必须号召工人做到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应该规定一个劳资关系的处理办法，由军管会规定并宣布执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废除。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

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要搞好。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有纪律的组织，应合理的有系统的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组织好了就会有力量。组织起来以后，还要应用各种方法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城市工作中要彻底转变农村的工作方式，不要用农村的工作方式来管理城市。城市工作的特点是集中领导，区、街一级组织应是市级组织的派出机关，一切都要集中到市级机关，市一级的机构还要加强。

4月25日对天津市国营企业职工讲话，指出：“现在的工厂是国家的工厂，人民的工厂，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要把工厂办好，首先要你们和我们把关系搞好。怎样跟共产党搞好关系呢？首先，要采取老实的态度，承认真理，服从真理，拥护真理，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一切要服从这个标准，小原则

要服从大原则，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就是原则性。其次，必须搞好跟工人的关系。职员和工人统统是工薪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基本上都是劳动者。因此，职员和工人必须互相团结，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办工厂，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办事。你们过去如果有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自以为了不起，今天把这种观点改正，就可以改善关系。可以先由职员进行自我批评。你们自我批评之后，工人也会自我批评的。两方面都自我批评，就能够团结起来了。再次，工厂组织要改变，提高效率，过高过低的工资应该适当调整，冗员和特务、坏分子应该裁汰。这样一来，有些职员就会失业，我们政府应该想出办法来，给他们适当的安置。大家要爱护工厂，爱惜公共财物，努力为国家和人民的工厂服务。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的批示：“中央同意，望即发布。”指出：“根据平、津经验，军管会能很好地接收城市及工厂和资财，但军管会不能经营企业和工厂。放军管会在接收后，应迅速将企业、工厂和物资，分别交给各适当的负责的机关管理和经营。”“根据平、津经验，新解放的城市照旧收税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但旧的收税人员，因在群众中种下很大的恶感，群众不信任。故由旧人员去收税，普遍遭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后来委任我军人员任税收局长，并由我军人员带领旧人员会收税，发给我人民政府税收局的收条，人民才踊跃交税。这一经验，望记取。”

“城市解放后，许多房客不交房租，房东亦不敢收房租，因此人心长期不安。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对此不应缄默，长期不表示态度，应正式宣布除官僚资本之房屋应予没收外，一切私人房屋的所有权应予保障，房客应继续交纳房租，租金多少应由房客与房东议定。有纠纷者应由政府或人民法庭调解仲裁解决之。”“城市解放后，常有许多自发的工人斗争。有些工人、店员，在老板恐慌情绪下，分了店铺和作坊。我们有些区委和支部，亦任意处理劳资纠纷。因此，在城市中常造成若干劳资斗争中的无政府状态，破坏我们的政策。故在城市解放后，应重新发表新华社的‘二七’社论及其他若干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并须规定每个城市的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与管理机关的争执问题，均须一律经过市总工会及市政府劳动局审查和处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中，大多有大批冗员及官僚制度，例如工厂中的警卫科、厂警等，工人、职员十分不满，要求迅速改革。而这些人员和机构，也可以迅速改革。

故在确定工厂管理关系后，应即发动工人迅速改革这些制度，以利生产。”

4月26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解答问题时指出：我们把工厂里的职员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因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人民，同是劳动阶级，不要因为他们较接近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就将他们划成另一个阶级，不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样就会分裂工人阶级，造成基本的原则错误。工厂里的中高级职员，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既然都是靠薪金收入生活的，都是雇佣劳动者，因此容许他们加入工会，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4月28日出席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并讲话，指出：“工人要求得自己的解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长期的奋斗和努力才能做到的。因为他必须解放全中国其他阶级，不然，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农民，和农民联合在一起。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朋友，第一个同盟军。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朋友。而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的朋友，是第三个朋友。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队伍就大了。我们三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而国民党是集体的代表者。我们必须分清敌友。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那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但在联合当中不能缺少斗争。因此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但以哪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争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大多，大发展了，而是太少，大不发展”。“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在讲到国营工厂问题时指出：“过去是官僚制度的管理，组织庞大，压迫工人，这些要加以改良，要有步骤地加以整顿”。但改得太仓促怕会出毛病，因此要非常小心和谨慎。“我想现在可以作两件事：（一）工厂组织要精简，过去有些人是多余的，没有技术，是亲戚朋友拉进来的，应当裁撤。（二）劣迹昭著的（如压迫过人的反动分子）应当去掉。不要把工厂看成救济机关，它应当是生产机关，百救济机关可以另设。但这件工作怎么作呢？必须工人、职员团结起来，意见一致，提出意见，由军事代表、政府领导，把旧的改好，组织起来，以便于生产”。

4月29日听取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的工作汇报并讲话。关于办学问题，指出中心问题是私立中学，要想一切办法使其尽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奖励私人拿钱办学校；在大学不一定提教授治校，助教当校长不见得就差：可以提学术自由，这不要怕。关于报纸问题，认为报纸应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以人废言，共产党不是宗派主义的党，好的意见、办法部听，不闭塞言路。关于文艺问题，指出电影审查要快，有些无害的可迅速上映，不要怕太宽，只怕太严、“左”了；要奖励旧戏班演新戏，改革旧戏者要奖励、免税、或由政府津贴一点，已禁止的一些旧戏要重新审查开禁，目的是让戏班子有饭吃；只禁个别海淫的、政治上反革命的，其他可以不管，思想上有问题的不要禁，不能用禁止的办法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听取天津市贸易公司工作情况汇报。在汇报到天津市在粮和布的问题上曾与投机商作过两次斗争，利用物价波动抑制了它时，刘少奇认为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物价波动来打击投机，把钱赚到我们口袋里，基本群众吃了亏，事后可以救济。反对投机赚的钱，原则上投入工业，那就物价愈波动愈发展生产。还提出，当上层机构和生产发生矛盾时就应改造。可组织几个独立的专业公司，管生产，也管贸易，如花纱布公司管全国的花纱布，粮食部管全国的粮食，煤炭、盐等等都办专业公司，以便于发展生产。

听取华北总工会工作汇报。在谈到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化管理问题时指出，工厂生产的原料、制造、推销等详细情况必须使全体职工都了解，厂长订计划时必须与工会和党支部的负责人、工厂管理委员会共同制定，计划必须交工人或代表会讨论，制定计划之后必须向工人作报告、号召执行，这个过程的执行就叫做管理民主化。工会工作者不但要保护工人福利，而且要关心原料、制造、推销等问题，负责帮助厂长解决问题。在谈到要在私营工厂中取消包工头和让被开除的工人复工、临时工转正式工等问题时说，包工头问题很复杂，应慢一点取消。为了维持生产，应保障资本家有裁减工人的权利。失业工人可由政府办失业救济，按工龄长短分若干级。经费可以由资本家中抽救济捐，出人口收救济税。经费存银行，谁失业就救济谁，发半工资，实行社会救济。临时工转正式工应慎重，要与资本家商量，如因此工资增加大多，使工厂关门，不管理理由多大，就一切都错。

5月1日对路经天津的随军南下的东北干部讲话。指出：外来干部要注意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努力训练本地干部使之能代替自己，以便抽身到别处去。不要怕别人代替自己，宗派主义是阻碍新干部成长的，自己抽不出身，新干部生长不起来，中国革命无希望。维持城市人民的秩序，特别重要的是维持内部的秩序——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和军队里的秩序。保持优良作风，保持纪律，艰苦奋斗，自己内部不乱，人民的秩序就易于维持、恢复。还指出，城市工作，一个是接收，一个是管理。接收工作一般是不错的，全党还没有解决的是管理问题。搞好管理要有知识，有学问。我们的干部知识不够，要虚心地向工人、资本家、工程师、商人学习，如果不虚心，神气十足，一定要出乱子。

听取化工、织染等行业工厂的生产情况汇报。

5月2日在进出口贸易、染织、皮革、火柴等十多个行业的工商业家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目前的王要问题，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所谓生产，无非是指工业农业。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在百分之十的工业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私营的。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人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 and 公家的长期合作。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种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

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不过这应是双方的，不但我们的贸易公司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顾到国家经济，顾到国家贸易公司的利润。你要不照顾它，它便不会照顾你。在讲到劳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真正做到劳资两利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

5月3日在天津市教育界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大学的理科可仍照过去办下去，文法方面如法律系、政治系基本上要改。中学的经费可适当增加。不论中国人、外国人、资本家，办私立学校一律欢迎。在谈到思想自由问题时认为，思想是无法限制的，所以讨论可以自由，可以辩驳。真理不怕驳，马克思主义已有几十年遭到各种方面的批驳，如当作学术研究，对共产党的政策、纲领等都可以研究。如你的对，就服从你。不然，共产党也是无原则的党，象国民党一样，是要失败的。经过证明是真理，就相信，如不是真理，即使是共产党、毛泽东说的，也是错的。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混淆，要分开。如我推翻蒋介石，你组织游行、出报纸等拥护蒋介石，或假思想自由之名作拥护蒋介石、反共产党之实，那不行，这就是政治问题。

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及其所属各地合作社干部谈话。指出：你们现在可以办三种合作社：一、城市的消费合作社，要有单独的系统，不要与供销合作社混同。二、农村的农业供销合作社，或叫农民供销合作（以后者为好）。三、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以上三种合作社均应有各自的组织系统和各自的领导机关（运输合作包括在供销合作社之内）。它们大体按如下分工：一、消费合作社。现在主要是办工厂、机关、学校的消费合作社，开始不要办得多了，市民的消费合作社，有力量也可以办。消费合作社的业务，要看社员需要什么，合作社能办什么，而且又合算，就可以办。消费合作社把货物批发回来卖，也就是集体购买后再卖给社员，它代替商人，避免中间剥削，货物价钱便宜。这样，合作社就有很大的平稳物价的作用。二、农民供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大量业务是进行商品交换，即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收购农民的上特产品，供给他们以工业品，不仅供给生产资料如工具等，而且还可扩大供给消费资料。三、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为手工业者收购原料，替他推销、出口产品。合作总社办这样几件事：一是训练干部，训练各行各业的收购工作干部，办合作社大学；一是了解市场情况，通告乡村；一是在城市中设立机关，帮助推销，要设立各行的专业合作社，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急需设立经营机关。

给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秉卿写回信，对他四月三十日来信提出扩大生产、增设新厂的发展计划表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5月4日视察天津市容。

5月5日出席华北职工代表会议[1]，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并作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最近毛主席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就是说要搞好城乡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统一观点，哪一面或者哪一方照顾不到，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比如说如果把资本家搞垮了，如果工资提得过高，资方恐慌，不纠正就要发生错误。只照

顾资本家，不照顾工人和公家，也是错误。所以现在问题复杂，就是因为要照顾‘四面八方’。只利于工人或者只利于资本家，都是不对的。上次我在天津讲劳资两利，必须实行劳资两利，不然资本家关了门，问题就难办了。所以必须使他们的生产能够维持，要求不应该太高，应该让资本家的生产能提高，工人的生活也能适当的提高，‘否则资本家工厂关门，国家现在又不能接收过来，假如接收私人资本那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了，这是要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的。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报告强调，“发展生产，是全体人民的要求，是国家的要求，也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中国的生产要发展，特别是要发展工业。我们办工厂的人，如厂长、经理、资本家，统统都应有一个发展生产的观点，不能说只是厂长、经理的责任，我们工人，我们工会便不负责，这是不可想象的。工会和工人对发展生产要负责，要采取负责的态度，站在负责的地位。有些工会同志觉得发展生产不是我们的事，或只是帮助一下，这是不对的。对 [1] 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天津召开。私人的工厂以为发展生产只是资本家的事情；而不是工人和工会的事，这样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所以不论公营或私营工厂的工会同志，都须注意，使生产发展，因为只有生产发展了，工人的生活才能提高和改善，不然生活是不能提高和改善的。工会要保护工人利益，但生产不发展生活是不能改善的，利益也无法保证。这是个整个社会的问题。”报告提出，所有工厂，所有铁路，都需要组织管理委员会，还要建立职工代表会议。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由经理或厂长、工程师，及生产中其他负责人和工会在工人职员大会上所选出的代表（相当于其他委员的数量）组成。职工代表会议，也就是工会的组织，就是工会的代表会。厂长、经理拟出计划后必须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讨论，还要经职工代表会议通过，而且要召集工人大会作报告，征求工人的意见，并请上级批准。这样订出的计划，方能大家负责，一致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否与厂长负责制有矛盾呢？不矛盾。我们的工厂是厂长负责制，但怎样负责呢？就是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大家帮助厂长来负责。重要的问题，必须经过工厂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通不过时，厂长有最后决定权。有人说，要厂长负责制；就不要工厂管理委员会了，那是不对的。关于工会组织问题，报告指出：“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它要办的事情很多，要办合作社，要选拔厂长，要参加政府，……总之，有许多事要工人办。但怎样办呢？就要把工人组织好。”“如何组织呢？我想是否可这样组织：也按各种产业、各种公司，凡有全国性公司的，就组织全国性的工会。如全国的铁路总工会、纺织总工会等。没有全国性公司之前，就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以上指的是产业工人的组织。此外还有上千万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等，不能把他们放在大门以外。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仅是近两三百万的产业工人，但其他工人是产业工人的外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也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

晚上，在黄敬和李烛尘陪同下，会见开滦煤矿公司中方总经理余明德和英方总经理裴利那，了解开滦煤矿的情况。对他们说：共产党保护外侨财产和外侨投资。我们主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内外交流。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有顾虑，我们欢迎英国人到中国投资，保证你们的资金安全。

5月6日在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来天津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作了帮助，一是劳资关系问题，一是职员问题。经过这么几天，资本家

情绪安定了。现在的问题是工人不高兴，干部思想没有搞通，还需要好好说服。讲话中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认为国外矛盾即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现在还是主要的，所以我们还要和资产阶级合作，还要引导人民注意国外矛盾。我们不要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太强调，帝国主义就会插进来，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后备军。除开国外矛盾，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可以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在谈到职员问题时，强调要解决知识分子看不起工人的问题，要把工人的地位提高，摆在知识分子之上，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不要认为工人摆在第一位就辱没了自己。此外还谈了要排除宗派主义情绪，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等问题。

5月7日上午，离开天津去塘沽，视察天津碱厂。下午，到达唐山。晚上，听取开滦煤矿军代表汇报，在谈话时强调：在城市工作中，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开滦这个企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为了国家，为了工人的生活，必须坚持生产。这一点也务必向工人讲清楚，这不是为中外资本家生产，而是为自己的国家生产，只有坚持生产，才会对人民有利。

5月8日召开开滦煤矿矿工座谈会，在发言时说：开滦的事情，横竖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拿主意才是。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

5月9日视察唐山机车车辆厂，并为该厂题词：“发挥工人的智力，创造新世界。”

5月10日视察林西矿。

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现在已经最后地、彻底地要胜利了，以后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心在城市，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了发展生产，就要同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斗争。革命的敌人是三个，革命的朋友是四个，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要敌我不分。有的人认为打倒了三个敌人以后，还要打资本家，这样就打到朋友身上了，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等到将来发展到生产过剩，再限制，让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有的人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也是不对的，就经济地位而言，他们的工作、劳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要有自己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否则，就没有力量。工会要参加工厂的管理，共产党要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告诉工人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使工人懂政策，有步骤、有计划地改变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会后，离唐山回北平。

5月11日同朱德、陈云等参加在北平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

5月12日与毛泽东、朱德接见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讲话，主要讲了天津考察的情况。讲到青年团问题时，主张按生产单位组织，不必要在每个街道都组织青年团、妇联会和党支部。青年团和妇联会，都应该积极参加工会工作，不要同工会竞争或冲突，更不要同工会争会员。工厂里的工作首先是工会工作，工会搞不好，青年团及其他工作也办不好。

5月15日与朱德出席全国军工会议并讲话，指出：兵工同志对人民解放

战争是有贡献的，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仗打完了，我们要建设新的工业，要接管城市。马克思说过，要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但对银行、工厂等不要粉碎。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准备了基础。若干的改良也是必要的。应该粉碎的没有粉碎，或不应该粉碎的却粉碎了，都要犯错误。我们在接收城市时，要注意学习工业管理及邮电交通的经验，不能摆老资格。

5月16日、176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昌、汉阳、汉口。

5月18日批示“同意”中华全国总工会就重组党组干事会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党组干事会由刘宁一、许之桢、李颀伯、林锵云、蔡畅、李立三、刘子久、冯文彬、栗再温、肖明、黄火青等十一人组成；列席党组干事会议的有赵国强、狄子才、杨之华、陈用文、陈郗文、陆平、董昕、王亦清、高林等九人。十九日，周恩来批示杨尚昆办公室复函同意，并指定李立三为全总党组书记。

5月19日在北平市干部会议上讲话，结合天津考察的情况讲了城市管理及城市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等问题。着重指出党内实际存在着“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私人资本主义现在不只是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扩大。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

5月28日与朱德接见即将出国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并讲话，指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会，要用一切友谊、一切感情、一切方法与他们建立联系，联合起来。要大张旗鼓地去，大张旗鼓地回，把中国的革命、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意见在国际上做些宣传，把世界工人阶级的情形、大会的情况带回来向中国无产阶级做些国际教育。不然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就很难实现。

毛泽东在李立三于五月二十六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世界工联选举副主席和执委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提少奇同志担任工联副主席。”

5月3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

5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指出：“最近邹大鹏[1]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事关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最近 [1]邹大鹏，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什么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

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在党内存在的上述偏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1]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当天发出。毛泽东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通[1]即东北局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知。通知说：“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1]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起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大纲对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目的、组织机构及职能等作了说明。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

6月4日在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作关于财政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便于在许多问题上的集中和统一，避免自己内部的各自为政和彼此之间的磨擦斗争，而能互通有无和在对外贸易上共同协调一致，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这事很急迫，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因为军事上得到很大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如果要把生产搞好，许多事必须统一，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但需要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1]辰世，即五月三十一日。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是从现在就着手，直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还成问题。现在开始着手做统一工作，又怕统一得过多。中国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处理，如果把不可能或者是不需要统一的硬统在一起，事情就会搞糟。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并华东局、南京市委、华中局并转汉口，并告华北局电：“上海、汉口及南京、九江的对外贸易，应力求有准备地迅速地恢复，应立即设立对外贸易管理处管理其事。”“华北人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暂行管理办法，你们可以采用，但有些货物的统销不要过早，华北统销过早，以致阻碍某些出口货物的收集与出口，后来又不得不允许私人经营”。

撰写重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校阅序言，“为了减少错误，我校阅了一次，并作了若干修改。由于此文写得太长，有些地方很不好读，意思也不明显，并有些重复，故在中间删去了几段，并将最后一段删去。此外，又

将我在一九四一年写的《人的阶级性》一篇短文附在后面，对这篇短文我作了一种原则性的修改。”

6月7日同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陈嘉庚<sup>[1]</sup>，就国内外局势等问题进行交谈。

6月8日就合作社的赢利分红问题复信毛泽东，认为合作社是否分红应分别不同情况。集体劳动的生产合作社，是可以而且应该分红的。但消费合作社则在原则上不应该分红，“消费合作社不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建立在赢利分红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消费者联合起来，共同地比较廉价地去购买消费品，免除<sup>[1]</sup>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商人剥削的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就要使消费合作社在基本上犯错误。”为农民及小手工业者销售生产品的销售合作社，是可以也应该把赚来的钱分给那些拿出产品之农民或手工业者的，但是在原则上亦不应分很多红利。手工业集体劳动的生产合作社，应该分红，因为这些利润是社员劳动创造的。

6月11日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

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颁布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

6月15日—19日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这次会议所以称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区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6月中旬与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和苏联政府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

6月为准备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撰写报告提纲。提纲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以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由这“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提纲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是：“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

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这就是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提纲指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这个提纲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

6月21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高北平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1]、王稼祥[2]。

6月26日到达苏联莫斯科。

6月28日斯大林。莫洛托夫[3]、马林科夫[4]、米高扬等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

7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等问题。

7月3日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

7月4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中国将实行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平[1]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2]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3]莫洛托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4]马林科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互惠地与各国通商贸易的外交原则；毛泽东将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后公开访问莫斯科。

7月6日致信斯大林，提出中共中央代表团拟在莫斯科学习苏联以下问题：（一）苏联的国家机构；（二）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三）苏联的文化教育；（四）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学习的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包括部长会议、内务部、教育部及文化高级机关、外交部、国家计划局、银行、合作社、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党的组织部。工会、青年团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以至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等，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信中还提请苏联政府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作出帮助，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工作等。

7月10日应邀到斯大林在孔策沃附近的别墅参加宴会。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出席。

7月11日应邀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商谈。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

7月15日——26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负责人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

7月18日和高岗、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参加十一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与斯大林谈话的情况。

7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任弼时血压仍有一百九十以上，稍劳即增高，罗荣桓病加重，两人均不宜远征治疗。要求根据商定的专家名单，向苏联提议先派两位名医来给任、罗治病。

7月25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一）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二）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为适宜。（三）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作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四）同意派邓力群[1]到新疆建立电台联络。（五）同意苏共组织摄影队随人民解放军行动去拍摄电影，如有必要可组织三个至四个摄影队，四个野战军各派去一个队。

与高岗、王稼祥电告中共中央：“给弼时和荣桓的医生正选派中。”

7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订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2]率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7月27日和高岗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对中国的革命给予高度评价，并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

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货[1]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员，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由苏联莫斯科到达新疆伊犁（今伊宁）。

[2]刘亚楼，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款协定。同日，高岗回国。7月3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刘少奇可先回国，留王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诗[1]等接洽创办空军、海军两校事完毕，待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后再去苏联；同意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

8月1日周恩来电告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张学诗等定于八月一日由北平动身前往苏联。

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我们完全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2]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

织共同委员会，请柯兄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

8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刘少奇、王稼祥：近来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下游沿岸几个大城市各码头及铁路矿山上空轰炸扫射频繁，造成很大侵扰和损失，甚望苏联三百六十门高射炮能提前订货并早日运来，请与柯瓦廖夫一商。

8月7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六日来电的请示意见。同意“中国大学[3]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

[1]张学诗，当时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

[2]柯兄，即柯瓦廖夫。

[3]中国大学，即后来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全文，望即照此签字。回国经过东北时，同高岗、李富春[1]商定具体执行办法。

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王稼祥：我们对与东欧各国通商问题，原则上早经同意，望转告匈、波、罗三国党，我们欢迎他们派代表来北平商谈通商及其他一切有关事宜。

8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关于组织高射炮兵团的方案，对苏联派指导人员来训练我炮手表示非常欢迎。再提出购高射机枪三百六十挺，并配弹药。

8月12日与王稼祥听取刘亚楼汇报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

8月13日与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

8月14日离莫斯科回国。致信斯大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王稼祥留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待至八月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并征询斯大林关于将在中国召开的亚洲职工代表会议、亚洲青年代表会议、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意见。

8月21日到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致电斯大林表示感谢。

8月25日到达沈阳。

8月26日电告中共中央：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二百二十人，于二十五日抵沈阳。拟于二十七日开欢迎会，由刘少奇作关于与苏联专家合作问题的报告，刘与柯及高级专家三十人准备于二十八日一道去北平。

[1]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8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一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国际形势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国家就要有一套知识。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但还要靠自己努力学习得快一些，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在讲到城市工作时指出，中央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今天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仅对国计民生有利，而且会使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更快一些。要搞工业化就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工业化后不搞社会主义就要成为帝国主义。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着重讲了要注重实际，不要看重形式、着重选举而流于形式主义，根据现在情况，这些人民

代表那怕是推举的，只要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形式，只有人民代表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讲到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时指出，中国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而且我们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要想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也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言必称希腊”那就变成教条主义，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决定；

当晚，离沈阳回北平。

9月3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苏关系的报告，指出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苏联要派大批专家来，中国的同志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

9月13日复电苏联职工总会主席古兹尼佐夫：“由于世界职工联合会已经决定并且公布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中国召开亚洲各国职工代表会议，中共中央认为这个会议仍应如期在中国召开。它的筹备工作不应停止，开会地点亦不应改变。中共中央认为亚洲职工代表会议对于那些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亚洲国家的工人群众，只应作一般的号召，而不要去进行任何组织工作，因为对于这些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需要根据这些国家的特别的环境，采取另外秘密的方法去进行，才能有效，公开的亚洲职工代表会议是不能担负这种任务的”。“中共中央希望古兹尼佐夫同志能促成世界职工联合会及苏联总工会先派一二位负责的代表立即来中国，以便与中国总工会的负责人进行协商”。“今年十二月在中国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亦应该依照上述方针来进行”。

就《华北局关于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致信薄一波：“你们发表这个决定是好的。有以下几点意见，请加以修改，再送我一阅，即可发出。（一）请参照政协共同纲领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央最近发出的指示，加以修改。（二）要保障党对各界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但代表中党员不要太多（此点中央已有指示），应写一段。（三）代表产生方法，只说普选不够，应有具体规定，如村代表以人口为比例由公民小组选举之，区、县代表以人口为比例由村人民大会选举之等。又各人民团体代表与地区代表的比例亦应有规定。但选举时可不进行公民登记，不投票，用举手及其他方法选举之，力求选举有代表性的人物。（四）下级代表大会选举之政府委员会须经上级政府加委，但下级人民代表大会撤换政府委员时，则不要由上级批准。如规定撤换也要上级批准，就不好办。”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同意立即颁布施行关于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及农协章程。

9月15日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快要胜利了。现在，以前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人都来了，我们不要讨厌他们，要团结他们，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实现对他们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方针，必须执行。不执行，胜利就不能巩固。这次统战工作，是以我们为主。我们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正确执行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群众路线。

9月17日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周恩来

代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所作的筹备工作报告；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的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刘少奇出席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代表中国共产党作题为《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讲话。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在今天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有它的坚固的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即将由政协筹备会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共同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

9月22日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政协筹备工作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9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你们来电所提问题，有些提得不妥，在方解放的城市，可用指定和邀请的办法召开各界代表会，等到城市人民团体已经组织起来或原来就有组织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就主要是由各人民团体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与有无名义上的军管无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之间，也不应再行划分什么区别。但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在职权上及代表选举方法上则应有区别，人民代表大会是全权的，其代表主要应由人民直接选举或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而不是由各人民团体选举。因在东北还没有经验，目前还不宜普遍召开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暂时召开几次人民代表会议，逐渐扩大代表会

议的权力，待有了经验之后，再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废除、修改或令其停止执行的权力。而不要规定一律须经上级政府批准。下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人民政府，须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的发言。

9月24日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的发言。

9月25日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的发言。

9月27日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还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9月29日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名额；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协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否认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等议案。

致信周恩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应保留十分之一的名额，给待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这些名额的具体名单，由全国委员会决定。此点请提交大会决定。”9月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会议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会议还通过《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下午六时，出席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0月1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初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并草拟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人选名单。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初拟名单，提请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协商提意见。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确定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

10月5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生产只占总生产的十分之一，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今天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人民经济，使中国工业化。但是，如果没有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完全友谊的帮助，那是要困难得多的。例如：我们铁路的很快恢复，就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又如鞍山、石景山等钢铁工业的恢复、有了苏联的帮助，就要快得多。所以苏联对中国人民真诚友谊的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和珍贵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10月7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党组举行的党员大会上讲话，阐述建国以后必须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要不要统一战线，不决定于胜利不胜利，而决定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今天无产阶级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无产阶级，全国人口四万万五千多万，而共产党员只是三百万。工业不发达，生产量不大。这些条件决定了党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必须联合农民，联合各民主阶层，联合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其中包括过去跟我们打过仗现在觉悟过来脱离了反革命阵营的分子，如傅作义、程潜等。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此是不应该动摇，不应该怀疑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中国人民有利。

10月9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李济深、王昆仑、蒋光鼐、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郭沫若、马叙伦、张奚若、杨秀峰、乌兰夫、朱德、林彪、刘宁一、邓颖超、冯文彬、沈雁冰、梁希、吴鸿宾、陈嘉庚、邵力子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0月11日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任务，就是把一两千万工人分别组织到工会中来。工人阶级的中坚队伍是产业工人三四百万人，是工人阶级中最进步的一个阶层。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

10月19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0月20日出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向待解放区进军和军队建设问题。

10月22日会见来中国筹备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的苏联工会代表别列金、久金，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在革命尚未胜利的亚洲国家

中，革命策略的运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亚洲与欧洲情况不同，被压迫的人民无任何合法权利，这些国家中的人民起来就会发生武装冲突，武装斗争已经是或将要是有些国家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国革命在最近二十二年中主要是武装斗争，在乡下进行武装斗争，在城市进行秘密工作。

10月23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同陈绍禹[1]谈话，指出陈绍禹不尊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承认错误的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二十六日，将同陈绍禹谈话的情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政治局会议认为刘少奇对陈绍禹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

11月7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大会上发表《论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的演说。

11月10日在中国劳动协会[2]代表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国工人运动中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它的工作结束后，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组织各种工会，团结全国人 [1]陈绍禹，即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2] 中国劳动协会，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一九四八年八月，以朱学范为首的劳协成员代表劳协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布劳协作为团体会员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劳协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结束劳协组织活动，其工作人员和部分会员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组织。民，把国家建设好。工会工作做好了，不仅对工人有利，对生产有利，而且对全国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它可以使全国其他阶级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11月11日复信陈明仁[1]：“来函奉悉。所言湖南省政方针及贵部军队整训计划，均甚得当。望与湖南各同志密切合作，努力进行为荷。”

11月12日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报告筹备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和建校计划。

11月15日为欢迎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以及苏联、印度等国来北京出席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致欢迎词。

11月16日——12月1日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亚洲、澳洲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一百一十七人。在十六日的开幕会上，刘少奇作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并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说：“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今天能够在中国召开，这是由于亚洲和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强大发展的结果。这是世界工联所领导的世界民主工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反对美、英、荷反动工会领袖的分裂政策，坚持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统一，以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与工人阶级权益的一个伟大胜利。同时，这也是由于中 [1] 陈明仁，原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和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国人民大革命在中国这一块广大的土地上获得了决定胜利的结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无疑的，它将推动亚洲、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广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并在国际工人阶级亲密团结的基础上促进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团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

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

11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电，指示应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组织。指出：“在少数民族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他们以前组织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又成立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所以现在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基础。现在开始这种建设，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新疆组织，并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步骤是：首先成立受西北局领导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分批介绍本地的先进分子入党，然后派他们和外来的党员一起到新疆各地去建立那里的党组织。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共后，并不要退出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关于新疆的社会改革，应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的，然后才能确定政策口号与时期，而且必须在各不同民族中采取不同的改革政策。

11月23日在北京各界力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召开而举行的集会上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为尽快恢复经济而努力工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获得了一切政治自由，并已取得了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团结国内一切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自己未来的幸福的生活。”

11月2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定于十二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代理。

11月28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同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薄一波、饶漱石、邓子恢等研究一九五一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

12月1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举行的集会上讲话，论述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形势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运动是或者应该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是或者应该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具有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它不能也不应该脱离民族解放运动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它不能不去过问、参加并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只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运动才能发展和胜利。”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电：“关于纠正乡村工作干部不良作风决定经中央审查，认为可行，拟即由新华社公布。除在华中各省实行外，华东、西北、西南及其他有类似情形的地方均须注重纠正同类错误。尤其是乱打、乱杀、乱捉必须防止及禁止，决不能放任。”

12月2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每年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通过了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并任命了东北人民政府和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12月4日复信陈步舟[1]：“先生父子近年失业，生活困难，极愿有所帮助，但因目前国家困难甚多，原来公务人员失业者甚众，故现今找一有薪水之事，极为难得。而我们革命组织人员，则大多实行无薪水的供给制，个

人生活虽可勉强维持，赡养家属则不可能。供给制将来亦需改为薪水制，但在一二年内，国家财政还无力负担，总在一二年后才能改制。公子曼伯如能不怕艰苦，则可先进湖南现有之革命军政训练班，受训半年，然后工作，而这种工作，现在是没有薪水的。”

12月6日同朱德、周恩来去西直门车站为毛泽东出访苏联送行。毛泽东于十六日到达莫斯科，准备同苏联领导人讨论有关两国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由于苏方拖延，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才正式开始。

12月8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致林彪[2]、谭政[3]、刘伯承[4]、邓小平[5]并告陈赓[6]电：

“（一）两广战役即将结束，陈赓所部休息十天至半个月，然后进兵云南，解放云南。休息地点望林、谭指定，并应给予充足的营养，以便恢复体力。（二）陈赓部由广西进军云南的道路及沿途准 [1] 陈步舟，是刘少奇的旧友，当时失业。他给刘少奇写信，反映生活困难，要求为他的儿子曼伯安排工作。

[2]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3]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4] 刘伯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5] 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6]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备，望刘、邓提出意见。据说百色地区瘴气甚多，饮水恶劣，不宜行军，果如此，则以经贵州进入云南为宜，望陈赓及林、谭即进行侦察并将情况及意见报告军委和刘、邓，以便早作决定。”

12月15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对云南事件的分析及处理办法是正确的。用你们前线将领名义批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任命各将领与中央政府组织法亦无冲突。目前我军既无法进入云南，一切只好让卢汉[1]自行处理，以免引起紊乱。”

12月19日在海员工会、店员工会会议上讲话，阐述了两个工会当前的任务。

12月21日起草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名义致毛泽东的电报：“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从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气不好，并准备一个月时间来回坐火车。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12月26日会见来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印度、越南等国的妇女代表，向她们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并回答了她们提出的问题。

[1] 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率部在昆明起义。

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胡志明[1]电：“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中共中央同意你们的提议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亦可能在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陆续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此事，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建议：即由胡志明同志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发一公开文告声明，愿意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准备派到越南的代表暂时仍采取秘密的形式。”

12月31日在干部会议上发表除夕讲演，指出：“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但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最大的问题，还是恢复经济，克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及各级人民政府，要一致努力，忘我地工作，牺牲奋斗。只要生产恢复，不打仗了，把交通恢复，没有开的工厂恢复开工，财经困难便可以克服，人民生活便可改善，胜利也就更加巩固 [1]胡志明，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印度支那共产党原名越南共产党，所以当时通常仍称它为越南共产党。

## 1950年五十二岁

1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元旦题词：“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一九五〇年就要在基本上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胜利。同志们！同志们！为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历史性的胜利而奋斗啊！”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藏民部落等少数民族事务问题给西北局、西南局的指示：少数民族事务必须细心地注意处理，处理的原则应该是向各少数民族极力表示好感，多和他们发生关系，不侵害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论他们是上层或下层，是僧侣或平民，如此去求得多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弄好关系，安定他们，然后再慢慢地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干部。待他们的干部成熟，情况了解，群众中有了准备，才能雄得上他们内部制度的改革。

1月2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向苏联政府要求在新疆设立开发金属、石油的中苏合资股份公司，并提出：“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木会要求我们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

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作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作这种要求的。”

1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部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十一省应该准备在一九五〇年秋后分配土地。在宁夏、青海两省完全汉人居住的地区亦须准备秋收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则不进行。在贵州、云南、四川、西康<sup>[1]</sup>则在一九五〇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一九五一年秋后来进行。”十日，收到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少奇同志：一月四日中央发各中央局关于土改及征粮等项工作的指示很好。请你们考虑可否要各中央局将此项指示电转发给各省委研究，并要各省委向中央局及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些电报收到后，由你汇编告我。”十一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一月四日中央发给你们关于土改与征粮等项工作的长电，请你们转发各省委研究”。

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苏谈判有关问题的情况和意见。

1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地方性敌伪起义事件给中南局等的指示：“关于靖西伪专员赖慧鹏及百色伪专员陈汉流宣布起义事，应视为地方事件，即由地方处理，他们的通电如须发表亦只在地方发表，而不要在全国发表。以后各地发生此类事件，除个别特别重要的少数民族起义须由中央宣布并答复者外，均由地方答复处理。对于这些起义事件的处理方针，应该是力求不用武力解决，而能彻底改编他们的部队，接收地方政权。如有拒绝调动改编、拒绝接收者，则必须坚决用武力解决之。”<sup>[1]</sup>西康，旧省名，一九五五年十月撤销，辖区划归四川省。

1月13日复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意出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并将书名改为《论党》。

致电毛泽东，提议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分配前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存放在上海准备用于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物资，经毛泽东同意后，于十六日将这一决定电复中共中央华东局。十八日，复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美经合署物资应无条件交给我们分配，而不应成立联合分配委员会。如他们提出成立此委员会应加拒绝。如他不无条件交出，我们在适当时机应由军管会直接征用之。”

1月14日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递交的国书，并致答词。

1月1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知罗贵波为中共驻越联络代表。在罗贵波赴越前，刘少奇多次同他谈话，就任务和工作方针等问题作了指示。

为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职工委员会之组织名单》，指出：“必须由党的负责同志参加职工运动，然后才能将工会工作做好并动员工人群众来完成工业生产计划。”

1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转张闻天电：“中央与毛主席及恩来同志商量后，今日已发表任洛甫[1]同志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首席代表，并已通知联合国。”“洛甫同志为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事，已与各党派协商，各党派均同意，待中央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其它人员，外交部正在准备组成一个强的班子去。”

1月20日致电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派代表参加法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1月23日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谈关于东北地区农村工作问题，指出：“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现在这种农户大概不会超过农民的百分之十。其中真正富农所占的比例，必然更少。”“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正因为是两个阶段，所以不能混为一谈，转变的早了，是不对的。”“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培育农民的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

1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今后土地改革，以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组织的土地委员会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协委员会来直接指导执行”。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军西藏及有关问题的指示。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南局电，指示要热情欢迎秘密来华访问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在他到达武汉后，你们可和他商量是否能在北京公开欢迎他，看他意见如何再作决定。你们对胡同志应热情招待，周密护送来京。”

1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将会议同意这一草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1月28日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递交的国书，并致答词。

1月2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征收公粮问题的指示，批评了某些地区对地主征粮过重的缺点，指出：“只有我们的政策是实际上行得通的，没有畸重畸轻的毛病，征粮任务才可能完成。”1月30日同朱德等设宴欢迎胡志明访华。当晚致电毛泽东，报告胡志明来访情况：“胡志明同志今日已到北京，晚间政治局设宴招待并进行谈话，他作了简单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要求。我们除盛赞越南抗战成绩外，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他离开工作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十七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六十，身体瘦削，但尚健康。”根据胡志明的要求，刘少奇安排他于二月三日晚间乘火车去莫斯科。

2月1日就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致信陆定一、胡乔木[1]：“中国的文字改革，尚无定案。但现我们亚洲邻国蒙古、朝鲜、越南的文字改革均已成功。在某一方面来讲，他们的文字已较中国文[1]胡乔木，当时任新闻总署署长。字为进步，而他们原来是学并用中国文字的。”“我们的文字研究者应即研究他们的字母及文字改革经验，并可派学生或研究工作者去这些国家学习，以便为我们的文字改革制订方案。”

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转张闻天：“中央及毛主席的意见认为你担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是适宜的。希望你不要辞谢，并请你于二月上旬到北京研究出席联合国各项有关事宜，准备随时出国。”

2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粮食问题给中南局等的指示：“必须切实保证本地人民需要之食粮，再将多余粮食运出口。否则，当地公粮亦不得完全运出口。如此，出口粮食必然不够，则应尽可能调用交通不方便地区之粮食，而不可把交通方便地区粮食调空。如仍不够粮食出口的需要，则应从各地人民食粮中普遍平均抽调一二成，而不可将少数地区的粮食抽空。”“为了使公粮调运能够合理，并为了向群众作充分的解释，使群众了解全般粮食情况，号召群众支援人民解放军及城市人口的食粮而自愿赞助粮食合理的出口，必须普遍召开省县和区乡的人民代表会议及农民代表会议，以便对粮食出口及公粮平价售卖问题作出决定，而不可由少数人作出决定。”

2月6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关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革大政治研究班已在党外人士中建立了一些信仰，拟继续扩大办下去，各地高级军政旧人员及知识分子愿来学习者，可以送来。”

2月7日在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关于一些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欺压群众的恶劣作风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对于以上较为严重的事件，应交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及人民监察委员会加以调查，弄清事实，并给以处分（须本人到场）。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处理的事件在报纸上公布，在群众中树立党与政府的纪律的威望，而不要把这些隐蔽起来。”

2月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有关中苏谈判的文件，并将情况电报毛泽东。

2月12日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了在新解放地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和政策：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九省和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汉人地区，凡是准备工作已经充足、群众的觉悟与组织已达应有水平的地区，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1]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则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另行决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之前，应一律实行减租。同日，将这个文件用电报抄送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周恩来审阅修改。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同意。这个文件后经各党派协商会议和政务院第二十一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于二十八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名义发出。

2月14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座谈会，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其议定书，并将与会者同意立即签字的意见电告毛泽东。当日，这三个文件在莫斯科签订。根据这些协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在一九五二年之前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 [1]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 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贷款三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百分之一）。

2月15日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举行有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外交使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参加的庆祝宴会，并发表演讲。指出：“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是久已存在的，然而，只有到了今天，由于中国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这种深厚的真诚的友谊，才用条约的形式把它确定与固定起来，因而就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接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公使夏法朗柯递交的国书，并致答词。

2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二月十八日寄来的综合报告及你在二月六日向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纲，均已阅悉。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的方针，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之实施。”

3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赓[1]、宋任穷[2]并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分局电：“我已解放云南、广西，东南亚各国首先是越南和缅甸两国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军将有人到滇桂要求发生关系。现越共中央已与我建立关系，他们并可派领事或其他适当代表到滇桂两省驻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中央与我尚未建立经 [1]陈赓，当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2]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常的正式关系，如果他们派人到滇桂两省建立此种关系时，我应给以热烈欢迎和帮助，在将来他们亦可能派遣适当代表秘密地驻在云南或广西。”

3月4日同朱德等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京。

3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电：“你对越南情况的了解及对中央的建议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大体了解一般的情况，然后对急需解决的问题和急需中国的帮助先进行研究，听取越南同志意见，即就若干问题提出意见，以便加以解决。例如他们急需的军火帮助，交通运输组织的建立以及其他问题等。第二步就战胜法国帝国主义所需解决的各项根本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例如建立主力部队及党与政权问题等。”

3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必须给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的人员以热情的招待和兄弟般的帮助，鼓励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细心地答复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示冷淡和骄傲。”

3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时能及时地加以镇压。”

3月24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题词：“继续提高技术，以便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3月28日修改并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中苏签订关于新疆石油与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表后，已经在北京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怀疑这两个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及向人民政府请愿者。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合股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赁合同。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关于这些，中央准备作出适当的解释发表。”

4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上海市委电，同意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上海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并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后，正在努力整编核实军政人员，以便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同时整顿全国税收，严防漏税及贪污现象，以增加国家收入。现在国家每月

财政收支已经接近平衡，只要今年不再发生全国性的大灾荒，物价即可能稳定。”“国家税收必须按月按季切实征收，但有某些征收确实过重，因而妨害于国计民生有利之工商事业者，应酌情减轻，税收机关的征收方法不善者，应尽量改善。”

4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罗贵波电：“越南同志向你提出许多问题，你可就你所知道的尽量予以答复和讲解，不知道的就不要任意答解。关于毛主席军事思想你可就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中十条军事原则加以解释，并可将古田会议决议及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介绍给他们。”

4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停止执行退还押金口号的指示：“退还押金口号应即停止执行。因事实上有许多地主特别是小地主无法退还押金，势必走到农民逼索，走到无计划地没收地主浮财，以致乱打乱杀。而地主的浮财除房屋、牲畜、农业工具及多余粮食外在将来我们也是决定不没收的，乱打乱杀我们是必须避免的。因此必须停止退押，才能确实避免这些。”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胡志明电：“我们已派定一个兵团司令员韦国清[1]同志到越南，协助你们创办军官学校并建立正规军，他现有病，还须休养一短时期，大约在一个月內即可率若干军事干部及学校干部起身赴越南。你们为老街及高平战役所需武器及干部的帮助，已令云南及广西准备，并有一部已集中在开远及碧色寨，你们部队开入云南广西训练的计划，亦已令两省准备中。”

4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加强青年团、工会、农会工[1]韦国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委员。作的指示，指出：在新解放地区，目前党的组织工作除开整顿干部作风、吸收少数先进分子入党而外暂时不是很多。因此党的组织工作人员可以较老区少安置一些，而应把工作人员安放在工会、农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中，首先把工会、农会、青年团的组织充分发展，工作做好，并依靠这些群众团体去完成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同时也为将来大量发展党员造成适当的条件，以便在两三年以后能够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各新解放区强大的党的组织。这应该成为各新解放区党的组织工作方针之一。为了使工会、农会、青年团成为新区社会改革的可以依靠的组织，各级党委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这些团体的工作，特别是青年团应该成为党的最亲密的最可靠的助手，应该加强它的工作。

4月17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并讲话，指出：“我们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其目的就是要使中苏两国人民互相了解。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外交，而是兄弟般的互相帮助、互相了解的老实的工作。”

4月19日修改和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加写了如下一段话：“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并华东局电：“中央已决定救济失业工人。现全党已号召全国在业工人捐献一天工资，人民解放军每个指战员捐助一斤米，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捐助一二斤米，作为临时救济。除此以外，中央人民

政府拟即颁布法令，在各城市劳动局中组织失业工人救济处与劳动介绍所，并规定统一办法，由政府及资本家与在业工人出钱对失业工人作必要的救济。”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海部队在琼崖纵队接应下，于四月十七日在海南岛登陆成功。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野战军部队与琼崖党、军关系问题的指示，指出：“双方的领导同志与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向自己的干部和党员切实说明两方同志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在彼此的关系上采取谦虚谨慎和学习的态度，鼓励对方，帮助对方，以便建立双方亲如兄弟的友谊与合作。”

4月29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发表演说，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一节的意义和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分析了当前存在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有利条件。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面临的任務：（一）解放台湾、西藏，肃清土匪、特务，巩固国防；（二）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三）某些生产的转业与私人资本的出路；（四）救济灾民，救济失业工人；（五）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六）认真地纠正缺点错误，整训干部。指出：“如果我们的工作作风更好一些，我们的缺点错误更少一些，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那末，我们就能更好地团结全中国的人民，就能更高地鼓舞全国人民的热情，就能增加人民更大的力量，就能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快地渡过目前的困难和创造美好的将来。”这个演说编入《刘少奇选集》。

5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南局等的指示：“关于退租问题，据中南方面反映，有许多地主已无存粮，一时退不出，亦望你们注意。我们认为现在亦可通知各地暂时停止退租。凡地主确实无粮，老租未退或退不够数的，可由地主打借条，保障在今年秋季收租时照退，并承认去年没有依法减租的错误。如此，把退租运动暂告一段落，以便集中注意去进行春耕和准备土改。”

复信给二姐刘绍懿[1]：“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过去是剥削了别人。乡下现在要减租退押，也是对的。你们应该照减照退。”“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

5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电：“越南同志对中国党和中国党的干部一般还是不很了解的。同样，我们对他们也不是具体了解的。在这种互相不大了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应有的误会和过份的警惕。此点望你加以注意。但两国党及其中坚干部都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在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现在也是相互信赖的。此点，你亦需加以注意。”“另外，韦国清不久亦率军事顾问团去越南，负责在军事上帮助他们，陈赓和宋任穷则不能长驻越南，只能在必要时去越南一转，他们的任务是在后方帮助越南，不能代替你的工作。韦国清因要集中注意在军事方面工作，亦不能代替你。你的任务现在实际上是，将来名义上也是驻越南的大使并兼中国党驻越南的代表。”

5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安东[2]经常有船来往，在适当码头附近设一个海员俱乐部是很有必要的。因海[1]刘绍懿，在土改时定为地主。

[2]安东，今辽宁丹东。员在船上生活，靠码头时总要上岸游玩，海员工会正须要加以组织，并就此教育他们。”

5月1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南局电：“湖南省既有许多地区还未进行减租或未彻底进行减租，应同意省委意见暂时不一般停止减租”，“又有些地区据报减租已经彻底，又有些地主家中确无存粮，只要这些地主不十分反动，应允许他们打借条答应在今年秋收时照减并照退，即可停止斗争或逼要。而只对那些确实有粮，又十分反动的地主，才继续斗争，如此，可减少斗争对象，不致使乡村过份紧张。”

5月1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参谋会议上讲话，着重论述了干部教育问题。指出：“部队和地方的老干部，是我们党的精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骨干。”“但也有缺点，就是文化水平低，技术知识少，业务能力差，因而应付新的工作有困难。军队干部虽然打过仗，有作战经验，但缺乏国防建设的知识，应付不了新的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现在已有这样的条件，国家可以拿出一笔教育经费，花三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军队面临的新任务》。

5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电：“越共要求一九五一年北面军援计划，待参谋部研究后再复。当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不能办到者则无法供给。所提物资中有布疋、药品、器械等，如越方没有或缺少物资交换，暂时亦可作为军援。待将来双方贸易有可能，越南能付出物资时，可要求他们偿付一部分物资。但现在他们既没有可能偿付，我们亦不要提。现在我们应集中注意有效地援助他们战胜帝国主义，其他的问题都可放在次要地位，在以后酌量和他们商量。”5月20日就供销合作社免除商人中间剥削问题致信薄一波[1]和刘澜涛，指出：“创办合作社的目的——供销与消费合作社的唯一的目的，就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商品交换行为中，不假手于商人，而由消费者和小生产者自己联合的行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合作社的正当利润不能说是商人的中间剥削，是无须解说的。所以不能说，创办合作社为了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是错误的，是一种“左”的思想’；也不能说，创办合作社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自然，在今天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合作社与国家商业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业的。私人商业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大量的商品还要经过商人的手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因此，这些直接间接经过了商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获得者，就还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而在目前，企图用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去全部代替私人商业的思想，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左’的思想，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

5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赓、宋任穷并西南局电：“越南来滇部队整训，主要以进行老街战役为目标，望用心协助他们，使他们在老街战役中获胜。目前部队整训和装备，将来作战指挥及后方勤务等，陈赓同志均有亲自前去协助之必要，望加准备。”

5月27日对重工业部反映湖南锡矿山锑矿矿区破坏严重的报告批示：“根据土地法，大矿山为国家所有，应即宣布锡矿山矿区土地所有权（除耕地外）为国家所有。由中央人民政府重工[1]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业部及中南军政委员会

与湖南省政府派人（何人为主由中央重工业部具体决定）组织锡矿山锑矿公司去管理。由公司定出开采规则，私人采矿者仍允许其继续开采。但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所定规则。否则，应予处分。过去矿区所有主的主权即予废除。”

5、6月间写作《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文章论述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步骤等问题，指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务；革命胜利以后，必须集中力量发展近代化的经济事业，这是提高人民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文章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首先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6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六一国际儿童节的题词：“重视儿童的权利，保护儿童的健康。”

6月6日——9日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六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阐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目的，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债务问题、人民法庭问题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强调土地改革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条件之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会议确定，要做好土地改革、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会议一致同意刘少奇等人的报告。会议还决定成立刘少奇负责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审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

6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最近由于若干下级党委和干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不慎重，不将所要处理的问题向上级报告和请示，因而发生了不少的事件”。“以后各地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应集中由各中央局处理，重要的问题则报告中央处理。如遇紧急情况发生，各地除立即向上级报告和请示外，各地亦应只作防御和退却的处理，不得采取进攻的步骤。此外，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必须首先了解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并从各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决定当地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工作步骤。必须严格防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

6月14日——23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十四日，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目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报告共五个部分：（一）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二）土地的没收和征收；（三）保存富农经济；（四）关于分配土地中的若干问题；（五）在进行土地改革时若干应该注意的事项。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

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二十日，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法（草案）》起草修改情况的说明报告。二十二日，就会议对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了结论。会议讨论和同意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

6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赓电：“你去越南，除与越南方面商谈和解决若干具体问题外，主要任务应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项情况在内）及我们可能的援助（特别注意物资的运输条件）拟定一个大体切实可行的计划，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分别先后运送各种物资，并训练干部，整编部队，扩大兵员，组织后勤，进行作战。这个计划必须切合实际，并须越共中央同意。”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并转越共中央电：“现在援助问题的中心关键是运输问题。由广西到边界的公路现已修好，云南到老街的公路七月底八月初亦可修好。但越南境内目前运输力据说很低，每月只能运二百吨，我们以前运到边界的物资，很久未运走，现仍藏在山洞中，而且何者应先运，何者后运，亦无人计划指挥。因此使许多物资不能运到。”“望罗贵波即商同越共方面立即将越南境内运输路线组织好，并派人指挥”。

为中央民族访问团题词：“过去汉族的统治阶级是压迫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七月起，由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民族访问团赴少数民族地区访问。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二十七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沿海出动，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二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6月27日同毛泽东、朱德等接见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负责人韦国清等，在讲话中阐述了援越的国际意义和对我国安全的关系，指出：你们此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

6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转越共中央电：“是否仍以先进行老街战役，后进行高平战役为宜。因在老街方面敌人增援较为困难，我军占领后亦较易巩固，今后与云南的交通运输至须占领老街，而在高平因敌增援较易，我军占领后亦难以巩固，或须连续进行几个战役，才能巩固。”

7月6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起草《总则》部分，提出：“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群众自愿联合、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经济组织，各类合作社不得违反自己的目的去追逐高额的利润。”消费合作社的目的，是消费者自愿地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的商业组织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日常消费品；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目的，首先是农民自愿地将自己当作消费者联合起来，凑合资金，建立自己的商业组织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日常消费品，并购买生产资料，同时推销自己所生产的多余农产品及其他副业产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独立生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自愿地将自己当作生产者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商业的和生产的组织，去

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同时在可能条件下组织生产的合理化与提高生产技术，以便扩大产品的市场，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7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电：“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能超过根据地纳税人口的百分之二，如超过此数，必须适当减少脱离生产人数，根据地才能长期坚持，否则是不能长期坚持的。同时，必须很好地进行公粮税收的征收工作和贸易工作，最后、最基本的，还必须很好地大规模地进行生产工作，一切军队和机关学校都多少要进行生产，如此才能克服财经困难，长期坚持，否则，必致最后不能坚持，自己崩溃。望你将这些意见和我们过去克服财经困难的经验告诉越共中央，请他们加以讨论。”

7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土地改革中处理债务、押金问题的指示：“中央认为在适当的限度内在土地改革前或土地改革中要地主向农民退还押金，是可以作的。但领导上必须很好地掌握，必须作得很适当，才能一方面既有效果，另一方面又不致发生乱捕乱打等混乱现象。”“农民欠地主的旧债废除，从当地解放以后所欠的新债不废，以后借贷自由，利息亦不加限制。”

7月21日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薛暮桥、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孟用潜等谈合作社问题，指出：“目前主要是搞供销、消费、生产及特种合作社。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哪一方面工作需要就办哪一种合作社，不必提以供销合作社为主。要使合作社走向巩固，走上轨道，必须制定合作社法，扩大宣传工作，但主要是国家贸易公司、银行、税收机关要帮助合作社。合作社要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有国家政权的领导；二有强大经济力量的扶助。当然，离开国家政权的领导就不能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但先决条件还是经济力量的扶助。因此，国家对合作社必须定出许多具体的扶助办法来。”

7月25日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社运动的经验，阐述了合作社的性质、作用和办社方针。指出：目前主要应办三类合作社，即在工人和城市劳动人民中组织消费合作社，在农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在城乡手工业者中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是一个独立的群众团体，是群众的经济组织。合作事业是有前途、有希望的伟大事业。会议在刘少奇指导下制订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草案。这个章程草案后经一九五四年七月召开的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修改后正式通过，并定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

7月下旬主持制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决定》是以一九三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作出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后制定的。这个文件经八月四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于八月二十日公布施行，为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8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关于中南区工会工作的报告，指出：“工会工作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于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望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和市委照邓子恢同志作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委对于工会工作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

8月5日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讲话，指出：法院、检察署、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国家统治机关，是与敌人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机关，是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利益的机关。

8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皖北今明两年当然要以大力救灾和修建淮河水利工程。但在无灾地区，如土改条件已经成熟，仍应进行土改，不应推迟。因为勉强推迟，将引起群众不满，目前世界形势的发展，亦以从速完成土改为有利。”

8月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并转告越共中央电：“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同意派送中国专家到越南工作。”“中国专家到越南，由越南分配他们到适当的机关工作。”“为了调整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之间的关系，中国派韦国清为驻越南顾问团团长。”

8月1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区减租交租问题的指示》。

8月15日召集薛暮桥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孟用潜、梁耀谈话，要求合作社领导机关必须深入地研究解决合作社一系列的业务问题，并就商品、批发、价格、资金周转、营业方式等十五个业务问题发表了意见，提出：“合作社是群众工作，又是经济工作。经济工作就是业务工作。”“合作社只讲方针政策，不把业务搞好，不把业务上一系列的问题解决好，要使它走上正轨，仍是不可能的。”

8月18日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资方代理人（或代表人）不得加入工会，工会会员不得在任何地方代表资方（不只是劳资协商会议），如有代表资方者，即自动地停止其会籍。”“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线应该明确划清，不应模糊。划分这种界线后，工人阶级才能自觉地去与资产阶级作必要的联合，否则这种联合，就要模糊工人的阶级觉悟。”

8月28日应约会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商谈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局势问题。

9月10日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开学典礼上讲话，着重阐述了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现在，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在指挥台上指挥，行吗？不行。”“中国党如果没有很多的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样大的国家达到社会主义。”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9月17日审改《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这个条例后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修改，并经十一月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五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

9月20日就由贫雇农起家的新富农可否选为劳动模范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只要新富农本人劳动好，对劳动有新发明和创造，对雇工待遇又好，合于劳模各种条件，而不是简单计算新富农的生产量多，不是他的雇工劳动好而本人劳动并不怎么好，就可以选为劳动模范。”“由于富农本人也是劳动者，只要它合于劳模条件，另加一条对雇工待遇好，亦可选为劳模。”

9月26日在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讲话：这一次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会。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差不多都是在群众中间产生起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或者几种特殊的创造，特殊的发明，特殊的功绩，这

些创造和发明我们应该加以推广。在今后，将会有更多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出现，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保证了一切真正有价值的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发明。

10月1日首都北京四十万人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庆祝大会。

10月3日在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我们是以为工农服务为目的的，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应该是为这一目的，我们的大学要教育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我们不只是破坏旧中国，而且还要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因此要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

10月5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时题词：“伟大的良师和益友。”

10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以及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0月11日在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上讲话，阐述了中苏友谊的意义和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组织工作等问题。指出：要使中苏两大国人民真正的友好起来，很好的团结起来，是要进行很多工作，要进行一些斗争的。所以，中苏友好协会这个组织，在某些意义上讲，应该是一个斗争的组织。向谁斗争？向敌人斗争。因此要了解敌人，研究敌人，研究斗争的方法。斗争的任务，斗争的目标，就是使中苏两大国人民很好的团结起来，相互的经验交流起来，经济建设的经验、组织的经验，各方面的经验交流起来。

10月14日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转发的《关于黄克诚[1]对贸易工作情况反映通报》上批示，要求财政经济委员会切实讨论国营贸易如何经营的问题，提出：“每个批发栈，每个零售店，均应有成本核算，好者有奖，坏者有罚。一方面要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人民需要，有利润。故应有一整套经营规划。”

10月19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的工作指示》上批示：“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则主要是由干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所以他们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我们应该纠正这种错误，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

10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登记办法（草案）》发给各地征询意见。刘少奇指导了这两个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并于七月、八月和十月先后对合作社法草案作了三次详细修改。后因情况变化，这两个草案未形成正式法规。

10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电：“华东有些地主除大量出租土地外，同时出租一些耕牛，但自己并不养牛，他只收牛租。这种地主的耕牛出租等于放债，是应该没收分给农民的。但地主如系自己大批养牛出租给农民种地，则是一种畜牧业，亦可考虑不加没收，让其继续养牛出租。在土改后，地主愿意买牛饲养出租者，亦应加以允许，因为这对缺牛[1]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农民是有好处的。”

10月28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为二十七日逝世的任弼时[1]

送灵。三十日，在任弼时追悼大会上讲话：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要好好地学习任弼时同志，要努力完成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事业。十一月十四日，为悼念任弼时题词：“学习弼时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0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1月11日就发表农贷消息一事致信胡乔木、范长江[2]，提出建立国家信贷制度的设想，指出：“关于国家投资（对国营企业）与贷款（主要对小生产者）问题，应与整个经济问题一起加以研究，而不要孤立研究。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依赖市场与信贷制度的，否则，就不能生产。过去他们是依赖商人的信贷，地主富农的信贷，又依赖商人把生产品卖到市场，又依赖商人买来自己的必需品，这样他们就受商人、地主残酷剥削，因而不能扩大生产。”“我们必须迅速建立新的信贷制度，同时鼓励农民互助互贷。这种新的国家信贷，应是以扶助农民生产为基本目标，一反商人的剥削目的，但在办法上仍然是春借秋还，并有利息（实际的利息），订立合同，并可要农民小手工业者给贷款机关（最好是供销合作社）以信用。”“这种贷款和经营，是代替商人、地主的地位，是合于经济法则的，国家与农民均可获得很大利益。然而这需要建立一套经济机构，这种机构，就是供销合作社，或农[1]任弼时，逝世前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范长江，当时任新闻总署副署长。业银行，或农贷局。”

11月12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筹建情况：“即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老[1]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另由人民大学附设一部政治训练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学一部分（约收学生三四千人）机构，照过去一样继续招收学生进行四个月的政治教育，以继续改造知识分子，但这个任务不久即可完结。人民大学拟由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任命中国人作校长，聘苏联同志为顾问。”

11月29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公私兼顾不仅是指公营、私营企业的关系，同时也是指公营企业中工人与行政的关系，认为公营企业中工人本身即主人，不是公私兼顾问题，这种否认公营企业中所存在的矛盾的看法，是不对的。

11月30日针对各地在土地改革中提出的关于小土地出租者、地主兼其他成分或其他成分兼地主者以及每户地主拥有土地平均数等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小土地出租者等问题的解释和指示。

12月3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会谈，就朝鲜战争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

12月5日就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工作致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廖鲁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有些已经召开并开得多，但有些不开或开得很少，请为政务院准备一个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工作的指示，总结过去经验并规定以后的工作。责成各[1]谢老，即谢觉哉，当时任内务部部长。级民政部门经常注意各级代表会议召开的情况并加以督促和向上级作报告。因为上级不加督促，许多政府人员是不大想多开代表会议的，故上级加紧督促甚为必要。”

12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北局并天津市委电：“对于有反动行为的教会及学校中的外籍人员，在取得证据并组织群众的抗议和告发后，可即由

政府加以处罚，其中一部可驱逐出境。”

12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市委并告各中央局电：“南京人民反美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是好的和必要的。但须切实注意阻止特务分子故意提出‘左’的口号去制造事件，以致陷我于被动。对于提出过左口号及要求枪毙美国人的人须在群众中批评其错误并对其提出警告，要群众不要上特务的当。但你们在运动中不要怕美帝停发学校经费，也不要怕外籍教师全部辞职，如有外籍教师因此辞职应一律批准，并令其迅速离开中国。如有停发经费者，应立即由政府接收学校，继续办理。”

复信胡志明：“我们认为你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及来信中所说的‘长期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贯彻这种方针，你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我们在和陈赓、罗贵波同志讨论以后，认为目前对你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这种正确的方针之下，制定你们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从各方面进行周密而适当的组织工作，以便从各方面把你们的力量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去和敌人进行有计划的斗争。在这里，我们派给你们们的顾问，或许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向你们提出若干有益的建议……但是所有这些，都只能根据越南的实际情况，从越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以规定。不顾越南实际情况，机械地搬运中国的经验，是错误的。这一点，希望你经常地加以注意，并给我们派到你那里的同志以指导。”

12月9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刘少奇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2月15日致信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程子华和孟用潜，提出合作社实行配售应注意防止可能发生的弊端，“因为这是配售实行后极大的消极因素，如不防止必致引起群众极大的不满。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过去日本人和国民党的配售就是如此，我们必须避免。必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精神去实行配售，使每个社员平均地得到利益，才能做好。因此又必须实行合作社的民主，使社员参与有关配售的各项决定，并有严格监察，才能做好。”

12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胡志明电：“云南同志电告你们在老街地区的部队粮食困难，越币跌价，商业停止，人民生活困难。云南已借给你们部队和政府一个月给养。为了恢复边界贸易，帮助越南克服困难，我们拟令云南国家贸易机关到老街一带设一个或几个商店，将中国若干货物运至越南，交换越南货物运回中国。”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云南省委并告西南局电：“可否由你们贸易公司到老街去设一个国营商店，由中国运去各种必需品，交换越南各种物资运回中国，以打开边界贸易。在贸易中虽然不应折本，但亦不应谋求过高利润，以活动边界贸易，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行为中自觉地赔一点钱，也是应该作的。”

12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电：“我们基本上同意你们发这样一个指示，着重纠正土改中的右倾偏向，以便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但在指示中还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那些‘左’的错误是不允许再犯的，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的重要性，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地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既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不犯或少犯‘左’的错误。”

12月26日致信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等，提出应注意解决店员失业问题：“全国店员可能有二三百万人，联其家属，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口。”“国家的商业机关和合作社应大量招收他们，加以政治的和新式商业知识的训练，然后依其成绩分配他们到国家的和合作社的商业和工业中工作，或改做其他工作。”

12月30日同王光美联名回信宋庆龄祝贺新年：“宋副主席：敬祝您新年健康！”

## 1951年五十三岁

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会议上作关于形势和组织业务工作的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的新问题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迫切性，并对党的组织业务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意见。

1月18日就训练航空员、坦克手及其他军事技术人员问题致信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议考虑在工厂、学校、机关中普遍建立一种学习军事技术的组织，以便训练大量的航空人员及其他人员。

1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华东局一个报告的批语，提出：应对土地改革中划错阶级成分问题予以注意，“因为这是土改中可以引起各种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电：“应向越共同志说明：必须大力组织财政经济工作来解决困难，而不能依靠发行货币来解决困难。但越南在军事时期政府要从银行透支一些款项来作必要开支是必然的，此点你们应加以计算。并告诉越南同志每年每季能透支多少，在透支过多之后会发生何种后果，在这种后果之后又应采取何种办法应付。在详细说明这些之后，使他们了解，用发行货币来发展生产支持贸易，然后再从生产贸易的发展来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正确的办法。”

1月24日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对外联络部并以王稼祥为部长的通知。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批准王稼祥关于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机构和领导组成人员的报告，同意廖承志为中央对外联络部第一副部长，李初梨为第二副部长，连贯为第三副部长。

1月31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韦国清并告罗贵波电：“请你们向胡志明同志提出，以后越军前方要求援助，均先经韦国清审查，后方要求先经罗贵波审查，再由罗、韦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请求。”“越军后勤司令部和兵站运输线及各部队的供给部，应即建立，武器弹药和物资的浪费损坏，应即规定办法加以禁止，说明爱护和节省武器弹药和物资的严重的政治意义，以教育所有人员。”

1月主持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二十八日，致信毛泽东：“惩治反革命条例，已经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发布了。请审阅。但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以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有些地方无军事法庭组织者，可立即组织起来，故人民革命法庭可以不组织，亦很难组织起来，不能应付目前情况，故以军事法庭审判来得简单有力。”当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二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二月二十一日公布。

撰写《为组织广大的合作社经济而斗争》一文，指出合作社经济开始成为我国人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的帮助之下，它将在长期的不断教育中引导我国数万万独立的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在长远的目标上来考虑与提出合作社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中国的情况来规定适合的合作社的各种原则和制度，以便保证合作社的工作和发展能够循着

正确的有利于极大多数人民的道路前进。

2月3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和全国解放后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指出:工会要配合各方面加以准备,把毛主席所说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告诉工人。三年准备后,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用以发动工人的热情。

2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土地改革和减租退押地区加强春耕生产的指示,指出:“春耕时节即到,各地进行土地改革及减租退押,不应妨害春耕生产。凡在春耕前可以完成土改者,应速求完成;不能完成但已开始进行者,应力求在春耕前告一段落;尚未开始者,则暂时不要开始,以便在春耕开始后集中全力进行春耕生产,争取今年丰收。在春耕紧张工作完成以后,各地仍可利用农忙间隙时间进行土改和减租退押工作,但均以不妨害农业生产为原则,即是说必须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原则下来进行这些工作。”

2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电:“你们应即在军区军分区及各城市军管会与剿匪司令部下组织军事法庭,在减租土改地区组织人民法庭。凡土匪、特务、反革命案犯,在军事管制时期,经军事法庭判决执行,在内部经省委或地委批准后,即可执行。”“在城市中的反革命亦应大杀几批,才能压下反革命气焰,鼓励群众的情绪,应告诉我们的干部,对反革命的坚决镇压,只要我们不杀错办错,是完全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理直气壮的,不要怕民主人士有什么批评和不满。”

2月12日为中共中央批转武汉市委关于土改期间城乡关系问题的简报,在批语中指出:“在解放以后,乡村地主已将不少财产非法地转移到城市和工商业中,有些工商业者并窝藏犯罪的恶霸地主,农民在土改中追回这些财产,并逮捕这些恶霸地主,是完全正当的。但此事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否则,将引起城市的混乱并破坏工商业。各县市人民政府应即和省市县农民协会及工会、工商联合会建立城乡联络委员会及联络处来有秩序地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

2月13日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名义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

2月14日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为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而举行的庆祝大会。

2月17日为中共中央批转河北省委关于改善领导方法的决定,指出要克服“在领导方法上普遍存在着的会议太多、指示太多及向下级要材料太多的现象”。

2月中旬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问题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及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各项重要问题。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向党内作了通报。刘少奇参与了《决议要点》的修改工作。

2月20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各大行政区的工作报告。在会上发表讲话: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已经做了一年的恢复工作了,再加上今年一年、明年一年,要在这三年之内,把各种工作都做好。要把抗美援朝搞好,解决朝鲜问题;要把土匪问题解决,肃清反革命;要把土地改革搞好;要把工商业搞好;要团结好,也就是说要把统一战线搞好。此外还要把文化教育等工作都做好。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就为我们国家

的建设，发展工业，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准备好了条件。还有二十二个月的准备时期，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加紧，应该在一九五三年就开始带全国性计划的经济建设。

2月26日复信江苏省无锡市华昌丝厂工人，祝贺该厂创造全国制丝最高纪录，鼓励工人们做工厂的主人，继续努力，创造更大的胜利。

2月28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论述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权的民主化建设。指出：“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就是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依靠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就能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周围，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力量，去履行我们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设任务和国防任务。“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

复信东北、上海、北京三个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科的同志，赞扬他们超额完成一九五一年译制苏联电影的任务和对工作的高度自觉性。

2月下旬修改《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各地在土地改革中均提出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若干补充规定。中央根据各区的意见并加以综合，起草了这个草案。但鉴于中央和各地政府已经颁发了很多的土地改革法令，并已使农村工作干部甚难掌握，如再公布这个草案，当使他们更加为难。所以这个草案决定不由政务院公布，而当作内部文件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区党委，作为你们处理土改中各种问题的参考。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亦可部分地或个别地由各区和省人民政府予以公布。”此件于三月七日下午发。

3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曾涌泉并转李鹏[1]及留苏学生电：“留苏学生要求在一九五一年暑假回中国一行，他们可以自己节省一部分及暑假期间的卢布津贴，作为在苏联境内的路费，在中国境内的路费及生活费可由中国政府负担。中央同意他们这个要求，望大使馆即派人组织他们照此计划执行，路费除开他们自己尽力节省出卢布外，不足之数，你们仍可酌情贴补一小部分。如已够用，则不要补贴。因为国内东西很便宜，要他们不要在苏联买东西回国送人。他们回国后除与各人家庭接触外，由中央组织部及青年团中央组织他们参观，并会同中央宣传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3月19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政府党组关于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至今还有许多党员对于[1]李鹏，当时在苏联留学，为中共留学生支部负责人。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国内写信，汇报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代表全体留学生请求“利用夏天休假回到中国一次”。和党外人士在一个机关中团结合作共同工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地解决，各级党委应加督促，要他们仿照北京市政府党组办法加以检讨，并写一书面报告，以便有所改进。”

3月27日同周恩来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关于要西藏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派人来北京谈判的有关情况。

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了党的组织状况和存在问题，阐述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改进干部管理制度和加强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报告指出：我们的党不只在上层，在各方面领导着我们的国家和各种事业；而且在下层，在各种工厂中、矿山中、农村中、机关和学校中、部队的连队中密切地联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使我们党具有充分广大的群众性。但最近两年不少的地方接收党员过多，以致有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到党内来了。还有一些坏分子，例如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党团和道会门分子，投机分子，自首或叛变过的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钻入了我们党的一些组织。因此，对于我们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是完全必要的。报告还根据党章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 (一)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
-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党员必须具有为这些目的坚持奋斗的決心；
- (三)“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
- (四)“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斗争和工作；
- (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
- (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
- (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
- (八)“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编入《刘少奇选集》。

3月3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八十大寿的祝寿仪式，并致词。

4月9日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论述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问题。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现在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每个党员除开社会职业之外，必须在党的一个组织的分配之下担负一种工作。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员，应在整党中分别情况进行处理。在整党建党工作中，首先要分清敌我界线，其次要分清党员与群众、先锋队与阶级的界线。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为坚持高标准的党员条件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今后要继续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根据这个决议进行的整党工作由此在全国逐步展开，至一九五四年春基本结束。《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编入《刘少奇选集》。

4月15日会见缅甸共产党代表昂支并谈话。

4月20日致电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1]：“为了解决你们的战时财政问题，建立统筹统支及其他必要的财政制度和纪律是完全需要的，并须进行不懈的斗争去反对那些破坏财政制度与纪律的人员，然后才能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合理地使用到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去。过去在中国为了解决我们的战时财政问题，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处分了不少的破坏制度的人员，并在人民中进行了普遍的生产运动和贸易工作，才能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之下解决军政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想在越南大体上也是要经过这些斗争和过程的。”

5月2日致电罗贵波、韦国清并转告胡志明：“我方汽车团参谋长去越南查看运输情况回来报告称：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管甚差，在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无人看守，经开箱检查，均已生锈，如不修理，不能使用，现已运回三百余吨废弹药。又如去年送给越南X光及电台机器，至今仍存放高平山洞中，山缝渗水，流及机器，亦无人过问等语。以上事项，望丁同志[2]注意并采取可能的办法加以改善。”

5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性的地方性的会议、适当使用积极分子、建立各级统计机构的指示：（一）“由于全国统一，使中央各机构建立对于全国的统一领导，召开全国性的各种会议，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中央各机构就不能了解全国的情况，决定统一的政策，建立对于全国的领导。”“但在全国会 [1]一九五一年二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当选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2]丁同志，即胡志明。议开过之后，各地各部门是否随即召集该项地方会议，应由各地党委统一计划调整，对于没有必要召开的地方会议，都不要召开”。（二）“现在工厂、农村、学校的基层组织中许多党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及劳动模范不脱离生产者，他们参加的会议太多，兼职太多，业余时间太多，学习时间也太多，党和行政及青年团、工会的活动时间没有统一的调整，甚至有互相争夺活动时间和积极分子者。各地党委应即和各方面协商，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三）“以后应在县市人民政府和党委成立有能力的统计机构，专门和经常地负责搜集各种材料，进行统计，供给各方面的需要。”

5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对于群众的宣传，对于党员的教育，思想的批判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各级党委要领导这个工作。在过去，各级党委对于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是不够的，不大注意宣传教育工作，常常把一些工作委托给宣传部的人来做，做一点就做一点，没有做也不去管，做错了也不管，使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陷于自流。我们说，别的工作做错了，表现出来还慢一点，但宣传工作做错了，就要出乱子。所以加强各级党委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一方面加强各级党委对于宣传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加强宣传工作机构，提高其工作能力，这是改善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报告在讲到经济建设方针时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当然作宣传工作的还是要讲，但作为实践的问题讲，十年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到十年之后，建设得很好，我们看情况，那时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十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的步骤；也可能十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

5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对地主的斗争已经相当彻底的地区，领导上应该说服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以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在土地改革后，适当地处理地主，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望各地加以注意”。

5月10日——16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十一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总结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来的伟大成绩，同时针对一些地区发生的工作草率和“左”的倾向，提出镇反工作现在要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处理积案。镇压反革命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底基本结束。

5月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新区组织和建立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指示》，提出：“乡村受土改影响，地主富农已不敢也无力经营土产运销，私营下层商业倒闭，有很大破坏，而国营贸易也无力全部解决土产运销问题，因此，农民土产品销不出。农民在贸易上第一个要求是把土产卖出去，甚至不大注意出卖土产的价钱。在此情形下，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由党和政府及农民协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想办法来推销土产，并换回农民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推销土产的办法。目前在新区除尽力建立国营贸易并组织私商来推销土产外，组织农民群众的合作社来推销土产，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一个办法。应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销土产的基本要求之下来组织新区农村合作社，而不必过分小心，束手束脚，使农民的困难不能解决。”

5月1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天津市委的指示：“常宝坤、程树棠[1]在前线牺牲，应按前线阵亡烈士待遇。”

5月13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作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讲话。指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有它的进步作用和革命作用的。如果目前即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对人民是无益的。伤害私人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无疑地是破坏着目前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这是“左”的错误。那么今天资本家对工人有没有剥削呢？自然有。但这种剥削有其进步的作用。可不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可以。转变方式有多种，如说服，颁布国家法令，开会讨论，甚或给以若干代价等等。这工作我们从现在起便开始培养和教育，使大家都能认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行程。因此不仅是可能，而且会是现实。假使有少数人反对怎么办？这很简单，可以消灭它。

5月16日致电高岗：“关于在国营工厂中实现统一领导问题，华东城市工作会议及其他多数同志都主张在工厂中建立党委来实现这种统一领导。理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或少有既懂得经济工作的技术又懂得党与群众工作的干部来管理工厂。因此，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管好工厂的。而以党委方式来实行集体领导，则既可补足厂长的某些缺点，又可统一各方面主要是党、政、工、团的领导。”“党委负责制，并不取消或妨碍厂长负责制，相反，它加强并支持厂长负责制，同样，也加强党的、工会的、青 [1]常宝坤（艺名小蘑菇），天津著名相声艺术家。程树棠（真名耿承彬），天津著名琴师。常、程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在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前线慰问过程中，遇敌机轰炸扫射，光荣牺牲。年团的工作，各方面的缺点则可得到一些

补助，少犯一些错误。”

5月中旬为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全国美协、北京市文联发起主办的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展览会书写对联：“唇亡齿寒辅车相依，披发缨冠众志成城。”

5月23日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论述了党的宣传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在广大的范围内宣传了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的原理通俗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另一方面在极为深刻的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在马列主义总武器库中增加了不少新的武器，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宣传工作可以分作两项，一项是当前中心工作、时事政策的宣传，一项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要建立经常的宣传机构和工作，注意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总的来讲，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并用各种办法逐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这个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

5月24日出席毛泽东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1]而举行的宴会。

[1]一九五一年四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开始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五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

5月研究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阅读了大量有关的文件资料。五、六月间写了《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1]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文章提出：国营工厂中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观察问题时必须分清敌对和非敌对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文章还提出：“工会工作必须从普通工人的要求出发，力求实现他们一切合理的能够实现的要求，然后逐步地提高工人觉悟，来实现我们党的要求和目的。”这篇文章是论述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的最早的文献之一，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

6月3日致信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杨献珍：“马列学院对于工人运动及工厂管理问题的教学情形，不知怎样？应认真地教一教这一门课。因为我们多数党员对于工人中的问题大生疏了，这就使他们不能很好的领导工人群众。”

6月11日为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捐献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单纯强调节约降低生活的偏向，望各地注意防止。用改善经营管理，改善劳资关系，提高生产效率，减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办法，则应加以强调与提倡。”

6月21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临时总学委党组扩大会议[1]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发表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长江日报》的《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写于一九

五一年四月的《论国营企业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两篇文章。议上作关于机关建设问题的报告。

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光荣历史，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和党所面临的“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艰苦而伟大的任务。”指出：“我们党和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乃是具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许多深刻的、复杂的根源的。有些同志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我们党和中国革命所以能够胜利的这些深刻的复杂的原因，他们简单地认为这种胜利只是由于他们打下了天下，因而，他们就表现了居功骄傲以及其他错误的观点。应该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育这些同志，以便扩大他们的眼界，纠正他们骄傲自大的观点以及其他错误的观点。”“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领袖，同时，又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还要进行长期、复杂而艰苦的斗争，才能保卫和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并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在此以后，还要进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最后地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7月3日在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1][1]中共山西省委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其中说：在山西老解放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省委主张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制是一个否定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的报告上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二十五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随后，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7月4日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关于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在批语中指出：“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而如果不正确地处理工资问题，我们就不能建立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就不能取得工人阶级对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就使我们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去搞好生产并搞好其他各种工作。”

7月5日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阐述了对中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指出：“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步骤——首先

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报告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这五种经济都会有发展，它们的基本关系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发展的结果，工业比重要逐渐增大，农业比重要相对缩小。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这段时间，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然后才能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两个主要的步骤，进入社会主义，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态度才能决定。”“工业国有化不是逐步实行的，而是逐步准备好，当作一种严重步骤来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乡村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依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一方面，是农村中广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思想、富农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互助组、合作社，国家贸易与对富农的累进税，并且还可以有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教育，这样两种潮流要同时在农村中发展和斗争。最后，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吸引农民到集体经济中来，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在农村中既不是去阻止或企图避免农民的自发趋势，也不是让其自流，而要加以领导，适当的控制和限制，准备最后的胜利。”

7月12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毕业生讲话，强调了干部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提出“马列学院以后要正规化，不能搞游击”，要把读书和锻炼思想作风两者兼顾起来。

7月20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会议上的结论》，并在讲稿上加了几段话，指出：“从原则上说，每一个党员犯了错误，而这种错误又不仅仅是涉及他个人，而是对党对群众有影响的，党在发现以后，都必须及时地加以纠正。这就是党的严肃性，党在纠正党员的错误时，必须向他说明：为什么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必须纠正？而如果不纠正又会怎样？并且指出纠正的方法。当着党的组织采取正式的决议形式，指令该组织内任何党员纠正某种错误，如果该党员采取不服从或反抗的态度，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工作中仍然继续他的错误，那就构成了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就有必要来考虑给他以处分。”“党员犯了错误，党的组织必须仔细地具体地去加以研究和分析，彻底弄清楚错误的性质，犯错误时主观与客观上的情况，犯错误的原因及其结果以及如何才能避免和改正这种错误等，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应该给以处分。必须使党的处理既不犯自由主义的错误，又不犯惩办主义的错误。”

7月2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和晚会，欢迎以越南国民联战线副主席、越南劳动总联团主席黄国越为团长的越南人民访华团。刘少奇在会上致词。

7、8月间写《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一文。文章提出农村供销合作社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办好三件事情：为农民推销多余的生产品；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办好这三件事，合作社和国营经济机关就能控制大量的农产品，为国家推销大量的工业品；能使合作

社成为国营经济机关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密切结合的纽带，使合作社和农民成为国营经济的同盟军；还能使合作社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用集体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广大的农民群众，使他们了解并接受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目的代表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因此又是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基本政治原则。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8月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的指示：“对土改后的农村，应以提高农村生产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为中心任务去布置一切工作。其中建立健全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在区乡即农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机关，建立以推销土产品为中心任务的各级合作社组织，普遍地组织劳动互助组，依照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决议，建立农村中党的组织等项，应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去布置。”“发展市内生产，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是城市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在目前，适当地在城市中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城市中的封建残余势力，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和领导，加强工会工作等，应成为当前的几项中心工作。此外在老区的农村中应将整党工作当作一项中心工作提出来去加以布置。”

8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电：“关于中越贸易问题，只能按照一般贸易规则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和财政援助混淆。所有财政和物资的援助，均须在贸易范围之外另行办理。又在越南尽可能大量地发展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偿付我方出口物资，这对越南财政和经济均有极大好处，必须大力组织。此点，请告越党中央。”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电：“关于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已经开始进行，这是很好的，将来还可发展。但既然是进行贸易，我们的贸易机关只能按照严格的一般贸易的规则进行两国物资的等价交换，不能和对你们的财政援助有任何混淆。我们的贸易机关只负责和你们进行贸易，没有担负任何在财政上援助你们的任务。对于你们物资和财政的援助，是由另外的机关并采用另外的办法来处理的。此点务请你们了解。”

9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中国的合作社运动，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继续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动力，合作社制度开始成为中国一种新的日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是农民把自己当作生产者组织起来，推销除自己消费以外多余的生产品，并供应自己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及其他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农民把自己当作消费者组织起来，供应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共产党应积极赞助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并在工作中把群众的切身要求与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远大目的密切结合起来。供销合作社就必须采取和商人完全不同的方针，直接地完全地对社员负责，全心全意地为社员办好供销业务。这个决议草案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9月3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

9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疆分局的指示，指出：“由于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又有严重的宗教问题，在这些地区内进行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斗争，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需要周密考虑后来进行的事情。”

9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在经济上应团结所有的人进行生产的指示》，指出：“在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农村中，除开严格禁止地主及其他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外，在经济上应该团结所有

的人来进行生产，就是对于那些守法并认真进行生产的地主，亦应包括在团结与保护之列。”

9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天津市委整党计划的批复，指出：“由于有些干部和党员还不了解整党及提高党员条件的意义和必要，因此，应该认真地传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决议和精神，以便统一全党对于整党和建党的认识。”“对于领导基层组织进行整党的干部，必须认真地加以选择和训练。”

9月29日写成《论合作社问题（初稿）》一文。文章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九个问题：（一）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基本目的与供销合作社的基本营业方针；（二）供销合作社的股金与盈余的分配；（三）供销合作社对社员的待遇必须与非社员有区别；（四）供销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与资金的运用；（五）供销合作社的管理与费用；（六）国营贸易与合作社贸易的关系；（七）供销合作社的组织问题；（八）城市中的消费合作社；（九）城市和农村中的工业生产合作社。文章指出：共产党积极赞助并领导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办理自己的供销业务，因为这不独对农民有很大的切身利益，而且对工人阶级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有极大的利益。因为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能够发展全国的物资交流，把多数以至全体农民吸收到合作社的组织中来，使合作社成为国营经济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之间密切结合的纽带，使国营经济与合作社能够掌握大量的物资，进行有组织贸易，对市场实行决定性的领导，因而使农民和国家能在一定限度内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合作社还能逐步地教育并引导农民群众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能用社会主义的原则教育农民。因此，合作社问题对于今后农民的趋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10月5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第二届年会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典礼。

10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并转告胡志明电：因韦国清患病休养，“韦同志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职务，即由罗贵波同志代理”。

10月23日——11月1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11月4日应邀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学习座谈会上作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经验，指出：思想改造，不只是对一般的人们需要，它首先对于共产党人就是需要的。共产党人不是只改别人，不改自己。共产党人在过去长时期内进行了思想改造，在现在，仍然在进行思想改造，在今后，还要进行思想改造，直到完全改好为止。而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在今后还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保障。我们共产党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是有各种不同的从；日社会得来的错误的思想的。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谓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的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播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

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建立，是在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才建立的。这就是说，我们若干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的。

11月前后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负责人谈话，提出合作社为实现组织上的群众性，要广泛地吸收群众入社。合作社要逐步实行包收包供，今年合作社包收棉花是很好的，特别是社员集体向国家售棉，是社会主义的交售方式，社会主义的收购方法。要加强基层合作社，把基层社的工作做好。

11月27日离开北京去南方视察和休养。到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大会。

12月1日到达济南，参观济南图书馆、博物馆和大明湖等名胜。

12月2日到山东曲阜，参观孔府、孔林。

12月36日经徐州到安徽蚌埠，视察淮河、淮河大桥，当晚到达南京。在南京期间，参谒了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视察了玄武湖入城水闸。地质调查所、历史博物馆等地，看望了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同志。

12月7日到无锡并游览。

12月8日经苏州到达上海，住虹桥俱乐部。在上海期间，视察了吴淞口要塞、国营印染一厂、国营上海电线厂等单位，看望了宋庆龄、张云逸、吴亮平等同志。

12月10日为海军南昌舰题词：“为保卫祖国的海岸而奋斗”。

12月13日到达杭州。在杭州期间，通读了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赴嘉兴南湖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赴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并视察了钱塘江大桥等单位。

12月19日复信毛泽东：“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问题，在过去确是没有提过，现在这样提，确实也难解释。同意将整党决议中的那种提法加以改正并发出安子文同志所起草的电报。”[1][1]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一九四八年二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时曾使用过。一九五一年四月经刘少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也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九五一年七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十月十七日，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干部阴一刚，罗云路给毛泽东写信；对《华北建设》第一一八期上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提出意见。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把宿批给刘少奇等阅，并要安子文提出处理意见。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毛泽东同意改正这一提法，并于十二月十五日写信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复信同意后，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发出安子文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 1952年五十四岁

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三反”、“五反”运动从此迅速展开并很快掀起高潮。

1月4日离开杭州去江西，然后在南昌、长沙、武汉作短期停留。沿途会见当地负责同志并谈话，视察了南昌三二厂、湖南大学等单位。

1月24日回到北京。

2月14日出席首都各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庆祝大会并讲话。

3月10日针对那种认为工人中的偷窃、揩油行为是由于资本家过重剥削、是正当行动的不正确观点，以中共中央名义复信程子华，论述了正确认识工人中偷窃行为的问题，指出：“工人中的偷窃和揩油行为，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看作是工人反对资本家的一种正当的斗争手段，也不能成为工人阶级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手段。工人阶级有一切正当的和有效的斗争手段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而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所已经采取的各种有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3月13日为中共中央批转天津国棉五厂“三反”与生产结合的经验，指出：“各地在国营工厂中进行‘三反’斗争必须切实注意维持生产。”

3月14日为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国营工厂“三反”的综合报告。十五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你批发的上海市委综合报告，已阅，很好。嗣后，关于‘三反’‘五反’各地来报请你多看，需要批转各地参考的，请你负责批转。”此后，刘少奇先后代中共中央批复和转发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华北局、天津市、中南局、山东分局、北京市、东北局、青年团中央等单位 and 地区的请示报告，指导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个运动于本年十月底结束。

3月18日、20日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对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加写了如下一段话：“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党员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些人则在运动中证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因此，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对于我们党的组织进行一次严肃的整理。”3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并华东局电，批准关于上海“五反”斗争的部署，并指出：“在上海，基本守法户一般规定以违法所得在一千万元以下者为标准，是适当的。但有些户营业额颇大，而违法所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情节不恶劣（例如只有漏税或成本核算稍高，因营业数量大，违法所得超过两千万），坦白较好者，亦可算做基本守法户，而不要机械规定为违法所得在两千万以下者。如此，可使基本守法户扩大，可使若干比较规矩的大户亦算作基本守法户，这对团结资产阶级是有好的作用的。”

3月2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私人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五反”的指示：“在公营企业中应该进行‘三反’，在私人企业中则不应进行‘三

反’，而应进行‘五反’，中央早有指示。”“在私人企业的工会工作人员中是应该进行‘三反’的，但不应因在工会中进行‘三反’而妨碍私人企业中的‘五反’。这些工会机关中的‘三反’，主要的应在‘五反’之前或‘五反’之后进行，时间可根据各企业‘五反’进行的情况来决定，不一定决定为先工后商，先大后小。”“在不少的车间工会组织中有贪污会费及捐献款项等事实，如有这类事实存在，工会机关中的‘三反’，应扩大到车间工会组织中去，以便清除这类事实。在‘三反’中发动工会会员会反对工会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是必要的，但不要在工会会员中去进行‘三反’。”

4月2日对中华全国总工会一机关干部反映城市“五反”中出现职工福利要求过高、劳动纪律松懈等现象，作了两条批示：“监督资本家现在尚无经验，在一般的劳资合同中还不要提出监督资方的条文。而且只说监督，也不一定要资本家签字同意的。在小商店中工人监督是有困难的，可能只不许有五毒及账目公开。”“商谈与签订合同，可以是劳资双方代表的谈判会议，也可以是劳资协商会议。至于工人监督资本家的形式，那是另一问题，还要在实际上去创造，在较大的工厂中可能是由工人派代表到各要害部门去监督。”

4月5日在马列学院作关于“三反”、“五反”的动员报告。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城市在“五反”运动后处理劳资关系的指示，指出：“为了在‘五反’后新的条件下建立今后相对安定的正确的劳资关系，以利生产和经营的发展。除开工人监督生产问题应即加以研究和试验外，关于工人的生活以及其他的关系问题，应用劳资合同的形式加以规定。这种合同不应设想是把什么都规定上的复杂的形式，而应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工人若干迫切的要求以及资本家提出的迫切问题，经过双方平等的协商，认为是可以确定者，才加以规定，并由双方代表签字，在以后规定的时间内予以遵守。没有解决的问题，则可留待以后继续协商解决。签订劳资合同，是使劳资关系趋于正常和相当安定的一种基本方式，否则，劳资关系总是动荡不定的。”

4月18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批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

4月19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

4月27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为庆祝一九五二年五一劳动节号召》。这个《号召》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布。

4月28日为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刘澜涛《关于监督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现在各地在监督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问题上缺乏领导，已有某些混乱现象发生，望各地党委和节约检查委员会迅速加以领导，并作必要的布置，使之走上正轨，不要放任。”

4月30日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的欢迎来中国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各国工会代表团和工会代表的酒会，并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身份致欢迎词。

4月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空气，做好工作。”

5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新疆若干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新疆农业地区，今年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坚决的革命的进攻，不容动摇。但在实行这个进攻的具体步骤上，必须十分慎重，切忌急躁，必须准备充足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去实行进攻，以便获得全胜。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的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5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推迟县区乡的“三反”和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由于过去各地‘三反’，‘五反’的影响，使社会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发生了阻滞现象，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反’‘五反’的地方，正在结束‘三反’‘五反’，并大力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及城乡交流。对于尚未进行‘三反’的县区乡和尚未进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决定一律推迟进行，即在秋征以前凡未发动三反的县区乡和‘五反’的城市，均不再发动，待今年秋征以后或明年再有步骤地来进行。”“在目前应集中力量作好生产、城乡交流及土改复查等项工作。”

5月24日致信毛泽东并周恩来、朱德、陈云，提议：“禁毒运动虽然主要由各地方党委领导，但各地具体行动仍有很多事情须配合办理。这种配合行动主要由中央公安部负责，另由彭真召集公安、铁道、交通、邮电、海关、内务、卫生等部门，定期汇报处理。中央宣传部亦派人参加。”这一提议经毛泽东等同意后，刘少奇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以后全国各地禁毒运动在具体步骤和行动上的配合，即由中央公安部负主要责任加以掌握，中央并指定彭真同志定期召集公安、铁道、交通、邮电、海关、内务、卫生、法院、监委等部门汇报情况，在中央指示之下处理有关各项问题。”

5月25日对河北通县专区合作社联合社的总结报告《“三反”运动的胜利给通县专区合作事业带来新气象》写了批语，指出“三反”、“五反”后，“合作社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作精神，必须大大地鼓励、提高和奖赏这种工作精神。这是办好合作社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5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新疆分局并西北局电：“新疆因为今年秋冬要实行土地改革，一切工作布置应以准备秋冬实行土地改革为中心任务，‘三反’‘五反’工作亦应服从这个中心任务。”

5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乡村中不再组织贫农团和区乡中不应组织工会的指示：“中央规定，在乡村中除农民协会外，不要再组织贫农团，也不要组织工会。为讨论贫农、雇农及手工工人的问题，在农民协会中可以召集贫农、雇农或手工工人的会议或代表会议。农民协会应吸收乡村中的工人雇农入会。这些规定原来就是为了避免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和中农之间的相互对立，又能适当地照顾他们各个部分的利益。”“县工会可以组织，但只吸收县城的工人及乡村中集中的有数百或数千长年被雇佣的工人入会，不要吸收乡村中分散的工人入会。”

致电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提出：应“在你们的土改法令上明白规定保留清真寺、拱北和喇嘛寺的土地。在上改进行中，所有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土改工作队均应向群众明白宣布这条法律，不许含糊或不予宣布，更不许宣布其他办法。”“因为今年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土地改革，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就不要同时进行改革。在土地法令上也应有一条规定：土改法令不适用于牧区或畜牧经济，并应在牧区和

半农半牧区广泛宣传这条法令，以稳定牧区。”“新疆在土地改革中，特别在镇压武装叛乱中是要杀一些人的，但是必须少杀。对于应该杀的人，也大部采取判刑监禁或判死刑缓期，只杀小部，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必须采取的政策。这就是镇反问题上对少数民族从宽的原则。”

5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并各中央局、分局电：“为了准备今冬查田、上改和整党等项工作，在秋收前后，集中县区乡三级脱离生产的干部进行整顿和训练，抽出十多天时间解决县区乡干部中的‘三反’问题。其他新区，凡有土改复查等项工作必须在今冬进行，又须在秋收前普遍整顿和训练县区乡三级脱离生产干部者，均可利用这个机会，抽出十天至二十天的时间，解决这三级干部中大多数的‘三反’问题。少数问题严重而复杂的干部，不宜继续担任原来之工作者，则可由地委集中加以处理。在老区，因为没有土改复查的任务，则应以准备今年秋征后县区乡的‘三反’和整党来进行准备工作。”

6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今年冬季工作，在老区农村应以‘三反’和整党为重点，在新区农村应以上改或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和建党为重点（并结合‘三反’，但不单另进行‘三反’），望各中央局、分局即以此为目标拟订计划，并进行准备。同时，务使以上各项工作密切结合农村生产和城乡交流工作。”

6月7日同青年团中央常委谈话，指出：青年团要研究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党的意图，要懂得党的尺度、党的计划，然后在党的政策、计划之下订自己的计划，这样工作上就能配合得好。青年团在斗争中当党的助手，在斗争中教育青年，这是根本性的东西。青年团要在当助手的每一步骤中来教育青年，在任何工作中不要离开教育，当助手要和教育结合起来。

6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三反”运动中处理党纪问题的指示》，指出：“在‘三反’和整党运动中对于党员的处分，‘必须既严肃又慎重，必须分清是非轻重，不许再有自由主义的态度，也不许轻率地处分党员。望各级党委密切地加以掌握，不要发生偏向。’”“以后对于任何党员的处分，都必须按规定先由相当的党委（或其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地作出决定（尽可能吸收本人参加申辩），然后送请相当的上级党委批准（附本人对处分的意见——不管是赞成的或反对的意见甚至是辱骂党的负责人的意见），在上级党委答复以后，不论是批准或改变或取消原来下级党委的决定，均必须向受处分者本人宣布。”

6月18日就开展识字运动问题致信陈云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识字运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6月20日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指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

7月9日就上海市在私营工厂中进行民主改革补课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上海市委电：“应切实注意在运动中不要妨碍生产，和资本家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严防追逼现象的发生，严格控制打击面，并须注意三十人以下的工厂企业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分党组关于司法改革和补充、训练司法干部的报告，指出：“各级法院凡未经彻底改造者，均须彻底地加以改造和整

顿。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应即制订计划，指定适当的工作组，进行典型试验，分批分期地展开斗争，改造和整顿所有的法院，同时调集和训练新的司法工作人员。”7月1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电：

“同意合并四川四个区并划四川为一个省，以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

7月15日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十八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呈报《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提议：“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自主席提出后，我找尚昆、子文及组织部其他同志谈过几次，并和高岗、邓子恢、习仲勋同志谈过。”“整个方案自须待九月以后的中央会议才能决定，但目前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方案的原则进行一些准备，抽调一些办事人员来中央，特别是加强中央办公厅的机构，帮助中央处理大量的文电和材料。”八月四日，毛泽东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7月18日为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加强中央机构改变大行政区机构与任务的初步方案》，指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为此，中央拟于明年初调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若干同志来中央工作，并拟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

7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西北局电，指出：“第一，农村共产党员不得雇用长工，进行富农式的剥削，否则，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这点，中央已有规定。第二，农村共产党员在原则上均应积极地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这是考验农村共产党员的一项重要条件。但这不是一条社会法律，在目前也还不要提出；不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而愿单干（也不剥削雇佣劳动）的农村共产党员，就要开除其党籍；而应首先对他们进行教育，说服他们自愿地积极地去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几次进行教育说服以后，并在农村中多数党员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以后，如果还有少数落后党员不愿参加，而愿单干，那就可以在以后的整党中令其退党或停止其党籍。”

7月29日在中南海接见赴苏联留学的学员并讲话：送你们去苏联学习是一种投资，建设工业需要投资，首先投资在干部的培养上。要去学习，首先要下定一个决心：为人民学习，为国家学习，学得了以后为人民工作，为国家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去了也学不好，学了回来也没有用。

8月2日为修改劳动保险条例有关内容致信安子文，提出：“工人生病，生活更加困难，不应少发工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有些工人觉悟不够，没有病或者只有微小的病，也请病假，医生不给证明有病时，他们常向医生斗争，医生不能不给签字。因此如在第一个月发百分之百的工资，病假立即增多，特别私人企业如此。因此，少发一部分工资也是可以考虑的办法，如有特殊困难者，则由行政或工会另定办法补助（对特殊困难者的补助总是要有的）。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一定要照顾到工人。否则，可能陷入被动。”

8月6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

草案编成的报告，通过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会议宣布：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三年左右时间内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

8月7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关于调整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等。

8月8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8月18日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上海大东烟厂工人来京请愿事件的报告》，指出：由于全国统一的市场已经形成，由于近代产业中的问题大都是带有全国性的，因此，处理个别近代工厂企业中的问题，常常要由相当的中央机关估计全国情况之后才能正确地加以决定。今后各地处理公私工矿企业中的重要问题均必须向上级的主管机关报告和请示，各企业管理机关和工会组织直接向中央各业务部门和产业工会报告和请示，同时报告当地党委和相当机关，而不必层层向上转报，拖延时日，不能适时地处理问题。中央各业务部门和工会的党组在处理问题时亦应向党中央的适当机关和负责同志报告和请示，不得任意处理。

8月26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和青年团的任务，强调指出：经济工作已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我们要从明年开始实行五年建设计划，为工业化打下基础，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向社会主义发展。

8月31日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报告》，指出：“各地党委应督促政府和企业管理机关以及资本家认真地根据实际可能的条件逐步解决和改善工人的居住问题。”

9月1日为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天津、安徽、浙江三次群众集会事先准备不周造成惨痛伤亡的通报》，在批语中指出：“上述事件的发生，证明了当地负责人官僚主义的严重，事先缺少充分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以致引起重大损失。虽然事后都作了善后处理，但人民的损失是严重的，今后各地进行宣传动员、召开群众大会，特别是在夜间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均须事先进行充分准备，严密组织。”

9月4日为中共中央批准全国第三次经济保卫工作会议的决议，在批语中指出：“各级党委，特别是在经济机关负责的党员必须更加提高对于反革命分子和盗窃、坐探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与盗窃行为的警惕性，并根据这个决议和前两次会议的决议认真地建立与加强我们的经济保卫工作，和这些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9月13日修改并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

9月16日修改并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

9月17日在修改《全总党组关于化学工会提出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公私合营“企业是统一的，对内对外的一切问题由厂长全权负责处理，副厂长协助厂长办事，在厂长委托下副厂长亦可代表工厂。但副厂长同时又是资方代理人，在公私关系问题上，他可以而且应该以资方代表身份出现，资方代表按规定不应加入工会，如加入工会，他就不能很好地代表私方。他不加入工会，并不损害他履行副厂长的一切职权。工会方面也不应该使他的这种职权有所损害”。

9月30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苏联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十月二日到达莫斯科。五日，苏共、十九大开幕。八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祝词。十四日，苏共十九大闭幕。

10月9日致信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种夫：“今天真理报发表我在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致词时，注明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我现在要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而我只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之一，虽然我对于党内的问题过问得比其他同志稍多一些。中共中央有一个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是管理中央本身的行政事务工作的，以前由任弼时同志担任，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即由我代理。这个职务和各国兄弟党总书记的职务是不同的。”

10月18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苏共十九大的情况。

10月1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10月20日给斯大林写信，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等问题。信中提出，“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应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

10月24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同斯大林、马林科夫、布尔加宁[1]、贝利亚[2]会谈，就中国政治经济建设等问题交换意见。二十八日，再次同斯大林会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将两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形分别用电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11月初在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11月下旬去苏联南部黑海边休养。

12月1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休养情况：我已来到休养所五天，“预定在南俄休息一个月，同时我已告诉联共中央，如需要我 [1]布尔加宁，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贝利亚，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回莫时，我随时可以回到莫斯科。现在只剩下一个印尼问题要谈一下。”

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

## 1953年五十五岁

1月7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十一日，回到北京。

1月13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等三十二人为委员，1月14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海关与对外贸易管理机关实行合并的决定》。

2月4日—7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分别听取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关于常委会会务的报告，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关于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经过和成就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提案审查报告的决议》。

2月11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决定成立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席，朱德等二十八人为委员。

2月12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2月13日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

2月15日召集邓子恢[1]、刘景范[2]、邓颖超[3]、胡耀邦[4]、杨之华[5]、胡乔木、熊复[6]等研究有关贯彻《婚姻法》的问题。

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据此，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句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2月18日为中共中央批转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青年团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各级党委每年最少应讨论青年团工作两次，并对青年团工作作出相当的决定。”

3月5日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工会干部问题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各级党委注意调整并适当地加强各级工会的干部，以便更好地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国家的 [1]邓子恢，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刘景范，当时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兼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3]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4]胡耀邦，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5]杨之华，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党组成员。

[6]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建设工作。”

3月上旬因病住院。二十八日，致信毛泽东，告之身体业已痊愈，并可从下星期一开始恢复工作。

4月3日主持中央选举委员会会议。

4月21日复信王稼祥，批准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稼祥为主任

委员，廖承志、刘宁一为副主任委员，并指出：“有关各人民团体的国际活动计划、有关政策方针的问题、工作报告的审查和必要的经验总结等，均需在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之下去进行或由委员会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后实施之。”

4月28日起草《关于中央目前工作方式的决定》。《决定》根据当时一些重要领导干部从各地调到中央的情况，提出：“为了集体地和迅速地处理各项重要问题，决定每星期举行两次政治局会议和两次书记处的扩大会议”，并对会议的召开方式和出席人员作了规定。当日，中共中央通过了这个《决定》。

5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指出：“我们祖国现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作为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责任都是极其重大的，为着逐步地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着很好地担负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我们必须加强工人阶级本身的团结，必须更进一步地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巩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阵线。”

5月9日——12日召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副部长安子文、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赖若愚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等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5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5月28日修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西北军区、西北局的指示电，提出：应“经常教育部队保持优良的纪律，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纠正工作人员和指战员中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思想。”

6月14日——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会议期间，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在会上施行“批薄射刘”的诡计，明批薄一波，暗攻刘少奇，把刘少奇的一些观点，如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讲话的观点、一九五一年一月有关东北农村问题谈话的观点、一九五一年七月关于山西互助合作批语的观点等，故意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同时在会外不断挑起事端，在高级干部中进行非法串连，到处搜集所谓刘少奇“错误”的材料，散布各种流言蜚语，诬蔑中伤刘少奇，攻击周恩来，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企图通过这些阴谋活动，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以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目的。

6月1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会议讨论并肯定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6月23日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青年运动的长期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已经发展

成为中国青年的一支强大的先进队伍了。”勉励“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全体青年团员：要和党一起，站到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最前列；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觉悟程度；要巩固自己的组织，为自己组织的纯洁性和严肃性而斗争；要高度地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把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祝词编入《刘少奇选集》。

7月18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讲话，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继续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意义和方针。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一种必要的工作，过去是必要的，现在是必要的，将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必要的，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人民和一部分可以联合的剥削者及其代表的联盟。后一个联盟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前一个联盟的。目前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以及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主要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是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斗争。在中国的条件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不可少的形式。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7月28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三年要在人民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邀集参加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各大区、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座谈选举工作。刘少奇主持会议并讲话，指出：基层选举工作，必须达到团结群众，教育干部，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

8月1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坚决制止滥发统计表报的第二次指示：责成国家统计局负责督促各部门、各地区清理过去所发出的统计表报，坚持制止滥发统计表报的严重现象。

8月30日在阅改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指出：“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必须十分重视争取和改造中国旧有技术人员的工作，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即使还有许多错误的观点需要改正，但一般他说来，他们对于我国过去的经济恢复工作已有不少的贡献。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还会有更多的贡献，恰当地估计他们过去的功绩，诚恳地妥善地改正他们的缺点，认真地团结他们，逐步地改造他们，使他们安心地更好地为今后的建设事业服务，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9月8日——11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有关国家经济建设问题及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

9月12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9月14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

9月15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所作的《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

9月16日——186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十七次会议听取并通过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所作的《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所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迟到一九五四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9月16日——10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他夸大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借口批判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中共中央察觉了他们的阴谋，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饶漱石被迫在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从而打破了他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阴谋。十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时时刻刻记着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因此我们决不允许把我们的眼光只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只关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部分同志。希望各地区党的组织部长同志们，到处去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十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议并讲话，在讲话中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并对自己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上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10月23日复信给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乡乡长邓子卿、农民协会主席王升萍，欢迎他们经常来信反映农村的情况，并强调说：“请你们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说好，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

11月22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关于签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问题。

11月24日致信毛泽东：“由中央办公厅检查了一九五三年五月以来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各次会议决议的办理情况。检查的结果，只有十项决议尚未办理完毕，其他各项决议均已办理。这十四项决议未办者，均已向负责办理人员催问，并已获得他们的回答，多数正在办理中或不久即可办好，少数尚须推迟一些时间方能办理。”

12月8日听取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主任程子华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并就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组织形式、资金、发展计划等九个问题谈了意见，指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仅是国营工业的助手，既供应城乡人民消费资料的需要（手工业品约占农民需要的百分之八十），也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在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担负着对手工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根据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精神，各级党委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到一九五四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社（组）员激增到一百二十一万多人，合作社组织发展到四万一千多个。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投票站，参加选举西单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2月9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批准了《中国、朝鲜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引导个体农民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从而指明了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进入发展时期。

12月24日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会后，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12月2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和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清理农贷中积压新式农具、农药、农械、水车问题和农贷中其他遗留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重要任务》、《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决定了有关事项。

12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1]》。这个决定草案是针对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反党分裂活动，根据毛泽东在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扩[1]这一文件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时题目改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大会议上的提议起草的。

致电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工作情况：“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邓子恢同志正写社论，待社论写好即可发表。总路线宣传要点，日内即可发出，汉字改革问题中央讨论过一次，但未作决定，交回委员会拟出进一步的方案后再提中央讨论。少数民族制定文字方案则交政务院批准试行。中央其他各项工作，各同志都在谨慎地照常进行，望勿系念！”

## 1954年五十六岁

1月1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元旦团拜会。

1月5日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京津两地党员违反粮食统销政策行为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对报告中提出的处理意见作了修改，指出：“多数应该从思想上进行批判，结合总路线的学习，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以教育党员，而不要着重以党纪处分的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只对于那些情节严重恶劣，有意对抗党的政策，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员，才能给以应有的党纪处分。”

1月7日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劳动部党组《关于东北、内蒙等地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情况的报告》的批语，增写了以下意见：“今后劳动部门向农村招请临时的和长期的工人时，亦应做到有计划，将工种、工作时间长短、工资待遇及所需工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等说明，并需适当地分配到各县农村，而特别照顾原来的习惯和灾区农村。”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提议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直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1月8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情况：讨论了中国科学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讨论了朝鲜问题和中印关于西藏问题[1]的谈判，讨论了一些中央文件；并提出对《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修改意见：“根据华东局及其他若干同志提议，对‘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以至消灭富农剥削’的口号，改为‘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暂时不提消灭富农剥削。因为这样对于公开宣传较为有利。”

1月15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的决议，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1月16日复电毛泽东：“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致电毛泽东：“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2]，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 [1]指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问题。

[2]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来改在二月六日开会。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1]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指

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学说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彻底胜利，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大路，这是列宁主义的一次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胜利。”“在中国目前过渡时期中，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对于我们是完全适用的。毛泽东同志最近所规定的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按照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运用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而提出的。”

审阅中共山西省委十一日报送中央的《关于在今年春节期间进行工农联盟教育和组织工农联欢的通知》。在中央对山西省委的批复中指出：原通知中的“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大团结”的提法不妥，“应该说，工人同农民以外的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是属于工农联盟范围内的而不是在工农联盟范围之外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另外一种联盟。以上望通知各地注意。”

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1]周、陈、彭、邓，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1月25日、2月5日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

2月3日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2月6日——10日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六日，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在会上作报告。报告概述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所进行的工作；提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问题；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交全会讨论。报告指出：“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报告强调：党和军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这些同志应当以身作则，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2月22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名义，致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

夫：为使中国留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更能直接地参加苏联学校内苏共党组织的生活，完全接受学校苏共党的统一领导与监督，并学习苏共党的工作的丰富经验，将现在苏联各学校的中共学生支部委托苏共中央交给苏联各学校苏共党委直接领导。

2月28日、3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负责，以董必武为主，根据中央政治局对讨论的意见及宪法起草小组的意见，将三读稿加以研究和修改。

3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大会并致开会词。

致电朱德并罗荣桓、聂荣臻：“望你们好好休养，如有重要情况望随时电告。北京昨日召开了二千四百人的高级干部会，由恩来、陈毅二同志报告了四中全会及两个座谈会[1]的情况，效果很好。”

3月12日、13日、1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四读稿。会议决定：（一）以陈伯达、胡乔木、董[1]指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的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八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初稿的最后修改；（二）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以李维汉为秘书长。

3月16日致信朱德：“你三月四日来信收到，所提意见甚好[1]，已抄送书记处各同志。关于肉食和养猪问题，中央已将商业部报告发给各地，其中也说到要各地注意增加猪的饲料。关于高岗和烧漱石问题，中央已发出两个文件，这些文件可从华南分局看到。政务院春耕生产指示不久亦可发出。望你很好地休养。罗、聂[2]二同志亦望将此意转告。”

3月23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决定：宪法草案除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外，政协全国委员会也进行分组讨论，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

3月26日去北京车站迎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4月15日主持中央选举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目前全国基层选举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会议就即将召开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几个有关问题作了决定。

4月19日审改《人民日报》将在次日发表的社论《党委应该积极领导报纸正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写了以下内容：“对于典型的坏人坏事，不只是应该进行批评，而且要进行无情的 [1]朱德信中建议：全国各地区凡能产红苕（红薯）的地方，多栽红苕。红苕叶子供猪吃，藤子可供气季猪的饲料，红苕细根可养肥猪。

[2]罗、聂，指罗荣桓、聂荣臻，当时在广州休养。斗争，给以严重的打击，以便在我们的国家中消灭这种坏人坏事。但这种坏人坏事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的，而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我们也必须采用这种特殊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它。至于我们工作中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则是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时候都有的，对于这些普通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就应该采取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大家团结起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不使这些一般的缺点和错误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而这是在任何地方、

任何部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报纸的任务不只是对于前一种坏人坏事应该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更重要更经常的是对于后一种一般性质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5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印发以下四个文件：《苏共在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对农业生产中的自流现象）》、《苏共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苏共强调在宣传教育中重视党的决议》、《苏共在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批语中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必须注意这几个文件中所说的问题。

5月27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

5月28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

5月29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第三章。在讨论“民族自治机关”时说：宪法规定少数民族有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是保护了少数民族，不规定，他们就要吃亏。这样规定是限制了少数民族，还是限制了大民族？我看是限制了汉族，不是要侵犯少数民族，而是限制侵犯少数民族。我们每一个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都是保护少数民族的，例如选举法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法律不充分保护少数民族，这个法律就行不通。

5月31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第四章，并对宪法草案初稿再次进行通盘讨论。

6月8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

6月11日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和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

6月14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决定将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此后近三个月的时间，全国有一亿五千万人参加了讨论。在此期间，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6月19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会上就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问题讲话：现在，各项社会改革已经完成，已经到了实行大规模的计划经济建设的时期，需要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上的统一集中，是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有很多建设事业，必须集中全国力量来做，而决不是一个大区或一个省市的力量所能胜任的。撤销了大区，同时要加强省、市的领导，中央要与各省、市直接接触，直接领导各省市。大区一级机构有十五万人，干部有好几万人，撤销了大区一级机构，就可以加强中央和各省、市。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相应的决定。6月29日—7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编制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

7月5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会议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了协商。7月6日审改将在次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方针》，在社论最后一段“既要掌握中心，又要保持各种工作相适应的发展；既要对上级负责，又要对当地

群众负责；既要服从全局需要，又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任何偏向一面的简单化观点都是错误的”之后，增写了一段话：“这就是领导的艺术。党的领导机关要作好这件事是有困难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可以作到的。一切领导机关必须作好这件事，才能算是一个好的领导机关。” 7月12日、13日、16日、19日、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先后听取李富春[1]、邓子恢、薄一波关于编制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

8月2日到首都机场迎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范文同。三日，同范文同会谈。

8月9日为印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整理的材料——

《苏共中央强调科学研究工作与实际相结合》，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此材料和中央五月五日所发苏共在宣传工作中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对教条主义两篇对我们很有用处，望各级党委加以重视。”8月21日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李富春，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8月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共中央对党员应遵守的若干纪律（例如不作寿、不送礼、不以人名作地名等）应有明文规定，并责成马明方[1]、张际春[2]、肖华、胡耀邦等起草一个决定草案，提交中央批准。

9月3日主持中央选举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批准邓小平委员作的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情况的报告，并通过公布代表名单的公告。

9月8日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9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11日和毛泽东一起，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四日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地区代表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9月12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会议还修正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9月15日——28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1]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会议。十五日，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报告从我们国家的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说明了宪法的基本内容。报告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共产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它法律中起模范作用，全国各族人民要为

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为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几个重要法律。二十七日，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

9月25日——30日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会见应邀前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越南、蒙古、保加利亚、波兰、朝鲜、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

9月30日主持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

10月1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苏会谈的报告。

10月22日同朱德一起会见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

10月24日会见来我国访问的英国物理学家、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约翰·贝尔纳教授。

10月31日到达广州。

11月1日——23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审议修改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11月1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如同意，请印发为盼。”随电发去中共中央《关于请各省市制订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

《指示》指出：中共中央已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示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

11月24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北京。

11月26日途经武汉时，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在火车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汇报。

11月27日途经郑州时，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关于水土保持和治黄工作的汇报。

11月28日回到北京。

12月9日会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

12月10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问题。

12月中旬听取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的汇报，指出：农村的小商小贩还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他们是商业劳动者，能够深入到任何偏僻的农村，要为他们提供货源，使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利润；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满足人民的需求。农村小商小贩有几百万人，非常分散，无领导，无计划，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应该团结教育他们，并通过组织起来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改造。

12月20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和《一九五五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12月25日同北京育英学校校长韩作黎和教师王衍茹、郭象慧谈话。针对该校学生中干部子弟多的特点，要求学校和老师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教育，不使学生特殊化，将来到社会上不为群众所讨厌，而为群众所信任；要特别

注意向学生和家长进行关于劳动的宣传教育，并争取家长的配合。

12月27日召集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外贸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在讲话中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全世界的人口增加以中国为最快，现在每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如果不节育，增加还要快。小孩生多了困难很大，父母、家庭、小孩本身都困难，社会和国家也困难。衣、食、医药、学校等等都不够，而且一下子也解决不了。因此，应当赞成节育。要搞一个关于节育问题的党内指示，先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卫生部门可以编些节育技术指导的小册子。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要努力做好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提倡节育》。

12月31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市、镇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

## 1955年五十七岁

1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时发言：国营一定要管私营，不管私营，社会主义搞不好，甚至搞不了。

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元旦团拜会和晚会。

1月10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草稿），增写了以下意见：“应当指出，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提高革命警惕性，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在我们的机关中安置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所能达到目的的，更不能因此就废弃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尤其不能因此就改变党同非党劳动人民联盟的方针，以及在工作中不用诚实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一切忠实于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非党工作人员。”这个指示于十七日下发。

1月18日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饶漱石的问题。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钱瑛[1]关于东北地区工矿中党的组织和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语说：“钱瑛同志这个报告反映了东北地区工矿企业中很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各区也是有的，值[1]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得各地党委和有关领导部门的严重注意。除工矿企业中的一长制和党委干部的调整两个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制订办法报告中央审查外，特将钱瑛同志这个报告发给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阅读，望即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具体的分析，展开必要的批评和斗争，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纠正存在的各种错误和缺点。”

1月24日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稿。同日，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

1月批示将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指出：“这一暂行条例的原则，对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也是基本上适用的，国家机关和军事部门可仿照这些原则来建立和改革自己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

2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韦国清并转胡志明电：

“关于援助越南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中国是会尽力满足越南同志的要求的，但越南在最近几年内（可以是五年，也可以是二年、三年或四年）需要中国援助一些什么项目和援助多少，请越南同志提出一个计划和数目。”

“在长期援助计划确定以前，越南同志可以即刻提出一九五五年要求中国援助的计划（包括贸易货单和金额），以便尽早解决目前的问题。”

2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全国第二次省市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在发言中提出：计划工作和计划机构要加强。计划工作不是临时的，计划机构要长期存在。县、乡也要搞计划，就是搞不好也要开始，只要开始，慢慢地就会搞好。财政与基本建设的矛盾是否可克服？办法是多收少支，增产节约。节约有许多文章可作，工厂机关有许多节约潜力，要来一个反对浪费、提倡节约的运动。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会议决议将这一草案交由国务院发给各级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征求人民意见。

2月8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2月上旬审阅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青年团的一些主要情况和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关于今后工作的部分增写了两条：“动员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密切协助公安部门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动员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同一切国家和经济机关中的贪污浪费现象进行斗争。”

2月12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关人员的决议》和《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关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

2月14日审阅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城市妇女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在批示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好，合于实际，可以同意。加了注意时事政策教育一句，此点城市妇联要经常注意抓紧，因为不论宣传员和报告员，常常容易忽略对散居城市居民的宣传鼓动。又，对南方城市妇女工作的经验，要加以应有的注意。”

2月24日同毛泽东、周恩来出席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举行的盛大宴会，共度藏历新年。

2月26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

2月28日从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党组的报告中，了解到山西孟县、清徐在执行拘捕条例时发生混乱现象，为此写信给董必武<sup>[1]</sup>、彭真<sup>[2]</sup>：“为贯彻逮捕、拘留条例，党内应发一指示，对县区乡随便拘人问题，应拟定一些办法，望召集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同志商酌，拟一指示交中央审核。”

3月5日审阅《全国总工会一九五四年工作报告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要点（第二次修正稿）》，并批示全国总工会：“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发生虚报成绩、假劳模以及贪污浪费、干部不团结等严重现象，工会系统没有或者很少向党和政府反映这些现象，并帮助党和政府向这些现象斗争。以后应提起注意，号召群众对这些现象加强监督，并经工会系统向全总反映，同时向相当的党委反映。全总和省市工会组织应有专人处理这类反映的材料，并进行初步的调查，重要的事件应向党中央及国务院反映。望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看是否能提出些适当办法。”

3月6日在看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情况简报《河南杞县初级市场变化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后，批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供销合作社现在所负责任非常重要，工作很繁重，但干部不强，人员也杂，贪污舞弊事情很多，急需加以整顿，合作社监事会本应严惩贪污舞弊行为，但不得力，甚至不起作用。为了把全国合作社加以整顿，使它很好地担负自己的任务，作好自己的工作，必须各级党委花大的力量来领导和帮助合作社，并加强合 [1] 董必武，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2]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作社的干部。”

3月7日审改中共中央转发黄河水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总结报告》的批语，增写了以下内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是根治黄河最根本的办法，也是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注意，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采取适当的方法，逐年加以实施，是能获得伟大的效果的。”“中央认为召开这种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很有必要，责成中央水利

部每年或每两年召开一次有华北、西北各地代表参加的这样的会议，总结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报告中央批准施行。各有关的省、专区和县亦应酌量开这样的会议，并将结果报告上级和中央。”

复信给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乡农民黄端生、成敬常，希望他们“和所有乡亲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认真努力，把合作化的事业搞好。”并说：“组织合作社必须使加入合作社的人都不吃亏，并且能得到些好处，同时，必须都是真正自愿入社，不愿入社的，绝不要强迫他入社。合作社是要积极办的，但必须办好。因此，不要太性急，宁可慢一点，但是要办好一点。”

3月10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关于第一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计算的问题、关于省、县、乡改变建制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超过选举法规定名额是否重新选举的问题。

3月11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3月21日——31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会议听取邓小平所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二十二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发言。4月2日约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陕西省委、甘肃省委、青海省委及西安市委负责人谈话。在谈到陕西省党代表会议如何召开时说：广大人民批评我们会多、会长，会如何开得好应当作为一个改善领导方式的重要问题去考虑。为了把会开好，就要在会前作好准备，报告、决议写出来，印发给到会的人，发言也事先写出来，避免拉拉扯扯，这样会就可以短了。在谈到监察工作时说：为了提高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要号召群众监督，要坚决反对那些认为告了状就了不得的看法和做法，有些人不准别人告状，追查写匿名信的人，实际上是反对监督。在谈到牧区工作时说：现在在牧区不要提社会主义改造的口号，只在干部中提出畜牧业生产也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但暂时不提合作化，因为还没有找到一条具体的道路，等试验成熟，有了经验，定了政策，再向群众宣传。

4月4日出席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全会批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三项决议和新选出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致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答复该刊向中共中央约稿一事：“今年除将转发重要报告、文件并已发来林伯渠同志和蔡畅同志的两篇文章之外，将另行供给专文五篇，题目如下：一，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斗争；三，中国青年——党的可靠助手；四，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五，百倍提高警惕，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制度而斗争。”

4月5日约集西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问题时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论时间迟早，总是要解决的，但是怎样改法，哪些地区可以改，就要很好地调查研究，慎重从事，如果要改的话，也要大家

同意，即人民同意，你们同意。在谈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时说：少数民族要求成立自治区，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要忽略；说那里没有经济中心，不允许成立，这不是理由。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亚非会议[1]的问题。

4月6日约集中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时说：办好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树立旗帜，建立信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对农民，对我们，都很重要。今后的方针，应该是巩固地向前发展。合作化的要求是又快又好，以好为第一，因为好了就可以快。这一批办不好，就不能快，为了快。必须把这一批办好，所以合作化的快慢，决定于这一批办得好不好。在谈到省委的组织形式和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问题时说：工作重心变了，过去搞革命，现在搞建设，因之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也要随之改变，一揽子的领导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 [1]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参加，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各种业务机构。必须健全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部门的业务机构，提高其水平，使之能负担它所应负担的任务。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业务部门去做，党委就可以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管他们的业务，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将是如此。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干部可不可以复员？我看可以。他原来是做什么的，就复员到什么岗位去。原来种田的回农村；原来是工人，安置到工厂去；原来做生意的还搞商业。只要有地方安置，他们自愿去就可以去。

4月7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决议》。

约集华东各省市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党内生活问题时说：“书记和委员，应当不怕有人反对，你反对得正确，对党有利，很好；反对得不正确，只要不是有意地制造分裂，也不怪罪于你，因为你有反对的权利，党章允许嘛！”“党内有意见不能怕争论，而应当公开地争论。只有公开地争论才不会破裂，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有意见不能展开争论，就是党内生活不健全。”“你们应当向党员展开宣传，说明党内生活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错误的。”

复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信中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机关这样多，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好，这是事实。同时，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这封信编入《刘少奇选集》。

4月8日约集北京、天津及华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说：凡是盲目发展得多的行业困难就大，这里有一条经验，并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好的，如果发展不是有计划、有前途的，发展本身就带有破坏性。在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河北省已经建立十万个社，山西省人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二，这是很大的成绩。目前主要问题是把现有的巩固好，只要巩固好现有的，就会有农民要求入社，所以，为了发展，就要巩固。今年明年少发展些，因为干部没有训练出来，经验不成熟，再快了就要发生危

险。在谈到粮食收购问题时说：决不能依靠在初级市场用价格政策收购粮食来完成任任务。价格也的确可以指挥市场，但如果单纯依靠价格政策，就会造成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得利的是商人和少数富有者，吃亏的是劳动人民，这是资本主义的路线。我们不走这一条路线，而走社会主义路线。实行统购统销，就是为了使若干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以保证广大人民的必需。

4月9日约集东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厂矿实行一长制时指出：实行一长制，以便有人负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党委要监督、保证，管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些，不是破坏一长制，而是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一长制。厂长要依靠党和群众才能做好工作。在谈到党委工作时指出：过去税收、征公粮都由党委管，现在财政部门把任务担负起来，党委就可以不管了，现在全党老管统购统销也不妙，要成立采购部去管，健全业务机构，使其能挑起担子来，这是使党委工作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关键之一；业务推出去了，党委的部门就可以管干部，管政治思想工作，管党的组织工作，就可以检查方针政策，实行监督。在谈到合作化问题时说：东北地区合作社已经发展了很多，今年主要是巩固，把现有的办好，不要多发展，甚至可以停一年，只要把这一批办好，将来就快了。在谈到农村建党问题时说：农村发展党要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合起来。所谓觉悟高，就是对合作化事业积极，能爱护公共财物，关心公共事业，愿意多尽义务，而不是自私自利。这样的人就可以发展入党，每个合作社要有一批这样的人才能办好。在谈到有些地方脱产干部过多时说：不能无限制地脱产，要加以控制，太多的要逐步减少，但不能因而削弱党的工作。在谈到确立国防观点时说：要教育人民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要“使人民有这个观点而又不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要使人民更有信心，要能增强内部团结，更加紧做好我们的工作。在谈到依靠贫农问题时指出：依靠贫农在内容上现在和过去不同，现在要包括新中农。新中农不能不依靠，因为他们人数多，贫农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依靠百分之二十是不够的，新中农过去是贫农，由于土地改革和党的领导才上升起来，因此是可以依靠的。

4月10日同朱德、陈云一起，会见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立特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图尔特。

4月12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草稿）。在如何对待农村商贩部分增写：“应该看到工人阶级当了政，对其他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出路必须负责适当安排，这是适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在如何组织农村集镇私商部分增写：“采取以上各种形式组织农村集镇商贩时，同时也必须注意对未组织起来的私营商贩营业额的影响。”

4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发言中指出：今后一年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全面停下来，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区、乡未办的，有条件的可以试办。全国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其中发展过多的省份有超过两三万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能巩固住五十几个社，即是最大胜利。

5月6日写信给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的次子刘允若，希望他“与同学们搞好关系，长期坚持地学下去，经常注意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培养自己成为国家的一个有用的人”。

5月7日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采用简化汉字的报告上批示：“拟

同意人民日报采用这五十六个简化汉字[1]。以后各报采用简体字，应先由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报告中央批准。”

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周恩来谈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

5月1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6月9日将一份反映不少职工疗养院医疗效率不高、床位使用率低、修建中有浪费现象的材料批示给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指出：“过去办这些事，是有一些错误的，没有严格地从中国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以考虑。应总结这些经验，并拟定以后的办法。在没有拟定新的办法以前，这类休养所不要新建。”

6月1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一九五六年有六十七万个社的基础上发展到一百万个社的计划。刘少奇在会上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6月18日复信给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乡农民协会主席王升萍：“希望你与其他同志们来信，告诉我一些乡村中的情况：生产成绩、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各阶层对政府政策的反映等等，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我们的工作，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完善到 [1]这五十七个简化汉字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第一批试用的简化汉字。一点缺点也没有，问题是我们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用不断地改正我们缺点的方法改进我们的工作。”

6月20日写信给刘允若，对他五六月间来信所说由于和同学们相处不好而要求转系和留级一事，提出批评，要他放弃这种错误的想法，老老实实完成五年学习的任务；勉励他克服困难，学会解决各种矛盾。

6月22日致信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主管人事工作的刘英，请她和大使馆的党组织协助解决刘允若的思想问题。

6月2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七月五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刘少奇在谈到这次会议要提倡朴素的作风时说：“现在全国进行经济建设，工厂、铁路投资很多。以后工厂厂房可以好一点，礼堂、工人宿舍、非生产性的房子要差一点，降低标准，有的要降低一半。沙发、地毯、写字台也要降低标准。招待用的香烟、水果、饭、点心，以后一律取消。提倡朴素的作风，不仅仅是作个报告，以后还要制定法律。”

6月28日致信陈嘉庚[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国家预决算等重要议案，事关我国工业化，意义重大，务请届时出席为盼，何日动身，请先电告。”

7月5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7月5日——3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计划。

7月8日复信江西萍乡安源镇工会主席范明庆等：“你们所请增加工会

两个脱产干部及修轻便铁道事，已转江西省总工会及铁道部酌情办理。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同志，如黄静源、周怀德、谢怀德、刘昌炎同志等烈士，我记得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纪念碑，并举行追悼会，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此事望你们商同萍乡县政府酌情办理。”7月10日审阅中共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全国城市妇女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在批示中指出：“城市中有广大的小商小贩及其家属，应对她们进行工作，文件中没有说到，应予补充。”7月17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陆定一工作汇报，并商谈西南、云南问题。

8月11日复信给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浑希仲，肯定他来信中所说的加强对干部子弟教育和取消对干部子弟特殊待遇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告知：党中央为此已经或正在采取一些办法。

8月25日在审阅赖若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加强工会建设，密切工会与群众的联系，为胜利地完成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后，致信李富春、李雪峰[1]、赖若愚：“目前有些先进的企业和落后的企业，它们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原材料的消耗、成本、产品质量等等悬殊[1]李雪峰，当时为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负责人。

很大，如果这些企业的规模及其他条件是大体相同的话，对落后的企业加以帮助，改善工作之后，这种悬殊是可以缩小或消灭的。

因此，如何组织先进的企业去帮助落后的企业，找出落后的原因，改进工作，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消灭落后的现象，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望你们同财经各部商量，提出这项重要任务，采取具体措施，先经典型试验，然后加以推广，以便逐步地但是尽可能迅速地消灭落后。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消灭了落后，应受到郑重的奖励。”“职工业余教育应分为两部分，一是普通的群众性的文化技术学习；二是高级的和比较高级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学习，这只能是少数人的或一部分人的，但这种学习很重要，必须为这一部分人或少数人创造学习的条件，不能因为他们人少而不予重视。”

9月5日在审阅《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摘要报告》后，致信陆定一、张际春：“编译局的工作计划望你们注意并讨论一次。我曾同师哲[1]、陈昌浩[2]同志谈过，应限一个时间例如五年译完并出版马恩列斯经典著作，请你们考虑是否可能，并在计划拟定后报中央批准。”

9月8日在看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把初中实际上当做初级农业技术学校来办的电报后，指示林枫[3]：“请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加以讨论，问题是要确定我国目前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的目的，同时又要不要妨害升学。课程的安排是要保证实现这个目的。”

9月1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 [1]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局长。

[2]陈昌浩，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3]林枫，当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议经过讨论，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

出席首都各界代表追悼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大会，担任主祭，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

9月15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彭真联名，致电日本国众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邀请两院各政党和无党派的国会议员派遣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电报中说，这“对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有所裨益”。

9月20日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题词：“学好本领，建设祖国。”

9月2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决定授予朱德等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还通过《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决议》。

9月27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

9月29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听陆定一汇报各省肃反情况。

10月3日为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题词：“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幢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事。

10月4日——11日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十一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认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他的其他指示及时地、全面而正确地解决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指出：“为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伟大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口号”，这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各级党委根据群众的各种条件并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定出分批分期发展合作社及其他一切有关事项的全面规划，又在运动中加强党的领导，才有可能既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错误，又防止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发言中，刘少奇还就农业合作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

10月16日举行宴会欢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并致词说：

日本国会接受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邀请，派遣代表团前来我国，这还是第一次。它将给今后中日两国议会代表团互相访问，树立良好的开端。我们愿意同我们的邻国早日建立正常的关系。为着两国邦交的恢复，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谈判早日实现。只要中日两国间正常关系问题能够解决，其他许多问题，都会逐步地获得解决。

10月2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工商界的宣传问题。

10月29日出席毛泽东邀集的由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座谈会，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0月30日会见以丹尼埃·麦耶为团长的法国议员代表团。

10月31日审阅《全国总工会生产部关于今后开展厂际竞赛的意见》，

针对有些企业单纯为了夺取红旗或赢得奖金的锦标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批示全国总工会：“因为是竞赛，有红旗和奖金，这种流弊似乎就很难避免。因此，口号似应这样提：落后企业向先进企业学习，赶上先进企业；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赶上自己，同时力求自己更加进步。落后企业赶上先进企业者有奖，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赶上自己者也有奖，在先进水平上再有进步者更要奖，在这里不要说尤其不要强调优胜劣败的话。”“对落后企业的人员指出生产上和其他工作上的落后情况（同先进企业比较），给他们以批评和压力是必要的。如此才能促进他们努力并向先进企业学习。但当落后企业愿意向先进企业学习时，先进企业的人员就必须毫不骄傲地热情地采取一切必要的办法去加以帮助。”

11月1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现在我们要全面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要在两三年之内搞出一个头绪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大体上有这么几种办法：一种是没收，一种是挤垮，一种是赎买。至于用什么办法，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三种办法哪一种好，要统一一下认识。在阶级斗争这样紧张，五亿几千万人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党内思想不统一，认识不一致，是很危险的。在我国，用赎买的办法，统一战线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资本家进行教育，向他们指出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前途是光明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1月22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

11月23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12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并提出：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为起草中共中央向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门同志预作准备。

12月7日听取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汇报。

听取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的汇报。

12月8日为中共中央某部题词，“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2月8日、10日分别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汇报。

12月9日听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廖鲁言、刘瑞龙、魏震五等的

汇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奥托·格罗提渥。

12月12日、13日听取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陈郁的汇报。

12月13日听取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的汇报。

12月14日听取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景范、宋应的汇报。

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人俊的汇报。

12月15日听取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副部长周荣鑫的汇报。

12月16日听取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的汇报。

12月18日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肃反等问题。

12月22日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汇报。

12月27日听取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改造小业主是个大麻烦，我们要不怕麻烦。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很有技术的，要注意发挥这些人的作用。一切好的人才，我们都要保留下来，一部分当职员，一部分当工人，凡是能进厂者尽量进厂当工人，合营厂放不下，就到国营厂去，这就把资产阶级分散了。

——要很好地注意先进厂与落后厂的差距，一定要找出原因，促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生产的大问题，也是领导的责任。

——新产品要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比如说皮鞋，捷克斯洛伐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全世界的鞋子也买来看看，然后再来设计，搞出各种式样的产品来。为了研究新产品，要把资本家中会搞设计的人养起来。服装设计也要搞，想花样很重要，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

——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要接受手工业的优良技术和传统，如果结合起来，在中国手工业基础上发展、提高，有很多产品是可以超过世界各国的。

——要想办法把产品质量标准定下来，多搜集技术资料。有些资料中国现在没有，可以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搞，也可以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搞。要提高工业水平，就要抓产品质量标准。

12月28日听取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张琴秋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沿海不进行基本建设，但也不要限死，投资少、回收快、发挥潜力大的，还是可以搞一些。

——今后纺织机器必须自己做，进口一点做样子是可以的，应当搞一个全面规划，全世界好的机器，都要搜集，都要造出来。

——节约用棉，必须与提高质量相结合，提高质量是对消费者负责的问题。

——纺织品和针织品的品种花色要增加。不断增加品种花色，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来促进生产是进步的，这和腐化不同，腐化是妨碍生产，破坏生产的，而刺激生产则是进步的。

12月29日听取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社会主义最怕无人负责。由于没有通盘的计划，或者有计划而无人控制，生产就出乱子。一时多了，一时少了；原料供应也是无计划，这里多，那里少，内地分配多了，上海分配少了，弄得你叫我喊，原因就在这里。所

以全面规划非常重要。

——轻工业与手工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有不少手工业的技术很好，应该把轻工业的制造技术与手工业结合起来，不要抛弃本国的传统基础，什么都学外国。

——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中专有一些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想出许多新产品新花样，有些做西装的裁缝，将全世界的西装样本收集来，你要做什么式样，他就替你做什么式样。苏联派人来中国，专学人造花朵、象牙雕刻，而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除了学外国的东西外，还应该自己创造新产品。

——中国设计新产品的人，往往是些不著名的人物，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但确有本事。应该设立一个机构，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专门想新产品新花样，还给奖金。这样，这些人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如果我们不注意培植，那么，资本主义消灭，这些人也跟着消灭了。

——新产品没有试制好就成批生产，那是冒进。有些产品必须达到技术标准，有些产品达不到标准而可以容许质量较低的，必须经过部一级机构批准。质量靠不住的东西不能出口。

12月30日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副局长邓洁等的汇报，就手工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以后，是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应该很好地研究。集中生产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不在于是高级社还是低级社。

——修修补补的、磨剪刀的、修农具的，这些分散的、流动的个体劳动者无论如何不能减少，而且要加多。分散流动，生产上门是手工业的一个好特点，要维持，要保持。

——技术要提高，太落后的应加以淘汰，不很落后的要注意保存，并加以提高发展。——花色品种要注意。要专门搞个机构，把技术高的手工业者养起来，他们有新创造就马上奖励。妇女穿什么衣服好，鞋、帽、桌子等等如何改变样式，他们会设计。搞社会主义，不能把这些东西搞掉。

12月31日听取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副部长金明等的汇报，指出：“财政来源要从经济上着想，经济发展了财政上就有办法。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主义，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更好克服。”“今后投资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重点建设，一个是利润大、生效快的事业。”

## 1956年五十八岁

1月2日听取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陈希云、喻杰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征购制度如何改变值得慎重研究，我国和苏联情况不一样，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和征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征购粮就必须降价，农民就会有意见。

——定产、定购还是肯定三年不变，销量如果要增加，可根据统购后市场收购的情况来定。城镇定量供应的制度今后不公开取消，情况好就松点，情况不好就紧点。

——储备粮计划打多大？国家和农民储备多少？粮食部应研究，粮食的季节差价过去取消，主要是为了打击富农，现在农村购销差价一年到头都是百分之八，国家既赔钱，农民又有意见，需要研究。

——中国豆类产品很多，但单位产量不高，应组织专门机构研究。今后只要粮食有办法，可以多加工一些成品（如酒、月饼、饼干等）出卖。

1月3日听取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王磊等的汇报，提出如下意见：

——小商贩可以组织起来，但不要完全并掉，留下百分之十也不要紧。不要改变他们的经营方法。

——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多了，要拿东西去换，你们可以放手向工业部门提出，增加农民需要的新产品，不要怕新产品积压。

——新的工矿区成立商业局很有必要。今后只要有人去建设新工矿区，就要派一批商业工作人员去为他们服务，而且要派思想好能吃苦耐劳的人去。

——广告是向人民宣传的，应当有威信。各工厂、合作社搞广告必须经过广告公司，不许讲假话，要货真价实，讲优点缺点，有科学家鉴定。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领导机关如何合并，可以多设想几种办法。考虑这个问题时，不要按常规办事，不要限制思想，要考虑对事业是否有利，群众是否同意，这是最基本的。

1月4日继续听取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社会主义商业现在存在着不灵活性，愚蠢性，不能适应地方情况的变化。兰州通了火车，你们不紧跟着去降低物价，那里的布价还是那样贵。这一点，你们不如资本家，他们灵活得很。解放以前没有全国市场，仗打完后有了全国市场，地区差价也大了，私商赚了很多钱。做生意的人要很灵活，很敏感。

——把全国商人中最有经验的人组织成为总公司的或地方商业厅的顾问团或聘为参事之类，可以起两个作用，一是统一战线的作用，一是向他们学习，他们是我们的先生、前辈。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长处吸收过来。

——工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商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分配。商品积压的原因，在于不适应人民的需要，必须力求改进。这是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必须责成国营商业品种齐全。这是人民的需要，不能怕麻烦。如果怕麻烦，只肯组织大路货，不肯搞小百货，那末这种人就不要吃国营商业的饭。社会主义商业的货物应当比资本主义商业更齐全，这才能显示它的优越性。

——临时工转正，要看本人是否有此要求和企业是否需要。只要企业需要就应首先增加他们；如果不需要，即使干了三五年，也不必转正。今后不应当用固定工的名义，应当学苏联的做法，一年签一次劳动合同，这种合同工也是正式工作人员。

听取姚依林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张启龙、邓辰西、邓飞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合作社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五亿农村人口，是由合作社在做生意，零售额超过国营商业好几倍，从总体看，合作社的规模和它承担的任务，比国营商业大得多，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是没有国营商业的帮助和支持，合作社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商业部不论对城市还是对乡村的商业都要负责，要把合作社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不能推开不管。合作社也要向商业靠拢。要强调互相支援，互相帮助。

——合作社的着眼点不要放在赚钱方面，应当强调把事业做得更好。

——商业部要把合作社当作一个可靠的力量加以使用，要把合作社当成自己的机构一样，帮助它，支持它，要求它。

——国营商业与合作社要分工，但有些东西也不可能分得那么明确。两家要搞“合作社”，不要搞“单干户”，少扯皮，多讲点友谊。要宣传友好合作，不搞友好合作的要批评。能分清的分清，分不清的大家共同去做。

1月5日听取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解学恭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外贸计划可制定大中小三个方案，大方案的贸易额可在，一千亿元以上。

——扩大出口，继续贯彻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改进出口商品的质量。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外要保留几块外贸信用好的招牌，以利对外活动。

——要扩大外贸行情的研究机构，出版面向国际的外贸杂志。

致信周恩来。陈云、李先念<sup>[1]</sup>和中国人民银行党组，转述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对银行禁止赊销一事的意见，信中说：“目前国营企业还有一些产品是积压的，这些积压的产品如能用赊销或分期付款办法或其他办法推销出去是对经济上有利的。又我国还将出现很多新产品，各种新产品可能要经过一段试销时期，在试销时期也要用赊销、分期付款等办法。因此，完全禁止赊销，可能不很适当。望再研究酌定。”

1月6日听取农产品采购部部长杨一辰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农产品采购是个带关键性的机构，它跟工业、出口和农民都有很大关系。它的工作有很大的政策性，搞得不好，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

——采购工作不只是个采购的问题，而且要通过采购来指导生产。采购部门只要能做到保证收购，保证价格，指导生产方法，<sup>[1]</sup>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就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植桑养蚕，淮河以南的十四个省都可以种茶树。生产蚕茧、茶叶这些东西不占粮地，可以大发展。采购部门可以向农业合作社订购蚕茧、茶叶，并教给生产方法。

——采购农产品需要有科研部门的协作。例如能榨油的东西多得很，南方很多野生的黄梗籽、梧桐籽都能榨油，需要科研部门加以研究。新原料的

试验，要提出计划，要有试验费，试验有成绩的给以奖励。

——需在新产区推广种植的农产品，开始几年收购价格应当高一些，用价格来刺激生产，待生产发展起来以后，价格可以降低一点。

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副行长陈希愈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各部门不重视财务，不注意节约，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给的多了，如果少给点钱，就会注意少花钱多办事。项目计划在执行中如发现不符合实际就应该改变，否则就会妨碍办事，要不妨碍办事又能有规矩地办事才好。

——预购、赊销是一种信用制度，银行不要去禁止，而要支持它的发展。有时是先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再给他工业品，有时是先给了工业品再收他的农产品。中国早有这种习惯，这是个好制度，应该提高这一制度成为国家制度。

1月7日听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副部长刘子久、毛齐华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现在采用的固定工与临时工的办法是错误的，临时工到处呼吁转正式工，使企业背包袱。过剩的劳动力应由国家负责，不能叫企业包下来。今后新工人或学徒都应实行合同制，签定一年或两年的合同。

——技术人员的工资可以高于部门或企业的领导人。如果是真正有技术的，工资可以高过厂长、部长甚至主席。

1月8日听取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工人犯了错误可以开除，开除后由工会管起来，改好了再吸收，这样才能加强劳动纪律，便于改造落后工人。

——工人得了职业病应积极治疗，可先由工会出钱办。1月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0日会见以南斯拉夫通讯社社长皮尔皮奇为首的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月14日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月15日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1日写信给刘允若，要他安心在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坚持学习，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信中说：“不管你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知识，对于你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是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接受这种批评，改正错误，也并不丧失什么面子，相反，凡是自爱的有自尊心的人，都应当欢迎这样批评。不要把正当的自尊心同保存一种虚假面子混淆起来，以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正错误，就丧失了自尊心。”

1月23日——24日会见苏联专家阿尔希波夫、谢苗洛夫，谈我国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月25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月1日写信给刘允若，再次劝他不要改变所学的专业。信中说：“你现在既不懂原子专业，也不懂电子专业，你现在的所谓喜爱或不喜爱，都是盲目的，为此而闹情绪，有点近乎瞎闹。我劝你安下心来，学好一门专业，再讲别的。你现在学好电子专业（只有四年半），将来完全可以再学原子专业，或直接到专业部门工作。当然，前面已说过，如果大使馆允许你去学原子专业，我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以为你这样转学，不会为你带来什么好处。”

2月14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听取各部委汇报一事很感兴趣，自本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亦先后听取财经方面二十九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其间，三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四月九日、十日，刘少奇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一同听取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2月16日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刘建章、余光生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铁路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对各个工业部门要有主动合作的精神。

——煤、粮食、木材等十七种物资，多数是生产资料，应该按照经济区域分区产销，合理运输。

——铁路运输不要只重视大路货，日用百货的零担运输也要注意。人民生活越好，需要的日用百货就越多，铁路不要怕麻烦，要想办法满足群众的要求。

——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新式的机车可以花钱买，可以仿造，自己试验。

——搞好铁路的基本建设，设计是关键。在基本建设上要注意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项缺少一项也不好。

2月17日听取交通部副部长李运昌、朱理治、马辉之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多吸收一些专家参加部领导，让他们挺起胸膛讲话是有好处的，一是把外行变内行，一是把内行变为红色专家。

——今后尽量自己造船。现在技术水平低，多造些船就会提高。采用先进技术很重要，落后的工具也要利用。

——目前水运的价格偏高，就该降下来。对降低运价有阻力，这是单纯财政观点。水运的运价不能比铁路高，必须低于铁路，运价高是事业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2月18日听取邮电部副部长范式人、钟夫翔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邮电部门是技术很高的部门，特别是电讯方面，必须采用最新的技术。究竟采用哪些新技术，要好好研究。

——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

——要好好使用技术人员，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些老干部不管人家业务技术水平怎样，文化水平怎样，总觉得你不是从山上下来的，在感情上就不是那样融洽，就不愿接近人家。从山上下来的也不见得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城市里也有不少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2月21日听取民航局局长邝任农、副局长李平、沈图的汇报，提出以下

意见：

——中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民用航空。中国没有强大的空军是不行的，强大的空军必须有强大的民用航空。

——航空事业的新技术要赶快学。飞机要下决心由国内自己造，采用机型要考虑到在战时的利用。

——专业航空有发展前途，要搞起来，现在力量很小，先满足工业、交通、水利的需要，再满足农业。林业的需要。——航空运价高不一定好，运价高了利用就少，飞机会空飞，不如降低运价。

2月2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为庆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加强藏族内部的团结，加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为建设繁荣幸福的西藏自治区而奋斗！”

3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之际，同作协负责人周扬、刘白羽谈话。指出：“大多数的青年还是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应该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不应该过早地把他们调出来。”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专业作家，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应该懂得自然科学，“也应该懂得历史知识和世界文学知识，至少应该懂得一种外国文”。“应该重视编辑工作，对于编辑的待遇，各方面都要提高。编辑工作是，一种高级创作，因为他要看作家的作品，鉴别作品，因此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创作，只不过他不写就是了。”作家“体验生活还是要参与实际工作，哪怕是很短一个时期也可以。”还指出：对作家的作品“党与政府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错了的。”“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同自己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自由论争就是要大家讲话。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这个谈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

听取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和副部长刘皑风、刘子载等的汇报。

3月6日听取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柳湜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应当在扫除文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中学教育。

——要注意高小毕业生是不是够。要多办一些高小，如果不注意办高小，将来可能出现高小毕业生不够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是高中、初中学生不够。

——有人提出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工业救国跟教育救国没有矛盾，有工业没有教育也不行。干部决定一切。工业救国要有技术干部。要有技术干部就要发展高等教育。要发展高等教育就要发展中学教育。要发展高中就要发展高等师范学校，中学招生任务要增加，高等师范学校招生任务也要增加，不能减少。减少高等师范学校和高中招生任务，反过来就会影响高等教育，也就会影响工业的发展。中学毕业生是半成品。有了中学生才能发展高等教育，培养技术干部。

3月7日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傅连璋、崔义田、郭子化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中西医互相都不懂，盲目反对就好似自己人打自己人。目前不要互相批评。

——要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的运动，在全国应组织三千名青年医师在职学习中医。

——加强基础的卫生组织，每个乡应有医务所或卫生所。

——气功疗法要提倡、推广，这种疗法并不难学，只要讲几次课，自己就可以做，为什么不去推广？针灸训练班要继续开办。

3月8日听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等的汇报，指出：“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任何事情都一样，没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要去改，至少慢一点改。要让民间职业剧团再搞它一个时期。比如在两三个五年计划内，让它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准最能得到人民的喜爱。”“要适当组织个体劳动。有些个体劳动是长期的，如修修补补等行业。乐器制造尽可能搞些合作社。文化用品生产能搞合作社的就搞合作社，不行的就个体劳动。对于流散艺人，可让他们登记，发给执照。说鼓书也是个体劳动，要让他们到处跑跑，但要适当组织，要适应他们的活动情况，便于他们的精神劳动。”“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文艺改革必须经过一定的努力。没有怀孕就要生孩子，这是不可能的。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剧团搞戏改，不要犯急性病，不能过早地改，改得不要过分。”这个谈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3月9日听取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荣高棠等的汇报，指出：体育已发展成为全民的事业，体育战线的党员要团结党外人士，共同搞好这项事业。体育工作有了规划以后，还要研究实际情况的发展，要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平，开展有益人民身心的体育活动。除了现代体育项目外，还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传统体育项目，研究其科学价值，采取各种办法传授和推广。体育还担负着国家的政治任务，促进各国人民的团结，体育在外交工作上可以同文艺一道成为“开路先锋”。要向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进行教育，不要单纯技术观点。

3月10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宋庆龄副委员长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的报告。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宋副委员长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反对殖民主义，主张独立民主，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她到这些国家去，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今后人大常委会要更多地开展国际友好活动。

3月13日到首都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迪·努·艾地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长征。

3月17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并决定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照原案通过，成为正式章程。

3月18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商议西方通讯社报道的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问题。

3月19日、2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

3月30日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澜涛、王从吾、刘锡五等同志谈工矿企业的监察工作问题。

4月1日听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关于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3日、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观点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言时指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免时，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直至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还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这篇文章于五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针对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的问题，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的错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应从中吸取的教训。

4月6日——8日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米高扬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

4月6日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陈云关于访问越南情况的汇报。

4月7日同周恩来一起，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和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沙·拉·拉希多夫。

4月20日致电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祝贺它的成立，称此事是西藏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喜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二十二日正式宣告成立。

4月2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讲话的基本思想，是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听取中央三十多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形成的。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依据这个决定，将释放有悔罪表现的日本战争罪犯。

4月27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在提倡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字。倡议书说：“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光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在这篇倡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邓小平、董必武、彭德怀、彭真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刘少奇在签字后回家即向王光美郑重地谈了这件事，并交待：自己死后遗体一定要火化，把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

4月30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致祝词。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

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需要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领导者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号召向先进生产者学习和看齐；号召生产的领导者支持先进生产者的运动，支持每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先进经验的创造。这个祝词编入《刘少奇选集》。

5月2日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并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期和人大代表到各地视察的问题发表讲话。

5月8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联席会议，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各地视察问题作了讲话：我们到各地去视察，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缺点，同时也要看看中央下去的东西有没有缺点，合不合实际情况，这样就可以改进中央的领导，也可以改进地方的领导，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更快一点解决。我们到地方上去视察，要看他们好的方面，同时也要看他们落后的一面，愿意找什么人谈话就找什么人谈话，不应该有限制。各方面的情况都可以看，希望大家把各方面的情况都反映上来。各种意见都可以反映，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反映的情况比较全面一点好，但一定要那么全面也很难，能够看出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很好，可以比较自由一些。还指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级跟下级是有矛盾的，中央同地方是有矛盾的。我们到地方上去，要问他们对中央、国务院和各部的领导有什么意见，让他们批评上面的领导，同时也要听一听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意见。

5月12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关于一九五六年直辖市和县以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议》、《关于准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

5月18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

5月28日听取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朱穆之、缪海陵、邓岗、石少华等负责人的汇报，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收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收下来。

——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

——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是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讲坏的，不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是客观主义，是有闻必录。要经过思考和观察，有自己的见解。要做到对当前斗争有利，不被敌人和反动派利用。

——新闻记者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不是皮毛地而是系统地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看出事物的本质。——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如果你的报道正确，人家把你赶走了，这是你的光荣。

听取广播事业局负责人梅益等的汇报，指出：广播跟人民思想、人民

生活、人民需要要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时装展览会，人民对它有兴趣，应该广播。又比如说，发现大脑炎、猩红热，可以请卫生部门广播一些预防常识。看起来是人民生活琐事，但很重要，这表示人民广播电台很关心人。

5月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讨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起草文件问题，主要是讨论起草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提议中央宣传部就此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在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报告后，致信安子文、陆定一：“在职高级干部离职学习，只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每门课程各离职学习三个半月到四个月（给各地一点机动）。其他三门课程——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及党的建设均不离职学习，只规定课程、材料要各人自读并听一些报告，也可进行考试，不参加考试的，也不必勉强。”

6月5日同周恩来联名致信陈嘉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拟于六月十五日以前举行。此次会议中心议题为国家财政的预算和决算、高级农业合作社章程，请即来京出席会议。”

6月6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并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没有准备好以前，仍可继续讲授《苏共党史》，并且应该讲完，但在讲授时可参照现在一些新的观点进行讲授。”

同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会见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等国兄弟党的领导人，并同他们会谈。在谈到党内斗争问题时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相互关系处理得不正确，党内就不能团结，就不能团结工农，团结人民。影响了团结，也就影响了一切，这是个决定性的问题，在工作中革命中和人民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过去有两种倾向：第一种是自由主义，不讨论原则问题，没有批评的态度，不分是非，和平共处，正确和错误不分界线；第二种是强调分歧，不注意团结，过分地相互批评，结果是大家不愉快。过去错误犯得多的是过火的斗争。在谈到外来帮助问题时说：外来帮助有真的帮助，也有帮坏了的。共产国际很想帮助我们，结果帮坏了。外国党的意见总不能象本国党那样正确，只有本国党最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问题只能由自己解决，外国的意见不能强加上去，只能当作参考。如果硬要加上去，可以把它抵挡掉。

6月1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对报告加以修改。经过此次会议讨论后修改的报告稿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

6月1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会日期，讨论本次会议议程和主席团、秘书长人选等问题，听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提请大会审定国家决算和预算的说明。

6月14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交大会审定；讨论通过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6月15日——3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并主持开幕

式。会议审议批准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讨论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中提出：“在执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6月16日参观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并题词：“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会，感到日本在工业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中日两国在五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共存共荣的经济合作，是可能的，并且是必要的。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6月17日会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在谈到向别国学习的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一种制度在这个国家实行得很好，不一定在那个国家就完全能照办，可能有不好的，因此还要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外国经验只能参考，但必须参考，所以我们也参考南斯拉夫及其他国家的经验，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6月19日召集胡乔木、吴冷西、朱穆之谈新华社的工作，说：新华社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新华社要好好研究报纸的需要，调查各种报纸的读者对象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使所发的稿件多种多样，适合读者的需要。记者要报道本质的东西，不要只反映表面现象。讲本质的时候，也不要硬梆梆那末几句，枯燥无味，要写得生动活泼，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反映本质和生动活泼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在这两方面提高。

同邓小平一起会见以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拉波欣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些工作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过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

6月27日、7月2日两次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煜谈党校的教学工作。在谈到如何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说：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我们有新的经验，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凡是能独立思考的人就不会跌交子，凡是照抄的，就会犯错误。苏联的许多经验还值得研究。在谈到党的建设的教学问题时说：中心是要总结我们党的经验。党内的斗争和党的团结出现问题，有些是路线错误，有些是一定时期的个别错误，我们党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解决的，苏联把它们混淆起来就犯了错误。在回答高级党校在教学上是否用得着整风方法时说：风是要整的，但不是天天去整。没有纪律不行，但又不能搞得死板了。整了风，使大家学习得更好，出去和群众的关系会更好些。不整风，有的人住了一年党校会犯更大的错误，可能更骄傲，有理论根据了，犯错误的胆子也大了。

6月29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会议，指出：

这次人代会会议上代表们的发言很好，很生动，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帮助。人代会就是要督促各方面的工作，只许作好，不许作坏。

7月7日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长张鼎丞、副检察长梁国斌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三大改造完成，革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现在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就可以控制住反革命分子，改造他们。这样看来，反革命分子就会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方针应该有所改变，不必再捕那样多的人了，杀人要更少，不是非杀不可的，就一定不要杀。

——检察机关今后批捕、起诉的工作是减少了，应该注意提高工作质量，特别要检查有没有捕错、判错的，如果有就要纠正。“不枉不纵”是检察院的奋斗目标，也是你们的职责。

——现在我们的法制有可能健全也必须健全起来。现在情况和过去不同，有很多反革命分子是隐蔽的，有的还隐藏在我们的内部；工人、农民当中也有犯罪的，如果再不健全法制，就容易出毛病了，现在所谓健全法制，主要是健全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的干部不要怕背包袱，不要怕人家说你“左”了或右了，看到什么问题处理得不妥当就提出来，这是你们的权力。

——检察院今后的方针应该是：监督合法，提高质量，抓紧重点，经得起检查。

——要把犯罪的人改造成为新人，这是我们的方针和目的。不要越改越坏，变成坚决反革命分子是不好的。这是第一条标准。另一条标准是生产。首先是第一条，要把他改造好。因此，要把劳改犯人的教育、生活、生产三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只有把教育工作搞好了，生活上有一定的保证，才能更好地发挥犯人劳动生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7月13日会见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在谈到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说，过去我们党和民主党派进行过合作，今后还要合作，不能说共产党可以再存在一百年，而民主党派就只能存在九十年。而且民主党派的存在，可以监督我们党，当然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们。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说：任何外国经验只能用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国家不论大小，都有

它的经验，必须相互学习。认为大国不必学习小国的经验，那是错误的。

7月15日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刊载的社论《从一封党员来信谈起》[1]，在社论中增写了以下一段话：“为了写成某些复杂问题的文件，可以先让别人起稿，然后由有关的人员讨论修改，再行定稿。负责人写的文件，也可以交给有关的人员讨论，并请他们提出意见，进行修改。但负责人对于一些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完全不动脑筋，只作传声筒，是要不得的。”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8月24日就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起草问题致信毛泽东：“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当日，毛泽东批示：“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

小的修改，请酌定。”

8月29日就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起草问题致信毛泽东：“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志通 [1]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是领导人呢？

是传声筒呢？》的党员来信，揭发浙江省税务局几个领导人向上级汇报工作，向干部做报告，甚至给党员讲党课，都由下级人员起草，自己不动手。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批评此类现象。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当日，毛泽东批示：“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

8月30日——9月13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

9月14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举行酒会，欢迎应邀前来我国参加中共八大的苏联等四十六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

9月15日——27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十五日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概述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内外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建国后七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方针和任务。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十六日，大会选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十七日，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

9月20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

9月22日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南布迪里巴德。在交谈中应客人要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整风是我们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主要是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文风上反对党八股。思想斗争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工作、讨论路线的方法。整风的目的就是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分析实际问题。要分析实际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占有全部材料是不行的。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行，不占有材料也

不行。立场、观点、方法可以学到，材料可以取得，有了这两条，问题就可以解决。

会见比利时王国国会代表团。在会见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断增进友谊，同任何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为全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是我国一贯奉行的坚定不移的政策。”

9月23日会见伊朗人民党代表团。

9月24日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在交谈中应客人要求介绍了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经验：党内经常有不同意见，有意见分歧，党就有责任把这些不同意见统一起来。统一是真的统一，是思想上的统一，这就要经过讨论，允许各种意见发表。错误意见也要让它发表，然后指出错误。从前我们党内有一种办法，就是不准人家保留意见。现在我们觉得这样不大好。心里不服就可以保留，但一定要执行多数的决定。允许保留意见有好处，因为某些情况下少数意见是正确的。少数意见如果错了也让保留，以后事实证明他的意见错了，他再放弃原来意见也可以。学术问题允许争论，例如对于李森科的学说[1]，我们这里也有不少文章表示不同意，我们允许发表。不能说李森科的学说不可以驳，驳倒了，就说明它不是真理，应该被驳倒。如果它是真理，就驳不倒，不怕驳，思想认识问题，要展开讨论，不能简单解决，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来解决，不能压制，愈压制就愈不好。

9月25日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9月2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听取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在发言时说：最近毛主席讲，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宋副委员长到国外去访问，可以调动积极因素，比如调动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因素、华侨的积极因素。有些积极因素，我们共产党调不动，宋副委员长可以调动，各民主党派可以调动，所以我们大家合作就有好处。统一战线对革命的意义，对国家建 [1] 李森科，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即指他的植物遗传学说，李森科排斥不同观点的学派，指斥遗传学上的基因理论是“反动的”、“唯心的”，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后果。设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会见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团。

9月27日会见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

9月28日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会上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副主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十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小平为总书记。

9月29日下午，到首都机场迎接印度国会代表团；晚上，举行欢迎宴会并致词。

10月3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10月8日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共产党代表团。

10月1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听取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报告。在发言时说：国家建设要有干部。训练干部，一个要看可能，一个要看需要，数量和质量要结合起来，增加招生人数一定要有限度，要逐步增加，既不要右倾保守，也不要急躁冒进，工作要做得又多又快又好。

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恐怕相当严重，学习苏联是好坏一齐学，不顾中国条件，结合实际不够，有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所以产生了许多毛病，产生了许多困难。学习苏联经验要有分析，必须独立思考。应该考虑一下，外国的这个经验是好还是坏，即使它的经验好，在我们这里能不能行得通，这也是个独立思考的问题。给学生规定的纪律不要太多了，太多了是不好的，应该让学生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思考，自由提问题，但是同时应该有指导，没有指导是不行的。

10月20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国和叙利亚的文化合作协定、中国和苏联的文化合作协定。

10月2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波兰形势问题。

10月22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随后，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谈波兰问题，并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

10月23日应苏共中央邀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晚，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就波匈事件[1]交换意见。

10月24日、26日列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等问题。

10月29日、30日同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会谈。

10月31日晚，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11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在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

11月5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在发言中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时说：常委会已经建立两年多了，到底如何做好工作，应当作个总结。常委会应该多做些工作，多起一些作用。现在人民来信很多，大量的转有关机关处理，有些事情需要常委会自己派人[1]波匈事件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处理，这样效果好一点，因此，机构要适当扩大一点，搞几个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别的什么。这些机构如何设置以及怎么进行工作，请委员们考虑，提出意见。

11月6日会见叙利亚议员访华团。

11月10日——15日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局势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在周恩来发言谈到生产资料问题时，刘少奇插话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

11月11日出席北京各界人民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会。

11月1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联席会议，就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去各地视察问题讲话：明年五月问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国家预算。在开会以前大家出去看一看，讲话有根据，对于大会很有好处。去年通过的预算大了一点，冒进了一点，不是统统冒进了，是有一部分冒进了一点，基本建设多搞了一些项目，农贷搞多了一点，职工人数增加多了，大学生和高中生也招多了，有这样一些问题。除了讨论预算以外，司法问题也要成为一个重点。

11月26日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

12月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讲话，现在干部有脱离生产的道路，却没有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应该有两条路，而我们只有一条路，这是不好的。脱离生产很容易，回到生产中去却很难，只进不出，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也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组成了，这个国家机构有两条任务：一条是实现专政；另一条是组织社会生活。第一条任务愈来愈小了，不是愈来愈大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但是工作质量要提高。最危险的是犯了可以避免但没有避免的错误，例如脱离群众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也应该避免。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强调组织部门的工作就是要把干部管好，首先是要把成为“统治阶层”的几十万干部管好。要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看他们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有特权，并且规定一些制度，限制他们的权力，要他们把工作做好，要他们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的根本问题，做好这件事，便是很大的成绩。

12月9日会见巴西、巴拉圭、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的共产党代表。在谈到革命道路问题时说：“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走向社会主义时各有各的道路，各国自己创造道路。有这样一个口号：‘各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除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各国有一个共同的道路。有人讲可以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话不对。”

12月12日主持有朱德、陈云、薄一波、康生、张闻天、陆定一、胡乔木、杨尚昆、吴冷西、王稼祥等参加的会议，讨论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12月17日召集中央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负责人李雪峰、李立三、谭震林、安子文、刘子久、曾山、赖若愚、张铁夫等，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地、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工人阶级问题、工会问题，在全党讨论一下很有必要。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够熟悉，要有一次集中的讨论。中央要全面讨论，就要作全面的准备，全面提出问题，全面看问题。工人阶级的各种问题都可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作交待。

——现在工人只要一进厂，就包下来（当然应当包，包了有好处）。但总要使工厂有个机动性，要的时候有地方来，不要的时候有地方送。如果只能进来，不能出去，这会把人胀死的。你们研究过劳动合同没有？恐怕这些东西我们执行了就好了。合同签了六个月，到期如果双方愿意，再签，不要就辞退，当然要有地方去。

——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有轻无重或有重无

轻，都是营养失调。建一个新基地，服务业投资占多少，这是个紧急问题。现在存在不少问题：没有房子，没有菜吃，没有交通工具，有男没女或有女没男，小孩子没有书读等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不解决要出乱子。

——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有二百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工厂可否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可以作决议。厂长提出的东西经它批准，不批准就不合法，就不能做。厂长没有提的，也可以督促和帮助厂长提出来。厂长由谁当、干部的任免，要经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或选举。其他如生产计划、职工升级。增加工资、厂长基金的支付等等，都要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管委会主要是修改、批准厂长的东西。代表大会、管委会和厂长的关系，就像过去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厂长的关系一样；像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一样。代表大会、管委会不参与执行，不妨碍厂长的日常事务。

12月19日、20日、23日、25日、26日、27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于二十九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从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述了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提出的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

12月29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报告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算执行情况。发言时说：整个情况是我们的步子跑快了一点，明年要稍许慢一点，稳当一点。我们总的方针就是：国家要发展，物价要稳定。只有稳定了物价，才能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降低。根本问题是积累和消费要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在黄炎培副委员长发言提出私人开工厂的问题后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会议还通过了《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 1957年五十九岁

1月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情况的汇报。

1月12日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的汇报，指出：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作得好的，是成功的。由于国内政治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今后宜少捕人。目前社会上的新气象是主要的，但是刑事犯罪仍有可能发展，有些坏事是干部子弟干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对这些人还是要打击的。

1月15日同邓小平、陆定一一起，召集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章泽等，讨论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提出以下意见：

——青年团在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口号是：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所谓带头作用，模范作用，首先应该表现在这方面。

——社会经济基础变了，人们的思想也要变，青年人一定要先变。我们要用相应的思想来促进基础变化，而不要妨碍基础。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党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团的政治任务。党的任务是什么，团的任务也是什么。这就是保证党的领导。

1月16日、17日同毛泽东一起，听取部分省市负责人汇报。

1月18日——27日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十八日和二十五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

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今后的干部工作方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要从过去大批地迅速提升干部职务的方法改变为稳定干部职务、提高干部能力的方法。”“目前我们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的工作人员已经过多，这在经济上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助长官僚主义的发展。现在对于生产人员脱离生产的道路还没有加以限制，而脱离生产的人员回到生产中的道路也还没有开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将造成严重错误。”“我们所有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工作都应该以这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为基础。基层单位的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基层单位的工作做不好，一切工作就不能做好，社会秩序就不容易安宁。”“所有党、政、群众团体和经济机关都应该切实加强基层单位的工作，都应该派强的干部到基层单位中去工作，而不应该把强的干部从基层单位抽走，削弱基层工作。”

2月11日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等的汇报，指出：要把西医里面有经验的老教授请来参加中医的研究、整理和提高工作。西医不学中医是可以的，但不能鄙视、歧视中医，要尊重中医，国家要给中医以帮助。

2月14日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一起，接见出席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

2月17日致信劳动部部长马文瑞，提出：“以后所有的学徒，包括艺徒学校的学生，都签订个人合同。这就是说，使以后的工人，包括新从农村来的工人，都实行个人合同。此外还有私人雇请工人者，都以签订个人合同为好。其中有两类性质的雇请工人：一种雇请辅助劳动，如私人雇请保姆、大

司务、家庭教师，自由职业者雇请助手等；另一种是资本家雇请工人。我们现在还不禁止私人雇请工人进行生产，允许一些私人生产事业发展也还有一些好处。这类工人也以签订个人合同为好。”

2月18日率调查组离开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临行前，同调查组同志谈话，指出：

——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

——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

——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

——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对于闹事者我们的政策不是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就接受，不正确就解释和批评。

——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作闹事，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是好事，不是坏事。

——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我们要十分注意研究分配问题，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

当晚到达河北保定。在火车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汇报有关工会、农业、教育、青年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2月19日下午，同保定的中学教职员和中学生代表座谈。晚上，同保定地区大学的教授和大学生代表座谈。

2月20日下午，去保定重灾区石桥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并和社员代表座谈。

2月21日下午，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晚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及调查组同志座谈。

2月22日凌晨，到达石家庄。下午，同中共石家庄市委负责人座谈。晚上，同石家庄的中学教职员和中学生代表座谈。

2月23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晚上，同石家庄工人代表座谈。

2月24日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石家庄市委及栾城、正定、获鹿等县县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这是新的情况。群众起来闹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

2月25日视察河北栾城贾村农业生产合作社。

2月26日下午，到达邯郸。听取中共邯郸地委、邯郸市委、邢台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凡是中央决定的东西，在地方上如行不通，就应当改变，硬要行下去，就要出乱子。因此，不论任何中央机关来的东西，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在你们地方上行不通，都可以报告中央，要求改变。你们地委、县委决定的东

西，也应该允许下边提意见，不合情况的，应该允许下面顶你们，当然，也要小心下边顶了不应该顶的东西。

2月27日下午，视察河北峰峰煤矿井同矿区的干部座谈。

晚上，同矿区工人、技师、职员的代表座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2月28日到达河南新乡。听取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的汇报，对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指出：这也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基本的所有制已经定下来，基本不变，但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一切都不变，时时会有些变动，主要在分配制度上变。”大社现在是办多了。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还指出：“社员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内作完，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

3月1日到达郑州。先后听取中共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洛阳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3月2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讲国际形势问题。

3月3日下午，同郑州的中学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座谈。晚上，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的同志谈话。

3月4日下午，视察郑州纺织机械厂、国棉三厂。晚上，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要利用人民闹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党。所以对闹事不要马马虎虎，要认真处理。

3月5日到达河南许昌。下午，听取中共许昌地委、许昌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同许昌市的中学、师范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座谈。

3月6日先后约中共许昌地委、许昌市委、确山县委、信阳地委负责人谈话。在和许昌地委负责人谈话时，针对许昌地区有些农业社实行牲畜集中喂养后出现瘦弱死亡现象，指出：“将来牲口是要集中喂养的，现在还是分散喂养好一些，分散喂养并不动摇集体所有制，是个经营方法问题。”

3月7日到达武汉。下午，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

3月9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3月10日同中共武汉市委负责人谈话。

3月11日听取王任重关于大学工作的汇报，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群众提出过高的要求，领导又有官僚主义，那就糟了。同日，还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指出：合作化和技术改革互相起作用，合作化是基本的，没有合作化不能搞技术改革，但光搞合作化不搞技术改革也不行。改良农业、手工业的劳动工具，就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要把设计新的劳动工具作为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任务。3月12日听取武汉重型机器厂负责人的汇报。

3月13日下午，听取武汉钢铁公司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和随行调查组讨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初稿。

3月14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3月15日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建筑工地。视察裕华纱厂，接见私方代表，并同厂长、党委书记谈话，指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要为工程技术人员配备助手，订购外国书刊，为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才智创造条件。3月16日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分析了群众闹事的几种情况，强调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3月17日同武汉地区的大学校长、教授以及民主党派组织的负责人座谈。

3月18日离开武汉去长沙，途中先后同中共湖北咸宁县委、湖南岳阳县委书记谈话。

3月19日到达长沙。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等谈话。晚上，听取周小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3月20日下午，听取周小舟、谭余保等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对人民群众自己办学采取禁止态度是不对的，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提倡勤劳读书，无论大、中、小学生，均可在星期日及假期做零工、上山采茶果，赚点钱，作为学习费用。

3月21日听取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澡堂、电影院等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总之，群众自己的事，要走群众路线。还指出：“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它的生产，指挥着人们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東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

3月22日同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作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讲话。指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学，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所以应届毕业生以及他们的教师、家长，都应当有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打算。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各地党政机关要作好统筹安排。但就全国说来，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是从事农业。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应当努力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

3月23日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长沙工人宿舍问题和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

3月24日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

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

3月25日到达株洲。下午，视察湘江机器厂。晚上，听取湘江机器厂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指示。在谈到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时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工人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我看青年工人能办到。有些地方搞‘私建公助’，我看不要这样提，你一说公助，他就会依赖你了。但实际上公家还是要助一点”。“自己盖房子，就会节省多了，不仅是土坯房子可以住，就是杉皮房子也可以住了。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話，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要工人自己盖房子，就要提高现在公房的房租，提高到什么程度呢？大体能够维持经常费、修理费、水电费，四十年的折旧费收一半，这就差不多了。”增加房租以后，真正有困难的，宁愿救济一点，房租还是要加。不接家属进城的，可以允许他们请假回家探亲。你们厂先试验一下，这是方针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求得解决。

3月26日视察株洲六一厂和麻纺厂的基本建设工地。

3月27日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株洲建设情况的汇报。

3月28日同中共株洲市委书记谈话，指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吃菜问题必将成为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要把蔬菜生产当成大事来抓。有的同志对工厂工作并不熟悉，满足于—知半解，其实没有认真钻进去，连大门都没有入，这样是不好的。搞建设，搞工业，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由外行变内行，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要虚心，要努力学习。

晚上，离开株洲去广州。途中在衡阳停留，和中共衡阳地委书记、中共衡阳市委书记谈话。

3月29日到达广州。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处同志谈话。

3月30日下午，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谈话。

3月31日修改、审定《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有不少学校的学生对学校当局进行的所谓劳动教育，大有反感。原因是这种所谓劳动教育是枯燥无味的教条，不能解决学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又勉强学生重复地去听报告，开讨论会，妨害学生准备升学考试。在目前，对应届毕业的学生，除开听一次报告，开一二次小组讨论会，再进行一次答复问题的会议以外，不要再占用他们的时间，妨害他们升学考试的准备工作。其他一切活动，可以在今年还不毕业的学生中

进行，而不要在应届毕业的学生中进行。此点，请告教育部和青年团的同志注意。”《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是随行调查组根据刘少奇此次南下调查同各地中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整理成的，经刘少奇审改后，四月八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致信周恩来，建议由国务院或者其他中央机关发出通知，在农业合作社和农民愿意的条件下，把今年春季栽在铁路公路两旁稻田、麦田和菜园内的树移栽到别处，以便保留这些田地继续耕种。至于栽在铁路公路两旁其他空地上的树，则由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尽力加以培养。

下午，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冯白驹、区梦觉、尹林平、赵紫阳等的汇报。

4月1日继续听取陶铸等的汇报，指出：以前我们主要是搞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经济。政府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机构，当然也还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

4月2日听取中共广州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职工家属宿舍的问题是方针上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为职工提供的房子，要收房租，而且不能太低，要包括折旧费。建议试办房子合作社，划出地皮来，让工人自己建房子。

4月3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负责人汇报教育工作，指出：办学有几种办法：第一是国家办学，要搞得正规一些；第二是合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都可以办，可以叫教育合作社；第三是私人办学，个体办学。今后不要提民办公助，就是大家来办，群众自己来办。实际上公家还是可以助一下，不过不要公开提倡。

4月4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广东省农林水利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

4月5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6日会见在广东省的民主党派人士。

会见并宴请来中国访问的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

4月7日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汇报商业工作、广东省财政厅负责人汇报税收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等等，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国营商业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才能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的，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

——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多样性。

——税收是调节经济生活、保护生产、保护社会主义、限制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会掌握原则、对社会主义没有热心的人是搞不成的。

——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

4月8日听取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副司令员梁兴初、詹才芳的汇报。

4月9日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4月10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讲话分析了当时群众反映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如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悬殊、城市工人要求盖家属宿舍、副食品供应紧张、临时工要求转正等问题，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人民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4月11日到达长沙。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谈话。

4月12日到达武汉。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谈话。

4月13日到达郑州。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等谈话，提出以下意见：  
——可以集体办学，农村合作社自己办学；城市街道、机关、工厂都可以组织起来办学，但不能从工厂、机关开支公家的钱。提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处理阶级矛盾有路线问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路线问题，有马列主义的路线，也有“左”倾或右倾的路线。两种路线，两种结果，一好一不好。

——只要进来了就不准解雇，所有正式工人、机关于部都是这样，这种制度只有中国有。苏联也不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是铁饭碗，没有工作做或工作做完了，都不解雇。这个制度保障工人长期不失业，是最大的好处。这个制度是否可以改？应该允许解雇。现在大家不赞成，可以不这样办。既然不解雇，国家有权要求多余的工人去做别的工作，比较苦一点、待遇低一点的工作。只愿意做拿钱多的事，不愿做拿钱少又比较苦的事，而且又不让解雇，这样下去是不成的。好事只有那么多，苦事没人做，国家是要垮台的。

4月14日下午，到达保定。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谈话，指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耕畜的方式。一搞合作化就实行集体喂养，没有经验就普遍推广，这就搞冒了。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因为所有制还是集体的，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晚上，回到北京。

4月15日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到首都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4月1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四次扩大会议，邀请伏罗希洛夫在会上演说。

4月17日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

4月18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

听取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等汇报地质部正定干校学生闹事的情况，指出：闹事当然不好，有意见可以提，道理讲清楚，事情就可以解决，不能使用压力。他们企图使用压力，迫使地质部分配工作，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也要以理服人，而不要以力压人。双方都使用压力，矛盾不就尖锐了吗？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的问题。首先要分清领导

上的是非，领导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其次是分清群众行动的是非。应该是这样的顺序。领导不先讲自己的错误是说服不了人的，即使群众有错误，领导上也要先作自我批评，但应实事求是，不夸大，不隐瞒。然后再去分清群众的是非，群众是会眼气的。如果领导只讲自己是的一面，不讲非的一面，而对群众只讲非的一面，不讲是的一面，用这种方法去解决是非问题，群众越搞越不服，对抗越大，即使最后以力压服，群众也是不甘心的。

4月1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二、三、四月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

4月21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

4月22日会见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前总统肖恢塔和夫人。

4月23日出席上海各界人民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

4月24日陪同伏罗希洛夫访问孙中山在上海的故居。

4月27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讲话指出：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今天在我国国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在以下这些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紧张：学生升学问题、学徒和艺徒的待遇问题、青年工人的住房问题、临时工问题、物价问题、自由市场问题、农民生活问题、少数人不愿意劳动和不守劳动纪律的问题、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无人处理的问题。总起来讲，“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对付闹事要有正确的办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以下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这就是：站在人民之上；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讲话在谈到自由市场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个、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

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就必须增加地方与企业的自治权力，以及在一定的限度内允许个人的经济活动。”“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4月28日回到北京。

4月30日出席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问题。

5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二至四月间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调查过程中的谈话整理并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社论指出：在学生中应当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这不仅可以帮助解决学生的学习费用不足的问题，增加学生们的就学条件，而且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通过实际劳动操作去体会人类劳动的伟大作用，增加对于劳动人民的了解和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可以培养他们艰苦奋斗、勤俭朴实的思想作风，帮助他们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这篇社论编入《刘少奇选集》。

5月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合作条约、文化合作协定、保健合作协定。

5月7日听取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煜关于党校学员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指出：“只读书不解决思想问题，不整风，就是教条主义；只整风不读书，就可能犯经验主义。我们过去整风，读书少了一些，有的甚至没有读书，是个缺点。这一条是值得今天注意的。”在谈到整风学习中要讨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指出：“积累和分配搞得不适当，势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积累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分配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分配得不妥当也不行，工人、农民分配不当，就要闹事。非生产人员多，分配得多了，工人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就表示分配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起阻碍作用。干部得奖金多了，工人不满意，这是分配问题；行政费开支多了，人民不满意，这也是分配问题；评级高低、工资多少不满意，不能就业、不能升学不满意，这些都是分配问题。其中，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领导人员分配过多，享受太多，形成特殊，人民不满。正因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以谁也想多分一点，可是谁也不能多分，多分了就不行，连我们这些人也包括在内，老资格也不行。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自己分配多了，享受高了，这至少是不尊重社会主义所有制，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至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经济是各行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性，没有灵活性、多样性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灵

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采，更方便，更灵活。”在谈到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指出：“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少数民族等七方面的关系问题。要认真研究党和各方面的关系，学会正确地妥当地处理这些关系。”

5月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他本人是否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发言中谈到：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还是国家的领袖。我们希望他健康长寿，但人总归是不能违背生命规律的，总是要见马克思的。我们要考虑的，是他在余年做什么事情好。主席讲的是对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是对中国很有意义的事情。

5月9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里塔·马尔科。

5月1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批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

5月15日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5月17日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的代表，并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勉励同学们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不怕吃苦，准备在野外工作几十年，甘愿当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做建设时期的开路先锋”。这个谈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5月18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新闻界的政治思想动向，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问题。

会见以纳·马·佩雷拉为首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5月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问题。在发言中谈到开展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的问题。指出：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灭掉。党外人士的意见，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不要忙，不要一下子顶回去。现在大家都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真有假，包括党内，也是有真有假。国际有修正主义思潮，国内也有这种思潮，党内也有。我们让它放一个时期，然后准备反击。让修正主义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但是修正主义不能够克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不能克服修正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有许多人用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我们在整风中间要正确地区别。现在党内许多同志受到党外的攻击，这种攻击有好处，使得我们的头脑清醒一点。我们国内各条战线现在都发生重新改组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左、中、右三派。在斗争没有展开的时候，中派总是跟右派站在一起。因此，我们要考虑做中派

的工作，要搞政治的“化学工业”，把中派和右派分开，让中派和我们结合，使右派孤立起来，办法是充分暴露右派。

5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

5月25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会期问题。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应邀来我国参加大会的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团。

6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6月14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二次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指出：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革命（即三大改造）是胜利的，建设是成功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是有的，但是无论缺点错误有多少，也不能否定这三条。任何历史上的大革命，没有法子不在社会生活上引起若干波动，我们这个大革命引起的波动真少，真是所谓和平革命，应该这样讲：中国胜利了！

6月19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五次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议程。在谈到明年上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换届选举问题时说：候选人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例如选十个代表可以提二十个或十五个候选人，但在提出候选人名单时，还是要经过协商。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报告。

6月25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六次会议，讨论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议案。会议决定每人使用的自留地，连同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百分之十。会议还讨论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问题。

6月26日——7月15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一九五七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6月28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并决定将《刑法（草案）》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征求意见，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综合各方面意见修改后公布试行。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7月9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对阿布拉希莫夫转达的苏共中央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

个共同的想法一致的文件来。7月17日——21日出席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

7月24日会见并宴请以缅甸联邦民族院副院长德钦登貌为首的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

8月1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愿意劳动，却要吃好的，穿好的，靠的是偷、骗、抢。这种人在整个人民中是少数，但是带破坏性，在生产上、政治上、道德风气上、人民内部的团结上，都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对这些人单靠教育是不行的，还要有改造他们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办一些工厂、农场，凡是以偷、骗、抢为生的人，都送到那里去劳动教养，教给他劳动技术，培养劳动习惯。进去以后，不准自由出入，这一条带一点强迫性质，但他们不是劳改犯，政治权利并未剥夺，劳动多少照给工资，基本上按劳付酬，改造好了再回到社会上去。还要开一些工读学校，把年纪小的送到这里，一面读书，一面劳动。采用这种办法，社会秩序就不会受到这些人的危害，我看对社会对他们本人都有好处。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问题和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8月2日——22日在北戴河集体办公。

8月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18日、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

8月28日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9日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9月2日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一起接见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9月6日到石景山钢铁厂和石景山发电厂看大字报。

9月9日出席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9月13日同朱德、周恩来一起，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

9月14日同朱德、周恩来一起，会见以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9月20日——10月9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毛泽东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方针。

9月29日会见以阿·鲍·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10月11日同邓小平、彭真、王稼祥一起，与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于哥夫、吉米特尔·加涅夫、鲍里斯·塔斯科夫以及中央委员卡洛·卢卡诺夫会谈。

10月13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整风运动问题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10月1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改后的草案）》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10月23日同朱德、周恩来一起，会见阿富汗王国首相萨达尔·穆罕默德·达乌德。

11月6日在首都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的目标同十月革命一样，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在以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11月8日在看了《参考资料》上刊载的《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一文后批示共青团中央：“中国是否可个别试办？请你们研究。”

11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11月14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在发言时说：“中国原来是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四分五裂。解放以后，我们把中国统一起来了，这是很大的进步，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中国的统一是从军事开始的，后来是政治上的统一，再后来是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的统一。中国的统一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在统一过程里，我们进行了很多改革，把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把经济基础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果不作这些改革，我们的国家是统一不成的。”“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作统一工作，这个工作作得很有成绩，而且相当彻底，缺点就是大厉害了一点，太死了一点。”“现在管理体制下放了，许多东西可以因地制宜了。我们一方面应该保证国家各方面的统一，从六亿人口出发，搞统一计划；另一方面要改正那些不合理的、过分集中的毛病，让地方能因地制宜。”“我们现在中央与地方和企业的关系与旧中国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面的上下级关系，相互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只要权力分得适当，既有统一，又有因地制宜，我们的经济就会有较快的发展。”会议还决定：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

11月15日阅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淮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的报道——《淮北地区能达到农业纲要产量指标》，批示彭真：“请要办公厅用电话告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委，注意研究这篇文章，曾希圣同志提出挖深塘的办法，其他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采用。请他们加以试验和推广。”

11月1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11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企业、厂矿整风情况的汇报；谭震林关于农村整风情况的汇报；陈正人关于山区生产、交通和人民生活情况的汇报；安子文关于各地下放干部情况的汇报。

11月29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

于经济作物地区农业税附加比例的规定。在发言时说：“现在一切税收都由中央订，地方政府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这是不利的，于生产不利，于促进生产发展不利。税收制度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而不要破坏经济基础，要促进经济发展而不要妨碍经济发展。”“湖南的同志给我说了这么个问题：农民上山把小树砍下来烧木炭，大家一烧就把山烧得光光的，这样就破坏了山林。我说，既然他们烧炭有钱赚，就应该收他们一些税，收税收得没有钱赚他们就不烧了，就保护了山林。但是湖南的同志说，税怎么能加，这是中央决定的。广东省委书记跟我谈，做小生意赚钱很多，商贩把小商品由这里搬到那里就赚很多钱，我们税收的起点是九十元，而他们每次带的货恰恰总是不到九十元，我们就始终收不到他们的税。农业合作社运出去的东西往往超过九十元，就要收税，这样一来，税收制度变成奖励单于户而不保护合作社了。因此，我主张，在不减少国家税收而又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中央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就某些税收的增加或减少自行决定。”

12月1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普塔、中央委员潘尼亚，在谈到党的团结统一问题时说：实现全党的统一要有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和正确的政治路线，要取得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因此，不能性急，要忍耐，要等待，不能硬要统一，否则党会受损伤。要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和学习。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党不能统一，而要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则不容易。党员中有人以为这样，有人以为那样，都认为自己正确，到底谁正确，要由实践来证明。在实践中，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和经受考验，才知道谁正确。应当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因为他们代表一部分党员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有不同的意见是好的；没有不同的意见，只有一个意见，那就危险。

12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祝词，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国家计划而斗争。祝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公开宣布了中国十五年左右要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12月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中央委员约希。

12月4日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12月7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批准《国务院关于调整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农业税附加比例的规定》。

12月8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12月13日邀集参加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的部分同志谈话。在听取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关于统战部长会议情况的汇报之后，就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如何认识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目前统一战线是否还包括资产阶级、如何安排右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12月20日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中央总书记蒂姆·布克。应客人要求谈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现在我国民主党派的作用是

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它们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它们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前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政党。既然它们是这样性质的政党，那么，没有理由不长期共存了。“在中国，政权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手中，我们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我们要监督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监督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问题的实质。当然，民主党派也可以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对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和建议，指出我们工作上的缺点。”

12月2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

12月28日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长张鼎丞等汇报省市检察长会议的情况。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青团工作。

12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12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度财政预算问题。

## 1958年六十岁

1月1日会见也门王国副首相塞弗·伊斯兰·穆罕默德·巴德尔王太子。

1月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次会议。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会期和议程、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在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时，刘少奇说：计划跟执行结果往往有出入，预算跟决算总是不一致，出一些问题也不要紧，但是我们要控制，计划只能超过，不能减低，预算只许少用，不许多花。

1月11日到达广西南宁。

1月11日——2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会后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1月21日致信毛泽东，送上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1]《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前后，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同志的意见起草的文件。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所写的关于制订和修改规章制度的条文。条文中说：“国务院各部门为了使工作走上轨道，凡年来召集了多次的业务会议，制订了大量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中已经有相当的一部分成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和废除。”“应当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就是：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群众觉悟提高的前提下，允许并且鼓励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群众创举。”“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方和基层单位去，很好地总结群众中创造的这类先进经验，发现下层单位和群众打破原有规章制度，而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提高群众觉悟的创举，应当立即建议主管机关予以批准和鼓励，停止原有规章制度中的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若干单位试行。”“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是限制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不顾一切原有规章制度的限制，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提高群众觉悟的前提下，通过当地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去修改或者废除原有规章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合理的新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若干单位试行。”条文最后强调：“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系统地总结这些先进典型成熟的经验，重大的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相应的主管部门批准，在全国或者全省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以后，再根据新的经验来修改或者重新制订各种规章制度，这是制订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1月23日回到北京。

1月24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二次会议，讨论有关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问题。

1月26日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中央总书记蒂姆·布克。1月31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议程、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等问题。

2月1日——11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查和批准一九五八年度国家预算；决定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批准《汉语拼音方案》；通过调整国务院机构等决议。

2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中共广西省委关于广西省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整风情况的报告。批语指出：“广西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很好，道理说得明白而正确，文字生动而简练，使人看了还想看。望各地各部门学习用这样的方法来写经验总结报告。广西省委所总结的农村整风的经验也是很好的，全国各地都应当根据当地农村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予以推行。这个报告发至县委以上各级党委，并可登党刊。我们希望有成百万干部看到这篇好文章。”

2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赵克关于改造洼地和治涝的总结报告。批语指出：天津专区改造洼地和治涝的经验极好。有了这个经验，又有了这个总结报告，不但是正确地解决了改造洼地和治涝的方针问题，而且有了系统的各方面的具体办法，从此，淮河以北广大低洼易涝地区都可以采用这些办法在最近几年内治好，使这些地区成为农业和副业的高产地区。在淮河以南的低洼易涝地区，因为情况有所不同，天津专区的经验不能全部采用，但也有某些经验是可以采用的。淮河以北一切有水源的地区只要能够改种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就可以成倍甚至几倍地提高。希望淮河以北各省、市、地、县、区、乡的同志，对于凡有条件改种水稻，并且有了改种水稻的经验的，应当积极地大力地推广，还没有改种水稻的经验的，也应当在一九五八年普遍试种，使凡有条件改种水稻的每一个乡、每一个合作社都有一块土地试种，以便取得经验，在以后逐步推广，望各地同志认真地注意这一个耕作制度的改革。

会见以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让·维美徐为团长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

2月16日阅九日《浙江日报》刊登的中共丽水县委关于开展全民整风运动，核实粮食产量，推动生产大跃进的工作报告（摘要），批示胡乔木[1]：“此篇对推动当前粮食、整风和生产工作都有用。其他地方也会有相同情况，但不会都一样。又文章相当长，要引起人家看，必须注意标题，并写按语或评论。”（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报告，标题为《工作方法对头困难问题迎刃解》。）

2月19日离开北京，到达河北保定。

2月20日——22日在河北视察。先后听取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保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参观河北省农业展览会，视察保定市机械厂。

2月21日致信中共中央，推荐河北综合利用红薯的经验，建议：“如果由国家大量地征购红薯干，例如占粮食的百分之二十，就可以少向农民征购其他粮种，国家的粮食也会充裕一些。而国家销售粮食配搭百分之二十的红薯面或者红薯干，人民也是不会反对的。这样，对于解决当前的粮食问题是大有帮助的。”二十八[1]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此信印发财经各部门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并要求有关部门对信中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加以讨论，提出意见。

2月23日离开河北，到达山西太原。

2月24日听取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

2月25日在太原晋祠镇同“跃进”、“胜利”、“迎辉”等农业社的干部座谈。针对农业社重视水田不重视旱地、重视平川不重视山地的偏向，指出：“农业社光种稻田很不够，收入缺乏充分保证。应当开发山地，组织开山队上山种树，搞多种经营。山是宝地，有了山，可以种核桃、花椒、苹果、葡萄和其他适宜于山地的作物。有了水田，又有旱地，有了平川，又有山地，这样就能够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经营多种经济。”

2月26日视察太原钢铁厂。在参观炼钢车间时说：“工程技术人员要搞试验炉或试验工段。要动手实干，亲自操作，这样才能增加实际知识，丰富经验，才能更好地指导工人。”“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既要能指挥，又要能动手。”在参观工人住宅区时说：“工人自建简易宿舍，花钱少，建筑快，住着方便。这对国家有利，对工厂有利，对工人也有利。只要能住十年八年，经济条件好了，拆掉再盖好的。”“要关心工人住宅区的厕所、自来水和环境卫生问题。”

2月27日听取沁县、高平县负责人的汇报。

2月28日视察太原重型机器厂。

3月1日批示中共河北省负责人林铁、马国瑞、阎达开：“关于薯类种植、征购、加工和供应诸问题，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似乎也应当即日发出一个指示，并在报纸上加以宣传。关于薯类，河北主要种红薯，山西主要种山药蛋。山药蛋干和山药粉更能长期保存，不容易坏，并可制作多种食品。中心思想是要把薯类由副食品变为城乡人民的主粮之一。寄上《山西日报》[1]一份，请参阅。前要你们写的关于红薯的通讯，不必寄给我看，即由你们在报纸上适当发表。”

3月2日在中共山西省委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当所有制的革命完成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完全没有束缚呢？不是！思想上的落后和保守，以及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生产力，第一是要做好人的工作，目前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劳动制度、劳动组织的改善；二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三是政治思想教育以及技术教育。在生产关系中，当前主要是解决分配问题。分配不合理，就会引起交换、消费的不合理，就会出问题。特别是在所有制问题解决后，主要注意力应集中在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分配得当，大家就精神愉快地工作。做好分配工作，就可以促进生产，也可以巩固和发展今天的所有制。当前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党如何领导企业。管企业不能见物不见人。管人，这一观念很重要，因为构成生产力有三点：第一是生产者；第二是协作（生产是社会性的生产，孤立的人不能解决问题）；三是生产资料。人如果不高兴，彼此不协作，就没有干劲和创造性，也就不会爱护公共财产。

3月3日离开太原，到达四川成都。

3月4日听取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厂矿整风、工业发展规划等问题的汇报。指出：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时，要注意控制一下，不要让大多数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利益受损害，以免[1]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的《山西日报》。刊登了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扩大薯类种植的指示。挫伤积极性。

3月7日视察郟县国营拖拉机站。建议拖拉机站将耕作收费标准由小田大田一样改为大田少收，吸引农业社尽量将小田合并为大田以提高机器效

率。同时也向县委建议：改变国家拖拉机站的办站方法，由农业社自己购买拖拉机，由拖拉机站代培拖拉机手，以此来促进农业机械化。

3月8日致信毛泽东，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山西省平陆县城关乡五星公社三爱公约》和《山西省平遥县红垦农业社对社员生产和生活的全面安排办法》两个文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两个合作社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风运动，从而拟定了正确处理合作社内部矛盾的一套具体办法，巩固整风运动的成果，团结所有社员，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的秩序，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望各地重视这两个合作社的经验，根据各地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和每一个合作社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经过社员充分讨论之后，对社员的生产和生活也拟定一个全面安排的办法，并且根据社员的意见制定一个全体社员都要遵守的公约。”该文件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二十八日发出。

3月8日——26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三十七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在十四日的会议上，刘少奇批评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财政方面不说真话的行为：一种情况是官僚主义，不摸底，乱说；一种情况是故意说假话，最恶劣。不管哪一种都要检讨。二十六日，刘少奇在会议上发言，说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还是有可能的，认为“慢性病”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现在右倾的危险还是主要的。在谈到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时说：这种转化总的讲是将来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萌芽，例如有些手工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国社合营的，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农业方面有些也可考虑这样搞，例如经济作物区是否可以搞国社合营的形式，但不能搞群众运动，也不能在报上宣传。集体经济有很大的积极性，现在还没发挥完，这点不能忽视，不要造成转化的空气。

3月10日在看了粮食部党组关于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经营的报告后，向粮食部建议：一、在一九五八年征购的粮食中，征购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薯类及薯类制品，具体比例由各省、市、自治区规定，二、以后由国家供应的粮食中，供应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薯类及薯类制品。三、一九五八年征购的粮食指标，似可增加百分之十。四、薯干和薯面的价格应低于粗粮的价格。五、各省、市、自治区应即布置薯类种植面积，并且公布征购薯类的指标。

3月28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干部会上作关于新建厂矿工资制度问题的报告。指出：现在全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不适应便要改。目前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在劳动工资、劳动组织等方面，还有很多缺陷。例如工人招进来就不能辞退，学生、学徒毕业后包分配工作，临时工都要转成正式工，某些工资福利只要提上去就难于改变等。应当改变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打破工人中养老院铁饭碗的观念。新建的工厂可实行新办法，招收工人时合同上写清楚，没有工作时暂时回家。煤矿可以招附近的农民作临时工，不需要时回农村。特别是县以下的工厂，农民可以学手艺，当工人后也可以回去种地，又是工人又是农民，这对将来消灭工农界限、城

乡界限是有好处的。

3月29日回到北京。

4月3日同朱德一起，会见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为《盐阜大众报》题词：“热烈祝贺《盐阜大众报》的十五周年！热烈祝贺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有过光荣历史的盐阜区人民，在争取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根本改变我们祖国和盐阜区的经济文化面貌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光荣。《盐阜大众报》在这一个伟大的改革自然界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应当在各方面起积极促进的作用，鼓舞人民的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一切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4月10日同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徐达本谈组织煤矿劳动力问题。

4月11日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汪戴尔。在谈话中说：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我们过去拟订的计划指标大低了，需要大大修改。我们提出了十五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按目前情况来看，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估计十年时间就可赶上。我们没有公开宣传，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

4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九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淮南煤矿通过整顿劳动组织，实现增产减人的报道。批语要求所有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在工人职员中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在双反运动[1]中学习淮南煤矿的经验，大力整顿劳动组织，以便节省大量劳动力，多快好省地实现生产大跃进。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除开正当的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外，不应当浪费一个劳动日，不应当拒绝担负自己所能担负的任何工作，至于成月成年的窝工浪费，成百成千成万工人的窝工浪费，而不千方百计地组织这些人去进行一些可能的对社会有益的生产事业，那是一种完全违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精神的现象，是完全不应当容许的。因此，淮南煤矿组织多余人员去进行临时性或长期性的副业生产，是完全正当的，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管理和劳动组织中一项具有原则意义的创举，值得各地推广。副业生产的项目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多种多样的，广而言之，可以扩大到组织多余人员去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社变工换工，组织家在农村的工人轮流放假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假期不给或少给工资）等。应当了解，组织厂矿工人每年轮流参加一个月农业生产，对于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对于犯职业病的工人是大有好处的，各地不妨在可能条件下加以试办。”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批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是对于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和提高，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的，这项经验应当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

4月20日在看了中共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以修改规章制度 [1]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双反运动即指这一运动。度为重点深入开展双反双比[1]运动》的报告后，致信陈云、邓小平：“请你们考虑在目前整风和‘双反’运动中是否应来一次（用几天时间）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鸣放？在工矿交通企业中还加改进劳动组织和

劳动管理的鸣放。为此应发一指示，并组织各部门去听取意见并着手试验和进行修改规章制度。”

4月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准备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稿。

4月22日离开北京，到达广州。同毛泽东讨论准备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稿。

4月下旬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参观广东农具改革展览会。对陪同参观的广东省负责人说：广东的农具改革改得很快，改得很好。我国的技术革命刚刚开始，以后新东西会不断出现。技术革命全靠群众的创造性，靠大家动脑筋想办法。

4月30日回到北京。

5月3日主持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准备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各项报告。

5月5日——23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五日，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对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指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18日到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投票站，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5月23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会见苏联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团。

5月25日出席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出版中共中央理论半月刊《红旗》。

和出席中共八届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一起，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并应水库指挥部的要求题词：“劳动万岁！”

5月29日写信给侄孙女刘维孔，希望她坚持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信中说：“继续在农村劳动，这比你在大学中所学到的本事，会要多一些。你在劳动三五年之后，会有机会进大学（例如半工半读的大学）学习的。那时，你会学到更多的本事。”信中还说：“在农忙时进行突击性的劳动是必要的，但是在突击过后，应当有必要的休整，使苦干同必要的休整结合起来，才能

坚持长久。”

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还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要使妇女从家务劳动里解放出来。商店、小学校、文化娱乐事业和理发、洗澡、做衣服等等服务性事业，都可以组织起来，由那些职工家属和农村妇女办。”“应当看得远一些，逐步地、系统地、全面地在自愿原则下，把这些为生活服务的事业组织成为集体的大经济事业。这样可以节省劳动力，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间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方向。”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6月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6月5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在讨论《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时指出：在很多的税收上面，一定要下面有权，不但省政府应该有而且县政府也应该有机动处理的权。总的政策有三条：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国家的积累。违反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都是不对的。只要不违反这三条，各地方可以机动处理，不算违法。税收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经过政府的预算进行分配，分配的大项是两个：积累和消费。国防费、行政费，这是消费中两笔最大的开支，我们现在力求节减国防费积行政费，这两项费用一节省，生产性的积累就多了。教育费算在消费里了，实际上教育费的大部分也是积累，多办学校教育小孩子，小孩子多读一些书，将来他搞生产就能搞得比较好。教育是百年大计，也是一种积累，是生产后备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6月7日审阅《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县以上新建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批示将此报告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以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批语要求各同志阅读这个报告和《内部参考》上刊载的北京招收自费学徒情况的消息，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考虑：一、是否 [1]中共四川省委在报告中提出：现行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等规章制度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招收工人职员，只准进，不准出；工资福利过高；劳保和奖励制度也有许多不当之处，助长了某些工人有钱就干、无钱不来的经济主义倾向的滋长。四川省委提出以下改进意见：一、新建厂矿招用工人的原则，必须贯彻工农合一、城乡合一的精神。根据工农业生产需要，使农民既有机会当工人，又可以回去当农民。二、县以上新建厂矿职工工资的标准，一般应比多数农民和县以下厂矿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略高一点，技术工人又应比一般工人稍高一些为原则。三、新建县以上厂矿均暂不执行劳保条例，但对职工应有的劳动保护，必须给以适当的照顾。应当批准四川省委这个报告？二、是否可以把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照试行？

三、对四川省委拟定的办法应当作一些什么修改？批语说：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次。

6月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6月14日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杨之华等谈话，要求全国妇联研究如何把家务劳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逐步组织起来，组织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的服务事业，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书记胡克实、刘西元等谈话，要求共青团抓两项工作：一、半工半读；二、把家务劳动组织起来，解放妇女劳动力。

6月18日审阅劳动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县以上新建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稿，批示两点意见：一、可以考虑：各种服务性的事业，由工人及其家属组织服务合作社来办理，不要由企业来举办。二、对于合同工，不采取给予劳保福利待遇的办法，而采取在工资标准之外另加一定百分数的副工资的办法，在农村的，全要交给农业社，由农业社保险；在城市的，将来也可能交给社会保险机关或者服务合作社，由它们保险。

6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学校教育问题。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教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严重的，一个时期内有方针性的错误，劳动教育在一九五四年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很好地进行。教育工作中事务主义也很严重，对思想、方针不关心。这是最重要的缺点。政治教育很重要，对思想改造要重视。对学生要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高中以上要多讲一些唯物观点、辩证观点。教育同劳动结合的道路，现在还没有走出来，还要想很多办法。学校分两类：一类是全日制学校，一类是半工半读学校。第一类学校是国家办的，质量要求高，这只能吸收一部分人，因此势必要有第二类学校。两类学校都算正规学校。全日制学校要增加一点劳动，目的是使学生得到思想锻炼、体力锻炼和学习技术。

6月21日致信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建议在新建的工厂中试办半工半读。指出：“实行这种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的工厂，就使工厂和学校完全合而为一了。工厂管理机关不只要管理工厂生产，而且要管理学校教育。国家只在工厂附近加建一些教室和集体宿舍，增加一些专业教员，所费不多，却可以多办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针对当时劳动力紧张的问题，提议“把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及其他为生活服务的事集体化”，把城市中闲散的全劳动力和大批的半劳动力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以便从社会上解放极大的一批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并使青年们能够腾出时间进行学习。

6月29日到劳动部机关，同马文瑞等座谈劳动工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对于按劳付酬问题，要全面地看，要从长远利益看。工人少拿一点工资，农民向国家纳税，这些钱用于什么去了？无非是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受益的还是劳动人民。

——由于农民生活将要进一步得到改善，工人工资势必要增加一点，但是现在不要宣传增加工资，可以考虑少增加工资，多降低物价。

——工人的工资加上福利，跟农民比，一般高了一点，因此农民要进城，农民愿意当工人。这也是必要的，不然工业不能发展。但是工人生活水平高得多，农民想进城的大多了，也不好办。工人可以比农民稍稍高一点。

——技术工人的工资要高一点，要使人们愿意学技术，“于不干，两斤

半”不好，平均主义要不得，但是高低太悬殊也要不得。

——社会主义不仅要改造所有制，还要改造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改组社会的各种生活。

——劳动部研究问题的范围应当广泛一点，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力情况如何，农村劳动力如何抽到工业部门，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社会保险制度如何建立，等等。研究这些，都是劳动部的职责。

——劳动部把许多权力下放，把许多事交地方办，这个办法好。交地方办会不会出些毛病？可能出。但是，抓在你们手里，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毛病还多一点。权力下放，出了问题，地方也可以取得经验。事情交给地方办，有困难给予帮助，这是开明政策。

——农民愿意搞工业，这也是必要的，不然工业不能发展。农民进城，人来得太多了不好办，不来也不好办。

6月30日到《北京日报》社，就该报正在开展的“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同部分编辑人员座谈并作了总结性讲话。针对编辑部反映有人认为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没出息，对于做党的驯服工具想不通，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员做党的工具好不好？很好。做一个驯服的工具，又有理想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有一致性的。报纸、党、国务院、主席、总理都是工具。党是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工具，国家也是工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我们提倡有远大的理想，每个人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有伟大的个人理想。但个人是不可能独立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人。个人志愿是不是伟大，能不能实现，要看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方向正确就能促进，个人志愿就能实现。党在分配党员工作时，要尽可能照顾个人志愿，但不可能完全照顾，还是要根据革命的需要，历史发展的需要。不应造成强调个人志愿的风气，强调了就会出毛病。但认为一有个人志愿就是个人主义，这也是机械论，不能让人生动活泼了。个人应该根据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发展，党的事业成功了，个人也跟着成功了。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可以更好地发展个性。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根据刘少奇这次讲话整理的社论《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作为对这次讨论的总结。

7月1日——4日视察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在同工厂负责人座谈时提出：工业的分布是集中好还是分散好，这是个原则问题，方针问题。在每个县摆两三个厂，加些小厂，工人农民可以合起来，工业农业、工人农民、城市乡村就没有好多区别了。消灭区别是历史上的大事，城市乡村、工人农民的区别大是不利的，把工厂摆得分散一点，工人农民在一起，双方都有好处，工人可以种地，农民可以进工厂。三日下午，在石景山钢铁厂扩建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7月5日视察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分别同干部、工人座谈。在同干部座谈时提出：工厂过去太单打一，不知道搞副业，只知发电、出铁。不务正业不行，但是单打一不好。应该围绕正业、不妨碍正业、又帮助正业，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你们每年烧这么多煤，要把煤里东西收回来，收回原油、硫酸氨等，原油可以炼柴油、煤油、汽油……最后是炼沥青。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给别人加工。还提出：社会劳动力有很大的浪费，主要是妇女劳动力。家务劳动浪费几千万劳动力。可以集体化，搞大规模的社会服务事业、社会经济事业和教育事业。我们国家人多，安排得好，组织得好，可以腾出许多

人来，大部分人一半学习，一半工作，而生产力不降低，还发展。有的国家人才少，劳动力少，困难一些，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赶上英国不是十五年，十五年是要超过美国。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干起活来，不计上下班，干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了。

7月6日到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委机关，同宣武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部分负责人座谈组织街道居民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发言说：“妇女要从家务里脱出来”的口号不确切，这不是什么从家务中脱出来的问题，实际情况应该是一部分妇女搞家务，一部分妇女搞生产。妇女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能节省出妇女的一半搞生产就是大事情。家务本身的性质也要变，变成社会劳动，可以集体化，专业化，也就可以产生先进经验，提高质量。

7月7日到北京市通州区视察。在听取区负责人关于全区农业生产、区乡工业、文教卫生情况的汇报后说：磨面、做饭、带孩子、缝纫、洗衣这些事实集体化，这就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生产集体化了，生活也得集体化，否则就和生产集体化不相适应。为生产服务的事业集体化，跟生产集体化配合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离开北京，到达河北香河。在听取县负责人的汇报时指出：群众的生活要安排好，食堂的副食是不是多增加一些？老人要吃软些的饭菜，是不是应该照顾？还有，冬天要烧炕怎么办？赞成办食堂的，进来，不赞成的就不来吧！一个生产队一半人赞成，那就办一半人的食堂。社要办大一点，工作才展得开。办多大，省委要专门研究一下。恐怕不宜性急，办大社和机械化要相适应。

7月8日下午到河北武清视察，听取县负责人的汇报。当晚到达天津市。

7月9日参观天津工业大跃进展览会和报捷馆。晚上，和天津重工业系统六个工厂的工人代表座谈。在座谈会上讲话，提倡工人学习多种手艺，当多面手，例如一个钳工应该也会做车工，也会翻砂和打铁，什么工种需要就做什么。还说：在我国，管理人员和工人是一家人，不分你我，当厂长、车间主任的可以当工人，工人也可以当厂长、车间主任。工人不仅要管理企业，也要管理国家，可以当市长、工业厅长，也可以当委员长。国家是大家的，应该大家管，主人要大家当。再过二三十年，管理工厂和管理国家的就都是现在的小孩子，他们书读得多，既会种地做工，也会办事，就可以大家轮流干。

7月10日下午，同天津部分街道干部和居民代表座谈。在会上说：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凡是街道办的事业都是国家的，是全民所有制；凡是居民委员会办的事业，都是居民自己的，是集体所有制。请市委、区委考虑，哪些事业可以由街道办事处交给居民委员会，国家不办，交给群众办。有许多事情，国家办不好，群众办，可能更好。如托儿所，过去都是国家办，办得很少，而且很贵，不能满足需要，应该主要由群众办，小学一部分也可由群众办。食堂过去办得很多，主要是机关、工厂的食堂，大饭店、小饭铺、烧饼油条铺合营了，也是国家办的了，可以考虑国家不办那么多，烧饼油条铺、豆腐房、肉店、菜店都交群众办，可能办得更好。晚上，同天津试办半工半读的各工厂代表座谈。在谈到劳动制度时说：劳动制度、福利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要改一下。什么不合理呢？一进工厂就通通包起来，还不能支配，工作给钱，不工作也给钱。还有，大学毕业生一毕业一定要派工作，不派工作不行，半年没工作也发工资，发工资还骂娘。劳

动保险也有问题，有些人半年作两天工，一年作一个礼拜的工，照发工资，这就不合理。今后，老工人按老办法，新招收的工人实行新办法。新办法在工业上大体有三种：一、固定工，这是少数人，大部分是老工人、技术复杂的工人和干部。二、长期合同工；三、短期合同工。合同工有事就干，没事辞退，家安在农业社。在谈到半工半读问题时说：半工半读是发展方向，现在还不要普遍推广，已经办的还要看一看，找一些经验。

7月11日视察天津河北区天纬路鸿顺里的加工组、托儿所、食堂、图书室、储蓄所、日用品代销店。对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及天纬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谈了以下意见：

——街道可建立预备工制度。例如电线厂需要四十名工人，街道可准备八十名，分两套班子轮流生产和学习，又提高技术，又提高文化。

——农民自己盖房子，工人为什么不能盖？要盖新式的。原则是：居民的房子自己修，自己翻盖。

——提倡群众的事群众办。有许多事情国家办不了，群众办可能更好。例如托儿所，过去都由国家办，办得少，又很贵，不能满足需要，应该由群众办。小饭铺、烧饼油条铺、发豆芽、做豆腐等等，都可以交给群众办。

7月12日到达山东济南。听取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等关于整风、农业、工业、文教、财经等方面情况的汇报。

7月13日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座谈。

7月14日视察济南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和成记面粉厂。晚上，和三个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工人代表座谈。7月15日在济南和中共寿张县委书记及该县部分公社负责人座谈。

7月16日到达山东聊城。听取中共聊城地委第一书记的汇报。

7月17日上午，从聊城到寿张城关乡参观高额丰产田。下午，从寿张返聊城，途经莘县时和该县的积极分子代表见面。7月18日上午，离聊城到高唐善店乡，参观棉花高额丰产田，并和中共高唐县委负责人谈话。下午，离开高唐到禹城，会见参加该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同志。晚上，从禹城回到天津，并同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谈话。

7月19日上午，从天津到河北沧县刘表乡富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并和乡、社干部座谈。晚上，回到天津。

7月20日上午，同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谈话。下午和晚上，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和万晓塘等座谈。

7月21日上午，继续同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座谈。在谈到工业布局问题时说：比较精密的制造业，可以设在几个大城市，其他许多工厂可以分散，不要只搞在几个大城市。一个专区可以有一个中心城市，但规模也不要太大。凡是能分散的工业应该适当分散。工厂分散搞到县，比集中搞到一个城市会节省得多。可以采取包干的办法，供给设计图纸和建设资金，工人由县里自己解决。工人从农民中来，工人就是农民，工钱少，需要的时候来，不需要的时候回农村生产，福利设施可以大大减少，资金可以节省，成本可以降低，这才是多快好省。还有，工厂建在农村，生活生产都好安排，粮食好解决，副食品供应也不会那么紧张。总之，不在一个城市搞那么多工厂，分散开来，这样比较经济合理，城乡差别会逐渐缩小。

下午，回到北京。

晚十时，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彭德怀一

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双方商谈问题。二十二日，继续商谈。

7月24日在看了卫生部党组《关于在北京医学院开办“中医班”》的报告后批示卫生部党组：“在医学院开办‘中医班’，实验的结果证明是不好的，以后就不要再办了。以后除由中医带徒弟外，可由中医学校训练中医，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中药。”

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尤金大使等。会见后到毛泽东处汇报。

7月30日——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安排问题的汇报。

8月1日——3日参加毛泽东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北京举行的会谈。

8月4日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8月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薄一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

8月17日——30日出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估计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宣布一九五八年要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农村工作问题。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主持会议，讨论财贸工作问题。二十八日，会议作出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一九五九年粮食达到八千亿斤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二十九日，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8月22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8月30日到河北秦皇岛市海滨公社草厂大队参加劳动，同时访问了几户社员，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9月1日中午，同周恩来一起，离开北戴河去河北唐山，在火车上和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徐达本谈话。下午，参观唐家庄矿井。晚上，到达唐山，并和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委地负责人谈话。

9月2日上午，同周恩来一起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地委的负责人、唐山钢铁厂负责人谈话。下午，参观唐山钢铁厂。晚上，离开唐山回到北京。途中在火车上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范长江谈话。

9月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议九月五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事。

9月5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外交政策等问题。

9月7日召集陆定一、康生、胡耀邦等座谈教育工作，提出学校教育要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现在有许多学校和社会隔绝起来了，这是要不得的。

教育工作中的问题，也主要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要到处搞教育，工厂、机关、学校都要搞教育。要把工业和教育搞在一起，教育部要懂得劳动制度，劳动部要懂得教育制度。劳动与教育分离，只管制造物质产品，不管培育新人，这个观点要改变。

9月9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中国政府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给刘允若写信，勉励他“鼓足干劲，毫无顾虑地、勇往直前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工作和学习”。

9月10日离开北京，到达河北徐水。在遂城人民公社谢坊营村视察时，发现建设规划上不重视植树造林，强调应该增加树木。晚上，在中共徐水县委机关同中共保定地委、徐水县委和社、村基层党组织书记见面，并同县委书记谈话。

9月11日视察徐水商庄人民公社的商庄村、大寺各庄村，并同公社党委书记谈话。晚上，到达保定市，听取保定地区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情况和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

9月12日上午，到达定县。视察韩家洼公社，向公社干部详细询问社员生活情况和农作物生产情况，并看了公社的试验田、发电厂、磨坊、幼儿园。下午，到达安国，参观东风人民公社丰产田和药材种植场。晚上，到达石家庄市。

9月13日在石家庄视察华北制药厂、石家庄钢铁厂、石家庄动力机器厂。晚上，同中共石家庄地委、石家庄市委负责人谈话。

9月14日到达邯郸。从邯郸去成安城关乡人民公社参观大面积丰产棉田。晚上，到邯郸马头镇，参观小高炉群，并和成安、大名、临漳三县派往马头镇领导群众炼铁的干部谈话。

9月15日离开河北，到达河南郑州。下午，听取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省委书记史向生、杨蔚屏等的汇报。

9月16日视察郑州纺织机器厂人民公社和西太康路人民公社。晚上，同吴芝圃、史向生、杨蔚屏等谈话，提出当前要作好五件事：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第三，要搞技术革命；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这样能节约很多的劳动力；第五，要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9月17日听取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负责人、中共修武县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中共遂平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参观郑州市小土高炉群。

9月18日下午，到达开封。参观开封小高炉群。听取中共开封地委、开封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提出：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的一套。新工厂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三小时上课，或者四小时上课，四小时劳动，要比较稳定，搞它八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晚上，到达商丘。听取中共商丘地委、商丘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9月19日上午，离开河南，到达江苏徐州。下午，听取中共徐州地委、

徐州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去沛县参观高产大豆田和棉田，并和中共沛县县委负责人谈话。晚上，到达新海连市。

9月20日上午，参观连云港港口设施及某军事工程。下午，到达新沂，参观县委机关工作人员种植的高额丰产田和红旗人民公社联合工厂。

9月21日上午，到达沐阳，同中共沐阳县委书记谈话。下午，到达清江（淮阴），听取中共淮阴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在中共淮阴地委负责人的陪同下，去洪泽参观二河闸水利工程工地、高良涧灌溉总渠水闸，指示说：“水可以为患，也可以为利，我们要变水患为水利，把水充分利用起来。搞一个水利工程，要考虑怎样把灌溉、防洪、运输、发电结合起来，这将是最大的节约。”

9月22日上午，在洪泽参观三河闸水利工程后去高邮。下午，听取中共高邮县委、宝应县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到达扬州。听取中共扬州地委、盐城地委负责人的汇报。

9月23日到达南通。听取中共南通地委、南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参观南通工业、手工业产品展览会。

9月24日到达苏州。听取中共苏州地委、苏州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同来自苏州、常州、扬州、南通、无锡等地区的部分干部座谈。

9月25日上午，参观苏州市东吴织绸厂，然后去无锡市参观小高炉群。下午，到达南京。

9月26日同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书记处书记陈光、刘顺元，省长惠浴宇等谈话。

9月27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集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人民公社化问题、劳动力紧张问题、劳动工资制度问题、教育方针问题的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要关头，或者说，是决战的关头。大概我们还需要昔战几年，工业过关了，农业上也过关了，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办好。

9月28日上午，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学院、高级步校、高级海校和南京军区的军官代表。下午，参观南京工学院和晨光机器厂；瞻仰雨花台烈士墓。

9月29日回到北京。

10月3日会见契尔文科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在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0月5日晚十一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告台湾同胞书。

10月8日——9日参观北京市高等学校展览会。

10月15日离开北京去华东视察。上午，到达山东济南，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裴孟飞等谈话。晚上，到达江苏徐州，同中共徐州地委负责人谈话。

10月16日离开徐州先后到安徽宿县、濉溪视察农村人民公社。晚上，到达蚌埠，听取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10月17日视察蚌埠市第三中学和蚌埠市各中学联合创办的红旗农场。在视察蚌埠三中时指出：教育和劳动相结合，从理论上讲不会降低教学质量，

但是由于没有经验，搞得不好，很可能降低教学质量，注意总结经验，不降低质量就好了。晚上，到达合肥，途经淮南时，视察淮南矿区及造纸厂。

10月18日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谈话，参观安徽省工农业展览馆。

10月19日视察合肥工业大学，肯定了该校把教育、科研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办法，指出：全日制大学要以读书为主，因为现在大学教育还没有普及，大学还不多。在重视生产实践的同时，也要加强理论教学。视察后对陪同视察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等说：现在有两句口号：“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全国只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工农化，这个任务还比较小，大头在工农分子知识化，那是几亿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中央决定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现在就要试办，将来农村人民公社也要办大学。

10月20日听取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的汇报。

10月21日到达芜湖，听取中共芜湖地委、芜湖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10月22日到达马鞍山，视察马鞍山钢铁厂，并同中共马鞍山市委负责人座谈。下午，到达南京，参观下关轮渡码头，并和中共江苏省委交通部及南京铁路局负责人座谈。晚上，离开南京，到达上海，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魏文伯、许建国等座谈。

10月23日下午，视察嘉定马陆人民公社和徐行人民公社，视察后同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谈话，晚上，听取中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等关于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情况的汇报。

10月24日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关于电机工业和里弄工作情况的汇报。

10月25日下午，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晚上，听取上海市委负责人关于思想工作、文教工作和工厂管理情况的汇报。

10月26日下午，视察上海汽轮机厂、电机厂、电器工业学校。晚上，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徐冰、许建国等谈话。

10月27日视察江南造船厂，并和工人代表座谈。

10月29日看望在上海居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庆龄。晚上，听取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等关于房屋建设和改造计划的汇报。

10月30日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等座谈城市人民公社问题。

10月31日参观上海铜仁合金工厂和上海钢铁一厂。

11月1日离开上海到达浙江杭州。途经嘉兴时听取中共嘉兴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书记处书记林乎加的汇报。

11月2日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浙江大学校长周荣鑫等汇报时插话说：教授、副教授职称现在不要去掉，物质刺激现在还是要，但不要那样强调。

11月3日到达宁波。登“洛阳号”军舰，听取舟山群岛要塞司令部政委、东海舰队司令员的汇报。晚上，听取中共宁波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11月4日上午，登舟山岛观看地形并下坑道与战士交谈。为驻岛部队题词：“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下午，回到宁波。晚上，同宁波地区各县的负责人座谈。在谈到城市建设规模时指出：城市到底需要多大，要按工业布局来定。基本问题是工业布局要合理，符合经济规律，根据运输线长短和资源情况来定人口多少。在谈到家庭问题时指出：“消灭家庭是很远

将来的事，现在不要去宣传消灭家庭，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话：“这要取决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

11月5日同林乎加及中共宁波地委负责人谈话，指出浙江工作中一些不够谨慎的苗头，说：不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分严重，要反对把富裕农民、小商小贩、知识分子推到敌人一边去的倾向。要大力发展生产，使群众有足够的肉、蛋、油、糖吃，而且要办好公共福利事业。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不要滥用，马克思、列宁说的共产主义是高标准。当日，离开宁波去杭州，在火车上继续同林乎加谈话，指出：虚报浮夸当然不好，有些地方一下摸不准确是难免的，但是故意假报就不好，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不能全怪报纸，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报的，地委县委书记签过字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对于这种作风要批评。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经济的工具是统计数字，如果统计不可靠，计划也就不可靠了。要反对说假话，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

11月6日离开杭州到达郑州。

11月7日——10日出席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1]。会议开始对当时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11月11日离开郑州回到北京。

11月13日、1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座谈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11月20日离开北京到达武汉。

11月21日——27日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1]第一次郑州会议于十一月二日开始，刘少奇当时正在浙江省视察，未参加六日以前的会议。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

11月26日参加毛泽东同朝鲜政府内阁首相金日成在武汉举行的会谈。

11月28日——12月10日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12月6日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一起，与金日成举行会谈。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12月13日回到北京。

12月16日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接见出席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代表。

12月25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致祝词，指出：目前在农村中的中心任务是结合冬季生产，认真地做好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在进行整社的时候，应该实行高度的民主，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

12月2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的

经济计划。

12月30日下午，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晚上，和彭真、李先念、刘澜涛、马文瑞等讨论劳动工资问题。

## 1959年六十一岁

1月8日同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宗教事务局(处)长会议的全体人员。这三个会议分别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在北京召开。

1月9日听取冶金工业部部长工鹤寿、副部长昌东、夏耘等汇报工作。

1月11日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段君毅等汇报工作，指出：一个大型工厂，有许多车间，各个车间的生产发展相互之间无论如何是不会平衡的，有的车间前进快，有的车间前进慢，在编计划的时候，往往容易按照最落后的环节来平衡生产，这样，就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所以要组织托拉斯、康采恩，就是这个道理，托拉斯、康采恩实际上就是工业资本家的合作社。如何具体运用全民所有制，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1月13日听取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徐达本、钟子云、贺秉章等汇报工作。

1月14日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1]、邓力群[2]等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指出：“拔白旗”[3]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现在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

1月15日听取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副部长梁膺庸、吴亮平、张珍等汇报工作。

1月17日听取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藻华、钱正英、程明升等汇报工作。

1月18日接见匈牙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自由报》总编辑内梅什·德热。在谈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把我国人民蕴藏着很大的生产潜力发挥出来了。这主要是通过发动人民群众来提高生产力。在中国，过去有些人不参加生产，如妇女大部分不参加生产。现在有几千万妇女参加劳动。现在很多人有了很高的劳动热情，但是也要有一个限度。难道可以永远这样发挥吗？当然，人力是有限的，重要的是技术革新。在一九[1]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2]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社秘书长、副总编辑。

[3]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做法叫作“拔白旗”。五八年，技术革新还不是主要的，将来恐怕主要是依靠技术革新。中国的技术很落后，稍微提高一些就会显示出效果来。高度的热情和高度的技术结合起来，就会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在谈到物质利益和政治觉悟的关系问题时说：我们认为二者都需要，但单纯依靠物质利益的刺激，那是有缺点的。现在还没有到不需要物质利益，单纯依靠政治觉悟办事的时候。当生产力的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时，按劳取酬的原则就不能取消。但是，使群众对多一些钱或少一些钱不那

么计较，对多做半小时工作不那么计较，这是可以做到的。八级工资、按劳取酬等制度只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后不得不实行的一种办法，不实行这些办法，将对生产的发展不利。但是，也不是永久实行下去。我们要使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淡薄下去，要教育工人和劳动群众去为长远利益，即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不只是为了眼前一点微小的利益而奋斗。

1月19日听取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刘建章、余光生等汇报工作。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来信谈到的赫鲁晓夫将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问题。

1月26日——2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轻工业、人民公社等方面的问题。二月一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在工业建设中，要注意只抓加工工业和制造工业，忽视原材料工业的问题。现在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如除钢铁外的农业方面的原材料和化学方面的原材料。原材料工业有能力，有库存，生产就会很快上去。这是经济工作的规律之一。

1月27日同毛泽东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并出席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2月4日听取轻工业部副部长宋乃德、邓洁等汇报一九五九年计划安排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指出：轻工业的技术革命任务很大，现在有二百八十万职工，以后不要再增加人了，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轻重工业并举要注意轻工业，原料、生产、收购。价格要照顾到轻工业，这个行业差了不行，这是涉及千百万人生活的问题。

2月5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六次会议。会议听取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作关于煤炭工业生产的报告，并讨论了有关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去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大跃进，不过，去年的大跃进也有一些缺点。我们的缺点就是对有些东西的生产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因而引起经济上某些方面的失调。缺点是应该承认的，也可以指出来，但过分责备便没有必要。这些缺点以后还会不会发生呢？我看还是可能发生的。不过缺点总是越来越少，经验则是越来越多，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

2月9日同邓小平等到首都机场迎接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周恩来，及同机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

出席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少先队辅导员春节联欢会。在和辅导员们座谈时指出：十五、六岁的小孩子要以读书为主，半工半读是十六岁以上青年的事。对儿童来说劳动是锻炼一下，引起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尊重劳动，注意学点技术，养成劳动习惯。

2月10日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和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2月10日、11日同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会谈。在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时说：土地分散不会降低生产力，而且会提高。因为种地的还是农民，但由于他们分得了土地，他们会经营得更好些，对于

机械化生产的机器，土地改革时不能分，否则会降低生产力。当时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农场极少，这种农场有进步的生产方法，产量高。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需要机械化、电气化问题说：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很需要高度机械化、电气化，但现在不能搞得很快，因为我们国家的钢铁不够，只有钢铁多了以后，才能机械化、电气化。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2月12日陪同毛泽东会见阿约艾·库马尔·高士。

2月14日听取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达成等汇报工作，指出：棉纱生产搞上锭，浪费劳动力，质量也差，恐怕不好。既然有现代技术，就不要去搞落后的。纺织工业布局，要就原料、就市场、就劳动力来安排。布的缩水问题，要告诉消费者，不要骗人。这个布下水后缩多少，出厂时就印在商标上，老百姓就高兴。2月16日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康世恩等汇报工作，指出：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象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

2月17日同毛泽东等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里·亚塔、政治局委员兼书记阿卜杜塞兰·布尔基亚。

2月20日同周恩来等会见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庞佩约·马凯斯，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希尔伯特·维埃拉，秘鲁共产党总书记腊乌尔·阿哥斯塔，以及厄瓜多尔共产党、玻利维亚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古巴人民社会党、巴西共产党、巴拉圭共产党、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巴拿马人民党的代表等，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渐成熟，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在谈到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时说：首先，要认真分析敌人，分析可以联合的同盟者，把他们分作几部分，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的时期里，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这是一条原则，其次，主要打击对象应该极少，要集中力量反对最反动、对革命最有妨害的敌人，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下或者联合他们一起斗争。第三，联合尽可能多的朋友，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力量都要团结。中立一切能够中立的人，这样才能打击主要敌人。在彻底完成第一个革命阶段的任务以前，不要提出第二个阶段的任务，不然会树敌太多。我们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才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进行对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的革命路线是：一方面实行马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区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另一方面也实行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这是马列主义理论的两个特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巩固的领导权，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主要就是对农民的领导，对贫雇农的领导。只有真正取得了工人、农民的拥护，掌握了革命的军队，党才有巩固的领导权，才能在革命胜利以后，实现对政权的领导。所以，必须有这三个条件：工人的拥护，农民的拥护，特别是贫雇农的拥护，革命的武装。

2月21日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詹姆斯·杰克逊。在谈话时说：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脱离群众，使党受到损失，但是两者的性质却不一样。教条主义是无产阶级内部犯错误的问题，是党内的正确同错误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是革命阵营的内部问题。就我们党的经验来说，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好的同志，他们要革命，要斗争，但是他们的策略不正

确。修正主义的性质则根本不同。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必须反对修正主义，不能把修正主义者当做同志。党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者的方针应该根本不同。对教条主义者要采取同志的态度，批评、教育、帮助、挽救的态度，对修正主义者则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要对他们进行斗争。如果他们不肯改正错误，同党对抗，就应该将他们清除出党，以保卫党的纯洁。

2月23日会见新到任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巴尔布·查哈勒斯库。在谈到党的问题时说：党也会犯错误的，党不要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要有广大群众的监督。党若能够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维持巩固的团结，即或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但是，一些有个人打算的人组成集团，犯了错误就不好办了。

2月24日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日共中央干部会委员春日正一。

2月26日听取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副部长杨春茂、陈云涛、刘裕民等汇报工作，指出：在建筑材料工业中，采矿是第一位的，是工业中的农业。现在我们把机械摆在第一，不注意改变这个观念要吃苦头。应把最好的政治干部、管理干部派到矿山去，采矿的工资也要高一点。

2月27日离开北京到达郑州。

2月27日——3月5日出席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要求人民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为基础。会议形成并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

3月3日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等，并出席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3月6日由郑州回到北京。

3月8日听取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等汇报工作。

3月9日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孔祥祯、马辉之等汇报工作。

3月10日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韩哲一等汇报物资调拨问题。

3月11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七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三次会议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有关问题。

3月11日、12日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杨尚昆、徐冰等开会，讨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问题。

3月14日听取水产部副部长高文华、张雨帆等汇报工作。

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黄克诚、杨尚昆、徐冰、张经武、张国华、杨静仁、赵卓仁等开会，讨论西藏问题。

3月16日同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3月1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解决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方针，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

3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试验改革学制的规定》、《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教育事业

计划的意见》等十一个文件。

3月21日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黄克诚、杨尚昆、江锋、徐冰、张国华、张经武等开会，讨论西藏问题。

3月23日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复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表示中国人民全力支持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召开和会讨论并缔结对德和约的建议。

离开北京去上海。

3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西藏问题、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程以及国家机构和人选问题。

3月25日——4月2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财贸工作，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刘少奇主持了四月二日的会议。

4月2日——5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刘少奇主持了四月五日下午的会议。

4月7日——8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准备提交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4月11日由上海回到北京。

4月15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会议就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议程和主席团名单交换了意见，讨论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与政协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员的候选人名单问题。

4月1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会议通过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选举了主席团和秘书长，并通过了第二届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名单，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同邓小平等会见由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率领的意共代表团。在谈话时提出：各国党互派代表团会谈、交换意见比较好。一定时候，几个共产党一起开会，交换意见，互供参考，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活泼的方式，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是莫斯科会议，由苏共召集大家到莫斯科去，开会讨论，通过文件，这个方式比较正式，也应肯定。此外，两个党或几个党会谈，交换意见，这种方式比较更好。交换意见只能供参考，不能强加于人，不能要人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意见办。共产国际时，通过决议，各国党一定要接受照办，这是历史经验。过去，有些党要我们提意见，我们提过意见，但再三说明只供参考，可以采纳，可以完全不采纳。这是我党与各国党交往的一个原则。要允许各国党犯错误，这是避免不了的，不犯错误就没有经验。我们党过去犯过多次错误（“左”、右倾机会主义），这才取得了些经验，做得比较正确。现在胜利了，但对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很可能还会犯错误。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各国的革命政党，包括犯各种错误的党，

团结起来，对我们的斗争有利。

4月18日——28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亿斤。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4月19日出席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会谈公报签字仪式。

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对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进行反击的问题。

4月25日同邓小平等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那日·莫拉夫斯基为团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时说：我们比欧美先进国家落后了一百年，如果能够通过六亿人民的努力，在十五年、二十年的时间里赶上先进的国家，那就很不错了。当然，在这个时间里也许还赶不上，还可能长一点，也不要紧。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获得群众的积极支持。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一般的还是好的，即团结、组织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强迫命令的作风，有些人还有右倾保守和资产阶级的观点。

4月30日同宋庆龄、董必武等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会见各国驻华使节。

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会见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

5月1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对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我国西藏问题的讲话作出反应的问题。

5月5日主持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

5月7日同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

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党代表会议的全体人员，并接见云南、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参观团和青年参观团。

5月10日邀请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陶淑范、褚连山等到家中作客，鼓励他们安心教育工作，希望他们对干部子女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第一副主席赫尔曼·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

5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陈云代表中央财经小组向政治局提出，一九五九年钢材的可靠指标应比三月上海会议拟定的指标降低，初步定为九百万吨。刘少奇同意陈云的意见，在讲话中指出：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5月15日会见黑非洲工人总联合会代表团团长、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几内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卡巴·玛玛迪。在谈话时说：我们很希望了解非洲的情况。现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泛的发展，这是很好的事，中国

广大人民很注意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关心他们。以后我们可多来往，更多地相互了解。

5月18日参观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5月20日接受瑞士联邦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雷纳·纳维义递交的国书。

6月1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同意陈云提出的将当年钢产量指标由一千八百万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的意见，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调整方案》的报告，决定立即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

6月18日同毛泽东会见智利共和国前副总统吉勒摩·德尔·贝特雷加尔和夫人。

6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报刊宣传问题的意见，并通过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名单。

6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关于当前煤炭生产问题的汇报；讨论和基本通过《高级党校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

6月27日离开北京经武汉去江西庐山。

7月1日到达庐山。

7月2日——8月1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的议题是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七月十四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发生的“左”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意见，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由此，会议后期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后，刘少奇曾主张批判彭德怀只在小范围进行，还要继续另搞一个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在中共中央提出来。

7月3日、4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中华南组[1]讨论并发言：一九五八年我们取得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些乱子，得到了极有益的教训。碰了钉子，知道转弯，这是真正的聪明人。不碰钉子而知道转弯的“聪明人”是没有的。全党全民都得到了经验，也碰了钉子，全党全民变得更聪明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了不起的收获。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

7月9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中华南组讨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并发言：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要在鼓足干劲的条件下，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形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1]这次会议起初按大区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和东北等六个组进行讨论。七月十六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原来按大区的编组，重新编组，新编组称第一组、第二组……，仍分为六个组。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

马鞍形的可能。但是，从几年的计划看，可能是大跃进的，是高速度发展的。

7月16日在协作区[1]主任会议上讲话：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提出三个平衡（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先市场、后基建，略有节余（多数年），略有赤字（少数年），这些都需要。

7月19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组会议并发言：提三个问题：（一）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常讲建设时期的主要倾向是右倾保守，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反“左”。当然，从南宁会议以来，都强调两条腿走路，既反右，又防“左”。从目前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左”和右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是主要倾向？（二）有的同志说，北戴河会议以后，只是在三个月中出了些乱子，这三个月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三）现在把钢产量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请大家讨论。对成绩要肯定够，对于缺点错误，也要讲透，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果确有缺点错误，不加以检查，不纠正，不总结经验教训，下一次还要碰这样的钉子，这是危险的。

[1]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它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必要的人员组成，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并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指导。

8月2日——16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8月17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批判彭德怀的“错误”。

8月21日由庐山回到北京。

8月21日、24日同周恩来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政治局委员武元甲等会谈。

8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主持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同意周恩来关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情况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刘少奇在会上通报了一九五九年生产指标数字调低的情况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有关情况。

8月27日约见苏联、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驻华使节，向他们通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有关情况。

9月3日参观新建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

9月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汇报，原则通过“西藏工委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报告”和“张国华、谭冠三[1]、汪锋[2]同志关于西藏民主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关于在建国十周年时，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建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等有关文件。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亲王。

9月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作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

9月13日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9月14日参观新建成的北京火车站。

9月15日出席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进行了座谈。

9月17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1]谭冠三，当时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2]汪锋，当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9月21日会见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夫人，说：我们希望同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友好，而且是要长期友好下去，这对两国都有利。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9月22日接受丹麦王国新任驻华大使巴特森递交的国书。在谈话时说：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可以不同，我们的制度就和你们的不同。但是，还是可以做朋友，只要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的制度要由中国人民来选择，如果不好，人民会反对，我们也不会坚持。

9月23日——2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关于当前工业生产形势和今后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汇报、廖鲁言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形势和今后工作的汇报、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情况的汇报。

9月24日同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回国的留学生。

9月26日同宋庆龄、董必武、林彪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9月27日同周恩来、董必武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吉米特尔·加涅夫，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

同宋庆龄、董必武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朱德、董必武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

9月28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

9月28日、29日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在闭幕词中代表我国人民感谢来宾们的鼓励和期望，并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依靠我们全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依靠我们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团结，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达到我们伟大的目标。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月29日同朱德会见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在谈话时说：我们在这十年当中有些改变，但还不多。要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面貌，还要几十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进展，但是速度比较慢。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较快的方法取得进展，希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速度能够快一些。事实证明可以快一些。速度是快还是慢，在我们这里，在党内是有争论的，我们的意见是可以快一点。快一点是广大人民的希望。我们的人民很穷，要求迅速改变现在的状态。所以把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就会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广大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更快一些。当然也会发生一些局部问题，如发展比例的某些局部失调问题。9月30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到机场迎接应邀前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等会谈。

同毛泽东、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同朱德会见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在谈话时说：我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和绝大部分的劳动知识分子都有改变我国面貌的强烈愿望。关于速度问题，曾引起我们党内的某些争论，有人认为速度太快，造成了紧张和经济中的失调。是的，快了会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局部的，暂时的，容易纠正，如果是全部的，长期性的，那就比较难以纠正了。

10月1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典。大典举行以前，同毛泽东等会见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晚上，同朱德到宾馆拜访了越南、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五国领导人，并分别会见了越南、朝鲜、蒙古、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七国党政代表团。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一文。这是刘少奇应苏联《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之约而写的纪念文章。

10月2日参加中共中央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的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有关情况。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会谈。

10月3日同毛泽东、朱德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10月4日同宋庆龄、董必武到机场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送行。

同宋庆龄、董必武、林彪到机场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送行。

同毛泽东、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等到机场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送行。

10月5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观礼代表团、接受检阅部队的代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军队文艺代表队和参加全运会的军队体育代表团。

10月6日同毛泽东会见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

10月7日同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到机场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送行。

10月9日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谈话时说：劳动人民应该实行民族团结，反对剥削者。有时，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影响，一时不能认清，只有认清了，各民族劳动人民互相妥协，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能这个民族爬到那个民族的头上，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无产阶级需要民族团结，而不是民族分裂。团结的旗帜有力量，不赞成团结，就是主张分裂，主张分裂的人将会孤立起来。

10月11日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于九日逝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

10月12日同毛泽东、朱德、林彪接见来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各民族观礼团和青年学习团。

10月13日到机场为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加涅夫送行。

10月15日会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瓦德克·罗歇。

10月17日会见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拉比·布哈利一行。

10月18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二十日，代表中共在《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上签字。

10月20日同周恩来、朱德到机场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送行。

10月21日会见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柯都维亚一行。

10月22日同毛泽东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

10月23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

10月26日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又称全国群英会）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在接见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时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召集周恩来、朱德、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杨尚昆、谷牧等开会，听取薄一波汇报关于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情况。

10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生产会议情况的汇报，讨论今冬明春工业生产安排。在谈到物资供应问题时说：这是个体制问题，要成立物资供应部，就象商业部管生活资料一样，物资供应部管生产资料。各地都要设这个机构，这样，就没有自由市场了，采购员就不会满天飞了。物资供应部是为生产企业部门服务的，不符合需要的，可以退货。同时，物资供应部和银行、财政部门一样，应起监督作用，监督生产和基建，也可以开物资交流会。

10月31日召集周恩来、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马文瑞、玉稼祥、刘宁一等开会，讨论劳动工资问题。

11月1日离开北京，乘飞机到达海南岛崖县（今海南三亚）休假。

11月2日致信杨尚昆并李富春、康生、薄一波，请他们指派两位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当前经济理论问题的同志来海南辅导学习。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于十一月七日到达海南。

11月2日——22日以主要时间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和有关资料，并召集了九次学习讨论会。曾参加学习讨论会的人员有：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林李明，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负责人，经济学家工学文、薛暮桥，以及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

11月8日到海南岛南端的西瑁洲岛和东瑁洲岛看望守岛部队和岛上的渔民，勉励战士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把小岛建成“南海上的一朵花”，并为守岛部队题词：“海岛是我国军事上最重要的地点，有些还是我国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必须认真地加以经营和坚守，祝坚持海岛工作的同志们精神愉快，工作胜利。”

11月11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不论做什么工作，总离不开吃饭穿衣。一个经济学，一个哲学，不论做什么，总离不开。”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时指出：“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国家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叫做‘专政’，那么就可以对群众粗暴了。专政只能对反革命。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国家专政对内的作用越来越缩小，组织教育群众的职能一万年也有。”“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

11月11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整个看来，教科书还是一本好书，但有缺点。苏联的同志从自己的经验去看别国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该警惕。”“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发展的，不断丰富其内容。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搞社会主义比苏联晚几十年，如果中国搞得不错，总应比第一个好些。再过若干年，我们的经验又变成老经验了，别人会比我们进步，我们准备人家超过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的

方针，免得发生长期性的工农比例、轻重比例失调。若是部分的个别的比例失调，容易纠正，以后还会经常有的，可随时调节。要注意长期障碍工业发展速度的比例。”

11月13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要研究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三是分配问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要研究。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有矛盾，也要研究。不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没有问题了，有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之间，就有不少问题。“举个例子：石景山钢铁厂，国家投资两亿四千万，准备五年扩建为年产六十万吨钢、一百二十万吨铁的企业，实行了投资包干，于是钢铁生产规模增了一倍，扩建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个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猛增许多，生产力从哪里来的，无非是投资归谁掌握的问题。从冶金部所掌握、所使用，变成归石景山钢铁厂所掌握、所使用。生产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本来就有，只是过去没有得以发挥而已。”“冶金部是全民所有制，石景山钢铁厂也是全民所有制，都是全民所有制，由谁来体现，用什么方法去执行，结果就大不相同，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石景山钢铁厂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看使用权就是所有权，这里，厂长，党委书记就代表国家，他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全民所有制是否就不要发展了，不需要不断调整了呢？要不断调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调整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

11月16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来看，不要把它当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立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既然是过渡阶段，它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区别于共产主义，也区别于资本主义。它在本质上和共产主义相同，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一个阶段。但它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带有许多旧的痕迹，这些痕迹不能很快脱掉，很快脱掉是不行的，要使它成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不能性急的。情况是复杂的。它既是社会主义，又有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许多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它的本质又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是复杂的。多种经济成分变成单一的所有制，本质的东西单一了，是社会主义，但还采取了很多资本主义的办法，如商品、货币、银行等。要说明现在为何保留和利用它，将来如何消灭它。写这本政治经济学有困难，马克思写《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成熟的阶段写的，现在社会主义尚未成熟。我们接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路接下来写，写资本主义变社会主义。”

11月17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可以说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不是为价值而生产，但是，还要转一个弯，通过商品、价值形式去实现。这是必要的，也会出毛病，使得一些工厂企业为片面追求产值而生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矛盾是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

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现在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自然，剩余价值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楚。”

11月18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形式和不承认按劳分配是商品存在的原因，是一个思路来的。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就要有商品的存在。哪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不过商品的性质变了。劳动力，当然不是商品了，但仍要采取商品的形式。既是商品，就需要一种计算方式。货币是等价物，就是作为交换的媒介。不管是叫货币，还是叫劳动日，这个东西没有取消，怎么取消商品？”商品在过渡期间，还有残余，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很长的时间。对商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哪些不同？要进行全面地研究。

11月19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它有低级阶段，还有基本成熟的中级阶段和完全成熟的高级阶段。基本差别消灭了，还有差别未消失，比如百分之八十按需分配了，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按劳分配，还有点残余，这是基本成熟阶段，还不是完全成熟的高级阶段。教科书讲，三大差别只能消灭本质差别，不能消灭差别，这话讲早了，中级阶段不能消灭，高级阶段能不能消灭呢？”“速度和比例是有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是矛盾的统一。比例的安排，要抓住主要环节，主要部门。有的同志要百废俱兴。开垦北大荒需要，开垦海南也需要，很难说哪一部门是不需要的，什么需要都满足，势必是什么都满足不了。平均分配的结果，搞不快，搞不好。因此，势必要有轻重缓急、主要次要，抓住主要环节、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就可以很快地前进。”“加强经济核算工作，十分重要。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帐越算越细。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帐那是错误的，大帐小帐都要算。”

11月21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学习教科书后，对我们的计划工作、经济核算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央和计委的同志，做了几年计划，碰到了一些问题，学到了一些经验。省、市、县的同志还没经验，中央犯过的错误，地方还可能犯。不但中央要学，地方也要学。”“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全面的经济分析，要加强计算工作。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那样，就会多花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净产值比总产值更接近实际，各企业要注重净产值这个指标，好好搞经济核算，政治挂帅提得高，好像经济核算、计划工作马虎点不要紧，这是不对的。为了搞好经济工作，既要有政治挂帅，又要有经济核算，有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也批评了计划工作。计划工作要抓典型。一个县的计划、一个企业的计划怎么搞？理论要从这些地方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到下面去，总有一个长处，会算帐、会列表。统计局要派人到下边留学，到县和企业去留学，亲自去实践，去做。做一步，总结一下经验；再做一步，再总结一下经验，七做八做，就解决问题了。”“我们的统计工作是为生产服务的，而不是让下边为统计部门服务。”

11月22日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非对抗性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但矛盾的斗争形式可以比较温和，也可以比较激烈。在把‘对抗’当作斗争形式时，非对抗性矛盾也有可能采取对抗的形式。拳头打、枪炮打、罢工、罢课这都是斗争形式。”“对抗作为斗争形式，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存在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采取非对抗的办法，如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矛盾，也不是天天打架，妥协的时间多得很，罢工几个月，工资增加了，又妥协了。不过，一般他讲，对抗性矛盾采取对抗性办法，才能最后解决。”“教科书对按劳分配讲得多，对相互关系讲得很少。人和人的关系，只讲一致，不讲矛盾，不讲领导和被领导者是矛盾的统一，好像只要所有制改变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都改变了。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相互关系本应改善，可是这方面旧社会的残余还不少，闹得大家不痛快，使社会生产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要实现同志式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还要做许多工作，还要经过斗争。现在，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还是大量存在的，这个关系一定要改善，不改善，劳动者心情不舒畅，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国家管理机关和劳动群众的关系。厂长、县长、局长、部长，同劳动群众的关系搞得不好，就影响很大。这一问题要提高到政治经济学上，提高到生产关系上来理解。”

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陶铸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的陪同下，视察海军榆林基地，检阅了部队。

11月24日应海军榆林基地的要求题词：“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

离崖县赴海口，途中参观了万宁南林农场橡胶园、兴隆华侨农场。当晚到达琼海县政府所在地嘉积镇。

11月25日参观琼海大路人民公社、文昌机械厂。午后抵海口。

11月26日离开海口，经广州赴杭州。

11月28日到达杭州。

复信黄炎培[1]：“新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主要是进行了革命的社会改造，即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它的目的，是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过去十年的建设虽有很大的成就，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完成，在今后的建设道路上，虽然还要清除一些旧的和新的障碍，但是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的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会加快建设的速度，使今后十年的建设成就大大超过以往十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充分地在人们面前显示出来。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将逐步地在基本上改变过来。现在还多少保存旧观念的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将要为今后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所改变。”

11月28日、29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问题。

11月30日——12月4日出席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形势问题以及一九六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就中苏关系等问题作了讲话，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

活性。

11月为上饶集中营烈士纪念碑题词：“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12月5日到达上海。

12月6日在上海视察T—5探空火箭的试制情况。

[1]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主任委员。

12月8日由上海回到北京。

12月14日召集康生、陆定一、胡乔木，以及理论宣传工作者熊复、姚溱、许立群、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上力、范若愚等，座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基础，对于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的国家 and 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这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说明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

12月16、1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八年规划初步设想的汇报，讨论并通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八年规划的初步设想”》。

本年撰写《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指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一九五九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于六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还没有摸到底。在北戴河会议时，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对于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的。这就埋伏了被动。不论计划指标是高是低，在人民群众中鼓足干劲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指标可高可低，气不可泄。我们现在和明年都要适当降低指标，但不可泄气，这要注意。”

## 1960年六十二岁

1月4日离开北京，次日到达上海。

1月7日—17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在“反右倾”思想指导下，会议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并脱离实际地提出了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

1月18日离开上海，二十日回到北京。

1月28日同周恩来等会见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并出席中缅两国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仪式。

1月31日邀请王光琦[1]、王光超[2]、王光英[3]等人和他们的子女到家中作客，应他们的要求谈了改造世界观等问题，说：在阶级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有封建阶级的、资产阶[1]王光琦，王光美的二哥，当时系对外贸易部干部。

[2]王光超，王光美的三哥，当时任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

[3]王光英，王光美的六哥，当时任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很要紧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性急，要多看，多谈，多锻炼。辩证观点，是矛盾斗争的统一。不要怕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那个矛盾又会发生，要面对矛盾，揭露矛盾，才能处理矛盾。有一个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人活一辈子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要贡献多一些才好。在谈到要处理好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就要吃点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点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要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了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吃小亏，占大便宜。一心一意干工作，可能人家一时不了解，也许会说是沽名钓誉，一天看不清楚，一年看不清楚，但是十年二十年会看清楚。占小便宜，人们会看清楚的，那是蔽盖不了的，也许可以蔽盖一时，长期蔽盖是不可能的。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要丧失一部分。为人民做事，大家就会照顾。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2月1日接见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参观团全体代表。2月5日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要求印发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谈话记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中央多次禁止印刷那些没有经过本人审定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记录，因此，这些谈话记录也不要印刷。我们的工作同志在听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之后，应该想一想，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和重要的，就应当设法变成自己的语言去和同志们进行讨论。在这种场合，少用一些权威，多在同志中进行自由的讨论和辩论，是有好处的。”

2月7日接见出席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2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

学校教师职务名称问题和改善教师生活待遇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一九六一年全国全日制中、小学教师工资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文件于三月七日批转下发。会议还听取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许涤新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现在他们向我们靠拢，我们也就要放宽一些，从思想、工作、生活照顾。政治照顾等方面采取积极团结的办法和措施。只要他们接受改造、靠拢党，我们总是要包下来，包到底，不会把他们丢掉不管。

2月12日接见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同两会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1]、盛丕华、胡子昂、孙起孟[2]，胡厥文、施复亮[3]等座谈。当时，有人担心政府对工商业者是否会照顾到底。刘少奇指出：工商业者只要接受改造，为国家做事，同共产党合作，生活上国家照顾到底，负责到底。工商业者要顾思想 [1]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主任委员。

[2]盛丕华、胡子昂、孙起孟，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3]胡厥文、施复亮，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进步的一头，国家包生活照顾的一头。哪一头做得不好，可以互相提意见。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起草并经本人修改审定的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兹德涅克·费林格。2月13、15、17、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工业生产问题的汇报、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问题的汇报、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汇报、孙志远[1]关于加强物资管理问题的汇报、刘宁一[2]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汇报、胡耀邦关于共青团工作的汇报，蔡畅关于女工工作的汇报。

2月20日为中共中央转发铁道部、交通部、商业部党组《关于开展捎脚运输情况的报告》起草批语，指出：“现在全国运输情况都紧张，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充分利用一切空回车船，运输客货，发掘现有运输潜力，完成运输任务。此外，煤炭和矿石的运输尚有大量的空回车辆没有利用，各部门、各地方必须设法在矿山附近设置适当的企业，以便利用现有的这个大的运输潜力，不能任其长期浪费。在以后基本建设布局的设计上，必须全面考虑运输的合理性，不能引起运输力的浪费。”这个文件于二月二十二日下发。

在会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时说：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问题讲得不好，如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刺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一定要执行的。劳动多，质量好，报酬就多；劳动少，质量不那么好，[1]孙志远，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刘宁一，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报酬就低。但仅这样做不够，要加上政治教育，要教育劳动者，使之有理想，为整个社会利益和共产主义利益奋斗。

2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的汇报。

2月27日修改并签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思来复班禅额尔德尼·确

吉坚赞藏历年贺电。

2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和粮食等问题。

3月3日听取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韩光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汇报有关新技术试验的问题，指出：搞科学研究，要有胆量进行试验，不要怕失败；对有些新事物，有时必须作破坏性试验，才会找出最科学的数据。

3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以职工家属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吸收其他一切自愿参加的人，在党委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积极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它是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它能够大大改变城市特别是广大家庭妇女啊面貌。因此，广大劳动人民家庭妇女对此有极大的热情。但是，生活比较富裕的上层家庭的男女成员，则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城市人民公社有不少的顾虑，因此，对于还有顾虑、还不愿参加人民公社的人，目前都不要动员他们参加。”“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经毛泽东八日阅批后，九日，这一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3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要》、《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一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3月21日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说：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友好相处。我们是不会侵略任何人的，不但今天不侵略，今后也永远不会侵略。过去，我们长期遭受到侵略，我们知道被侵略的味道。侵略是不正义的行为我们自己决不会去干不正义的事，决不会侵略别人。

3月24日离开北京，到达天津。

3月24日—25日出席毛泽东在天津召集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会议要讨论的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建设、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工农业生产、教育、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等十六个问题。在谈到工农兵学哲学问题时，刘少奇说：我看工人学哲学有很多帮助，我看这是个哲学的普及运动。

3月2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生产情况、中外关系、纪念列宁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等问题。在讨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刘少奇提出：不要把马列主义跟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

3月26日视察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钢厂轧钢一分厂、天津塘路木材加工厂。

3月27日视察天津针织研究所、天津市和平区兴安路街巨龙服务社、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街主食加工站、天津站西货场。

3月28日听取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提出以下意见：要以农业为基础，

备方面都要支援农业。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饭吃，还剩下多少人去搞工业、运输、教育，文艺、科学等等。说社会分工，实际上首先是农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我们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搞饭吃。所以，农业技术革命要搞好。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和公社的同志们讲清楚，这是不能胡来的。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要把物资调拨部门和财贸部门结合起来，组织各方面的协作。物资调拨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

晚，由天津回到北京。

3月30日——4月10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4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一九六二年）补充计划要点》和谭震林将向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

4月15日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巴扬勒·贾尔卡赛汗。

4月17日离北京去外地视察工作。

途经河北石家庄时。在火车上同该市负责人谈话。

4月18日到达郑州。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4月19日继续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

视察郑州第四棉纺厂、第二砂轮厂。

4月20日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指出：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他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

离开郑州。途经僵师东寺庄生产大队时，察看麦田生长情况和地下引水工程。

4月21日到达洛阳。视察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在听取以上三厂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不要忽视技术人员、老工人的力量。讲本事，还是技术人员、老工人大。在技术革命中，我们要鼓励唱对台戏。对台戏，就是百家争鸣，经过争鸣，然后再结合起来，就更好。要经常唱点对台戏才好。不要对不赞成的人戴“右

倾保守”的帽子。

4月22日视察洛阳麻袋厂、敬事街小学及校办工厂。游览龙门石窟、关林、王城公园和汉代古墓。

4月23日离开洛阳到三门峡。视察三门峡水电站工程。4月24日到达西安。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方仲如等谈话，指出：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势必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改变。劳动组织、生产组织要改变，工资制度要改变。不改就会妨碍生产、妨碍技术改革，就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导者自己的发明改革很少，他的工作是扫清道路，组织群众，鼓励群众，按正确道路前进。

4月25日视察西北光学仪器厂。参观半坡村遗址。

4月26日视察西安机械制造厂、庆安机器制造厂、秦岭电器厂、陇西铸造厂和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

4月27日视察西安搪瓷厂、黄河机械厂。与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谈话，在谈到劳动力紧张问题时，指出：出路在于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大跃进靠它，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靠它，工农群众知识化靠它。

4月28日离开西安到宝鸡。视察东风仪表厂、宝成仪表厂。

4月30日到达四川德阳。视察水利电力设备厂和第二重型机器厂基建工地。听取中共德阳地委、德阳县委和德阳工业区党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指出：由于形势造成的困难，工业区要做缓建的准备，暂时“下马”，但必须保护好一切设备，一旦形势好转就要再“上马”。

到达成都。5月1日出席四川省暨成都市各界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5月2日——3日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廖志高等汇报工作。在谈到木材资源问题时说：木材问题一定要注意到一边砍伐，一边栽种。过去我们的祖宗砍得多，栽得少，以后我们要注意，应该栽得多，砍得少才好，不然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儿孙又会骂我们的。在谈到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时说：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好，上、中、下一条心，这是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达到上下一条心的办法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关心工人的生活 and 休息，以身作则，还要领导正确，政策正确。领导信任群众，群众信任领导，互相信任。你不参加劳动，群众就不信任你。古语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干部应以群众之忧为忧。5月5日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和成都制药厂。视察后指出：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工作有几个特点：勤俭办企业，多种经营，群众路线（小组工作），小组工作对“两参一改三结合”[1]有新发展，今后还应当有发展，应当相信工人能够实际管理工厂、城市、国家。工人文化水平和觉悟水平真正提高了，就挖了官僚主义的根，能够从根本上彻底消灭官僚主义。

5月6日参观四川省工业展览会。

5月7日离开成都到达自贡。听取中共自贡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视察自贡市张家坝化工厂，大文堡盐厂和贡井盐厂。[1]“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一九六一年鞍山钢铁公司总结的企业管理经验。两参，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

一改，指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5月8日离开自贡，到达重庆。

5月12日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5月13日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曾家岩纪念分馆，游览朝天门码头和枇杷山。

5月14日视察重庆建设机床厂、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5月15日乘“江峡”轮离开重庆赴武汉。

5月16日途经三斗坪，考察未来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坝址。

5月17日到达武汉。

5月19日听取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

5月20日离开武汉经湖南、江西赴浙江。途经长沙、南昌时在火车上分别同中共湖南省委、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

5月21日到达杭州。

5月21日——22日出席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

5月23日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

离开杭州，到达上海。

5月24日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

5月25日视察上海泰山化工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汽轮发电机厂等单位。

5月26日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海现场会议上讲话：现在，全民的、全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的路线。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与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也有我们的特点，这就是群众路线，专家、群众、干部三结合的路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应该一直发展下去，使它通畅地一直发展下去是我们的任务。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就会阻碍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要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包括工资制度的调整，保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保持群众的热情和干劲，领导干部要参加生产，同工人打成一片，这样就会一条心，一股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群众的热情使得干干净净，总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会走向反面。此外，要组织托拉斯，组织综合性公司，或联合性企业，这也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改革。物资管理办法也要改，我看现在就应该改，以块块为主，统一管理，象商业部门管理生活资料一样。要一切为着技术革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5月27日离开上海回北京。途经南京时，在火车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

5月28日途经济南时，在火车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回到北京。

5月29日到北京医院向林伯渠[1]遗体告别。三十一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林伯渠灵前吊唁，并参加守灵。六月二日，北京各界人民公祭林伯渠，刘少奇主祭。

6月1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

6月2日同朱德、周恩来等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

6月5日同周恩来、邓小平等邀集在北京出席世界工联理 [1]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于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兄弟党代表谈话，阐明中共中央对当前国际共运中一些有争执的问题的看法。

6月7日飞抵上海。

6月8日—18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补充计划，总结几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

6月8日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国际问题座谈会。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当前国际形势问题的讲话。

6月10日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在座谈会开始时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

6月11日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在柯庆施发言时插话：现在群众能否撤换他们不满意的干部？我们有些代表选举流于形式。群众对于部的监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鉴于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加以约束。待遇不同，是考虑到需要不同，享受较高待遇的人，不应心安理得。在王任重发言时插话：大搞基建，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或不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在座谈会结束时说：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6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报告。

6月13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金门问题。

6月14日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问题。

6月16日为《人民日报》拟发表的成都量具刃具厂党委《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文撰写编者按语，并就此事致信李井泉[1]、李雪峰。按语指出：“工厂企业内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近两年来有了一些重要的发展，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成都量具刃具厂就是这方面的先进典型之一”。

[1]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凡是条件业已具备的厂矿企业,应当推广成都量具刃具厂一的经验,条件尚未具备的厂矿企业,则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不久以后也能推广。推广这项经验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因而取得绝大多数工人的完全信任;二是大多数工人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正能够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国营企业,在一切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先公后私的原则。由于有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就能够出现‘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新的相互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按语及《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文于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中央和各省、市在加强农业、真正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上是通了的,思想上有变化;但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是不通,总是想多搞基本建设,不肯下来,急于多上马一些项目。这样搞下去,还是要继续被动。所以,我今天再提一下,就是基本建设还得根据有多少材料、多少劳动力,决定上多少项目,而且是一仗一仗打,一个一个搞,能够搞多少就算多少。总之,在基本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问题上要在这次争取主动,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同志要下决心,不要搞那么多基本建设。

6月27日同周恩来等出席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的上海四万民兵反对美帝国主义示威大会。

6月29日由上海回到北京。

6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彭真、康生、伍修权关于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汇报。

7月2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作人员代表团。在谈到政治挂帅时说:我们讲政治挂帅就是要经常注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注意解决这种矛盾。政治挂帅是对着物质刺激讲的。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实行,不实行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认为,物质刺激实行就是了,不要去宣传、去鼓吹。物质刺激不是宣传的口号,不是教育的口号,而是制度问题。宣传上要宣传共产主义,应该像列宁写的《伟大的创举》一样,宣传忘我劳动,不计报酬地工作,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内容。

7月4日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7月5日——8月10日出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三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

7月21日回到北京。

7月22日同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

7月23日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7月24日离开北京去北戴河,继续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7月28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长参加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外交、外贸、科学技术、粮食和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8月9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与胡志明交谈的情况，并讨论了《越南劳动党向苏中两兄弟党建议的几点意见》。

8月10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讲话总结了与会同志的意见，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指出：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到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工业，要积极地搞，除开尖端以外，其他的工业尽量地要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帮助。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出工人贵族，在我国，如果不注意，也可能产生。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每年整风，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悬殊不大，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们死了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后辈，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这一条。

8月14日返回北京。

8月22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会见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

8月24日、26日主持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座谈会。在二十六日的讲话中向各民主党派阐释了中共中央对不久前发生的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和停止供应主要设备事件的态度和方针，指出：今天的座谈会许多委员发表了意见，表现我们团结一致。在这种困难面前，在这种风浪面前，我们团结一致，这很好。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站起来！不应该这么一压就倒了，那个就不好了。中国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是受压迫的，但是还没有压倒嘛！难道现在就可以压下去？我们站起来了！不光是这么一件事情，再大的事情也压不下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同时要谨慎对待。

9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了答复苏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通知书[1]的问题。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复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解决中苏两党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逝世。

9月10日会见由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率领的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9月11日--13日同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会谈。十一日，在会谈时说：所有非洲国家都要独立，都要不仅是形式上的独立。我们完全支持非洲人民的这种要求。我们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根据你们的需要提供一些援助。十三日，出席中几联合公报和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9月1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中的工作方针。

9月19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劳伦斯·路易斯·夏基和主席理·狄克逊。

9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当前钢铁、煤炭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的汇报，讨论并通过了粮 [1]在一九六 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前

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食部党组提出的一九六一年第四季度粮食调拨安排的意见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分配方案的调整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压缩食用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

9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中苏两党会谈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

9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约瑟夫·赛迪维，在谈话时说：人民公社是我们的试验，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历史性的试验，中国农村五亿多人口的试验。现在才过了两年多时间，作结论还大早。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可以继续这样做下去。无论如何，这是个伟大的试验，如果将来失败了，可以作出结论，说这个办法不好，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说这个办法好。

9月29日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会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

9月30日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

10月3日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彼得·克尼曼。

10月9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八日编发的《情况简报》第五五三号上刊载的《湖北省委指示各地处理县以上各级刮“共产风”问题》等文后批示：“此二件所说现象，估计全国各地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应由有大部门研究一下，定出一些办法，加以整顿”。

10月9日、15日、2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就邓小平自莫斯科来电，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在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期间的工作方针问题。邓小平是在九月中旬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出席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准备的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的。

10月上半月在轻工业部党组六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小商品生产的报告》上批示：“小商品的供产销，是否全国各地（以地方为主）都由商业部门来总管，即由商业部门来计划、供应原料、加工、定货、销售产品，制造仍归轻工业部。因小商品种类甚多，商业部门最敏感，一有问题发生，商业部门即可采取办法，或向领导提出要求。”

10月20日同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中友协主席阿卜杜勒·凯莱齐。

10月23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农业问题。

10月24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本日下午返京的邓小平、彭真汇报莫斯科会议情况。

10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会上决定由刘少奇任团长，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将于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0月审改《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草案）》（简

称《十二条》)。在第二条中加写：“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我们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下来，绝不容许对它有任何侵犯，特别是从上面来的侵犯。已侵犯了的必须赔偿，否则，就要破坏生产力，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第四条中加写：“对于打乱生产小队‘四固定’的所谓农业生产‘大兵团作战’和‘大丰产方’，是不应当采用的方法，在目前，应当基本上以小队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和丰产方。”指示信以中共中央名义于十一月三日下发。

11月2日、4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

11月5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苏联莫斯科。

11月6日参加莫斯科市召开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大会。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11月7日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

11月8日拜谒列宁和斯大林陵墓。

11月1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确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五十名。

11月30日同邓小平等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11月—12月初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十二月一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12月1日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实习生和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二千五百多人。

12月2日离开莫斯科赴列宁格勒访问。

12月3日到达列宁格勒。参观冬宫内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基洛夫工厂，并在基洛夫工厂第十车间召开的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

12月4日参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斯莫尔尼宫，并乘车游览列宁格勒市容。接见在列宁格勒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出席苏共列宁格勒市委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并发表讲话：列宁格勒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摇篮。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五、六十年间，中国人民到处寻求解放的真理。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都是想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试验过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是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人物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就开始了中国革命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四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伟大的十月革命，永远记着首先举起这个革命火炬的列宁格勒人民。

离开列宁格勒赴明斯克访问。

12月5日到达明斯克。参观市郊加斯特罗集体农庄，并乘车游览市容。出席白俄罗斯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讲话，说：白俄罗斯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英勇顽强地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有力地配合了苏军的正面作战，直到最后取得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你们这种英勇斗争的事迹，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是特别亲切的。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主要地也是采用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的。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你们在游击战争中的每一个胜利，同苏军正面作战中的每一个胜利一样，对于中国人民都是巨大的鼓舞。我们把你们的胜利看成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离开明斯克回莫斯科。

12月6日回到莫斯科。参观李哈乔夫汽车厂。

12月7日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盛大答谢宴会，招待苏联党、政领导人。出席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在中央列宁运动场体育宫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发表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出席苏联党和政府举行的欢送宴会。在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回忆了他第一次到苏联的情形，说：我是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一九二一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有时候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走。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这是因为我们遇到许多觉悟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他们却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发生各种困难的原因。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在一九二一年冬，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从那时候起，我就为拥护苏联，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现在我所看到的苏联，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但是今天空前繁荣的苏联正是昨天经过艰苦奋斗的苏联的继承和发展。

12月8日启程回国，途中在伊尔库次克停留。

12月9日参观伊尔库次克水电站，游览贝加尔湖。

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前往机场迎接。

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访问苏联和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

12月15日会见来华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位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宾努、首相福·波伦、第一副首相涅·刁隆。

12月17日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12月19日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

克亲王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并庆祝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集会。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2月22日会见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夫人。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为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 1961年六十三岁

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汇报会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

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五次汇报会上发言：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

1月10日在《河南省委批转纪登奎[1]同志“关于灵宝县大王等公社层层召开‘兑现会’的经验报告”》上批示：“看来，贯彻执行中央二十条政策，首先是认真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就是在一二类社队的许多干部中是还有很大的抵抗的。必须省、地、县、社四级下最大的决心，并且派工作队下去督促，真正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冲破抵抗，使中央政策兑现。现在离开春耕的时间已不很远，各地必须抓紧时机，立即下决心，普遍发动群众[1]纪登奎，当时任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众，认真退赔财物，贯彻执行中央政策，以便团结一致，热情高涨地进入春耕生产。”

1月14日—18日出席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指示），开展整风整社。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十八日，刘少奇在大会上报告了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

1月15日同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劳伦斯·路易斯·夏基。

1月20日听取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汪锋、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汇报工作，指出：提高干部的水平，主要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条讲起来也就是那么多，而实际有许多不同，也总是变化的。结合实际就是要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众、不同的干部、不同的时间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创造性的发展的，我们和你们这些人，再过一二十年就差不多了，关键在于联系实际，培养干部。负责人搞一些典型调查很重要，无产阶级、共产党要有和群众商量的风气，要真正地、全心全意地和群众在一起，有做人民勤务员的作风。有这种风气，老干部才能坚强，新干部才能成长。省委、地委的领导人要注意支持好风气，反对坏风气，主要领导人支持哪种风气，干部就会产生这种风气，即使领导人死了，作风还会存在。如果支持了坏风气，老干部就会变坏，新干部成长不起来。

1月21日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汇报工作，指出：最近违法乱纪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河南的信阳，甘肃的天水，山东、贵州等省也有一些地方，违法乱纪很严重。你们应当去做检查违法乱纪的工作。现在这方面

做得不是多了，而是做得不够。要注意加强这个工作。现在检察机关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1月23日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1月27日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等谈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指出：群众来信应当分配给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看，对于群众来信中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带有一般性、普遍性，就应当从政策上考虑，党委要做出决定，有些甚至中央要做出决定。无论对什么信，甚至反革命信，不能任何一级机关都可以检查、扣留、追究。信写到哪一级，只能哪一级拆看。下面发生打击报复写信人的现象，是因为上面不负责任，层层照转，转到被告手里。对人民来信这样处理，是要死人的，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要立即改变这种做法。办信人员，要学包文正[1]，抓住典型，一追到底。

1月下旬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商业网管理工作的批[1]包文正，即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天圣进士，历任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又知江宁（今南京）、开封等府，官至枢密副使。他为官清廉，执法严正，不畏权贵，深得百姓称赞。示》，在“凡是商业网点减少过多，商业人员减少过多，以致影响市场供应和造成群众不便的，都应当坚决恢复起来”一句后加写：“以后对于旧城市区某些不合理的商店的调整撤并，均需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统筹规划，经过群众讨论同意，方能作出决定，不得任意处理。”二十八日，这一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1月29日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以反“五风”[1]为内容的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起草批语，要求全国凡“五风”严重的地区都采取通海口公社以民主教育和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办法进行整顿。

2月4日为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的三个文件[2]起草批语：“从这几个文件看，就是在一、二类社队中，彻底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是很不容易的，其中遇到了各种抵抗，还有许多假象。此外，根据通海口公社整风第二阶段的经验，纠正干部的命令化和特殊化作风，也很不容易。为了使中央政策兑现，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肃的斗争，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才能办到。望各地根据这些经验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指导当前的整风整社运动”。

2月6日会见尼加拉瓜文化代表团和哥斯达黎加文化友好代表团。在谈话时说：过去，我们的敌人是很强大的，几个帝国[1]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2]三个文件是：《河南省委批转洛阳地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政策兑现情况的两个报告》、《洛阳地委和灵宝县委整社工作组关于大王公社政策兑现经验的第二次简报》、《洛阳地委关于中央十二条政策兑现情况的报告》。主义联合来压迫中国人民，在我们国内，还有他们的走狗，那就是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的敌人，在国内是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在国外是帝国主义。这两个敌人中，主要的是帝国主义。我们认识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得知我们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打倒了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在我国国内的走狗没有了。革命胜利以后，全国人民

团结起来，好好地组织在一起进行建设。搞革命，我们有经验，搞建设，我们还没有经验。你们看到了一些我们的建设成就，但我们的成就还很少。现在中国还是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在经济上、文化上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概况。

2月8日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保罗·汪戴尔，在交谈中说：一九五八年以前，我们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时期，我们对建设毫无经验，就是照抄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自然条件、人口条件和政治条件，采取一定的办法进行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也是可以适用于全世界一切国家的，但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来运用这个真理，就会有不同的形式。中国的条件和欧洲的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条件采取一些办法进行建设。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们就采取了一些办法，其中有些办法是苏联没有的。一九五八年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搞得很快，一快，各方面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这当然就产生了困难。但这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知道该怎么办，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正确、比较完备的办法。这种办法既不是很快，也不是很慢，而是适当，适合中国的具体条件。经济形式，速度快慢，各国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的经验还是不够的，要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熟悉，就可以摸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比较完备的路线。

2月10日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南局就“李立[1]同志关于番禺县委如何抓好面上工作的报告”发出的指示》等文件，起草批语：“在整风整社工作中除抓紧重点社队以外，必须立即注意抓紧广大面上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政策的初步兑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掀起准备春耕生产的高潮。”

将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回河北省深县探家后写的情况反映转送中共河北省委，并致函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长刘子厚：“看来，下面还有一些干部向群众封锁中央的政策，对生产不闻不问，并且还在进行违法乱纪的事情，在这些地区如不放手发动群众，直接宣布政策，让群众大鸣大放，使群众翻过身来，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那里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

在《公安工作简报》一九六一年第八期刊登的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处理意见[2]一文上批示，“我同意湖南公安厅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3]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1]李立，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部长。

[2]刘桂阳，女，当时是湖南郴县鲤鱼江电厂青年临时工，因在北京国务院北门外张贴不满人民公社的标语，于一九六一年九月被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湖南省公安厅在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中认为，刘过去一贯表现较好，同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没有矛盾，张贴标语的动机不是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因此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3]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二月十四日，这一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2月12日会见中国尼泊尔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首席代表帕德马·巴哈杜尔·卡特里少将，在交谈中说：我们同情世界上弱小的、受压迫的民族，中国自己永远不去压迫或欺侮弱小的国家或民族。这种政策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

许侵略、压迫其他国家或民族。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去侵略、压迫其他国家或民族，那就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经过历史的考验的。

2月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并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一九六一年粮食情况的汇报。

2月26日为中共中央转发《广东中山县但洲公社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起草批语：“现在已经进入或接近春耕大忙时期，各地整风整社运动应当及时采取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在春耕开始以后，各地应当首先抓紧春耕，并利用农事间隙来进行整风整社。总之，要分期分批、坚决彻底地把整风整社运动进行到底，同时又必须促进而不能妨碍当前的农业生产。”

3月11日——13日主持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负责人及其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工作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和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同样问题。十三日，毛泽东建议，两个会议在广州合并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3月14日由北京飞抵广州。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和有关问题。在会上发言：群众提出他们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们要求，如果他们丰收了，多产了，可以多购，但他们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产少购少吃。我们对多产的，应该有所奖励，国家应该采取这个政策。按劳分配，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就是说多产的要能够多吃一点，多用一点。增加收入的问题，不但贫队要增加收入，富队也要增加收入，这样他们才满意。我们不是提出，要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吗？如果让富队不增加收入，那就达不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3月15日—23日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起草并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刘少奇主持了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的会议。

3月1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插话：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资。所谓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他还说：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

3月1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调

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

3月20日在广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维克托·乔治·韦尔科克斯。

3月2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要领导自由市场，光靠行政办法不行，要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要懂得这个道理。”

“轻工业品到底是首先供应城市，还是首先供应农村？如果能换到农产品，应该首先供应农村。换到了农产品，也就增加了城市的供应。多拿些轻工业品到农村，就可以收购更多的农产品。”和农民交换，价格要相当，必须不涨价，比如几个鸡蛋换一盒纸烟，要有个比例。“自由市场的价格随时涨落，我们也要按自由市场价格的高低随时变动，多少工业品交换多少农产品，可以随时变动。如自由市场鸡蛋涨价了，就多给几包烟，让农民比在自由市场交换要多得一点。这样一搞，自由市场的价格就会跌下来了，自由市场就归国家领导了。我们不要轻视这个问题。”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粮食征购不要平均拿，可以分别几种情况。要贯彻按劳付酬，多劳多吃的原则。这就是细，越细越合理，越细越能照顾千差万别，越细越能鼓舞群众的积极性，越能增产节约。

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河南省整风问题的反映》上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南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批示：“河南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打击面是很宽的。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并且在不损伤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把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挽救过来。这需要对于部和群众进行细致复杂的工作。”“此外，在整风中必须再三重申不得使用肉刑，发生此种错误者，必须立即制止并予查处”。“新起骨干中也混进少数坏分子，值得注意。”

4月1日离开广州到达长沙，准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行前同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2日到湖南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住在原生产队养猪场一间破旧的空房里。

4月3日上午，在住地听取先期到达的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对张平化等人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下午，视察当地生产情况。

4月4日——7日听取中央工作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队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

4月8日上午，视察当地养猪场和农业生产情况。下午，离开王家湾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4月9日参观毛泽东旧居。离开韶山到长沙。途中，在湘潭市郊许家坳察看农民住房，探问患病的农民，并同当地群众交谈。

4月10日——11日在长沙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并同他们研究工作。

4月11日同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就农村情况交换意见。

4月12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生产大队蹲点调查，住大队部所在地王家塘。途中听取关于天华大队的情况汇报。

4月13日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农业六十条》，着重讨论了食堂、分配、粮食和住房问题。在请大队干部发表意见时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要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都有利，只一利不行，大家有利才好。办食堂问题，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办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份了、厉害了，好象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就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现在正在讨论当中，散食堂，不要马上就散了。要办，就要办好；要退，也要退好；要分小，也要分好。不要一声喊，又一下改了。现在可以讲，但不要着急动，恐怕这样好。

4月14日上午，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下午，召集天华大队所属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征求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在听取生产队干部的意见后说：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种菜、砍柴，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食堂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还有一条，不好喂猪。再有，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你这一套，都是吃这样多，不切合实际。还有，食堂占菜地多。再有一条，叫作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4月15日上午，察看天华大队施家冲食堂。下午，约请施家冲部分社员座谈，征求农民对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意见。在会议开始时说：这几年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当然有成绩，但有缺点，缺点很多。这些缺点，中央要负责，省委要负责，县委也要负责，这里公社、大队也要负责。在听取群众意见后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在一起住，自留地没有了，猪不能养了，鸡鸭不能养了，许多东西比以前少了，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了。以前喂了猪有肉吃、有油吃，喂了鸡有蛋吃，塘里养了鱼有鱼吃。粮食少一点，有红薯、芋头。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生活就差了。所以这个生活不如以前，是肯定的嘛！从前的政策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了。于是，许多人“坐大船”，不积极。这怪不得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为什么不晓得，还不是官僚主义。

4月16日访问社员家庭。

4月17日出席中共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在会上说：听了群众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公社化办食堂以来，把困难户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百分之八十的农户不积极，这不利。看来，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在谈到有人怕散食堂以后出现两极分化问题时说：两极分化，也不是说一点可能也没有，也可能有一点，但没有什么可怕。从前地主那样分化，不是一下就搞掉了。解

决两极分化的办法很多。两极分化，就是富的很富，穷的很穷。有了供给制，对于特别困难的人，有了一点社会保险，不会那样穷。要有点差别，有的人好一点，有的人困难一点。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现在不要怕按劳分配部分多了。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

4月18日同随行的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谈话，提出：要很快研究一下农村成立派出所和恢复人民法庭问题，这样做方便群众，有利群众，有利维护社会治安。

4月19日上午，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天华大队的有关情况。在听完汇报后说：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面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共产党员的纪律。在谈到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时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对的，这句话没有错。如果办食堂真正自愿，办得好，有利生产，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阵地，但这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不是最重要的阵地。三级所有制是根本阵地，集体经济是主要阵地。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至于说食堂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句话不对。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和多数群众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是。群众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仅仅是领米回家做饭吃，怎么能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晚上，同参加工作组的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负责人谈话。

4月20日同中央工作组和天华大队干部研究食堂问题，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食堂，如果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食堂（停办）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4月21日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研究解散食堂的问题，指出：退食堂不能影响生产，不能引起损失。办食堂引起很大损失，退食堂不要再引起损失。今后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这样可以避免错误，或减少错误，一辈子都要记住这一条。

4月22日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研究解散食堂和退赔问题，在谈到退赔问题时说：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赔。你们湖南向中央写报告说退赔了百分之九十，我看没有听社员的汇报。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如果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就知道退赔了多少。在谈到要了解真实情况时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的怎么怎么好，肥料搞的怎么好，整田搞的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谈到散食堂问题时说：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六十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

的睡醒了呀？总而言之，这一回要搞好，好好安排，不要引起新的损失。特别是生产队的干部和党员，不能自私自利，趁此机会捞一把。食堂的炊具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有领导地解决，不能你抢我夺。

4月23日访问天华大队社员家庭。

4月24日召集中央工作组会议，研究农村手工业问题，提出：“手工业是组织起来生产好还是分散生产好，你们研究一下”。“把手工业工人的工资提高一点，可能有些农民不赞成，要跟他们讲清道理，如果还不赶快提高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吸引人来学，手工业就会绝种。”“你们具体算一算帐，加到多少工资，工人才满意，而工厂又不赔本，能维持下去。要做到工人很积极，努力做工，情绪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工资待遇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劳动效率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产品质量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几个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首先恢复，然后还要有一点进步。恐怕这件事不容易办，不是里手，就不能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就不能进步。工人又满意，工厂又有钱赚，就要认真地经营，认真地核算。县、社工业是不是有这个本事？恐怕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就办不下去。”4月25日上午，登天华山，察看山林毁坏情况。下山后，召集中央工作组研究农村商业问题，指出：供销合作社不要归公社所有，要归社员代表大会所有。归理事会所有。归社员选举出来的代表会和社员代表会选举出来的理事会、监事会所有，就是归社员所有，所有权和支配权是分不开的，归它所有，它就有权支配。但供销合作社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归公社党委领导，经济上可以监督。下午，召集工作组研究群众住房问题，说：拆了人家的房子，一定要赔，大队、公社干部要负这个责任。赔，一定要赔清，使社员基本满意，不能敷衍了事。如果这回敷衍了事，就不能教育公社和大队干部，以后他还会搞。大队要从公积金里面拿出一部分钱搞房屋退赔，不能拿其他的钱搞房屋退赔。总而言之，房屋问题要彻底解决，一年解决不了，两年；两年解决不了，三年；三年解决不了，四年；四年解决不了，五年。晚上，到长沙。

4月26日在长沙会见全非人民大会秘书长阿卜杜拉那·迪亚洛、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卡马拉·本加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计划部副主任索·玛玛杜、几内亚教师工会总书记凯塔·库曼迪安等外宾。在交谈时说：我们很高兴看到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有很多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或者开始取得独立。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会轻易从非洲退出的。他们在非洲还有许多代理人。无论如何帝国主义在非洲是孤立的，他们的代理人只是少数。

因此，帝国主义是可以打倒的。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还有力量，又很狡猾，这个办法行不通，他还可以换一个办法。目的仍然是为了自己的利润，剥削非洲人民。非洲人民要取得完全的独立和解放还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

4月27日从长沙到天华大队。同农民群众谈话，讲解《农业六十条》。

4月28日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天华大队领导班子问题汇报。

4月29日召集社办工业工人座谈，征求意见。之后，同中央工作组负责人谈话，指出：看来手工业的工资制度非改革一下不可。手工业工人的工资要比农民收入高，而且要有显著的差别，这样才有人学。

4月30日上午，召集中央工作组研究安排下步工作，说：我希望工作组

的同志，从始至终贯彻这一条——走群众路线，去掉思赐观点。这个问题讲起来容易，办起来不容易。这三年，就是没有让群众当家作主，搞拆房子呀，搞居民点呀。如果让群众当家作主，这些就办不成。不过那个时候，群众在那个风浪里面也搞得糊里糊涂了，如果那个时候要他表决，他也赞成。所以，走群众路线不能在一股风之下表决，要经过反复商量酝酿。特别是关系多数群众利害的问题，不能急急忙忙作决定。下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你们省委搞调查，搞了很久，这个调查不容易嘛。这个调查真正把情况调查清楚，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不容易，要经过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可能对客观实际认识清楚。这个过程可能长，可能短，到底多长，各有不同。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那么，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否则，就会搞得没有个边。所谓问题，一个是我们党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譬如我们的粮食政策，人民公社中的各种政策，例如供给制、按劳分配、公共食堂等等。首先看这些政策到底正确不正确。不要先肯定这些政策是一定正确的。到底是否正确，去调查一下。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还不够，还要规定一些什么政策。第三，我们脑子里面连问题也没有，那么我们去进行调查，在调查中提出问题。作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统一起来，认识世界以后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晚上，同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大家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之后，到长沙。

4月中下旬在天华大队调查期间，了解到该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因他们喂养的一头耕牛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死亡，解剖后，在肺内发现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即被认为有意破坏而受到批斗、关押。刘少奇初步调查后对此案表示怀疑，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湖南省公安厅复查后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于六月三十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七月十日，刘少奇在北京审阅了这一调查报告，并致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备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5月1日出席长沙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谈话，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在报纸和党委的关系方面，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批评，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你们要作马列主义的记者，要鼓励群众前

进，报纸要有指导性，要帮助党委指导工作。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

致信张平化：“湖南农村的房屋问题，是一个目前就需要处理、而要在二三年内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组在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关于房屋情况的调查和处理意见，可以作为各地处理农村房屋问题的参考，请你考虑，是否可将这个文件发给各地？”当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房屋情况调查和处理意见》转发全省。

5月2日到宁乡县城。下午，听取中共宁乡县委汇报工作。晚上，召集宁乡县、社工业干部座谈。之后上街观看市容。

5月3日上午，在宁乡县公安局听取县政法工作负责人汇报工作。下午，召集宁乡县商业干部座谈。晚上，到故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旧居。

5月4日听取宁乡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汇报，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三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晚上，听取炭子冲大队工作队汇报，指出：办食堂应该是节省劳动力，现在的食堂是浪费劳动力。不节省劳动力就不要它。解决社员住房问题，不要笼统地提“物归原主”，要经过普遍调查，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大队要帮助社员解决。

5月5日上午，视察宁乡花明楼公社安湖塘生产队公共食堂，与农民交谈。下午，同农民成敬常谈话，说：这几年，听说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土荒了不少。我是回来看看，回来的晚了，对社员不起。现在的政策还没有搞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在谈到群众住房问题时说：纪念馆（指旧居）不要办了，你以为我喜欢办纪念馆吗？我不喜欢。把这些房子分给社员住，房子里的东西也分给社员用。晚上，同农民李桂生谈话。

5月6日上午，同农民王升萍谈话，在得知王反映农村情况的信多次被扣后说：谁打击你，谁查问你告状，就再告他们的状，告几次不行，信被别人扣了，不见回信，你就来北京，我出路费，在北京吃、住，我出钱。下午，同农民欧寅春、欧风球、欧荣华谈话，说，现在人们对政策还不那么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制还不那么肯定。所有制不能侵犯，否则，人们就不相信政策了。你可以拿我的，我也可以拿他的，都这样就拿乱了。必须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拿了要赔，这样，以后就不会乱拿了。晚上，听取整社工作队负责人汇报工作，说：群众的心情现在还不舒畅。我同几个社员谈话，他们不敢讲话，特别是对现在的干部，不敢讲话。你们在这里，他们也不愿意找你们，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工作队要抓紧解决食堂解散以后所需要的炊具，如锅、铲、火钳、坛坛罐罐等。要赶快告诉省委、地委、县委制造这些东西，有了东西，退赔了，群众就相信你们了，只讲空话不兑现，群众就不信任你们。

5月7日上午，到首子冲祭扫母亲坟墓，下午，在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

不好。”在谈到食堂问题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散食堂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好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此外，要保护山林。山林所有权归大队，包给小队，划出自留山。在谈到退赔平调社员的各种财物时说：这个帐要一户一户地结。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来，挂在公社里。这次教训根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这里是我的故乡，要靠自己努力。千万不能用我家乡的名义去要求别人照顾。这里还有我的亲属，也不要因为我的关系特别照顾他们。这篇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5月8日到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临时医院看望正在那里治病的社员，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

5月9日同宁乡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工作队座谈，指出：民主这个东西不能恩赐，是大家争来的。我们有些干部，一方面说上边不让讲话，但自己不去争民主；另一方面又怕群众，怕群众起来了事情不好办。你们工作队来这里以后，解决了不少问题，群众说你们是“青天”，这说明你们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但也说明这是恩赐的，不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工作队解放群众。“青天大老爷”是封建社会对管老百姓管得好的官的称呼，如果你们也是“青天大老爷”，我看也不妙，一定是没有走群众路线。当党员、当干部，不学会走群众路线是不行的。有的干部不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吗？群众路线走得好，就自然有前途，否则，不仅不能升官，还要撤职降级。下午，在返回宁乡县城途中视察黄材水库。晚上，回到宁乡县城。

5月10日听取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汇报工作。

5月11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近期在湖南调查研究的情况，并提出关于解决社员住房，退赔社员财物，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待遇等问题的处理意见。在谈到关于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问题时提出：现在乡村中乱拿别人的东西和小偷小摸现象相当多，引起群众的不安，妨碍生产。形成这种乱拿别人东西的风气，一是由于现在吃的东西太少，二是由于过去几年刮了“共产风”，动摇了社员个人的那一部分所有制，也动摇了国家和集体的所有制，有的社员向工作组说，他们可以平调，乱拿别人的东西，为什么我不可拿别人一点东西呢？因此过去平调的东西，必须坚持退赔，就是由于搬家、大兵团作战而破坏的东西，也必须坚决退赔。一年退赔不完，两年三年五年也必须退赔完。国家和集体拿了社员个人的东西坚决退赔，社员拿了别人的东西，也应要求社员退赔，一次还不清，几次还，一年还不清，几年还，但是不可不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各方面的所有制，安定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以利生产的发展。

在宁乡听取中央调查组关于商业问题的汇报，指出：还是要把生意做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意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进步，做得更好。所谓好者，就是周转快，费用低，损耗低，分配得比较公平合理，便利群众，使群众更节省劳动力。农村里面恢复供销合作社，势在必行，但也不是过去农村供销合作社简单的复原，供销合作社算作集体商业，与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生产相适应，为生产服务，同时为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的生活服

务。

5月12日在宁乡听取中央调查组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汇报，指出：手工业社国有化，变成全民所有制，转快了，现在要退回来，还是恢复手工业社，自己基本核算，按照过去那一套办。对手工业社的产品不能平调，要等价交换。以前平调的要赔，以后不准平调。晚上到长沙。

5月13日听取中共湘阴县委关于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指出：我们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必须彻底退赔。但是，不要完全拿钱退赔，应该搞点实物，有利发展生产，搞好生活。对于“分田到户”这个问题，要正面提出这样做不对，要教育群众，给他们说清楚：生产与生活问题不同，生活可以自由，生产应当是集体的。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群众是懂得的，要正面教育，讲清道理，不要戴帽子。自留地是分给他的；田头、田角、田坎可以种豆子，但不是分给他的，而是包给他的，还有百分之五至十要交给公家。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发展生活资料可以自由，但生产一定要集体的。要充分发动群众，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工作组的恩赐观点。我已同工作组同志说过多次：群众说你们是“包青天”，不知你们听了怎样，我是觉得群众在批评我们，这些事情早就应该发现和解决的。总之，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产党还害怕自己的群众吗？只有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才害怕发动群众。干部，一定要走群众路线才行，但是有些干部水平低，不会搞群众路线。要告诉他们方法，要提高干部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水平。

5月15日离开长沙回北京。途经郑州时，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指出：现在做好工作的关键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如何搞群众路线是个问题，过去搞过，但是后来忘掉了，恢复起来不容易。搞好群众路线可以避免许多错误，可以保护多数群众的意见，可以顶住上边的瞎指挥，群众还可以替少数干部担负责任。

5月16日回到北京。

5月21日——6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5月24日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组（中南、华北小组）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讲话分析了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指出：“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我们的这些缺

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的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这篇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6月3日审阅中共中央文教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工作的指示（草稿）》，在开头加写：“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群众，使农民逐步地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我们党的一项最重要的历史任务”。这个指示经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于二十三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6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的说明。

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

6月8日同邓小平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等会谈。在会谈时说：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共产党，世界问题又是这样的复杂，对什么问题都要认识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不同看法。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互相讨论、互相协商、互相忍让、互相尊重，如果发生分歧，不要在公开的场合上争论，不要公开指责。兄弟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如能取得一致，那很好，如不能取得一致，那就放下，以后再讨论。无论如何，不能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

6月9日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黑根。在谈话时说：最近，我们正在采取一些办法，鼓励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农业收成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影响，我们这么多人口，不能靠从外国买粮食，我们想今年买五百万吨粮食，是很大的一个数目，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少的，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想从工业和其它方面疏散一些人口到农村去，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6月12日同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政府总理范文同。在谈话中说，近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加上两年来的天灾，加重了我们的损失。这使我们小心些，使干部和领导人头脑清醒些，不再糊涂。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干部要熟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6月13日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会谈。十四日，出席首都群众欢迎苏加诺总统大会和中、印尼两国互换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接受苏加诺总统赠予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级勋章。十五日，同毛泽东、周恩来回访苏加诺总统。

6月16日同毛泽东、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

6月17日在《长沙县福临公社对干部生活特殊化走后门处理的情况》上给李先念批示：“请你们抓住几个省、几个县、几个公社、几个大队，由上而下地公布商品帐目，认真加以清查，以便了解过去是怎样分配商品的，在今后又应该怎样改进商品分配办法，在过去一年多内，商业部门和粮食部门除犯了其他的一些错误以外，在分配商品方面，也犯了许多极端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是你们自己和我们都还不大清楚，必须迅速查清并坚决改正。”

6月20日同朱德、邓小平、董必武会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代表团团长、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

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立场，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年来，同中国人民一起，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中国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讲话提出：当前，不论新党员，或者老党员，都有一项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系统的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党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接受尼泊尔王国新任驻华大使凯·巴哈杜尔递交的国书。在交谈中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希望同四周邻国以及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对我们的建设是必要的。我们认为不论大国小国，不论大民族小民族，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损害。这是中国的既定政策，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相信这个道理：侵略别的国家，最终是要失败的。每个国家都要发展。有些国家的发展受到外来的阻难，但这种阻难最终是要被冲破的。中国也是冲破阻难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有个成语：朋友不怕多，敌人不怕少，国家与国家之间应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损害。互相帮助总比互相损害好。这是我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念形态。我们根据这一观念形态而制定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同其他国家没有利害冲突。只有美国占领了我国台湾，这就引起了冲突，只要美国不占领我国领土，把第七舰队撤走，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冲突了。

7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说：“这是一个好文件。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走上了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位置是好事情，是成绩。但是有瞎指挥的偏向，瞎指挥下面也听你的。继续这样搞下去，我们要跌下台的，再也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要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有偏就纠，无偏不纠。纠偏，要向干部讲清楚。现在纠偏，是因为有偏向。”十九日，中共中央批示下发了这两个文件。

7月10日同周恩来、邓小平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会谈。十一日，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7月11日听取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张昭、杨延森等汇报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三省区的林业工作，指出：砍了多少树应该很快地栽起来，砍了栽上是我们的根本方针，而且栽起来的要比原有的多。我国森林资源很少，要使已有的资源充分利用，并且永远保持下去。老的砍了，新的要栽起来。总之，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7月14日会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在谈话中说：农村人民公社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还是不利？我们已经试验了三年，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出了一些毛病。这是任何历史性的试验期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可以办下去，现在只试验了三年，至少可试验十年，再作总结。我们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很大的进步。本来也可以继续办它好几年而不进入公社。但是农民群众已经在高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织公社，想对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农民要这样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当时，我们也曾考虑到将来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也许不完全适合，但对不对，这要由历史来做结论。我们认为，人民公社如果组织得好，政策制度适当的话，它对促进农业生产的优越性还是比高级农业合作社要多。要使它促进生产有利，时间短是不行的。只能在试验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找到更好的办法。现在还只办了三年，下结论还太早。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办法，使人民公社能够更正常的发展。

为中共中央批转张鼎丞关于闽西地区的调查报告起草批语：“必须充分估计农村形势的严重性，以及转变农村形势和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艰巨性，而认真地采取谨慎的适合情况的步骤，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彻底转变过来。” [1] 7月15日在看了《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报告》后致信彭真[2]、谢富治、谢觉哉[3]、张鼎丞：“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报告，我已看过，觉得很好。请中央政法小组加以讨论，最好在全国其他地方也进行试办，以便进一步总结经验。总之，目前大量的社会治安问题，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是不能放任不管的，而党委和政府又只能依靠政法机构去管，政法机构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去管这类问题，这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解决的。长沙县人民法院一个多月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端倪了，所以值得重视。”

7月16日离开北京去东北视察。

7月17日到达沈阳。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汇报工作，指出：现在，有些人有怀疑、抱怨、牢骚，讲出来好。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话。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只是要注意一下，不能利用困难来捣乱。要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克服困难。要切实让人家讲话，这样党内就生动了，就可以讨论问题了。人民公社是有优越性，问题是丢掉了高级社的一套东西，搞了平均主义、供给制、食堂等等。可以设想，如果保存高级社的一切优越性，在此基础上联合组织人民公社，优越性就可能更多一些。现在看不出优越性，难于说服人家，农民就说服不了。等三五年后，经济恢复了，人民公社显示出更多的优越性来，有了事实，才 [1] 由于这个报告此前已由邓小平批转中共福建省委和华东局，刘少奇起草的批语没有下发。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3] 谢觉哉，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能说服人。又说：林业要搞长远规划，否则破坏了资源无法恢复，贻害子孙，等于犯罪，采伐方法也要研究。

7月18日离开沈阳，到达哈尔滨。

7月19日视察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分别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和林业情况。在汇报到林业问题时指出：采伐、集材，可否采取包产办法。林业中计件的不少，栽树也可以计件。包产有几种形式：集体的、个人的、“大兵团作战”的（指突击栽树）。要研究林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在谈到所有制问题时指出：不搞三种所有制，或三种所有制不配套，经济就不活，就简单化。国营企业也有所有制问题。抚顺把煤矿工人调去搞水库，不给钱，人民政府和党委都不遵守所有制，你的人我可以调，这样必然要搞乱，要破坏所有制。只要所有制一动摇，其余一切都动摇了。不要以为都是国营企业就可以不分你我了。因为都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都要计算盈亏，应该把账算清。彻底算清账才能巩固所有制。在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你们二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说：你们搞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搞一个典型调查，去看一次还不行，等二年、三年后还须再来看看。

7月20日就林业问题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提出：今后，小规格的木材，价格可以定得高一些，还可以根据密林、疏林的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收购价格。对工人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你生产多少东西，可以挣多少工资。出售价格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如木材的质量、需要的加工量等，分别确定。

离开哈尔滨到达小兴安岭视察。听取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负责人汇报工作。

7月21日冒雨视察带岭林业实验局凉水沟试验林场的人工更新林和树木园。

7月22日视察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观看了油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晚上，召集带岭林业实验局负责人和工人代表座谈木材采伐和造林问题。

7月23日召开带岭林业系统部分负责人座谈会。在讲话中指出：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听群众意见，即使片面意见，也有片面的理由。命令主义要少一点，不要什么事都是指示，才能使大家感到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离开带岭到丰林林业局（今五营林业局）视察。途中听取中共伊春市委负责人汇报林业情况。

7月24日视察丰林林业局，察看了原始红松林、第四林场的采伐迹地和拖拉机集材、小火车作业等。在同林业局负责人座谈中说：党委领导了小事，没有领导大事，党委摆脱不了日常事务，尽抓行政工作，就搞乱了，等于没

有党委领导。企业管理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现在只有党委领导，没有厂长负责制了。要把领导加强起来。工人参加管理，只是参加，不能代替管理，不能因为工人参加管理就放松领导，丢掉管理。要把过去那些好的制度恢复起来，要提高管理水平，企业管理好的标志是，采伐、造林、集材、装车任务完成得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成本降低，质量提高，节省材料。工资制度要实行考工，“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的现象要纠正。

7月25日视察伊春市木材加工厂。在伊春市林业干部会议上讲话：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各方面需要。如何把资源和需要结合起来，就是你们的工作。从中央林业部到林业厅、林业局、林场以至工段，都是做这个工作。这算作你们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在工资和价格方面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收购价与工资政策有密切联系。收购时应当小木头贵（因为费工），大木头便宜（因为省工）。而销售价与收购价不同，销售按木材质量等级论价，用户买木头越大越贵，越小越便宜。工资应该根据收购价来定。要恢复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采伐迹地更新，无非是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两种，两者应当结合起来。人工更新，可以采取由林场、工段、工组、家属来包栽、包活、包抚育、包成林的办法。会后，应邀为林区工作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7月26日到达鹤岗，听取中共鹤岗市委和鹤岗矿务局负责人汇报工作，当了解到煤矿安全工作存在问题时说：制度，特别是技术上的制度，要工程师、技术员负责，他们懂得煤矿怎样开法，怎样才能组织好连续生产，不出事故，他们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

到达佳木斯，视察佳木斯造纸厂。

7月27日到达牡丹江。视察了镜泊湖发电厂、人造红松林、人参种植园，游览了镜泊湖，并探望了正在宿营地休息的地质勘探队员。二十九日，听取镜泊湖东京城林业局负责人汇报工作，鼓励他们搞针叶树、阔叶树混栽和人工更新的试验研究。

7月30日离开牡丹江赴哈尔滨。途中听取中共牡丹江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指出：干活多的比干活少的要多得一点。据说在职工中有一种反映，多出工不如少出工，少出工不如不出工。为什么？因为不出工可以领取工资额的百分之七十，出工多，达不到定额，也只能领工资额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出工呢？这是国家管理工资有问题。林场办农业不能提亦工亦农，让林业工人拿工资去种地是蚀本的，还是要农民亦农亦林好。农民冬天没事搞木头是划得来的，亦工亦农就划不来。林业搞粮食，要走集体的道路，叫做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责任制度，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7月31日在哈尔滨接见出席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的负责干部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成员，指出：栽树和森林更新问题，我们应当重视，许多领导同志只顾砍树去了，没有很好地研究它。更新方法可以这样定，人工更新为土，人工促进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两条腿走路。采伐问题，过去日本人、老中华民国搞得很糟，不管幼树，光拿木头。现在观念要改变，一个是要拿到木头，一个是要有利于幼树生长，一律皆伐，影响太大，可能择伐对森林更有好处。

8月1日离开哈尔滨去大兴安岭林区。

8月3日冒雨视察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今喜桂图旗）林业管理局根河林业局五峰山林场，同局领导干部和工人代表座谈森林更新、恢复规章制度

和建立责任制等问题。在谈到工资问题时说：林区津贴，你们这里一律是百分之三十三，小兴安岭一律是百分之二十五，这是平均主义。是否应分开来算，住在山里的和上山的多一点，住在镇里的和坐办公室的少一点，冬天和夏天，晴天和雨天，也应该有差别。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和工人讨论一下如何调整。国家还是给你们百分之三十三，一个钱也不少，就看怎么分法合理。平均主义不能鼓励大家去做艰苦的工作。

8月4日视察西尼气林业局。同当地干部和工人代表座谈，指出：采伐的第一个目的是拿木头，第二个目的是有利于更新。拿木头要与有利于更新相结合，采伐的方式要服从于更新。

8月5日到达呼伦贝尔盟首府海拉尔。下午，到鄂温克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公社西博生产队和白音胡硕生产队，受到蒙古、鄂温克、达斡尔和汉族等牧民的夹道欢迎，观看了赛马、摔跤、套马等牧民传统活动，并到牧民家中作客。

8月6日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讲话。讲话阐述了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的林业工作方针，以及工资制度与木材价格、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采伐与更新方式、林业局体制等问题，指出：“生产关系不适合，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一下，使它适合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森林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过去被废除了的，要恢复。”“每个林业局应当有机械工程师和林业工程师，要建立工程师负责制。林业局副局长中至少应当有一个是林业大学毕业生，林场应当有一个中等林业学校毕业主任副场长。”森林更新，恐怕还是提以人工更新为主，不然都不搞人工更新了。人工更新长得快，产量高，采伐方便。我们不否定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更新的说法，但是人往往走容易走的路，所以仍要提以人工更新为主，实行两条腿走路。你们要总结栽树经验，要想办法栽活，要有专业队伍，采取包栽、包活、包成林的办法。这篇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8月7日回哈尔滨途中，视察齐齐哈尔钢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和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和当地干部座谈。

8月8日到达哈尔滨。听取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中共黑龙江省委秘书处成员汇报工作。参观东北林学院（今东北林业大学）及其实验林场。

8月9日视察哈尔滨香坊人民公社的竹藤软木厂、三八布鞋厂、卫星轴承厂、综合服务站、安埠管理区公共食堂、公社第二幼儿园。在香坊人民公社干部座谈会上说：城市人民公社在利用剩余劳动力方面是有作用的，但不要忽视了原来的政权，不能削弱政权机构的作用。组织剩余劳动力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入国营工厂当工人，这要谨慎；另外一种，办小一点的工厂，这种工厂如果要搞全民所有制，势必要和国营、地方国营企业享受同样的待遇，不然工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维持不下去。搞全民所有制的工厂须是机械化水平高，劳动生产率高，国家才能划得来。你们只晓得全民所有制好，不晓得全民所有制也有问题。现在不叫“全民”，会比叫“全民”搞得好。公社办的工业要算一下账，不仅要看产值多少，还要看成本是否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了，产品数量质量是否提高了，最后才是看产值。一般算产值看不出问题。产值提高了，产品数量、质量不提高也不行。每个企业都要

算帐，要算数量、质量、成本、劳动生产率等几项，进行比较。

8月11日由哈尔滨回到北京。

8月13日接受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尔温·伯纳德·佩雷拉递交的国书。在交谈时说：锡兰国家虽不大，在国际事务中同样可起重要作用。我们赞成不结盟国家会议。这个会议对世界和平和民族解放可能有利。西方国家要想反对世界和平是困难的，反对民族解放也很困难。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可用不同方式获得。

同周恩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

8月14日同董必武会见巴西合众国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

同周恩来、董必武、朱德与加纳共和国总统兼政府首脑克瓦米·恩克鲁玛会谈。在会谈开始时说：恩克鲁玛总统的访问，对中加两国人民的友好，对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好团结，是一个重要的贡献。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近年来有广泛的发展，是对中国人民的很好的支持。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斗争的发展感到很高兴，坚决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和非洲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非洲人民的斗争，只要做得到，我们总是愿意尽我们的力量。不过有一点要讲清楚，中国解放不久，中国自己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我们的力量还不大，但只要我们对非洲各国人民能有所帮助，我们还是愿尽力帮助，虽然现在不会太多。或许若干年后，比如十年之后，就可以有更多的帮助。

8月15日同周恩来继续和恩克鲁玛总统会谈，并回答了有关人民公社和所有制等问题，说：人民公社有三级管理委员会，委员由社员选举，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既管生产，又管分配。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我们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即国营企业；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此外，还有小部分个人所有制。银行、商业、对外贸易是国家所有，乡村商业由农民组织的供销合作社经营，是集体所有，自负盈亏。还有小商小贩，是由国营商业或公社组织管理的。个体所有制，每个农民有自留地，自己养猪、鸡，有的还有牛等家畜家禽。分配是根据所有制来的。全民所有制，把产品交给国家，领取工资；集体所有制的产品，归集体所有；个体所有制的产品归个人所有。

8月18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加纳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8月20日离开北京赴庐山。

8月22日到达庐山。

8月23日——9月16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还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

8月25日在财贸整风试点工作组关于河南新乡粮食和商业部门“走后门”问题的情况反映上批示：“粮食和市场物资越紧张，粮食和商业部门‘走后门’的现象也越严重，据我了解，某些商品的大部分是从‘后门’分配的，农民根本买不到。这件事情，粮食和商业部门有责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也有责任。如果不加整顿，我们所设想的要用商品去向农民交换农产品，要用实物对工人表现按劳分配，都将有很大的一部分要落空。如何杜绝商业和粮

食部门‘走后门’？如何组织群众监督粮食和商品的分配？使国家掌握的人民急需的商品能够最合理地进行分配，以促进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是当前粮食和市场问题中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批示作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

8月28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李先念作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中插话：企业总是搞这么多人，是要破产的，如果不解决，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要关掉一些工厂，不能那么亏本下去。9月10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听取薄一波作关于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的说明报告和陆定一作关于教育条例、轮训干部问题的报告。在陆定一讲到现在有点政治斗争扩大化时插话：我们现在又重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一部分党的组织里头，特别是中级党委，省委以下的党组织里头，相当普遍地犯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9月13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在第六条加写：“每个国营企业都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利。”

9月17日从庐山飞回北京。

9月18日接受瑞典王国新任驻华大使切尔·厄贝尔递交的国书。在交谈时说：我们希望进一步增进与瑞典人民和政府的友好关系。事实上，我们不仅希望与瑞典人民和政府发展友好关系，而且希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发展友好关系。你们国家很幸运，未卷入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被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连续不断的国内战争，打了几十年。你们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我们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是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和平，有更长期的和平，那就更好了。

9月22日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时说：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保证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说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指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的生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过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那时中国将成为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那时从中国以外的角度来看，情形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西方许多国家正在考虑的问题”时，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问过几十年后中国是否会侵略和向外扩张？正如你们英国人曾经压迫我们一样，是否我们会转过来压迫英国或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从其他国家的情形得出结论：凡是压迫别国人民的民族，它自己就不会有自由，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不但不会压迫英国人，就是对一些小国，对我们的邻国，比如缅甸、泰国、柬埔寨、尼泊尔、印度等，我们都要在互利的条件下，互相尊重主权，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友好关系。我们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并教育我们的后代永不侵略和压迫别的国家。我们只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同周恩来、董必武、朱德与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博士会谈。

9月23日同周恩来继续与多尔蒂科斯总统会谈，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在宣传上可以少宣传一点，更多地宣传要人民艰苦奋斗。我们实际多做一点，宣传上少讲一点，这样，实际上改善了

人民生活，人民还是满意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同帝国主义斗争中，都可能遇到各种困难，这要我们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在思想上都有准备才好。

毛泽东同负责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谈话时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9月24日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乌·杜米特鲁递交的国书。在交谈时说：人们的主观反映客观，有时就不能够一下子反映得很全面，有些同志这方面反映多些，那方面反映少些；另一些同志可能又那方面反映多些，这方面反映少些。要人们的主观全部反映客观，需要一个认识过程。认识过程中可有不同的意见，这不要紧，过一些时候，经过讨论，问题就可以一致了，不同意见一致了，过一时期又有别的问题，又会不一致，又需努力使它一致，这就是发展规律，客观的法则即是如此。我们党内也是如此，有些问题开始提出来时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和研究，又会取得一致。如果提出另外的问题，又会不一致。这是一个经常的工作。

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接着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9月28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古巴共和国总统多尔蒂科斯。

9月29日举行盛大国宴，欢迎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和王后。在宴会上讲话：我们坚决主张，大小国家应该一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力的侵犯和干涉，相互提供的经济援助，不应该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信守这些原则。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希望自己发展，也希望别国发展。我们希望自己生活得好，也希望别人生活得好。我们认为推行侵略、干涉和扩张政策的国家，不论它看起来是如何强大，最终是要失败的。

9月30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见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

10月2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古巴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10月5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并在条约上签字。

10月9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

10月12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

10月13日同周恩来会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签字仪式。当吴努讲到：从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和中缅友好迅速发展的事实，可以说明中国没有大国主义时，说：你这样讲我很高兴。我们就怕有大国主义。我们是大国，怕大国主义是好的。我们还要教育我们的后代，不要犯大国主义的错误。如犯有个别的这种错误，要立即改正，要道歉。承认错误，人家就高兴了。

10月19日在听取李先念等汇报商业工作时指出：拿国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谋求个人的方便，是不允许的，更不能拿个人“走后门”来的东西，去随便换东西。商业队伍要加强，骨干更加强些。一个城市要有商业监察机构。商业部门的监察机关要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在谈到农村自由市场问题时说：农村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但不是不要管理。自由市场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也会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一些暴发户。甚至有些人开地下工厂，也不要怕，除了他们骗人以外，他们生产的东西总是人民需要的，是我们的缺陷。他们发现了我们的空子，便积极去搞，那就补了我们的空子。

10月24日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到机场迎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提前回国的周恩来。

10月25日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和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张昭、梁昌武汇报在北京召开的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情况。提出：林区里的工资高，要拿些商品进去卖，要办学校和其他一些福利事业，把人定居下来。可以实行三年不征购，鼓励他们发展林区农副业生产。现在林区的秩序不大好，要进行整顿。林业生产要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实行机械化是长远方针，更新也要搞机械化。

10月28日同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

11月6日——10日主持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市场、粮食等问题。

11月14日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

11月16日到广东从化疗养。十二月十九日回到北京。

12月16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犯。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长远计划、党的工作等问题，为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二十一日，刘少奇在邓小平报告国内形势时插话：这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帐，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以前的就算了，以后如果再搞这种事情，要开除党籍，或者至少要受纪律处分。会议后期，刘少奇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在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报告。

本车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题词：“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馆题词：“我们必须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来教育我国人民和军队。”

## 1962年六十四岁

1月11日——2月7日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1月11日——2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报告稿印发大会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二十一人组成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刘少奇先后主持八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根据大会分组讨论提出的意见，对报告作了重要修改。

1月14日同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同阿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等进行交谈。

1月2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由刘少奇主持起草并修改的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刘少奇在讨论中指出：现在有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各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样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1月2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要求全党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当前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报告认为，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这些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

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当然是不对的。困难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报告强调，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这个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

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讲话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讲话要求全党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筐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讲话纠正和清理了中央和地方在最近几年中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重视客观条件叫做“唯条件论”、“左”比右好等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号召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

1月30日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时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参加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的讨论并讲话。在此期间，还分别听取安徽省各地委的情况汇报，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个别谈话，调查了解和解决安徽省在过去几年中犯“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以及至今仍然“捂盖子”、不如实反映情况的问题。在大组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对安徽省过去几年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同时严肃批评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要求安徽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总结产生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回去把工作做好。

2月8日主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在讲话中提出：起草书面报告时，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并强调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我们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形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会后，由刘少奇主持，对他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再次作了修改，增加了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论述。这两份文件于二十五日由中共中央

办公厅转发全党。

2月21日——23日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当年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赞同陈云的讲话,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更充分他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二十六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李先念也分别就工业情况、建设速度问题和财政、信贷、市场问题作了报告。会后,刘少奇提出由中共中央将陈云等人的报告批转全国。

2月26日阅财政部关于《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的报告。报告反映了北京钢厂由于生产计划严重超过国家下达的计划,造成连年亏损,几乎将国家投资全部赔光的情况。刘少奇批示由彭真、刘仁阅处。并提出:“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

3月5日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监察工作情况反映》刊载的《青海省公安机关破坏法制违法乱纪情况十分严重》的材料上批示:“小平、彭真阅后,交谢富治同志办。中央公安部应派人到青海去会同省委严肃处理。青海公安机关违法乱纪情况,应引为教训。”

在商业部《商业工作简报》上刊载的《部分地区农村缺煤情况严重》的材料上批示:“关于群众的烧柴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商业机构是不能不管的。否则,要破坏生产。但如何管法?要研究。”

3月8日约请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物资总局局长袁宝华等汇报物资工作情况,提出:“物资部门是先行部门,不是后勤部门。国家计划工作,必须建立在物资基础上,要有物资做保证,不掌握物资,计划是空的。”“物资部门是综合部门,要有全面观点。物资管理必须是全面管理,集中统一管理。”物资工作要为生产服务,促进生产发展。“你们必须把物资工作的重点,由管计划内的大路货,转向管理计划上没有列、没人管、没人注意的那些物资上去。在这方面,你们有很多有利条件,能做出很大成绩。不要怕难,难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乱而后治。”“行政机构可短小精干,经营管理机构要充实加强。”3月12日、1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等二月二十六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的批语、中央关于节约的紧急指示、中央关于渡荒的指示等文件。在十三日的会上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3月15日在看了《公安工作简报》第六期后致信谢富治:“此件看过。我认为这是一方面的你们能够控制的好的情况。请你注意另一方面的情况,就是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有许多地方公安机关,甚至公社大队等用长期拘留、

长期劳改、劳教等方式，实际上逮捕了許多人，饿死和折磨死了一些人。而这些是你们不能够控制的，没有统计的，或者统计不确实。一九六一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停止。去年我在湖南就还看见这种情况。你们应该严格地检查、揭露、批判和纠正这种违法的情况。”

3月16日同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批转陈云等讲话的决定，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建议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中央批转陈云等讲话的文件于十八日发出，宣布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通知于四月十九日发出。

3月17日同罗瑞卿<sup>[1]</sup>、王任重、谢富治谈公安工作，指出：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下面不按照法律，县、公社甚至大队用长期拘留、劳改、劳教等办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你们要认真检查，彻底揭露、批判。当然，揭露出来是不好看的，是很丑的，但是，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在谢富治、王任重谈到这几年政法机关经常被批评为“右倾”的情况时说：你们怕“右倾”吗？无非是撤职。坚持真理，撤职也是好的，也光荣嘛！

3月18日回到北京。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3月21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了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方针。刘少奇在会上讲话，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国内形势实事求是他讲，在经济方面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的。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这个时期，我们调查研究不够。中央的同志，省的负责同志，自己不去亲自作调查研究，只是听汇报来了解情况，而且轻信那些汇报，人家一报，我们就信了。但是人家的汇报，有许多是浮夸的，不符合事实的，或者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们就相信了。又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去商量，没有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许多高指标，都不是从群众中间来的，是上面定的，拿到群众中间，又没有很好地听群众的意见，因此有些缺点、错误就不能很快地发现，不能很快地改正。有些地方，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的形式瞎指挥。同时，有一段时间在党内、在群众中，又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过火的批评斗争。这样，就使得群众和干部不敢讲真话，有意见也不敢讲，严重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刘少奇提出，希望大家一方面看到我们当前的困难，另一方面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有切切实实的工作，了解当前的困难，继续逐步前进。

3月27日——4月16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4月4日在公安部党组准备印发刘少奇三月十七日同罗瑞卿、王任重、谢富治谈话要点的送审稿上批示：“这个记录稿不要印。过去，你们已经印得有些过多了，将来会出毛病的。四年来，公安政法工作方面的确有不少新的经验需要总结，如果你们搜集了材料，我可以参加，和你们一道，认真地系统地进行总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要这样草率、零星地印发东西。”

4月9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就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通报的内容听取意见。

4月16日致信毛泽东：“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4月17日听取中共中央办公厅赴石家庄地区物资工作调查组汇报，提出：物资管理部门不是特殊部门，是个综合部门，你们也是个商业部，你们要基本上照商业部的办法。商业部能供应六亿人民，难道你们就不能供应二十一万企业？要抽调一批懂技术的人员，充实物资队伍。

4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东北地区精简工作的汇报和中央财经小组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在讨论当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指出：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问题，要全面调整。现在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

4月24日接见中共中央办公厅赴石家庄、无锡物资工作调查组成员，指出：当前的经济情况很复杂，问题又多，经济失调，大量物资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原因主要在上面，是计划安排和政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你们要向厂内的同志讲，向他们承认错误。按照我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陈云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转的财政预算报告去讲。你们代表中央检讨，市里也检讨，是非分明，实事求是。物资工作要抓两头（供和销），目的是为工厂服务。企业要根据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要求进行生产，不能让企业盲目生产。工作组要创造个办好工厂的典型。

4月28日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等汇报公安政法工作，指出：我们无产阶级的法律还没有成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去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斯大林也搞了一些东西，毛主席规定了我们专政工作的路线，又提出两类矛盾问题。现在的经验是两方面的，赫鲁晓夫不要专政，斯大林后期把肃反扩大化，我们也有混淆两类矛盾的经验。现在要纠正，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从理论上、方针原则上、机构分工上和具体办法上搞出一套来。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级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4月29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62]第三十八期）上刊载的关于反映长春第五坦克技术学校无视中央停止修建非生产性建筑的指示、巧立名目修建大礼堂等情况后批示：“采取切实的办法，停止这些基本建设。”

5月7日——11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七日，在李富春谈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缩短工业战线问题和李先念谈粮食和外汇问题之后说：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

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十一日，在会议结束前作总结讲话：“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为了克服困难，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状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

5月17日在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九期刊载的《安徽将宾馆饭店划归商业部门经营》后致函李先念：“是否可以考虑，将县以上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所建楼、堂、馆、所，一律收归国家所有，组织房产管理处，统一管

理。使用者一律按标准付给租金。这样，可以制止盲目建设楼、堂、馆、所，也可制止盲目占用房屋。”

5月23日约请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谈如何起草《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指出：“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要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搞错了，就要犯大错误。过去对矛盾性质认识错了的也有，但主要是错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和政府中的国尺党作风，主要表现在这上面。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这个问题要好好讲一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这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你们是专政工具，同时也有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备级党委领导。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6月3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工业搞多少，文教事业规模搞多大才适当？在这方面，几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要看农民能拿出多少商品粮食，才能确定可以搞多少工业和文教事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农民除自己消费外，能提供多少粮食和农产品，决定能腾出多少劳动力来从事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即搞工业，精神生产即搞科学、文化、

艺术。计划经济中的第一个比例即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要适当。多少人从事农业，多少人从事工业、文教有个比例关系。”

6月5日接见出席全国物资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物资厅、局长，在讲话中指出：还是要靠试点总结经验。每个大区，每个省、市都要搞试点。没有经过试点，就全面铺开，会犯错误的。“调查研究，进行试点，是总结自己的经验。还要学习别人的经验，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物资工作开始就要把底子打好，要严格，要按规矩办事，要有科学管理，要建立一套规章制度。物资部门就是要干预生产，成本高了要检查，质量差了要监督，要做报告。到一定时期，物资部门也像商业部门一样，搞加工定货，企业生产听你们指挥，要什么生产什么，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6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林彪关于中印边境的情况通报和当前军事上采取的方针政策。

6月27日同邓小平、彭真等会见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希斯尼·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们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其中包括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者、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包括修正主义者在内。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那就只能团结很少数的人。如果包括修正主义者，团结就不能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如果要包括多数党，包括所有的党，就只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一致，不能在所有问题上一致。求同存异，不同意的就不写在文件上。实际上，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带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战线的性质。

7月3日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恩来、尚昆同志：这是中央办公厅派到石家庄工作组和石市委拟出的办法。我看是好的。请中央精减小组加以讨论，是否可以酌加修改后发给其他各地参考。”7月18日接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主要产粮区工作的司局长以上干部，在讲话中向他们提出五项任务：（一）加强地委、县委和基层的领导；（二）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三）如实地反映情况；（四）改变地方党组织中某些不正确的作风；（五）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谈到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时说：“政策是由中央统一制定的，只有中央才有权力决定政策，这一条，在观念上要明确。当然，某些地方有特殊情况，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可以制定某些地方的政策，但是都要经过中央决定，经过中央批准。”地方党委、地方政府虽然不制定政策，但是应该研究政策。“政策执行得好不好，完全执行或不完全执行，机械地执行或比较实事求是地执行，这中间差别很大。有些人对党的政策各取所需，只执行自己所需要的，不需要的就不执行，或者执行反了、偏了，就会危害党的事业。”在谈到改变地方党组织中某些不正确的作风时说：“现在有些地方的市场跟全国的统一市场是矛盾的，画地为牢，别的地方的东西不许来，这是不允许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呢？设这样多的关卡，这不是按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人为地制造障碍、壁垒。”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

7月24日到达北戴河。7月25日——8月24日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

业等问题，开始十多天分小组讨论农业、商业等有关文件。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发言，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八月十一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上就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估计作了检讨，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八月二十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提出：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于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究竟怎样传达，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刘少奇的意见得到毛泽东赞同。

8月1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刘少奇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重新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作者作了重要补充和修订。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的修养是统一的”等章节中加强了理论论述，补充了关于我们党的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并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思想意识修养。

8月25日回到北京。

8月26日——9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为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的预备会议。

9月1日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罗查递交的国书并谈话。在谈到国际关系问题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同所有的国家友好相处；我们坚持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应该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管其他大国喜欢与否，我们将坚持这些原则。

9月21日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阮维祯。

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全会肯定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的成效，决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二十六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说：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第二种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第三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而第二、第三种态度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我们要坚持第一种态度，反对第二、第三种态度。同时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意见，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定的

计划继续进行。

10月5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会见以武元甲为团长的越南军事代表团。

10月10日听取国家经委党组汇报物资管理试点工作情况，指出：物资管理工作是一件新工作，开始思想认识不统一，是自然的。要先按设想在小范围内摸索着进行。不要怕困难，要谨慎地搞下去。在具体步骤、做法上，要走一步，看一步，看准一步，走一步。在三年内把全国物资工作搞好，就算有成绩。“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商业工作做了个决定。决定中的许多原则，对物资工作也适用。实际上物资部门也是商业部门，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物资部门的权力很大，不要抓住人家的困难去整人家，如果物资部门那样办，就很不对了。物资部门必须很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要想一切办法，保证工厂生产的稳定。这就要强调计划的严肃性和合同的严肃性。凡是订了货，半道不要的，由订货单位赔偿损失，承认错误，并为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找出路。如因国家计划变动给企业造成损失，国家要帮助企业解决损失和产品销售的问题。凡是产品不合乎计划或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的，生产部门要负责保修、保退、保换，损失由生产单位负责。过去生产的一些不合格的产品，要减价出售。绝不许拿次货当好货去销售，要讲老实话，好货就是好货，次货就是次货，不许骗人。生产资料的质量不好会带来严重后果，必须强调质量合格，不能乱收购。”

10月14日将《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载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光明日报》）、《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载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文汇报》）两篇文章推荐给子女毛毛（刘允若）、涛涛（刘涛）阅读，并在给他们的信中提出：“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它的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如果你们发现人们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善恶有不同的看法，你们就可以发现这些人们中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对于一切社会、政治现象，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

10月15日、1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农口当前工作、一九六三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二十年二十五年的设想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等问题。在汇报到明年开始试制除草剂等新农药时插话：农药问题要认真搞一下，可以进口一些除草剂，每一种都买一点，先小面积试验。要吸收外国的经验。在汇报到林业问题时插话：要大搞封山育林，积极搞人造林，大面积的森林还是要靠天然更新。在汇报到农业科研和教学问题时插话：搞农业机器设计、制造的学校和搞经营管理的学校两种都要，现在这种学校太少了。另外，在搞农业机械的时候，还要注意农村的加工机械的制造和配套。

10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中印边境对印军事方针的决定。二十日，印军在中印边境向中国大举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实行自卫反击，并拔除了他们在中国境内修筑的据点。

10月1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汇报国防工业口的基本情况、当年计划执行情况、一九六三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等问题。指出：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

专门的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无非是创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地前进。

10月20日、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汇报工交口一九六三年计划安排等问题。在汇报到重工业同轻工业的关系时插话：重工业是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不是轻工业为重工业服务，不是农业为重工业服务。在汇报到增加工业产品品种问题时插话：钢材品种、机器品种、化工品种，那些关键的东西苏联不给我们，我们从资本主义这方面打点主意，无非是出点钱，因为我们自己搞也要花钱，花时间。各部门对外贸易部，要注意向资本主义方面找出路。在汇报到产品质量考核时插话：是不是从价格上采取一些措施，你提高质量就加价，降低质量就降价，优质优价嘛。你只考核，质量不好也不处分，好也不奖励？每一种出厂的产品，都要搞一个单子，保证什么规格，什么质量标准，不合格的可以保退、降价、扣钱。每一个厂都要搞这么一些技术措施。不要去欺骗使用部门和消费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老老实实。资本主义是讲究信用的。苏联产品的质量就不好，特别是消费品，我看它没有认真注意这个问题。每出厂一种产品，都要有质量标准，如果不合规格，要赔钱。单靠政治不行，单靠考核也不行，要赔。在汇报到维持现有生产水平的投资安排得不够时插话：这是因为我们无知，吃这样大的苦头，花这样大的代价，才懂得，需要先维持简单再生产，再搞扩大再生产。过去我们扩大再生产搞了很多，盖了很多新工厂，简单再生产搞不下去了。盖新工厂不如扩建老工厂，扩建老工厂不如维持简单再生产。

10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市场和外汇情况。在汇报到农产品收购问题时插话：今年的农产品征购有完不成的危险，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有些东西，比如粮食，在没有完成征购任务以前，不能进入自由市场。

10月2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汇报文教口一九六二年调整和执行情况、一九六三年的安排和指标等问题。在汇报到调整艺术表演团体问题时插话：文工团要大减，现在减得还太少。文工团办多了实在不好。一方面要为国家着想，一方面要为这些小孩子着想，他们现在跳舞唱歌，都是些半调子，将来怎么办？要跳舞，就进舞蹈学校，要唱歌，就进音乐学校。舞蹈学校和音乐学校不要减，文工团要大减。在汇报到基层文教卫生事业的调整时插话：农村卫生事业要大发展，一个县要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些难治的病，可以到县医院去治。可以从农村救济费中拨出一部分来作医疗费。

10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韩光汇报科学口的情况和今后任务。指出：科学要抓。我们要搞几个现代化，科学研究部门不首先现代化，整个国家都不能现代化。在汇报到农业科研问题时插话：我们人口三倍于苏联，四倍于美国，可是我们的耕地只有十六亿亩，比他们少得多。美国人吃的粮食比我们少，他们吃奶和肉多，按照美国人的吃粮标准，我们的粮食已经够了。所以，我们要大搞山林，大搞野生植物。畜牧要大发展。在汇报到发明创造者应发给证书和奖金时插话：发点奖金也有必要。除了政治以外，还要搞点物资刺激。

10月31日、11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汇报基本建设情况。指出：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还要紧张工作。

11月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李先念汇报国家财政金融情况。在汇报到财政支出情况时插话：城市维护费应包括修房子。城市只晓得盖新房子，不晓得修旧房子，就等于只搞扩大再生产，不搞简单再生产一样。我还建议增加一个城市建设部，管房子，修房子，把所有房子都管起来，还管城市的一切建设。它可以收房租。过去没有人管房子，中央也不管，预算里面也不打，以后所有旧房子都要修，各部盖的大楼都要收房租。在汇报到信贷收支情况时插话：要注意信贷收支的平衡，这一点，过去就是不注意，信贷不平衡了，也不报告，也不提意见，也不想办法。今后发现信贷不平衡了，发生赤字了，通货要膨胀了，就要马上报告，采取办法。这个地方要多说两句，提起注意，吸取经验。过去出漏子，就出在这个地方。

11月3日召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林业工作负责人座谈林业问题，指出：木材价格要彻底改，把大木材的出场价格压低，售价提高，小规格材的出场价格提高，售价降低。价格可以促进生产，促进木材节约。要想法解决大面积造林问题，方法一是天然更新，二是人工促进，人工播种，三是育苗移栽。林业科学院要注意研究这些问题。要专门研究木材分配，现在分配木材未用心思，如冰棍用大木材，还分配木材，岂有此理，必须充分利用资源，减少木材浪费。

11月5日同朱德、邓小平会见挪威共产党中央主席埃米尔·洛夫林。

11月12日同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没有人管了，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对干部的要求同一般党员不同，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干部当中，特别是高级、中级干部当中有不好的，有坏人、蜕化变质的，他们所起的影响同基层党员几个人所起的影响不一样。党外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是好的，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列宁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对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现在有些大案子处理不下去，有人顶住。不要怕，处理了这些人，大多数人是拥护的，这就能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的本质。总而言之，不要脱离党员多数，不要脱离群众、干部、工人、农民的多数，要认真地搞民主集中制，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一个领导、一个多数，这可以使我们党保证纯洁，将来曲折少一点。

11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李富春、李先念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指出：要继续贯彻五月会议精神，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还得下马，精减城镇人口要继续减，不然，对我们十分不利，使我们十分被动。明年的计划可能还是大了一点，不要一下子搞那么大，搞得大了，又来调整。这两年，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扭转了这个局势，不要再一次扭转了，那样就划不来了，时间也耽误了，老百姓也受了苦头，国家也受了损失。不如现在紧一点，搞小一点。

11月29日再次会见挪威共产党中央主席埃米尔·洛夫林。

12月10日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关于石家庄市工商关系问题和处理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先念、一波、子华：此件对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工商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处理办法，并且使争执很久、妨碍生产的许多问题，很快（三个星期）就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请你们注意讨论研究，并立即规定几条办法，迅速解决各地发生的工商关系问题。或者加一批语，规定办法，把此件转发各地。”

12月19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移民、合作部长阿赫马迪。

12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六三年财政、信贷、外汇、市场平衡等情况汇报。在插话中指出：一方面形势好转了，但是各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这样才可以在一九六三年争取更进一步的好转。针对有些地方又出现扩大基本建设的苗头指出：要抓紧一点，不抓紧，今年好一点，明年又出乱子。

12月26日同董必武、周恩来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谈到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时说：我们两国的边界通过谈判，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我们认为，这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好处。我们两国是兄弟邻邦，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我们和其他的兄弟国家也是采取同样的原则来解决边界问题的。

## 1963年六十五岁

1月1日同董必武、周恩来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谈话中说：中国是大国，但是我们教育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和我国人民，无论如何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中国历史上有过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就坚决改正。对国内民族也采取平等态度，反对大汉族主义。

1月3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1月4日同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罔正芳。在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说：我们对苏共的关系，一定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我们方面决不主动采取分裂步骤，一定尽量保持团结，即使内部不团结，那么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也好，而且时间维持越长越好，除非苏共下决心，同中国分裂，把关系搞坏。我们决不先采取步骤。即使被迫采取步骤，我们也采取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斗争方式。

1月14日同邓小平召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程潜、杨明轩、黄炎培、陈叔通、傅作义、张奚若、周建人、季方、陈其尤、许德珩、徐荫山等座谈中苏关系等国际形势问题，提出：对中苏关系，要有精神准备，不要惊慌失措，我们还是争取团结，不要分裂，纵然破裂了，以后还可以再合作再团结。

1月16日同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副书记优素福·阿吉托罗普。

1月20日出席中国尼泊尔边界议定书签字仪式，并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大臣图尔西·吉里博士。

1月21日在看了东北林业总局林产工业局《再提关于合理利用木材、节约木材的几点意见》后致信薄一波、谷牧、李富春、谭震林等：“东北林产工业局写的这个意见，很值得一看，请你们考虑并且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意见。以后木材供应是否统一由木材公司管理，原木运到各城市（原木运输较为便利），由木材公司统一计划加工，按质量、规格供应各需材单位以成品、半成品、成材或者原木。加工剩余物也集中起来，全部加以利用（小的用作冰棍杆、牙签、医院用棉签等，其余作纤维板、纸浆等。）除有特殊情况外，一律不供应各用材单位以原木。这样可大量节约木材，因材利用，并可满足需要。”

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袁宝华汇报一九六三年全国生产供应预拨会议情况。指出：“数量矛盾、品种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供应时间上的矛盾是生产和供应的基本矛盾，长期存在，如果东西够了，这四个矛盾没有了，物资就会过剩，那时，物资部门又会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难。这四个矛盾存在可以推动我们自力更生，多想办法。物资部门要很好地研究这四个矛盾，要研究和监督各单位、各地区所提需要物资指标是否切实合理，计划部门、经济部门也要很好研究这四个矛盾。”“商业、物资系统的一级站、二级站，不愿定点供应、直达供货，而愿增加中转环节，层层加费，这是在起反动作用，是‘必求垄断而登之’，妨碍经济进步。”“东西没经过你，你只盖个章子，就要收百分之几的手续费，这是不劳而获，等于旧中国时代的税卡，等于是拦路打劫，要向一、二级站的工作人员讲清楚，绝不允许他们阻碍物资流通，一定要发展定点供应，直达供货。”

1月26日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会见丁颖、竺可桢、吴有训、金善宝、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黄家驷、蒲辅周、邓稼先、孙超、侯宝璋等一百多位著名科学家时说：我们国家的进步，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都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依靠科学家的努力，尤其需要老科学家的带头。只要大家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进步得很快。

2月4日、5日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约翰·高兰和英国《工人日报》主编乔治·马修斯会谈。在四日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我们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在处理中苏两党的关系时是很谨慎的。我们绝对不会首先采取同苏联分裂的步骤。在五日会谈时进一步指出：我们从来就宣传，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如果中苏两国破裂，对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对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严重损害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这么讲。我也相信，苏联同志也不愿意中苏两党两国分裂，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分裂，对于苏联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对于中苏两党、两国避免分裂，恢复团结，是抱有希望的。现在的问题是：苏联和其他一些党采用施加压力的办法，要我们放弃我们认为正确的一些原则和观点，这是办不到的。只能采取独立、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办法，来解决分裂，增进团结。

2月6日——9日主持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劳动工资、增产节约和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六日，在讨论到国营商业要打破地区封锁、减少流通环节时指出：要组织一个全国的市场，不要组织一个地方的市场，全局要照顾局部，局部要照顾全局。组织起来以后地方就没有道理阻止物资出口，这叫做打破封建割据。打破封锁这一条，这回一定要解决，再不要拖拉了。在谈到个体商贩和合作商店职工的收入比国营商业职工高一些时指出：还是要高一点，因为他们没有公费医疗、劳动保险、社会福利。只要他们不搞暴利，这些人还是靠劳动吃饭的。

2月10日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农业机械站在农闲期间开展服务活动的报告》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印发给工作会议各同志参考。农村动力机械必须综合利用。所有拖拉机站、排灌站等，都必须配备粮食加工机械、饲料加工机械以及其他农产品加工机械。今年制造多少农产品加工机械，望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列入计划。以后每年的计划，都应有农产品加工机械的生产指标。”

2月11日——28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等问题。刘少奇主持了十二日、十三日会议。十二日，在彭真作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后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二十五日，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论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状况、斗争的性质、斗争的前途和方针等问题。

这个报告经刘少奇修改后，于四月二日作为内部文件下发。会议期间，毛泽东推荐了湖南省在农村开展以抓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省在农村中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2月1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交谈时说：我们革命胜利后，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下，教育我们所有的干部、人民，不论同任何国家和人民打交道，都切记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教育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同时，我们也反对别人的大国沙文主义，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正在反对，我们不买它的账，在他们面前绝不低头。十四日，参加首都群众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集会。

2月28日会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伦纳特·佩特里，在交谈时说：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我们取得政权后，内战才停下来。但是，我们刚取得政权，美国人就打到鸭绿江边，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不得不派志愿军把他们打回去。一打就打了三年。所以中国现在还有许多落后的东西，经济文化都还很落后，新的东西还不多。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需要几十年。因此我们需要有几十年的和平时间。如果世界局势紧张了，或者发生了战争，就会牵连到我们，我们的建设就要停下来，因此我们希望和平。这是我们真正的心里话。我们希望长时期的和平，譬如说至少五十年。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3月6日会见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和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在交谈中说：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这个大国、大民族也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东方日本的欺侮，他们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很理解国与国之间打交道时处于不平等地位是什么味道。不论大国小国，同别国打交道时处于不平等地位，是不能忍受的。所以首先的一条是，我们在同别国打交道时要处于平等地位。任何国家，不论美国、英国、印度都是一样。他们要平等对待我们，否则我们不能接受。所以，如果不以平等态度同其他国家打交道，一定要引起对方的反对。

《解放军报》刊登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1]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3月7日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会见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和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

3月26日飞抵昆明。

3月30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颁布特赦令：根据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州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4月12日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离昆明前往印度尼西亚友好访问，途经缅甸首都仰光短暂停留后抵雅加达，受到苏加诺总统的欢迎。下午，由苏加诺总统陪同在国家宫参观花[1]雷锋，中共党员，湖南长沙人。一九六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

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因公殉职。裙和兰花展览会。

4月13日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国宴，在讲话中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只要保持警惕，坚持团结、坚持斗争，这些困难和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参加印度尼西亚航空节庆祝活动。向印度尼西亚烈士墓献花圈。

4月14日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抵茂物访问。

4月15日游览茂物热带植物园。中午，离茂物抵万隆访问。

4月16日参观位于万隆以北二十公里的复舟山火山喷火口。中午，离万隆抵日惹访问，在阿贡宫参观日惹手工艺品展览。

4月17日参观日惹婆罗浮屠佛塔。中午，离日惹抵巴厘首府巴塘。

4月18日出席巴塘人民为欢迎刘少奇主席来访举行的集会，在讲话中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主独立的斗争，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极重要组成部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绝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越是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就越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道路，就是捍卫世界和平的道路”。同苏加诺总统在巴塘的坦帕西林宫会谈。

4月19日到达雅加达。在国家宫举行告别宴会。

4月20日同苏加诺总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离雅加达到达仰光，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受到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的欢迎。

4月21日在奈温主席陪同下，参观瑞光大金塔，并捐款六千缅元供修缮宝塔之用。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献花圈。出席奈温主席举行的国宴，在讲话中说：“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亚非国家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的一个光辉范例。”

4月22日在奈温主席陪同下，访问掸邦首府东枝，游览了风景名胜莱茵湖。

4月23日到达缅甸西南海岸的海滨休养地额不里。

4月24日同奈温主席会谈。在谈到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时说：在我们这些新独立国家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让后起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另一条道路是殖民地、附属国的道路，我们也不愿采取。因此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要取得经济上的独立，需要几十年的工作。在国内，我们必须依靠最大多数人民，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在国外，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尊重我们独立、平等待我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我们就能站得稳。中国是真正尊重缅甸独立，平等对待缅甸的，缅甸可以依靠中国，中国不会做损害缅甸的事。

4月25日到达仰光。举行告别宴会，在讲话中说：“在访问期间，我们亲身感受到了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胞波’友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4月26日继续同奈温主席会谈。离开仰光回到昆明。

5月1日在昆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中午，同陈毅等离开昆明前往金边，对柬埔寨王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欢迎。下午，到王宫拜会柬埔寨王国王后，参观关于人民社会同盟成就的永久性展览，游览金边市容。

5月2日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抵暹粒访问。参观吴哥古迹，游览暹粒市容。

5月3日抵磅湛访问。参观中国援建的“柬中友谊纺织厂”，到湄公河畔观看柬埔寨传统的赛船。下午，到达金边，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国宴并讲话。

5月4日在金边西南一百公里的游览胜地基里隆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

5月5日到达金边，举行告别宴会，在讲话中说：“我们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外来干涉、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将一如既往，密切合作，相互支持。我们两国人民不仅要在今天和睦相处，而且要世代友好下去。”下午，同西哈努克亲王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参加金边市民为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柬埔寨举行的群众集会。

5月6日回到昆明。

5月9日同王光美给在北京上中学的女儿刘平平写信，祝贺她十四岁生日：“我们希望在满十四岁以后，认真地考虑一下：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你应当力争上游，不要安于中游，不要做落后分子和自私分子。我们认为，根据你的健康状况、智力条件和你自幼所受的党的教育，你不应当只安于中游，不应当马马虎虎地度过你的青春时期。我们希望你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续承担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现在学习要认真、刻苦，热爱劳动，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为了人民和集体，可以有所牺牲，并且注意锻炼身体。将来，党和人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好什么工作。当然，要这样做是会有许多困难，要吃苦，要吃一些亏，要受委屈，甚至要牺牲的；但是，只要你真正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决心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关心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虽然吃了苦，吃了亏，你反而会心情愉快，心情舒畅的。希望你认真地考虑。”

5月10日同陈毅等离昆明前往河内，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欢迎。下午，向烈士墓献花圈。

5月11日、12日、14日、15日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第一书记黎笋、政治局委员长征、范文同、范雄、武元甲、黎德寿、阮志清、阮维桢、黄文欢等举行会谈，主要交谈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5月12日出席河内为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越南举行的二十万人群众集会。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爱国正义斗争。”

5月13日在河内风景区西湖休息。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

5月15日参观阮爱国党校，在欢迎会上发表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晚上，举行告别宴会。

5月16日同胡志明主席共同签署《刘少奇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回到昆明。

5月19日听取中共云南省委汇报工作,指出:云南虽然只有二百万人口,但很重要,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疆,工作做好了,是有国际意义的。要引导这二百万人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政策,一个办法,要取得人民的信任,而且走上正轨,这是很个容易的,时间是要长一些的。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称为《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是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5月22日由昆明回到北京。

5月25日出席《中国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并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

5月27日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等会谈。

5月29日飞抵武汉,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的修改审定。

6月2日、3日同邓小平等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政治局委员长征等会谈。

6月4日由武汉回到北京。

6月6日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到车站迎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来华访问。七日,同崔庸健会谈。八日,出席首都群众为欢迎崔庸健委员长举行的集会。十六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崔庸健。十七日,到机场为崔庸健送行。二十三日,新华社发表《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联合声明》。

6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和准备参加七月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

6月13日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六月十一日在北京逝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

6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于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和中共代表团在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应采取的方针。中苏两党会谈于七月五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

6月中、下旬审阅修改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7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

7月10日、20日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并谈话。

7月25日去北戴河休养。

8月5日回到北京。

8月6日同朱德、周恩来会见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

9月3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

9月6日——27日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工业发展方针等问题，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从十四日起，刘少奇因出访朝鲜，没有参加后一阶段的会议。

9月14日同林枫[1]、叶剑英[2]等离北京乘火车前往朝鲜访问。

9月15日到达平壤，受到金日成首相和崔庸健委员长的欢迎。晚上，出席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共和国内阁举行的国宴并讲话。

9月16日、17日、18日同金日成举行会谈。主要交谈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9月18日出席平壤群众为欢迎刘少奇主席举行的集会，在讲话中赞扬朝鲜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到底。同金日成、崔庸健会谈。

9月19日在崔庸健陪同下参观朝鲜钢铁基地——松林市黄海钢铁厂。

9月20日在崔庸健陪同下抵咸兴市访问，出席咸镜南道和咸兴市为欢迎刘少奇主席举行的群众集会并讲话。

[1]林枫，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叶剑英，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9月21日参观朝鲜“二·八”维尼龙工厂和兴南肥料厂。

9月22日参观咸镜南道咸州郡的朝阳合作农场。

9月23日在返回平壤途中，参观朝鲜水利灌溉工程——平安南道延丰水库。

9月24日在金日成陪同下参观朝鲜工农业展览馆。晚上，观看正在朝鲜访问演出的中国上海舞剧团舞剧《小刀会》。

9月25日继续同金日成会谈，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经济工作方面的经验，就是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对人民生活、农业、轻工业注意得不够。搞基本建设过多，就是搞工厂，搞扩大再生产过多。很多人只注意扩大再生产，忽视简单再生产。又说：我们有六亿人口，很快就七亿，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以后要认真搞计划生育。

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接见使馆工作人员和在平壤的中国专家、中国留学生。

9月26日在平壤举行告别宴会并讲话。

9月27日离平壤回国。

9月28日回到北京。

10月1日晚上，分别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一和夫人、巴基斯坦公众领袖巴沙尼等。

10月21日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生产情况。指出：缩短工业战线，主要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过去基本建设战线太长，项目过多，要求太快、太急，设计没有搞好，急于上马，一心搞扩大再生产，忽视了简单再生产。同时，

在生产方面，只注意增加数量，忽视质量，提的指标过高，超过设备的可能，本来可以用十五年的设备只能用五年，设备损坏过多，又不注意维修，不让它休息，造成不好的后果。这些都是痛苦的经验，有了痛苦的经验才能认识。付出代价，取得经验，要永远记取。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革命战士，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人，管理企业，总要比资本家管理得好，对企业的浪费、亏本，应该感到可惜、痛心，用一切办法同浪费现象作斗争。如果对国家的财产不爱护，对企业的浪费不管，还算什么觉悟的无产阶级，如果看见浪费现象熟视无睹，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能当领导。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企业，所有的干部、党员都要动员起来，向这方面努力，并以此作为鉴定干部、党员的条件之一。

10月23日继续听取薄一波汇报。指出：节约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长期方针，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持家，国家才能兴旺。不要以为这是“小气”，这是国家兴旺之气。全党、全国、全民族提倡这个风气，一年就可节约几十亿元。一种风气，一种民族风格，会留传几百年。在谈到产品品种时指出：凡是有特点的东西，都要保存、发扬、推广，当作领导工业的一种政策。我们为自己的国家当家，不能搞掉。要创造出我国自己特点的产品。在谈到工业管理体制时指出：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部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飞机、造船都可以成立总公司。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配，不由总公司管。

10月24日继续听取薄一波汇报。在谈到设备更新时指出：钱放到什么地方？有一部分可以用于新的基本建设，但大部分还是要用于现有企业。过去把老企业的折旧挪过来搞新建项目了，今后要还账。首先要搞设备更新、维持简单再生产，而后行有余力，再搞扩大再生产，不是首先扩大再生产，而后有可能才搞设备更新。应该说，扩大再生产也是首先放在老企业。在谈到技术人员的使用和培养时指出：要把他们放在一定的负责的岗位上，要提拔一批工程师，放手使用，不那么成熟不要紧，摆在一定的位置上，才能逐渐成熟。企业不要设那么多副职，去安插照顾干部，要照顾，由国家照顾。企业是生产斗争的最前线，应选一些大学、高中毕业的又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雷锋式的人物去。在谈到管理体制时指出：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考虑一下，如何管理好企业，无非是有组织、有计划和减少官僚主义。”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中央成立部，各省成立厅，都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恐怕不合适。企业要搞经济核算，组织专业公司管企业，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各部的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变成业务机构。”当然，搞公司也是官办机构，也可能产生官僚主义，但公司总比较接近企业。“管企业的组织要更接近企业，接近群众。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

10月27日会见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议长比会瓦·班杜·塔帕和夫人。

10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这个文件的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后来称为《后十条》）。

同周恩来会见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加·富尔和夫人。

11月1日到达上海。

11月3日到达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有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并拟定《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这两个文件向全国宣读，“要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会议期间，同毛泽东交谈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方法，决定采取两项措施：扩大宣传规模，改变过去只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的做法，省级和中央一级报刊都可以组织文章，但要经中宣部、各大区批准；扩大传达范围，由过去只传达到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逐步扩大到全体人民。

11月9日回到北京。

召集中共中央宣传部、各中央局宣传部、《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负责人会议，传达和布置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两项措施。

11月13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战线上要更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为纲，来带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也带动各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工作，同时要继续坚定地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

11月1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等文件；原则通过提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草稿）》和《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草稿）》；听取彭真关于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立法和下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的说明。刘少奇在讲话中传达了在杭州同毛泽东商定的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两项措施。

11月15日、16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彭真报告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立法和下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刘少奇在十五日的讲话中通报了扩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规模和传达范围的措施。

11月17日——12月3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和《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说明》，批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11月22日出席中国阿富汗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在会见阿富汗内务大臣阿布杜·卡尤姆博士时说：“我们要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设是搞不成的。中国要改变

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不愿同其他国家发生什么战争。”

11月下旬为于十二月十三日开幕的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记取这一次洪水和其他各次水旱灾害的经验教训，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决心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

批地把河北水利建设好。”

12月1日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并谈话。

12月12日、13日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农村工作。在谈到造林经费时提出：要从国家预算中抽出一部分资金，搞造林基金，可以给农业银行搞长期贷款，分三四十年归还，一年拨一亿，三十年拨三十亿，三年以后林木可以轮回采伐，就可以周转。不下这个决心，造林很困难。

12月21日同刘允斌等子女们谈话，谈了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教训，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关系等问题，教育子女们要立大志，要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自觉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促进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指出，只有这样，我们的一生才能感到有意义，心情才会舒畅，在困难面前不会悲观失望，永远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2月22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罗荣桓[1]公祭大会并担任主祭。

12月26日听取薄一波、余秋里等汇报工业生产和全国工业会议的情况。在汇报到松辽油田（即大庆油田）的经验时指出：

有干劲，有风格，搞得很好。但要注意适当休息，劳逸结合。工资制度，不要简单提不计报酬，工人可以讲不计报酬，领导上要讲按劳分配，不要又把按劳分配搞掉了。要长远打算，农副业生产、市政建设，要慢慢搞起来，将来搞个特区政府，搞一元化的统一领导。在汇报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问题时指出：要接受过 [1]罗荣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病逝。去的经验教训，不浮夸。运动是长期的，不要停下来。提倡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敢说，在小范围内说，敢干，先在试验室里干。推广的和教人家的，必须是成熟的。过去几年，好的东西多，毛病出在报纸上讲多了，不成熟的也推广了，要好好总结一下。在汇报到组织托拉斯与地方有矛盾时指出：“要考虑我们是个大国，将来工厂越来越多，究竟怎么管理对国家有利。要撇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行业主义。什么‘地方不方便’，‘利润分成’，‘产品分成’，‘谁大谁小’，‘谁说了算’等等，不在考虑之列，这些问题，放在分配制度、财政制度中研究。”在谈到管理体制时说：“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作当事人，不好吗？有的厅局长、工业书记、商业书记、煤炭书记都滚到里面去了，不看全局。自己不滚进去，不是聪明的办法吗？超脱一点，就有全局观点了。党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样管的问题。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

## 1964年六十六岁

1月3日主持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有关人士三十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批示[1]，听取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汇报。在讲话中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2月上旬春节期间，同到河北抚宁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回京休息的王光美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问题，提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边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 [1]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保护他了。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王光美返河北后，向中共河北省委传达了刘少奇的谈话内容。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将河北省委根据王光美传达整理的谈话要点送毛泽东审阅。

2月13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教育工作座谈会（当天是甲辰年春节，亦称“春节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缩短学制，改变现行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思想。

2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

3月3日——10日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会谈。

3月15日会见以柬埔寨王国政府副首相、国防大臣兼王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朗诺中将为为首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

3月21日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以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为日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3月27日复信王光美，谈对桃园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势的看法，提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也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这是运动和斗争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不经过批评和斗争。对于那些违反人民利益、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只顾取得少数人的非法利益，而且坚持不改，并企图进行破坏的人，是不能不继续进行坚决斗争的，否则，是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的。”

4月5日同周恩来会见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

4月11日复信王光美，在谈了对桃园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势的看法后指出：“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和你们与社员群众的实践经验，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标准。我的信，只能作为你们的某种参考，

引导你们向某一方面想一下，如果不是真理，不管是什么人的意见，必须有勇气加以否定。”

4月12日同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主席爱·弗·希尔。

4月19日会见以朝鲜对外文委副委员长康久永为团长的朝鲜文化代表团。在谈到文艺创作时说：革命发展时代应有好的作品。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我们革命胜利已有十多年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已基本完成，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单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就不够了。必须更进一步，要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这需要创造。我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没解决得很好。在教育方面也未解决好。小、中、大学到底怎么搞，我们也有不少缺点。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了，也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5月13日会见由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元泽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康良煜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5月14日听取国务院计委领导小组汇报长期计划。指出：我们必须提倡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在安排计划时，一定不要让老实人吃亏，不要使虚报浮夸的人占便宜。同时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怎样普及教育？按照现在的办法，农民负担不起，国家也负担不起，在目前的制度办法下谈普及教育是行不通的。要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只有一种制度不行，必须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

5月15日——6月17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一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防修反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5月17日同周恩来与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会谈。

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李富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说明和谭震林作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农业工作的说明。

5月22日、23日同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格里巴会谈。

5月25日阅《桃园大队社员用羊奶喂猪的情况调查》一文后致信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一阅。中国从北到南各处地方，特别是山区，都可以养羊，特别是发展奶羊，利益很大。羊奶营养价值高，儿童和老年人吃了很好。但许多人还不习惯吃羊奶，特别不加糖的时候，不爱吃。婴儿则没有不习惯的问题，加点糖儿童就爱吃了。如果母亲的奶不足，用羊奶补充，是很好的。比买奶粉吃，或另作婴儿食品，要省钱省劳力。用羊奶喂猪喂鸡，都可大大节省精饲料，并且效果很好。所以在农村中推荐养羊，特别是养奶羊，是值得注意的。”

5月27日阅中共浙江省委《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义的报告》后致信谭震林：“同意将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阅读。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公社干部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从事集体生产，用一小半时间办公社。只要安排好，是完全能行的。二是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这有过去许多经验。必须在“四清”之后，总结过去的经验，定出一些严格的制度，经过典型试验，然后由省委、地委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去办。过去的错误绝不应该重复。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其他各省也可以试点。以后再由有经验的省起草一个章程送中央审

查。”

5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在发言中指出：现在，形势全面好转了，国家财政收入多一些了，但出现一个苗头，就是大家都想多办点事。这个苗头继续放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一切工业部门都要保持过去两年的作风，对基本建设要控制，不能松。

5月31日会见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恩·佩耶，指出：我们欣赏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上执行独立的政策。我们两国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发展友好的关系。我们在国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执行与你们相似的政策——独立的政策，不听别人指挥。在国内，我们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今后在不少具体项目上，我们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相互帮助。

6月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在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付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

同周恩来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元帅，在谈到经济援助时说：请总统阁下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凡是答应的事，我们就一定真心诚意去做。也有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你们国家做错了事，犯了错误，这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就承认并改正错误。我们相信，采取这样的政策，就可以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西方国家的通讯社放肆地诽谤和污蔑我们，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世界各国从事颠覆活动，要控制别的国家、民族……让全世界人民来看，全世界人民可以观察我们的实际行动，让他们通过对我们的行动和政策的实际观察，得到真实的了解和正确的结论。三日，同萨拉勒总统会谈。四日，出席首都群众为欢迎萨拉勒总统访华举行的集会。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萨拉勒总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联合公报》。

6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制订《中共中央关于在我国工业系统建立政治机关的决定》、《政治工作条例》等文件的说明和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汇报。

6月8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防止修正主义问题时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我国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意见。

6月1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阐述了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方针和在国内如何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问题，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经常开展“四清”、“五反”运动，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全体与会代表。

6月14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福米·卡瓦瓦。

6月15日、16日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军事汇报表演。6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修改《后十条》。

6月20日参观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国防工业馆，观看了导弹、飞机、潜艇、通讯设备等军工新产品。

6月28日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李颀伯、张承先、万晓塘等汇报正在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情况。

7月1日召集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军队系统军级干部座谈军队政治工作、战备训练等问题，在讲话中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军事问题，讲了敌人进攻的几种可能性。我们从最坏的可能作准备，准备好，争取最好的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要想打的象征，但是，要做准备，要经常有敌情观念。中国有句古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没有敌国，没有外患就要亡国的，没有敌情观念不好。

7月2日召集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在谈到如何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说：一条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搞能够确实解决问题，锻炼干部，又出经验。一批一批地搞看来似乎慢实际快。再一条是省、地、县委书记真正去蹲点。所谓蹲点不是到点上听听汇报又回来了，而是从扎根串连开始一直到四清搞完为止，一直搞下来，取得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各级党委才能真正领导好这次革命。

7月3日召集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市委书记座谈城市工业生产、文化教育、“五反”运动、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在谈到劳动制度时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劳动保险，来了不能走，要走很困难，吃了一些苦头。以后，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利用农民的农闲季节。国家的劳动制度应是两种，不是一种。这样，国家就节省了，成本降低了，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好处。

7月5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谈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提出：这是一种新事业，新事业如果没人去关心它，没人扶持，就不能很好地发展。是不是由教育厅或工业厅专设一个机构管这个事情？对半工半读的工厂，材料要直接调拨，产品收购上照顾一点，因为它是少数嘛。

7月6日离开天津到达济南。

7月8日召集出席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如何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在谈话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带工作队到一个生产大队，参加“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亲自取得一项新的工作的实践经验。

7月9日召集出席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的军队系统师以上干部座谈部队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等问题。在谈到军队建设时说：在军队内部真正实行军事民主，使战士对干部无顾虑地讲话，是不容易的。要造成那么一种风气，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是把我们所领导的军队、机关、企业、工厂、农村都造成这样一种正常的局面。

7月10日召集山东省工业、教育系统的厅局长座谈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提出：现在我们只有一种教育制度，全日制的大学、中学、

小学，这种教育制度是不能普及教育的。在农村搞半农半读，在城市搞半工半读，这么一个形式，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就可以满足很多人读书的要求，国家负担不大，家庭也负担不大。这样就可以普及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至大学教育了。这件事可以放手一点去办。

7月11日召集山东省地委书记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

7月12日到达合肥。晚上，召集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座谈会，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在谈到要搞好省委内部的团结时说：我们要注意少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当然应该注意，但少数人的意见往往不大引起人们注意，应该认真听取少数人的意见，一般情况是，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不那么困难，而少数人的意见就不那么容易听得进去。

7月13日召集安徽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说：这个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土地改革困难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在谈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说：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要具体化一下，先搞试验，不要一下子铺开，最后又垮台，要过四五年再总结经验，搞得好一点，正规一点。

7月14日到达南京。听取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汇报工作。

7月15日召集江苏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在讲话中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分期分批下基层蹲点调查，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

7月16日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军区空军和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座谈会，座谈部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问题。指出：现在要加强军事工作，搞好民兵，还要搞点地方部队，要寓兵于民。现在战争打不起来，但军队要做好打仗的准备。

7月17日召集江苏省地、市委书记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7月18日到达上海。

7月21日、23日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在谈到两种劳动制度时提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多的国家，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要利用农村农闲劳动力的剩余，在城市做些工。如果这样做，就要逐步减少固定工，增加临时工、合同工，否则，都是固定工，将来不得了，如果劳动制度上一些规定妨碍两种劳动制度发展的，应该修改，要根据国家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加以修订。

7月24日到达郑州。召集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7月25日回到北京。

7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

参加的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比过去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还要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己到农村工厂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直接经验，才能领导现在和今后的革命斗争，否则不能领导。对“四清”、“五反”是伟大的大革命意义认识不够，对蹲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怕艰苦，是负责干部蹲点蹲不下去的主要原因。要把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每个省、每个大中城市，都来着手试办。从当前讲，这个办法可以普及教育，减轻国家和家庭的负担，从长远讲，可以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劳动制度还要实行亦工亦农制度，以后应该减少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比较多地用临时工。

8月2日听取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汇报时指出：现在小孩子很多而入学率低，他们希望入学，希望升学，这种愿望是正当的。不满足他们这种愿望，我们还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是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如果只办全日制一种学校，那国家和群众都负担不起。只有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才能既减轻国家和家庭的负担，又满足青少年升学的要求。

8月初在修改八月一日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记录稿时加写：“现在的敌我矛盾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有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

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离开北京，到达武汉。同中共湖北省委及地市委负责人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

8月6日、7日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

8月8日到达长沙。同中共湖南省委及地市委负责人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

8月9日、10日在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

8月11日到达广州。

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回去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后来在北京作了一次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也者，就是防“左”。

在广州期间，主持修改《后十条》。

8月12日、13日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8月16日召集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成员座谈会，讨论《后十条》修改稿。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汇报湖北、湖南、广东之行的情况和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問題，建议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实行“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毛泽东十八日复电赞成。

8月19日将《后十条》修改稿报送中共中央，同时致信毛泽东并中央：“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sup>[1]</sup>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就批转王光美报告一事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王光美于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称为“桃园经验”），介绍了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之后，王光美又在全国一些地方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刘少奇在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sup>[1]</sup>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但又指出：“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此次到会同志<sup>[1]</sup>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九月一日，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8月20日到达南宁。

8月21日、22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在二十二日谈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说：“我所说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学校制度，是结合的。还有一种是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的结合。两种劳动制度相互结合，两种劳动制度又与两种学校制度相互结合。”“实行这种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的结合，在当前来讲有好处。这使我们有可能普及教育，而国家负担得起，家庭也能负担得起。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制度，只实行现在的教育制度，即全日制的小学、中学、大学，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能普及教育，办多了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一方面消灭文盲，一方面大量的文盲又新产生了。小孩子现在也多。

[1]指八月二十九日底至九月一日召开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所以不想个办法，普及教育就没有希望。”这个报告部分内容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8月23日到达昆明。

8月24日、25日在昆明召开的中共贵州、云南两省省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

8月26日回到北京。

8月29日——9月1日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和《后十条》修改稿。《后十条》修改稿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经毛泽东批改、同意，于九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修正草案称，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8月31日会见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主席团成员，祝贺会议成功。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四十四个国家地区的三百六十七名科学家。

9月3日致信邓小平、彭真、安子文，建议“过去派到各地劳动锻炼的干部，凡符合参加四清、五反者，一律由各地省委组织他们参加四清、五反”。

9月10日同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会谈。

9月14日在一封署名“一群女护士”。反映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某领导干部在长期养病期间搞特殊化的群众来信上批示：“由全总、煤炭工业部处理。照中央决定，一切高级干部的专职医生和护士，一律撤销。”

9月16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副部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到基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认真蹲点调查，了解真实情况。

9月17日会见冰岛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人民意志报》主编玛格努斯·基亚尔但逊夫妇，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出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但没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经验。我们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出现修正主义，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和平演变呢？我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措施来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由于我们注意了，又有适当措施，有可能不出现，但还有可能出现。为什么？因为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事，总要失败一两次，这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我不能保证中国不会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和政府从上到下，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加以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就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质。美帝国主义也在算我们中国，它认为对我们这一代，没有希望，不会和平演变，第二代也没有希望，第三、四代他们抱有希望。美帝国主义在算我们，我们就要考虑了，如果第一、二代死了，怎么办？我们正在提出这个问题——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各级都要有接班人。接班人有五个条件，《九评》[1]里已经写了。

[1]指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

中央的公开信》一文。

9月18日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提出：计划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日常工作减少一点，一部分人搞计划，其他的人下去蹲点。这样，矛盾就揭露出来，问题就可以搞清楚了。在谈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时说：现在要试验，五年总结经验扩大试验，十年推广。计、经委要支持给原料、设备，分配生产一定的产品，要搞好。这个问题不能等了，再等十年，就困难了。

9月22日、23日、25日听取国家经委党组汇报工交系统关于当前工业生产状况、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托拉斯试点和物资管理等工作的情况。在谈到专业化和协作问题时指出：就全国来说，要搞大而全，工业部门要齐全；就一个大区说，也要逐步大而全，但在开始时先搞小而全；就一个企业来说，不能大而全，也不能小而全，要搞专业化，一个托拉斯，也不能完全靠自己，要靠协作。在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指出：托拉斯和部的职能要分开，托拉斯管工厂，管实际工作，部只管计划工作，搞综合平衡，做政治工作，监督托拉斯。在谈到物资管理工作时指出：物资管理首先目的要明确，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坐在办公室，不下去，就不能为生产服务，物资工作要统一管理，又要活。

9月23日起草《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如果我们不能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能直接听到群众的呼声，就不能参加和看到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就不能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真理，那我们就只能凭自己头脑里想像的和文件上规定的许多框框办事，或者在别人的指挥之下盲目地行动”。同日，致信毛泽东，请毛泽东对信稿审阅修改。二十五日，毛泽东复信，认为“信写得很好”，并建议加写一小段理论性的话，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加写了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并于三十日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又作了修改。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将此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

会见由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众议院议长休·费尔南多率领的议会代表团。

9月28日同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9月29日、30日同刚果（布）（今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一代巴会谈。

9月30日出席首都群众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刚果共和国（布）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一代巴举行的集会。晚上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招待会并讲话。

9月30日、10月2日同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会谈。在介绍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经验教训时说：独立后要巩固独立是可能的，但有一个危险。因为我们组织了政府，建立了政权，这个政府就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可能官僚化。脱离了人民就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脱离人民，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们也遇到过困难，遇到过灾荒。用什么方法克服困难呢？没有什

么秘密，就是国家领导人同人民群众一样，少吃少穿，一道克服困难。革命过程中多少次困难，多少次危险都走过来了。办法很简单，有困难，有危险，我们就同大家一道，站在最前面，站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别人就都跟上来了。战士们没有饭吃，我们也没有饭吃。遇到困难，我们有得吃，他们没得吃，就不行。我们也有这样的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脱离群众，群众不要他。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合乎大多数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的，但要有一个先锋队，一个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这个党是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能团结多数干部，有了错误能进行自我批评，不是犯了错误就说我没有犯。人民对我们犯错误是能理解的，但我们必须承认错误，他们就没有话讲了。如犯了错误不承认，人民、干部就不服。有这么一个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团结绝大多数人民和干部，这个国家的独立就能巩固，经济就能发展。

10月4日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财政、经济计划、司法和行政管理大臣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

10月5日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

10月7日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格奥尔基·毛雷尔。

10月8日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

10月9日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上将。

10月12日为转发《李雪峰致刘少奇的信》[1]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要求“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此件于十六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0月18日复信李富春：“十八日来信收到。我现在不能向计划会议的同志们讲话，因为我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你送给我的材料，也没有看完。明年计划以早日下达为有利。请转告各位同志，要当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计划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就必须实事求是，大公无私，敢于同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而不要顾虑个人得失。我看，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同志有右倾思想。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中央最近转发了李雪峰同志的一封信，请给同志们念一念。今天河北省委又送来一个反对右倾的情况简报，也可以念给同志们听。但是，不要同过去一样在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上去反对右倾。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只能在厉行节约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当前的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等方面。”

10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1]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于十月十一日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了山西、河北等省的县级领

导干部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抵触情绪等思想动态。告》。指示中提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之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31日同阿宫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会谈。十一月一日，同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会见查希尔国王。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坚决支持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11月1日同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再次会谈。

11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提出：“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此批示于十二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县团级党委。

11月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草稿）》，加写：“党内或机关于部中有支持和参与投机倒把活动者，查明属实后，立即开除党籍和工作，送回乡村监督劳动，或判处劳动改造。”此通知于十二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

12月6日致信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将《河南省委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推荐给东北地区各省委阅读，要求东北局和东北地区各省委领导参照河南省委在报告中反映的县社两级干部严重“四不清”的情况，“亲自抓住几个县和二一个市的工作队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不断整顿工作队，并取得运动的胜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此信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于十日发至省军级党委。

12月7日致信周恩来：“现在农村各种统计报表和所谓‘调查提纲’太多，影响了农村基层工作。这些报表，绝大多数是不必要的，以此统计的数字大多数不实。要取得我们所需要的确实的统计数字，要付出艰巨的努力，才能取得，绝不是坐在办公室发一张表就能获得的。因此，统计部门的工作有彻底加以改进的必要。”

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运动前一阶段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批评。会议后期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某些过左的做法。但是，《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

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2月15日在全国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讲话。在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调查、在农村中重新划分阶级成份等问题。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向即将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

12月16日出席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涛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12月17日出席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12月18日出席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向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明和彭真关于会议议程的说明。

12月19日出席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12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进一步讨论全国各地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问题。

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会议根据刘少奇主席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2月21日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以副总理阿齐兹·西德基为团长的工业经济代表团，在谈到我国对外援助问题时说：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足，经济上还落后，我们援助别国的能力还不大。我们在能力许可范围内尽力帮助一些。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帮助是诚意的。我们的帮助一定要对你们有用，使受援的亚非国家能够自力更生，而不是使它们依赖中国，要使它们既不依赖中国也不依赖欧洲国家，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

12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召集中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5日召集华东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6日召集东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7日出席全国工作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赛福鼎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作了发言。

12月28日出席全国工作会议。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作了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召集西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9日召集西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30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并就国际国内形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作了讲话。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我们党内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党内有这么一些人，他当了权，他又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搞剥削，搞压迫，乡村里面的基层组织，如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就有这么一些人。有的包括区、县里面的负责人，比如县长之类。此外，还有一些专区、省的人。中央，也有个别部门查出来了。在谈到加强思想改造问题时指出：不要怕改造，我们自己最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相信孔夫子，相信封建文人，后来又相信资本主义，相信国民党，最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人从来就是在不断跟自然界的斗争中间和在社会阶级斗争中间改造自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造的目的，是搞好中国。我们只要把中国搞好，把中国的自然界、中国的经济技术改造好，把人也改造好，社会也改造好，就搞好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了，这个影响会是很大的。

## 1965年六十七岁

1月1日召集华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月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前一阶段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依靠工作队，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要求各级领导改变这种状况，文件直接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

1月8日召集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讲话。

在看了中共北京市委通县四清工作团《四清简报》所登《高各庄大队贫下中农群众控诉斗争严重四不清干部窦子祥》一文后，致信彭真，指出：“工作队组织群众斗争的许多方式，是不好的。如大会次数开得过多，在会上打人并实行其他形式的体罚等。”“四清简报印发这个材料，没有对这些加以批判，是不对的。”

1月9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国民议会议长诺罗敦·蒙达那、政府首脑诺罗敦·康托尔，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感谢他们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为营救于一九六四年四月被巴西当局非法逮捕、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非法判决的九名我国贸易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所作出的努力。

1月1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将《二十三条》下发全党。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中央的通知，在点上和面上都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通过这次宣传，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和其他群众得到支持和鼓舞，使得干部和工作队员得到教育和提高，并且会起安定人心的作用，和使极少数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更加孤立。这样，也就能使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使今年的生产建设搞得更好”。

1月27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由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率领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

1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治局会议今后的工作方法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即将来华（访问朝鲜路过北京）会谈等问题。

2月4日、6日、7日、8日同邓小平等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和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组成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会谈。

2月9日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范五关于准备森林后备资源问题的意见的电文上批示：“请余秋里同志注意在长期计划中应列入森林工业和森林资源这一个项目，不要忘了扩大森林资源的工作。全国绿化的工作，也要广泛动员群众来做。”

2月11日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和由他率领的苏联代表团。

2月1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国内市场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和罗瑞卿关于军事工业建设的报告。

2月17日同周恩来到机场欢迎但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和夫人。十八日、十九日同尼雷尔总统会谈。十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雷尔总统。二十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但桑尼亚友好条约》上签字，并出席首都人民欢迎尼雷尔总统访华举行的集会。

2月21日陪同尼雷尔总统访问南京，参观南京无线电厂，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和民兵的军事表演。

2月22日陪同尼雷尔总统访问上海，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二十三日，在上海为尼雷尔总统送行。

2月23日、24日在上海听取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关于上海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汇报。

2月25日回到北京。

3月2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穆罕墨德·阿尤布·汗和外交部长阿里·布托。三日、四日，同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会谈。

3月1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苏共中央于一日至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的情况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对于这次会议的评论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文章于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月17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

3月18日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中央委员会主席默·威廉斯。

3月19日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和由他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会见由叙利亚外交部长哈桑·穆拉维德率领的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在谈到两国之间交流经验时说：我们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同你们谈，一定要谈反面的经验，谈犯了哪些错误。我们有些同志，不愿向外国朋友谈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愿向外国朋友谈落后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应该真诚地对待我们的外国朋友。既要谈成绩，也要谈缺点和错误；既要安排看先进单位，也要安排看落后的单位。在谈到政策制定的依据时说：“我们按照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才能巩固。我们就执行这一条。判断一个国家政策的好坏、正确与错误，其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人民最大利益有利的事，我们就办；对人民最大利益不利的事，我们就不办。”“人民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为了暂时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有些人为了少数人利益，不顾多数人利益；有些人为了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这是人民内部意见的不同。对这种意见的不同，不能用强迫手段，要采取说服的办法，讲清道理。一次说不过，多说几次。说服了，办出的事就不一样了。中心问题是，争取绝大多数人的人心，发展和组织他们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

3月28日会见英属圭亚那人民进步党主席布林德利·本和乔治·戴维。

3月30日会见智利前副总统德尔佩德雷加尔。

3月31日听取教育部负责人汇报正在召开的全国农村半工半读教育会议

情况，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有什么办法使资本主义不复辟？这是个世界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我们来解决。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

4月5日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题词：“热烈庆祝伟大的万隆会议十周年！热烈欢呼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向富有革命英雄气概的、觉醒的、战斗的亚非人民致敬！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帜，发扬万隆精神，坚持斗争，把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非洲彻底清除出去！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合作、互相支援，为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而共同奋斗！预祝即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更大成就！万隆精神万岁！亚非团结万岁！”

4月10日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外事顾问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时说：各级领导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私心，不贪污，能吃苦，必要时与人民一起吃苦，这样，国家才能搞好。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肃清贪污盗窃。我们不敢保证我们的政府能肃清他们，如搞得好，就能肃清，搞不好，也不能肃清。我们就是依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和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核心必须与人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与广大人民结合得好，才能保证肃清贪污盗窃集团，否则，就不行。

4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越南形势和国内备战问题，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4月18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集会。

4月19日同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4月22日接见被巴西当局非法关押一年多后于不久前回国的贸易、新闻工作者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马耀增、王治、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张宝生等九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谈话时说：经过这次锻炼、考验，很好，以后就可以更好地斗争了。考验有几个方面，一是受到人家压迫，要威武不能屈，你们已经经受了这种考验；二是富贵不能淫，出国人员很有这个危险；三是贫贱不能移。有的人出去后就跑了，跑有什么好处？跑是没有出路的。几年来，我们许多出国同志，在国外都受到了不少的锻炼，特别是专家、工程师，他们在外国同人家一起劳动，很受欢迎。有的已经死在国外了。死了就葬在那里吧，不要搬回来，这是为了他们的事业而牺牲，埋在那里，人家会纪念他们的。

5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情况的报告》和《关于适应备战形势，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工交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全国是一千二百六十多个基本建设项目，跟最高时期的一千七百个差不多了，战线已经相当长了，各地方、各部门切实要控制这种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的情绪，要切实控制，不准自由上马，以后中央批也要注意。同时，这一千二百多个里头也有一些是可以推迟的，要注意，不要又搞一次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5月12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声讨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多米尼加集会。

5月1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姚依林[1]关于财贸问题的汇报。在谈到加强农村商业机构时指出：供销社搞大生意忙不赢，对小生意就容易忽视。要专设一个机构，成批收购的东西不管，就是收那些小东西。在谈到改革现行商业体制时指出：要抓批发机构。批发机构集中，零售和小批发机构分散，商品合理流通就彻底解决了。

5月1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关于工业生产的汇报和李富春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汇报。在谈到基础工业时指出：今年运输紧张、电力紧张、煤炭也紧张，明年怎么办？明年更紧张，后年更紧张。现在大概是运输能力、煤炭能力、电力已经到了饱和点了，不增加运输能力和发电机组，煤炭不增加，事业就上不去，钢材当然也上不去。所以，现在不只是解决今年的紧张问题，现在就要着手为明年、后年作准备。这样，才可以从被动走向主动。

5月21日在北京市一 一中学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地改制是可以的。而且似乎也应从一年级开始逐步地进行改制，分几年改完。教师学生不愿半工半读者，都暂不勉强。半工半读学校同样有一个升学问题。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应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

[1] 姚依林，当时任商业部部长。

5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的汇报和张爱萍[1]关于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情况的汇报。

5月25日参观第七机械工业部二二一厂。在谈到民兵工作时指出：现在不打仗兵显得多，一打起仗来兵就少了。各兵种都要搞自己的民兵，如守备部队一个营，应该抓两个营的民兵训练，平时训练、生产，打起仗来就是几个营了。机动部队，平时住在一个地方，也应该抓两个军的民兵训练，打起仗来就是几个军。特别是防空部队，就那么几个防空师、高射炮师，打起仗来，正式防空部队开到前线去，后方就要靠自己保护自己。

5月26日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医务人员是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

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在汇报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提出：铁路运输问题，你们考虑一下。以后在人口多、生产规模也大的地区，很多铁路干线都要修双轨。运输是个大问题，非修双轨不行，不然，生产上不去。要把水运搞起来，特别是长江南北，这样，就可以少修一点铁路。搞水运，比修铁路便宜。秦始皇的时候就搞了很多运河，有的我们现在还可以利用，只要挖通就行了。我们要规划一下全国的运输，有些小河，只要筑一米高的坝，就可以走船。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各方面都要照 [1]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顾到。在汇报到劳动力的安排问题时指出：教育制度同劳动制度是联系起来的，劳动制度不搞好，教育制度是搞不好的。现在多余的年轻工人，可以搞半工半读，此外，就是新增加的学徒，要他半工半读，读三年书、四年书，达到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水平。这样，过四、五十年，我们工人阶级的面貌就改变了。搞得太快了不可

能，搞得太慢了也不好。总而言之，不许工厂随便招工人，要搞半工半读。

6月1日听取托拉斯试办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汇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组织得更好。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些，更有组织些。“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总之，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可以考虑托拉斯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恐怕几种形式都要有，只一种不行。”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试办托拉斯》。

6月3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表示：“中国人民将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兄弟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6月5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夫人。

会见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亚齐德。

6月8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科乔·蒂奥多西和由他们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6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高等教育部党委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写的《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

6月28日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康良温和由他率领的朝鲜人民代表团。

7月3日会见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

7月5日听取全国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筹备小组汇报，提出：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要使它形成习惯、制度，不要看成小事。厂长自己讲话要秘书起稿，为什么这样搞？就是架子放不下来。能讲一点，就讲一点，不能讲，就不讲。以后要禁止这件事，提倡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懂一点，说一点。

7月11日为批转王任重报送中央的九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7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15日会见参加第六次社会主义国家邮电部长会议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团。

7月17日听取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郭子化、崔义田、史书翰等关于医务工作如何为农村服务问题的汇报。

7月20日听取农业部部长江一真汇报正在召开的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会议情况。

7月21日同董必武、周恩来到机场欢迎索马里共和国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二十二日，同周恩来与欧斯曼总统会谈。二十三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欧斯曼总统。二十五日，到机场为欧斯曼总统送行。

7月24日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二十五日，同奈温主席会谈。二十六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奈温主席。

7月27日陪同奈温主席抵沈阳访问，参观辽宁省工业展览馆。二十八日，陪同奈温主席到鞍山访问，参观鞍山钢铁公司的炼铁厂、炼钢厂、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同日返回沈阳。二十九日，在沈阳为奈温主席送行。

7月29日在沈阳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汇报工作，提出：“四清”运动就是发动群众解决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样就可以纲举目张，其他各项工作就都搞上去了。但是“四清”以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也还会有新的问题要不断解决。领导机关的作风，包括组织机构和领导方法，还要不断改进。

7月31日同董必武、邓小平等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及夫人。

8月3日同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8月4日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会谈，五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艾地。

8月8日会见柬埔寨王国内阁副首相、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宋双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代表团。

8月11日听取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汇报发展农业机械生产问题，指出：农业机械就是生产力，现在搞不好将来总会搞好的，这方面搞不好，对农业没有利，农业事业就发展不了。我们要尽可能少走点弯路，少贴点本，把这条路走通。

8月13日阅谭震林送来反映有关各地农村工作中发生没收社员自留地、擅自将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硬性向社员摊派集资任务等情况的四份简报后致信毛泽东：“这是谭震林同志送来的几个材料，并且要求发给各地。我觉得这是震林同志第一次注意并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意可以同意震林同志意见转发各地。请主席审阅。如主席认为可以转发各地，请主席批示。”毛泽东二十日批示：“照办”。以上材料加上中央按语后以《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8月26日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四百多名日本朋友。

8月28日同毛泽东会见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

9月3日出席首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集会。

9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关于卫生工作的汇报，基本通过卫生部党组《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

9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肖望东等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

9月10日同周恩来、邓小平等听取物资管理部部长袁宝华汇报物资管理改革工作。在汇报到物资管理工作还没有经验时说：“没有经验我们就要总

总结经验。现在不只是物资工作没有经验，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工作也都还没有经验。这个问题，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解决。但是他们不说没有解决。我们承认没有解决。承认没有解决的本身就是个成绩，这样就有解决的可能性。”在汇报到物资工作的方针方法时说：“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物资部的工作一定要和生产结合起来，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会反过来影响、限制、促进生产的发展。有时分配对生产要起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时说：“今年的生产高潮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其中也有盲目性，增加得太大了。原计划生产增长百分之七，工交会议上决定增产计划为百分之十五，结果到六月底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我看还会走到它的反面。不正当的自筹资金和在市场抢购物资都要制止。”

9月11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运动会开幕式。

9月13日同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和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十七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袴田里见和砂间一良。

9月18日——10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刘少奇主持了九月十八日的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报告。因接待来华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刘少奇没有参加后一阶段的会议。9月19日——21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同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召集中央军委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其可能出现的前景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

9月27日同朱德会见由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鲁尔·萨勒、副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威路约·普斯波尤多率领的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9月28日到机场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二十九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三十日，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

10月8日同周恩来等会见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进勇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10月10日到哈尔滨迎接访问朝鲜后再次来华的西哈努克亲王。十一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哈尔滨儿童公园，同欢迎的少先队员一起乘坐小火车。十二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哈尔滨电机厂和哈尔滨汽轮机厂。

10月12日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汇报工作。在谈到副业生产时指出：要把副业生产搞起来，副业生产搞不起来，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你们这个地方有半年的农闲时间，可以多搞些生产，多收入一些，当然还要搞农田基本建设。在谈到农业生产成本较高时指出：这个问题除了正确解决国家和集体、个人的关系外，重要的是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比如机耕费问题，河北有一个拖拉机站，每亩机耕费是一元七角，经过“四清”，把三级管理改为两级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提倡增产节约，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机耕费减少了一半。在谈到林业工作和群众搞副业发生矛盾时指出：在不妨碍国家利益的条件下，要照顾群众的利益，这样群众反过来也会照顾国家的利益。必须实行两利政策，利于群众，利于集体，利于国家。不两利，只有你有利不行。有群众的地方，要依靠群众护林、造林、育林，但是要解决关

系问题，解决林权问题。分散的、小片的次生林，要分给公社或生产队，大片的次生林，可以不分，但要解决群众的需要。

10月13日到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到昆明访问送行。回到北京。

10月24日全国政协四届三次会议决定：刘少奇为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

10月2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和印度尼西亚政治局势的情况通报。

10月31日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赞扬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是对中国近代历史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伟大人物，号召全国人民和海外一切爱国人士，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彻底实现孙先生的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理想而奋斗。

11月3日听取教育部部长何伟、刘皑凤副部长汇报正在召开的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情况。

11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制度问题。在会议上讲话：“我们的国民教育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全日制；一种是业余教育；一种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工半读学校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和当工程师的水平，但是也要能当工人、农民。当然，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今后还应多培养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农村实现四化需要大量技术人员，城市应该为农村输送这种人材，但也要随着需要和可能逐步地输送。“城市普及初中，还是提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城市全日制初中、农村全日制小学，不要提停止发展，这一条路不要堵死。”但也要参加劳动，锻炼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城市职工的业余教育，一定要重视。城市半工半读，要坚持五年试验，十年推广，各种各样形式都可以试验，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在中国避免出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根本的有三条措施，第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要坚持到底；第二是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搞半工半读，全日制要改革，还要加强业余教育；第三是干部参加劳动。我们把这三个办法实行了，也许能够避免，也许还不能避免。

11月9日同周恩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1]《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1月15日、1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制度问题。在会议上讲话：工业部门既是生产队，也是教育队，今后要注意教育。青少年参加劳动，还要注意卫生，劳动时间不能过长，不能过重。现在有些半工半读学校，劳动重，功课也重，要提醒注意。

11月17日、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先后听取余秋里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谷牧关于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吴波[2]关于财[1]姚文元，当时任《解放日报》编委、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

[2] 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政情况的汇报；讨论并原则批准了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

11月18日会见第二批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青年代表团团

长及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日本友协常务理事三好一、日本民青中央委员佐佐木一司等。在会见时说：中国在以前是个落后的国家，现在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有大量的落后的现象没有消灭，特别是在农村里，经济上、文化上比你们日本还是要落后一些。想克服这个落后的现象，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可能比你们从明治维新开始发展工业的时间要短一点，但是，也不能很短。发展我们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只能靠中国自己的政府和人民来节约，不能靠其他的办法，不能靠掠夺和剥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来发展。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是团结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进行艰苦的努力，来克服这些落后的现象，把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建设好。

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为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广播工作做好，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得到鼓舞。”

12月8日——15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罗瑞卿[1]的所谓“问题”。会上，林彪、叶群[2]、吴法宪[3]、李作鹏[4]等人罗织罪名，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罗瑞卿因此被调离军事领导岗 [1]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叶群，当时任林彪办公室主任。

[3] 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4] 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位。12月15日为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致信毛泽东：“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日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经毛泽东同意，《论十大关系》一文于二十六日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

## 1966年六十八岁

2月3日将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同意中南局公开发表，建议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2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提纲提出，要坚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八日，彭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二日，中共中央将提纲转发全党。

2月1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薄一波、陶鲁笏[2]关于正在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政治工作[1]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2]陶鲁笏，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会议情况汇报。指出：一九六五年的成绩是八年积累来的，现在看，进步很大。但是，应当说，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还只是开始，潜力还很大。一方面要鼓足干劲，一方面要稳步前进，头脑要保持清醒，还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现在是一步步地走向正确，认识水平一年一年提高。大跃进几年要一分为二，调整时期要一分为二，最近几年也要一分为二。总之，一年比一年好，走上了好转。做任何工作都要把政治意义向参加工作的人讲清楚，这样工作就可能做得更好。突出政治的结果，大家就不会在物质利益上斤斤计较。工作做得更好，也要注意按劳分配，不能工作搞得越好，工资越少。工人有许多实际困难要解决，包括家属问题。第一要突出政治，第二要解决实际问题，保证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群众路线问题。

2月23日就贯彻毛泽东对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所作的批示致信周恩来、邓小平，提议“先将湖北省委文件、毛主席批语、王任重同志的信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计委、经委、建委、科委、物资部、八机部、一机部、华北局李雪峰、刘子厚各同志研究，并准备意见，几天以后，中央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随后，刘少奇主持有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农业机械化问题，责成国家小计委[1]摸清情况，拟出方案，提交下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由小计委派[1]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决定由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中共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中共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贾庭三等人组成新的工作班子，负责国家经济计划的规划和编制工作，当时被称为小计委。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方案，进行试验。三月十一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以上处理过程。

2月24日到机场迎接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三月四日到机场为恩克鲁玛总统送行。

2月26日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谈工会工作。指出：工会工作到

底如何做？列宁讲过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政权的支柱，但他自己没有实践过。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要起纽带作用，起渠道作用，要反映情况。你们恐怕还有顾虑吧？这是计较个人得失。工会要站稳立场，站稳了阶级立场就可以反映情况。反映错了就错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反映对了，得罪了人，把你撤了职，但群众还是拥护你的，怕什么呢？

2月28日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岡正芳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三月三日、四日、六日，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

3月1日写信给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王光美：“关于在四清中是否要有一段清政治，既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各人意见去作，看结果如何。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作。”

3月7日同邓小平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

3月17日到达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现状，认为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3月20日回到北京。

3月22日离开北京，到达乌鲁木齐。

3月24日听取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汇报工作。指出：新疆有这样大的草原，很好，你们要保护草原，保护草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还要改良草原，合理利用草原。新疆畜牧业可以大发展，有前途。要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业促进畜牧业发展。在牧区要搞半牧半读，给牧民增加一些文化，这是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办法。你们农业有长期设想，工业也要有长期规划。日用品、消费品都要自己制造，从内地运划不来，本地内部调运也不方便。要就原料、就市场分散布局。在十五年左右要做到除了少数东西自己不能制造外，大多数东西都能自己制造，而且各地都能制造。同时，你们还要搞钢铁，搞机械制造，拖拉机、汽车都可以自己制造。

3月26日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到达拉瓦尔品第。同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会谈。在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我们坚决反对侵略者。我们支持世界上一切反对侵略的人民，并且尽我们的可能，支援他们的斗争。亚非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反对侵略的斗争，最后是一定会胜利的。”

3月27日继续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会见萨达尔·阿卜杜勒·加尧姆、阿里·穆罕默德·坎瓦尔、穆罕默德·阿斯拉姆汗和马克希尔·沙阿等四位克什米尔公众领袖。在阿尤布·汗总统陪同下参观历史古迹泰格西拉博物馆。

3月28日在阿尤布·汗总统陪同下，参观正在建设中的巴基斯坦新首府伊斯兰堡。下午，到达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访问。

3月29日访谒巴基斯坦著名爱国诗人阿拉马·穆罕默德·伊克巴勒的陵墓，参观巴德沙希清真寺和拉合尔堡，出席市民招待会和巴中友协举行的午宴。

3月30日到卡拉齐访问。向巴基斯坦第一位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陵墓献花圈，出席卡拉齐市民招待会。

3月31日离开卡拉齐回国，到达新疆和田。

4月4日离开和田前往阿富汗访问，到达喀布尔，受到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的欢迎。向阿富汗先王穆罕默德·纳迪尔·沙阿

陵墓献花圈。在国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中国一贯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发展关系。中国不容许别人用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对待我们，同时也不容许自己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别人。”

4月5日同查希尔·沙阿国王和穆·哈·迈万德瓦尔首相会谈。在谈到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时说：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亚非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我们在给援助时，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的要求。但因为中国基本上仍是一个落后国家，力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要求。现已有三十五个亚非国家接受我们的援助，对我们来说，需要相当一部分支出，但分给三十五个国家，每个国家只能得到很小一部分。希望亚非国家了解我们这种实际情况。

4月6日访问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参观礼拜五清真寺和比扎德公园。下午，返喀布尔。

4月7日参观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出席喀布尔市民举行的欢迎集会并讲话。

4月8日离开喀布尔回国，到达乌鲁木齐。

4月11日离开乌鲁木齐，到达昆明。

4月15日离开昆明前往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访问，到达达卡，受到阿尤布·汗总统的欢迎。出席达卡市民招待会。4月16日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年来，多数亚非国家和个别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亚、非、拉国家要取得独立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是继续前进的，它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不甘心完全从它们的势力范围撤退，还想保持它们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实际上这是一个斗争，是一个亚、非、拉美被压迫人民及其领袖要独立同殖民主义国家要保持它们的利益和特权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还会继续发展。一时产生逆流是会有有的，但总的历史发展趋势必然是亚、非、拉国家完全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下摆脱出来，获得完全的独立。

游览达卡附近的希塔拉卡雅河和观看巴基斯坦民间歌舞演出。

4月17日离开达卡前往缅甸访问，到达仰光，受到奈温主席的欢迎。在奈温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中缅两国历来是友好的，十多年来，不管亚洲和世界上发生什么变化，中缅友谊一直向前发展，我们两国人民能够这样和睦相处，友好合作，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双方认真执行了两国政府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真正做到了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们始终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友好地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的友好关系是有原则的，是有广阔发展前途的。”

4月18日同奈温主席会谈。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献花圈。

4月19日离开仰光回国，到达昆明。

4月20日到达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4月25日回到北京。

4月28日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到机场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谢胡举行会谈。五月二日，继续同谢胡会谈。五月十一日为谢胡送行。

5月1日分别会见尼泊尔工商大臣里贾尔和几内亚工会代表团团长、教育总监察长路易·贝昂赞，并谈话。

5月4日——2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先后领导进行了对彭真[1]、罗瑞卿、陆定一[2]、杨尚昆[3]的错误批判，并主持制订了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会议期间，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知》的许多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加写的，其中有：“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 [1]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

[2]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伴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制造恐怖气氛。二十六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5月18日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

5月27日分别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马丁·比尔巴赫和即将离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并谈话。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5月30日起草并发出署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请示信：“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1]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毛泽东于当日夜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致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记得大概是一九四八年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寄来这篇据说是我写的文章（当时题目

叫“论态度问题”，现在又改为“怎样正确处理同志关系”），并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是不是可以发表？当时我就用电报答复西北局李卓然同志说，我不知道有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请他不要发表。这样一篇显然有很多错误的文章，现在还在流传，影响实在不好，请设法制止。”

6月1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宋硕[2]、陆平[3]、彭珮云[4]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起草并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地青年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大革命”

[1]报馆，指人民日报社。

[2]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

[3]陆平，当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校长。

[4]彭珮云，当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运动哄然而起。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1]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该校党委职权并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学生很快的组织起来，走上轨道。会议同意李雪峰在汇报中提出的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会议还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这些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此后，随着运动的进展，根据大多数学校党组织陷于被动瘫痪的情况和学校师生的强烈要求，北京市的大学、中学普遍派驻了工作组。许多省、市也仿照北京市的做法，相继向当地的大学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

新华社播发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

[1]张承先，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职权。”这一电讯稿由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起草，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

6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领导职务，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同意。

6月6日、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在会上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

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线，明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6月7日分别会见但桑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马里政府经济代表团，并谈话。

接受马里新任驻华大使吉塞·提迪亚尼递交国书。

6月9日——12日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1]、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在讨论中提出：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讨论中对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形成明确意见。

6月11日在杭州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与越南劳动党中央[1]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委员会主席胡志明会谈。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4日——28日多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先后提出：对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工作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黑帮，也允许他改正错误，给出路。

6月20日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后来，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八月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听取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工作组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对这个学校的运动发表了意见，并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你们和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

6月22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唐·本·鲁·古纳瓦德纳并谈话。

6月27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通报了“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

6月28日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并谈话。

6月29日打电话给康生，就《人民日报》“七一”社论稿中点名批判彭德怀、彭真一事提出责问，要康生立即制止这种擅自点名的做法。

6月30日同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稿，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手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四十万职工的企业，决定用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七月二日，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即发出。这个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并规定要“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

7月11日再次听取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工作组关于该校运动情况的汇报，向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部署的设想：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

7月1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共青团中央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的汇报，对中学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求和政策等作了指示：（一）我们的教育，是从资产阶级的教育沿袭下来的，所以，不能对所有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数代表人物，大多数人从中受到教育，树立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二）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边，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三）清经济。政治清了，组织清了，思想也清了，趁这个机会把经济也清一下。他还提出：第一阶段的工作，初中在八九月底搞完，争取十月开学上课，高中在九十月搞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7月1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

帮进攻。当晚，在怀仁堂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任。

7月22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发表声明：“我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种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他在讲话中建议：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因为相互间有各种问题要讨论，有的时候要辩论。对牛鬼蛇神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办法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同学中间有不同的意见也要贴大字报，也要放手发表意见，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要发表意见，也要讨论。讨论起来就要辩论，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同时，辩论中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发生各种事件也是完全可能的。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时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7月31日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会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一九六六

年暑期物理讨论会的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及其他外国朋友。

8月1日——12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1日向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国际国内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派工作组的作法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毛泽东在插话中指责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组织“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8月2日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参加学生大会，听取了两派学生的发言，最后作了讲话，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有不同意见讨论么，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8月3日再次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分别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向他们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团结起来，讲究政策，共同把运动搞好。

8月4日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南组讨论并发言，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在会上又一次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伯下台，有五条不怕。

在中南海同驻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主动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谅解。

8月5日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泽东写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七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此后，全会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二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

央领导机构，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只有林彪一人仍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等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刘少奇在会上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

8月11日、12日林彪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告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把这份诬告材料通过江青转给毛泽东。

8月18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从这次开始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一百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煽动下，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破坏法制，使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9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1]，并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九月十四日复函刘少奇：“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2]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9月14日致信周恩来：“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十七日，周恩来按毛泽东、刘少奇的意见批办。

9月16日康生利用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向毛泽东写信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10月9日——28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 [1]这一检讨提纲后改为在当年十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2]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这次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0月22日致信周恩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周恩来未再提出意见。

10月2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对所谓“路线错误”承

担了责任，说：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的，就是我。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10月31日致信周恩来：“童小鹏[1]同志电话说你的意见，是否可以把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我是否有什么修改？我同意你的意见，把我的检讨发下去。我已作了一些修改[1]童小鹏，当时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改，并加了一段，列举我在历史上所犯的一些错误。现送给你，请你审阅修改！是否要送主席和林彪同志审阅，也请你酌定。”十一月九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印发至县、团级。

11月12日出席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

12月6日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林彪在会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刘少奇在发言中被迫作了检讨。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二十五日，蒯大富带领五千余人上街游行，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这一煽动活动持续了多日。

## 1967年六十九岁

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六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月5日致信毛泽东：“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六日批示周恩来：“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周恩来于七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1月12日戚本禹在钓鱼台十六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说：刘、邓、陶[1]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当晚，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强行闯进刘少奇住处，第二次围攻、批斗刘少奇夫妇。

1月13日毛泽东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1]刘、邓、陶，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谈话中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要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对所提要求未表态。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并把它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材料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这个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成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3月28日致信毛泽东，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澄清事实真相，说，“我看过《清宫秘史》这个影片，记得是在主席处开会回来，在春耦斋看的，看时已是下半夜，看完天已大亮，后半部看得不大清楚。一起同看的，有总理周恩来同志，似乎还有胡乔木等人。看完就散了，我们都没有讲什么。”“我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不可能……讲这个话。”

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中用“八个为什么”归纳了所谓的刘少奇“八大罪状”，攻击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4月起，报刊上开始不点名地对刘少奇批判攻击。

4月6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再次批斗刘少奇，勒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要他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

刘少奇按历史事实逐条据理驳斥。当造反派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4月9日获悉清华大学要组织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愤慨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他还对家人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同时又对子女们说：“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4月10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了号称三十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数百名领导干部同时陪斗。

4月12日——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先后讲话，罗织和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

4月14日针对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一篇答辩材料，逐条说明事实真相。其中在回答“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说：“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他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这个错误。”这份答辩材料当时由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但几小时后就被撕成碎片。此后，刘少奇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

5月8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为名，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此后，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并在群众中开展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

7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八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等问题承担了责任，说：“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

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这份检查被造反派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

7月16日针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造反派组织的无理要求，致信汪东兴说，鉴于第一次检查被说成是“反扑”，不准备再向这个组织作第二次检查。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刘少奇在被拉去批斗前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批斗会后，刘少奇被与家人隔离，单独看管，失去了行动自由。

7月20日——24日三次致信汪东兴，要求他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多封信件和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揪刘”的情况转报中共中央，请中央决定处理办法，均未获答复。二十日夜，戚本禹等派人冒充“革命群众”，强要刘少奇写检查，遭到拒绝。

7、8月间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所谓“揪刘火线”，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包围中南海，扬言要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8月5日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号称有百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大会。与此同时，中南海内再次组织了“批斗刘、邓、陶大会”。

8月8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进一步表明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子女们被赶出中南海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十一月王光美转押秦城监狱，从此刘少奇一个人被看押在住所。

## 1968年七十岁

2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通知，向“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写出一份书面答复，叙述自己入团、入党和历史上两次被敌人逮捕并经营救出狱的经过，阐明事实真相。

2月26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同志。”

9月16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刑讯逼供等恶劣手段伪造证据，拼凑了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江青在对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二十九日，林彪对此批示“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13日——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七。第八届中央委员九十七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十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四十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中央直属机关的人员达七十四人，占会议成员总数一百三十二人的百分之五十七多。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批判了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造成了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本年刘少奇继续被单独关押，从年初起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四月上旬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小步态等症状。七月上旬，在慢性支气管炎基础上发生支气管肺炎。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病情严重，经抢救脱险，但以后又多次发作，到十月份共发生较大反复五次。十月九日以后完全不能自行进食，靠鼻饲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病情报告》记载：刘少奇的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

## 1969年七十一岁

4月1日——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江青一伙的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二十八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7月5日支气管肺炎发作，发烧，咳嗽，呼吸增快，两肺湿罗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医生会诊后的《病情报告》称：“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后经抢救治疗，病情暂时稳定。

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十日三次病危。

11月12日晨六时四十五分，在河南开封逝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四日，在河南郑州隆重举行刘少奇骨灰迎送仪式。刘少奇的骨灰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刘少奇亲属接回北京。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九日，遵照刘少奇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